

读懂 一带一路

全面解读新丝路战略机遇
系统展望“一带一路”未来图景

国家智库顶级学者 前瞻中国新丝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审定
厉以宁 林毅夫 郑永年 等◎著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读懂“一带一路”

作者:厉以宁等著；智石经济研究院编著

ISBN:978750865441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从上海自贸区的经验来看，“一带一路”关键是制度创新。大家拿出相互的信任、诚意，“一带一路”一定能搞得好。

厉以宁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

“一带一路”战略带动的基础设施投资正是重要经济增长动力之一，水泥、钢铁、电解铝，随着“一带一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会创造很大的市场需求。

林毅夫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要配合国家的大战略，优先考虑“一带一路”，抓住这个大机遇。

汤敏

国务院参事、智石经济研究院院长

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旋律的外交战略将开启新篇章，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重构正式登台，中国有望迎来第四次投资浪潮的大变局。

管清友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

前言
“一带一路”为中国经济带来重要增长动力

厉以宁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林毅夫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秘书长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三次提及“一带一路”，指出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将“一带一路”列为2015年重点推进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毫无疑问，2015年被视为“一带一路”落地实施的关键年。

厉以宁：沿线国家相互信任，“一带一路”一定能搞好

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意味新变化，也意味着新机遇。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

谈到新常态下“一带一路”的发展，从上海自贸区的经验来看，关键是制度创新，要复制一批可以推广的模式，海上、陆上的“一带

一路”，都在上海自贸区的影响下发挥作用。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行过程中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贸易和投资并重，不是单纯为了贸易，也不是单纯为了投资，适合投资的就投资，适合开展贸易的就开展贸易；

第二，中国应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很多基础设施要做，把基础设施搞好，对整个路线将来的畅通是有好处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样如此；

第三，中国要跟沿线国家更好地合作，更好地谅解，这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拿出相互的信任、诚意，这样“一带一路”一定能搞好。

林毅夫：“一带一路”为新常态经济提供多元增长动力

在“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健康、稳定的增长，我们有实现8%增速的潜力，达到政府工作报告所讲的7%左右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做得好，会比7%还要高。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等中低端产业逐渐失去了比较优势，我国还有没有新的增长动力？我们当然还有比较优势。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仍有多方面增长动力来源，“一带一路”战略带动的基础设施投资正是重要经济增长动力之一，水泥、钢铁、电解铝，随着“一带一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会创造很大的市场需求。

其他经济增长动力来源还包括：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的装备制造业，以及电子产业、材料产业、精密仪器等；互联网的新业态，例如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快递业务等；新产业，绿色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传统加工业则可以转移出去，扩大机器设备、中间部件的外销市场等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差异大，很多国家基础设施非常差，市场不完善，我国基础设施生产技术和设备先进、经验丰富，将为工业化基础比较弱的国家带去新的工业化发展机遇。

张燕生：“一带一路”体现新体制、新格局、新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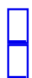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培育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无论是新体制、新格局还是新优势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中都有充分体现。

“一带一路”的内涵是，新常态的中国用资本输出的方式进入到亚太和欧洲，构建贯穿欧亚大陆的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为什么中国要用资本输出的方式走出去？因为依靠鼓励出口和招商引资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是小经济模式，对于中国作为大国来讲，下一步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多会推动进口和出口并举，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工业、农业、服务业并举，西方发达国家、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开放并举的新战略。

2014年12月，习近平主席视察江苏省时提出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理论，引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反响。“四个全面”都在发展“一带一路”的新理念上有所体现：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但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要翻番，而且要从全球视野思考，推动周边欠发达人口、

国家和地区都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在国内和周边合作中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推动创新驱动和智慧发展，在“一带一路”方面推动市场规则、公平竞争；四、全面依法治国，“一带一路”也要按照国际的规范、标准开展合作。



第一章
“一带一路”·大战略新图景

“一带一路”，让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更完善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国于1979年开始，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去这36年，在这么一个过渡转型期，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3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7%，对外贸易增长46.4%，中国确实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2010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出口超过了德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的贸易总量，也就是进口加出口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同一个时期的东欧国家也在转型，但他们遭遇到经济崩溃，危机不断。为什么同样的转型，中国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最主要是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转型的策略，实行了渐进的双轨方式。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很多国有企业，在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在开放竞争市场当中没有能力的，国家一方面对这样的产业给予必要的补贴，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采取开放性的态度。这样一个双轨制的改革，让中国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这种双轨制的方式，也应用于对外开放，对那些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技术资本很密集的，当时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产业领域，我们继续给它必要的保护，但对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采取开放的方式招商引资，效果也非

常好。当时中国经济是一个资本市场很不发达，国内金融体系也很不健全的转型经济，所以，我们在资本账户还是采取管理控制的方式，然后在经常账户上面采取开放的方式。这样一个渐进的双轨转型方式，让中国取得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但这样的改革方式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为了保护补贴，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转型过程中，并不是把原来的制度全部消除掉，所以保留在金融市场、在要素市场的扭曲和流动，就产生了寻租的行为，也就是贪污腐败。

政策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九十年代，由于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有一些资本密集的产业我们没有比较优势，但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使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原来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已经具备比较优势，例如一些装备业和汽车产业。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时候给它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让我们的经济稳定，在稳定上才能发展。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的，如果继续给它保护补贴的话，是锦上添花，对这些企业当然是好的，但带来的后果是这些保护补贴都会产生寻租行为，会造成社会风气的不良。

所以我们对内的改革，必须要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让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必须全面深化我们的经济改革。在对外开放上面也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保护我们的一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国家对很多投资领域是限制的，资金是不能自由流动的。现在要继续深化改革，不仅是对内的深化，而且对外开放也必须深化。我想，自贸区的提出，就是在投资领域上面进行探索。过去我们有很多限制，现在能够把那些限制取消掉，除了少数几个领域确实关系到国防安全的，我们必须有所控制，其他的都应该开放。在资金上也是一样的，过去资本账户是有管制的，现在要更好地利用国内跟国际的资金，应该在资本账户上探索一个开放的方式。

当然，这些改革我们采取务实的态度，就是先到某个地区试验，看看效果怎么样，可能有哪些不利的影响。那些不利的影响怎么克服，有利的如何放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自贸区率先被提出，现在自贸区也扩展到天津、广东。这是我们自贸区被提出的历史背景。

那么“一带一路”的战略，为什么会被提出来呢？一方面，中国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当然是希望能够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从中等偏上变成高收入国家，从改革开放的经验来讲，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国内的资源和国际的资源。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同时，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在国际上，我们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同时，也应该有相应的影响力和发言权。这样才符合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可是目前的国际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规则的设计是由当时的发达国家设计的。现在整个国际的政经板块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要中国承担更大的义务，应该给中国更大的发言权。这在国际上有很多讨论，基本上是共识。2009年，胡锦涛主席跟奥巴马总统已经达成协议，比如在世界银行中国的投票权要增加，在国际货币组织中国的投票权要增加，但上述提议在美国的国会上并没有通过。美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亚洲太平洋的利益，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应该参加国际各种贸易规则的谈判，深化各种国际贸易体系。可是在跨太平洋国际伙伴关系，在太平洋成立自由贸易区中，中国却没有受邀请参加。这是什么目的？这个目的是美国想维护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以及确保美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安全。美国采取合作政策，来制约中国对外开放和发展。

在这种状况下，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且在印尼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一个新的亚太地区，亚洲、欧洲地区合作框架，目标是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建立所有这些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我们这个倡议的提出，是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抓手，所以在中国的主导下，相关国家共同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

对这样的一个政策，亚太地区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合作，美国也是了解的。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时候，提出建立“印度太平洋经济走廊”，并且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连接阿富汗和中亚的国家。但相对于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来看，即使在美国很有保留的状况下，依然有57个国家参加，当中包括德国、英国。现在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中有四个参加。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印太经济走廊”目前可以说无声无息。

中国在提出这个创意的时候，有三大优势。第一个优势，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不管是从产业还是建设能力上都有优势。第二个优势，中国现在有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展望未来，中国每年的外汇储备还会增加。所以中国支持这些基础建设的能力不管从资金来看还是建设能力来讲，都是非常优越的。我们知道，一般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瓶颈就是基础设施，如果帮其解决基础设施问题，我们都是受欢迎的。除在基础设施和资金上，中国还有第三个优势，发展阶段的优势。我们前期的发展，是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变成最大的出口国，让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现在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上失掉了比较优势。但以其他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必须开始要把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转移到其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能够真正取得持续发展的国家，是抓住劳动力密集型比较优势的战略机遇期，取得二十年、三十年的发展，进入到中等收入

国家或者高收入国家。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要把这些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出去的阶段，而且要转移出去的规模非常巨大。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日本整个制造业的规模是970万人。80年代的时候，“亚洲四小龙”中韩国整个制造业的规模是230万人，中国的台湾是150万人，中国的香港不到100万人，新加坡50万人。中国的整个制造业规模，按照第三次工业普查是1.25亿人。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提出来以后，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响应，最主要这不仅涉及中国的利益，创造一个国际和平的发展环境，让中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个资源，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机会。

总的来说，自贸区的政策以及“一带一路”新的战略，都是在这个阶段，按照我们与时俱进的需要提出的新的改革开放战略。这个战略的落实，能够让中国有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个更好的对外环境，不仅能够帮助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梦想。

“一带一路”战略彰显“大国心态”

汤敏 国务院参事、智石经济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一个突破性、全局性的长期战略。“一带一路”是打造中国与相关各国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将中国和东南亚等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联了起来。“一带一路”将带动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开放，解决中国的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以实现新时期国内的城乡、区域间均衡性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统筹改革开放的全新战略，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龙头”。

为什么要“一带一路”

开辟新市场，调整对外开放模式的需要。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消费、东方制造”模式，国际分工重组。经过了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整个的世界经济正在重构。过去那种“西方消费、东方制造”的国际分工模式现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欧洲、日本的消费能力在下降，储蓄在增加，再靠借钱来消费的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国际经济结构性的变化对“东方制造”产生了很大的挑战。我国过去的靠大量出口、巨额顺差的模式也将有所变化。

发展“一带一路”是全球范围内对新增长动力的需求。全球性产能过剩加剧，需要新需求、新增长动力。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实际上是全球各国都面临的大问题。最近出现的石油及大宗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的现象，都跟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有很大关系。

此外，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过程中，特别是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需要第三极来平衡。TPP和TTIP涵盖的内容与贸易自由化的水平都远高于正在谈判中的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是依照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定的贸易规则标准。美欧市场规模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使得TPP与TTIP一旦形成，现行多边贸易体制有可能会被边缘化。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被排除在TPP与TTIP的谈判之外，如无应对措施，可能会造成这些国家的地缘经济困局，需要第三极来加以平衡。而被排除在TPP、TTIP之外的国家，大部分恰好就是在这“一带一路”之上。

从国内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一种新开放战略。以“引进来”为主的模式实行了三十多年，随着我国比较优势逐渐减少，这种经济模式受到了很大挑战。以劳动力成本为例，在我国，一个劳动力工资成本达到年均4 000到5 000美元，这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相当高了。面对这种情况，一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出去，部分企业也会走出去，这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实际上，我国从2014年开始已经成为净投资国。十年前，我国对外投资总量还很小，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世界上排名第三的对外投资国了。

从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来看，在新时期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放战略。这个新战略可以用“一带一路”来概括。虽然它叫“一带”“一路”，但其范围与意义远远超出了过去的那种“带”“路”的概念。它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开放的大战略。“一带一路”包括65个国家，44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63%，它整个的外贸、外资的

流入，每年增长分别是13.9%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长都快很多。预计未来的10年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里，整个出口将会占世界的1/3，真正成为第三极。

在这些国家中，人均GDP才3 000多美元的国家还相当多，跟我国相比有一个发展落差，存在着非常大的市场。

如何做好“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以推动实现区域内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重点，其中以中国对外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园区和产业投资合作等领域将是核心部分。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要配合国家的大战略，优先考虑“一带一路”，抓住这个大机遇。

在“一带一路”上，长期以来已经形成很多区域的、多边的、双边的合作机制。早在1990年初的时候，亚洲开发银行就开始推动各种各样的亚太经济合作形式，例如大湄公河三角区，中亚经济合作区等，20年间，做了很多的工作。各国互联互通的概念，亚太经济合作的理念都已形成了，很多项目都已经有了初步的设计。“一带一路”将在这些基础上，把已经形成的亚太经济合作推向更高的层次。

要真正发挥好“一带一路”的引领工作，我们需要有一系列开拓性的政策与措施。

建立有效的政府间协调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发展水平差异大，利益诉求不同，应尽快制定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操作性强的政府间交流机制，争取我国对外投资方向、项目与各国实现项

目合作、战略对接。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成立建设合作规划编制小组，建设一批合作典型项目，产生示范效应。

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帮助沿线国家改善交通、电力、通信基础设施，通过高铁、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源的合作开发，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等一揽子安排，推动亚欧经济一体化。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每年亚洲国家需要7 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电力通道、通信等基础设施投资。根据我们在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经验，基础设施投资回报都是相当稳健的，而且能产生很多附加的、溢出的效果，投资风险相对较小。

除了对外投资，我们还需要跟进其他的产业投资。有了基础设施，产业进入就容易发展，反过来，有了产业进入，基础设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发挥其经济效益。中国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迁的时期，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把我们相对成熟的工业，像核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产业作为我们到国外投资的强项。

推出一批“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清单，积极推进若干产业园区建设。鼓励国内企业和沿线沿边地区依托现有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通过合作、合资等灵活方式，在境外合作建立产业园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各种类型的产业合作区。把基础设施投资、园区建设、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

积极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框架。“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当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已经成立或正在筹备。以这两大机构为投融资平台，搭建更加开放的投融资框架。有关部门应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推出地方版丝路基金，并出资成立其他类型基金。鼓励国内银行与金融机构到“一带一路”国家设立

分支机构；还可以发行长期债券，特别是动员更多私人部门的资金以PPP（公私合营）模式投资。

“一带一路”风险何在

“一带一路”战略在多个高风险地带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地缘政治复杂，缺乏多边自贸安全体系和有效投资合作机制，制约了区域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一带一路”还可能因挑战国际秩序引发大国战略冲突。美国、日本等国家跟“一带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事关重大。

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特别是政治、社会、法律之间的差别过大。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的投资，都充满着巨大的风险。

除了外部风险，还有我国企业面临的内部风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不足，企业在国内政府种种政策的呵护下还能生存，到比较恶劣的环境里，还能不能生存？从总体上来说，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大规模走出去，快速走出去，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学费。

我们还要面对保护主义、汇率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以及东道国在环境、法律、劳工福利等方面的要求。

为减少风险，首先要重新梳理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并根据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与那些中国企业投资较多的国家，要重新修订双边的投资保护协定。为防控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政府还应当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风险评估和风险信息发布；利用外交手段与相关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经济外交支撑，充分利用国际法制规则应对风险。企业应全面客观地评估重大投资交易的政治风险；积极开展多方位的公关

活动，融入当地社会以缓和矛盾；主动参加包括世界银行与各地区性国际开发银行提供的海外投资保险，合理进行风险转移。

为防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汇率与金融风险，应进一步支持出口信贷，扩大“走出去”企业的融资渠道；国家要鼓励银行金融企业走出去，到企业投资密集的地方去提供服务；企业应当加强对汇率与金融风险的管理，合理利用各种金融避险工具，降低财务风险。

提高“走出去”企业环保意识与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行为。将环境影响评价、协议保护机制、生态补偿（生态服务费）和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其中；倡导企业树立环保理念，尊重东道国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障劳工合法权益，实现自身盈利与环境保护“双赢”；投资合作项目必须依法取得当地政府环保方面的许可，履行环境影响评价、达标排放、环保应急管理等环保法律义务；鼓励企业与国际接轨，研究和借鉴国际组织及多边金融机构采用的环保原则、标准和惯例。

需要“大国心态”

“一带一路”战略除了外部风险之外，还有内部风险。内部风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国民有没有一种大国心态、大国风度，特别是要有一种大国能力。“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并第一次大规模推动的国际性战略，过去都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一些设想规划，我们参与，而这个“一带一路”，我国是提出国、发起国，就需要有一种大国的心态。

所谓“大国心态”，就是我们要有能够吃亏的想法，要考虑别人的利益，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大国能力方面，我们要拿出很好的规划、很好的计划，而这个规划和计划不能考虑自己一方的

利益，要考虑别人的利益，让别人也能真正积极参与，这个能力要求非常高。

同时，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相当不足。包括承受风险的能力，不仅是企业本身的抗风险能力，还包括国家风险分散的机制有没有，我们的金融体系能不能帮助企业把风险分散掉，这些都是不足的。

还有很多技术风险，例如保护主义的风险、产业本身的风险、汇率的风险、金融的风险，以及社会的风险，被投资国对我们发展这些领域，提出的环境要求、法律要求、社会要求等等。我们能不能真正达到一种共赢的局面，这些都是我国在推动“一带一路”时面对的巨大风险、巨大挑战。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还需要大量学习。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出去，不得不推动的时候，这需要格外谨慎，需要格外努力，需要我们有一种全新的思路。

实施重构中国全球价值链战略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价值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谁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整个价值链的财富流向。未来的全球竞争是价值链竞争，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战略应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

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层次改变

近十多年来，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的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分工”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

据统计，1980~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2013年已经达到18.78万亿美元。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

面对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新格局的大背景，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至少存在两个弊端：第一，由于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存在，统计跨境总量贸易而非净增加值会产生大量重复计算；第二，由于没有反映出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双边贸易统计中包含了他国中间投入品价值。例如在“三角贸易”模式中，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中就包含了大量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进口的中间投入品，这就迫切需要新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

因此，一种能够真实反映全球贸易运行和贸易秩序的全新核算方法——贸易增加值（Trade in Value Added）统计正在越来越受到关注。由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附加值统计方法是在统计各国价值贡献的时候，扣除了传统通关统计中折返增加值，避免了重复计算，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状况（某国在相应环节为某货物增加价值称为本国附加值，各国出口货物中由上游其他国家提供的附加值则称为外国附加值）。这样，每个国家（地区）出口货物中本国附加值和外国附加值的比例就可反映该国（地区）的贸易获益率。

在国际贸易组织的大力推动和倡导下，2011年以来主要权威国际机构纷纷发布了基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相关研究报告，例如2011年WTO（世界贸易组织）和日本IDE-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发布的《贸易模式和东亚的全球价值链：从货物贸易到任务贸易》报告、2013年1月16日经合组织（OECD）和WTO推出的全球附加值贸易统计初版数据库报告、2013年2月27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和发展：全球经济中的投资和附加值贸易》等，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使得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有了重新的认识。根据WTO和IDE-JETRO（2011）报告，以贸易增加值方法测算，中美贸易顺差在2000年、2005年和2008年三个年份相比传统统计方式计算出的顺差额要缩小20%~27%，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因素，贸易失衡的程度更是会减少40%以上，甚至在2005年达到了53%的缩减规模。可见，全球失衡的状况并没有全值统计那么严重。

还原中国的贸易统计幻觉

一国的出口产品中，不仅包括国内增加值，也包括国外增加值。国内增加值指一国的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本国增加值，这部分增加值由本国生产出口至其他国家或者被折返回本国。UNCTA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报告显示，全球出口中约有28%是进口国仅仅为了将其作为生产某种出口商品或服务的中间产品而进口，在2010年19万亿美元的全球出口中，约有5万亿美元被重复核算。在全球价值链上，美国主要以其掌握的核心技术专业化生产高附加值部分，而中国由于长期以来高技术研发能力不足，主要以其丰裕的劳动力承接产品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部分。这样的分工决定了中国势必进口大量中间投入品。而美国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销售，表面上大多表现为中间产品的跨境出口，事实上是国内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布局和延续。

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加工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为标志，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我国加入WTO的十多年来，中间品货物贸易量的年均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中国的中间品贸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本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禀赋，生产层次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再输往国外；二是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利用本国的劳动力禀赋对其进行加工和组装，生产成最终产品或中间品后出口到国外（即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主导模式。

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四成左右。中国在工业制成品加工组装环节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欧盟等是最主要的终端消费市场。由于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由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转移至中国内地，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来对美、欧的贸易顺差也转移至内

地。这种转移可以通过复进口来体现，即“货物出口后再进口至该国”。

通过对中国出口加工区考察发现，由于中国香港的物流和基础设施能力先进，产品经过中国香港运输成本低廉且节省时间。出口加工区出口产品可以享受出口退税，中间货物进口用于加工，加工后也可以享受优惠税收出口。中国是迄今世界上主要的复进口国。中国的复进口自2000年以来已经增长超过12倍，复进口正成为中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失衡的成分被严重夸大。

根据我们利用投入产出模型的测算，在出口部门中，含国外增加值比重较高的部门集中在制造业，其产品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平均比重为26.3%，即主要制造业部门的出口超过1/4的增加值非中国本国创造。如果以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计算，中美贸易顺差将缩水36%左右，中欧贸易顺差、中印等双边贸易顺差也将大幅下降，中日贸易逆差则进一步扩大。

更为严峻的是，虚胖的贸易规模非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利益分配的增长，反而加剧了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摩擦，中美贸易摩擦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海关统计的我国贸易顺差逐年扩大，从1995年的167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峰值的2 981亿美元。此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贸易顺差有所回落，中国2013年贸易顺差2 597亿美元。2011年若以经常性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作为“失衡”程度的衡量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统计，中国经常性账户失衡占全球失衡的份额已从2003年的6.8%上升到2008年峰值时的24.3%，2009年为24.1%，2010年回落至19.9%，全球失衡的1/5来自中国，汇率摩擦、贸易摩擦等由此产生。以WTO公布的数据为准，中国已连续19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9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仍然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

以产业升级向上游攀升

未来十年全球产业竞争将是价值链上的竞争，价值链竞争决定中国制造业乃至产业竞争力和未来经济的前途与命运。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流失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很多国内大型企业的主要业务仍集中在国内市场。因此，我们建议研究制定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中长期发展战略，深化和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以及“走出去”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并鼓励国内企业向低产业梯度国家转移。政府除了财税、金融及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推进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第二，应着力增强零部件和装备制造业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内分工，打造和延长国内价值链。短期内，应继续促进成套机器设备进口，加速国内陈旧设备的更新，增加国内资本积累；但从长期看，应该提高研发经费的投入和效率，鼓励我国本土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

第三，要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国内布局，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加快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步伐。一是国家要继续强化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差别化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通过执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和调整加工贸易商品目录，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二是国家应加大资金投入，优先支持中西部地区出口加工区的建设。三是针对我国出口加工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现状，建议应打破地方利益和市场壁垒，建立全国统一要素市场，保障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并且更多地赋予中西部出口加工区物流功能，建设一批报税物流园区和仓库，提升产业配套和产业集群水平，优化贸易链的区域布局。四是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的区域结构，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防止东部地区对产业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产生挤出效应。

第四，可充分挖掘国内市场需求容量，推动全球高级要素向中国集聚。从趋势上看，中国第一波依托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全球化红利”将趋于结束，而第二波“全球化红利”，也就是通过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国外高级生产要素来推动中国经济升级。总体看，中国吸收国际资本的综合优势并未明显减弱。扩内需政策将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的增长潜能，逐步提高的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外商投资创造了发展条件。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和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措施的实施为提高外资质量和水平提供了政策支撑，区域差异和多层次劳动力继续为多类型外商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此外，中国应积极顺应全球FTA大浪潮，加快推进中日韩FTA、中国—东盟FTA谈判，以及提前研究中美FTA、中欧FTA等战略协定谈判，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水平，真正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第五，可通过“一带一路”战略逐步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战略可形成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

略”和“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我国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铁等行业“走出去”的步伐会越来越快，未来需要进一步通过异地投资、兼并重组、国际产业技术联盟、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等手段，实现由产品输出到产品、技术、资本、服务输出的转变，实现中国产业链的整体升级。与此同时，根据劳动力成本和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优势，未来5年，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完成中国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内国际政经大手笔

鲍志成 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文化传承所所长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固然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内在迫切需要，同时，也正是30多年改革开放和发展成就累积的内在能量，为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实力和底气。

第一，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实现进步繁荣、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相融通，站在人类命运和道义责任的制高点，自觉担当负责任大国的国际道义和责任义务，提出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经验与成果，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两个共同体的宏伟构想，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带一路”新丝路既是实现“中国梦”的全新之路，也是对接连通“世界梦”的有效途径。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作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进入21世纪，亚洲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如何巩固和平发展，进一步凝聚亚洲国家的共识和力量，增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现和谐亚洲是亚洲

国家的共同课题。“一带一路”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是筑牢“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坚韧纽带。

“一带一路”是一条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东起发端于中国，向西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西两端牵着亚太、欧洲两大经济圈。它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

“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不限国别范围，不是一个实体，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在共同建设的未来，“一带一路”无疑将释放更大的活力，很多项目涉及的国家和实体可能更多，开放性也更强。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心愿，正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落地生根。中国人民有梦想，世界各国人民有梦想，这将给世界带来无限生机和美好前景，一幅横贯东西、共谋发展的宏大蓝图正在铺展开来。

第二，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济发展蓄积的相对优势，集合成巨大的“中国正能量”，足以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提供必要的产品、技术、设备、资金和金融保障。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赶超美国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雄踞世界第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7%，而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为3.9%。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序，从2002年的第六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二位，首次超

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五年世界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困难时期，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从26万亿元增加到约52万亿元，按现价计算翻了约一番。

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一跃而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可以输出价廉物美的日常用品，提供技术和设备。从1895~2009年，美国稳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长达114年之久。到2010年，中国首超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据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球通视数据，当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为10万亿美元，中国产出占比19.8%，首次高于美国的19.4%。这是中国经济历史性的跨越，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令人赞叹的“中国奇迹”，标志着人类经济发展步入新纪元。据中国社科院相关资料，现在全球500种工业品中，中国有221种产品产量位居第一，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据德勤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的《2010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2010年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在被评的26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占比达到20.8%。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1.07万亿元人民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资料，目前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在136个国家中排名第七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中国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据2014年底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及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4）No.4》显示，2013年中国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30.6%，低技能与低技术含量产业为17.8%，而中等技能与技术含量的产业为12.3%，高技能与高技术含量产业为17.1%。这说明，中国出口产品中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

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仍占很大比重，而高技能与高技术含量产品正在显著增长。近年来，中国工业结构由门类单一到齐全、由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迈进，中国正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升级，创新正成为驱动发展的第一要素。2013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1 847亿元，比1995年增长33倍，年均增长21.6%；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08%，比1995年提高1.51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如今已成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1 600多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201倍，在世界货物贸易的占比从比重不足1%上升到12%左右。据中国经济网数据，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过去10年中国与沿途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 000亿美元，出境游客数量约5亿人次，周边国家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将率先受益。

在西方国家饱经金融危机冲击、深陷资本和财政困难的同时，中国成功地从资金缺乏、吸引外资的资本输入国转换为外汇储备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不仅自身具备应对金融风险的足够实力，还开始输出资本，投资开发，帮助有困难的国家。总量约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中国超过日本坐拥世界规模最大外汇储备国地位，“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2007年，中国成立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10月24日，中国倡议并拿出约500亿美元，与21国在北京签约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整个亚洲的港口、铁路和输电线等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为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中国又出资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预计到2020年，东南亚和中亚国家光在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上就需至少8 000亿美元，而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1.25万亿美元。2015年中国将超过目前的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出资者。

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2013年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实现了快速发展，亚洲的境外人民币资金池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欧洲市场的离岸人民币交易量快速增长，非洲和美洲国家也开始积极地增强人民币离岸业务。2014年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阶段，人民币投资产品日趋丰富，海外离岸市场建设飞速发展，人民币成为英国外汇储备货币之一；从地理位置来看，在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发展已经日趋成熟的基础上，2014年离岸人民币市场在英国、欧洲、韩国、新加坡等全球金融中心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据2014年7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等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4》，2013年底人民币国际化指数达到1.69%，与2013年初的0.92%相比提高了84%。同期美元国际化指数为52.96%，保持基本稳定；欧元为30.53%，英镑为4.3%，有温和的上升；日元为4.27%，国际化程度下降。随着国际市场上人民币直接投资额和人民币的信贷额大幅增长，201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为1.74%，第二季度为1.96%，年底有可能会超过3%。乐观估计，三五年内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国际使用水平有望成为继美元和欧元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货币。

“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中，经贸合作是基石。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必将迎来一个共创共享的新时代。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以东部沿海为主的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升级转向，累积的先发经济优势和能量需要外溢转移，多年来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亟须在深度和广度上持续推进，为提升并扩大整体对外开放水平和空间，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奠定了历史基础和现实机遇。

纵观古今，我国的对外交流和开放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漫长演变历程，如果从开放主体的主动性和被动性来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汉唐——主动开放时期，明清——主动锁国时期，清末

民国——被动开放时期，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动锁国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主动开放时期。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后，我国对外开放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重启国门。1980年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大经济特区，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突破口；1984年开放天津、上海、福州、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起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并在开放城市开辟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大引进外资和技术的步伐，形成沿海开放地带。1990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并以之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还开放了一些沿边城镇和内地省会城市。1992年6月开放长江沿岸的5个城市，不久又批准了17个省会为内陆开放城市。同时，遍布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内陆边境沿边城市也逐步开放。至此，我国基本上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局面，形成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由于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的地区发展差异与整体经济规模同步增长。由于东西部自然环境存在巨大差距，东部沿海地区比较优越，西部地区水土流失比较严重，土地荒漠化，生态问题严重，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加上历史和政策因素，导致东西部经济的差距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东部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远高于西部，东西部居民收入的差距也比较明显。从本质上说，东部以制造业和出口外向型为主，同时有发达的金融产业，经济高度发达；西部以资源型产业为主，经济欠发达。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中国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许多年间持续加剧。为了缩小这种差距，

20世纪末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资源投入倾斜、鼓励东部产业转移、西部地区税收优惠等政策，以及西部地区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优势，推进西部地区加快发展。这一政策成效到近年开始显现出来，从2008年开始，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有所缩小。但就竞争力而言，中部、西部和东北等区域与沿海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竞争力差距并不大，在不同指标上表现也各有所长。

“一带一路”新丝路战略的提出，使中国和中亚乃至向西更多国家的经贸合作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构成对西部发展的重大利好。“一带一路”必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随着自贸园区、京津冀一体化、长江沿岸经济带等经济空间结构调整布局的重大举措的相继推出，以上海合作组织为龙头，以“一带一路”为两翼，联动各大沿海、沿边、沿线经济带，东中西联动、南北方呼应的全面大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第四，加快推进自贸区战略，建设“一带一路”新丝路的战略支点和经济“桥头堡”，以降低贸易门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区域内经济一体化，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经由国内自贸园区和国际自由贸易区建设，加速落地“一带一路”规划，可谓又一实质性推进工程。2014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为我国加快自贸区建设提供了思路，除了加强自贸区建设的顶层设计外，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建设成为既定策略。

以港口和自贸园区为枢纽，打通东北亚、东南亚，通过印度洋、南太平洋，连贯欧亚大陆，是实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桥头堡。12月12日，国务院决定，依托现有新

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以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中国自由贸易园区从上海一地，随即扩展到东部四个地区，预计第二批自贸园区很快就会推出。

以自贸区战略为切入口，构建利益共同体，从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过渡到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是中国提升开放水平的重大策略。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2月5日的讲话中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要将零星的、个别的自贸协定谈判，与整体自贸区战略结合起来，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

“一带一路”是新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传统的外需放缓后，沿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将给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找到新的突破口与增长点。目前，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新加坡、中国与韩国等国家的自贸协定。中国还倡导缔结亚太自贸区，将中国自身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努力与争夺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的主动权结合起来。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仿佛是一支如椽大笔，在世界政经版图上挥洒出来的一大手笔，描绘了中国与世界未来一个历史阶段发展的新蓝图。

开放、合作、和平、发展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题

肖金成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

申现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博士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四国期间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东盟期间又首次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下文简称“一带一路”）是依托亚欧大陆桥与海上通道，以加强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为重点，实现各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国际区域合作框架，目的是通过我国全方位开放这一出发点，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国内陆沿边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与合作，实现国内经济平衡发展及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和平发展。

“一带一路”是全方位开放之路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已经得到明显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在世界位居前列。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4.1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从开放的对象来看，主要是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开放，以2013年为例，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加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进

出口额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8%。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以WTO为主的多边机制进一步遭到削弱，以双边和区域为主的地区性协定成为国家间战略竞合的重要手段，并加快向高标准、全面性迈进，以美国为主导的TPP与TTIP在政府采购、劳工权益、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领域确定的新规则和新标准使我国的对外开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在未来一个时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我国推进全方位开放的重要出发点和着眼点。首先，在向西开放上，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我国将通过更多面向西部和南部的中亚、欧洲、东南亚国家以及西南方向的非洲的经贸合作，提高我国向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对外贸易与投资水平，以此深化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其次，在向东开放上，我国将顺应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趋势，在面向亚太地区及西方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开放上，通过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层次与水平。

“一带一路”是全面合作之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较强，例如东南亚地区在农业、工业、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以及电子商务等领域；中亚、西亚在提升基础设施和推进加工业发展上；南亚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高铁）、扭转外贸逆差、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非洲在产业发展、金融服务、减贫、医疗卫生、生态环保等领

域，均有引进我国产业、技术、资金的需求，在推进本国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对华贸易规模上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而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在对外投资、自由贸易区建设、拓展海外市场、扩大能源资源进口、推动产能过大产业向外转移等方面也有与上述国家深化经贸合作的需要。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进我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在技术、投资、贸易、能源、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也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针对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出现的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出“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依托“一带一路”的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地区开放，离不开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提升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离不开内陆沿边地区的腹地支撑。内陆沿边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可以围绕着“一带一路”建设提升经济的互补合作水平。一是内陆沿边地区可以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共建面向“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建立内陆沿边地区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平台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国家对内陆沿边地区投资的跨境投资平台；二是可以依托沿海港口经济的发展优势，通过东部沿海地区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物流中心、虚拟贸易中心建设，构筑横贯东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提升内陆沿边地区“走出去”的能力；三是内陆与沿海地区共同打造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合作平台，推进沿海地区的技术、产业向内陆沿边地区转化、转移，在支撑沿海地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提升内陆沿边地区的经济内生发展能力；四是深化内陆沿边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在体制创新方面的合作，通过复制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推进制度体系的对接，提升内陆沿边地区与国际规则对接的水平。例如内陆沿边地区可以在机构组建、企业设立程序、税收制度、市场准入与监管、过境管理、投资者保护、负面清单、信息公开、电子政务、交通和通

信设施建设方面学习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改善内陆沿边地区开放发展的营商环境。总之，“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动沿海内陆沿边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与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中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

“一带一路”是和平交流之路

通过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织品、瓷器、茶叶、农产品加工技术、建筑工艺、度量衡工具等源源不断输往世界各地，番薯、玉米、南瓜、番茄、苦瓜、香料、棉花等农作物与天文历法、阿拉伯数字、地理学和机械工程学等科学技术也被引进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为当时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和平交流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至今为各国人民所津津乐道。近几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将“新殖民主义”的帽子强加在我国头上，到处渲染“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的丝绸之路建设便于中国对外“掠夺”资源，与中国贸易逆差的扩大不利于其自身的长期发展；中国是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竞争对手等。

通观历史便知，我国不可能走殖民主义道路。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沿线涉及的中亚、东欧、东南亚、南亚与西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与我国一样，同样遭受了被殖民的历史，同为殖民主义的受害国，中国绝不会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殖民主义道路。丝绸之路虽然是一个文化符号，但彰显的是和平交流、共同发展的理念，和平与发展是丝绸之路的“内核”。

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并没有在当地留下一兵一卒，所到之处传递的是友谊，是文明。西亚、北非与中亚地区石油资源虽然较多，中国的进口规模也相对较大，但中国并没有在该地区拥有军事力量，石油资源富裕的国家需要石油出口来获得发展资金，需要有稳

定、可靠的市场需求者，随着美国页岩气的开发，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对石油等资源的需求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

此外，我国已经多次明确提出，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采取的是平等和开放的态度，不谋求私利，不搞势力范围，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强加于人，也不与其他大国和既有机制竞争。中国努力将自身发展战略与亚洲区域合作战略以及他国的发展战略对接，将“中国梦”与“亚洲梦”“欧洲梦”连接，支持有关国家改善民生、增加就业和工业化的努力，积极为本地区提供公共产品，让有关国家安心、舒心、开心。因此，从这个层面看，我国的“一带一路”也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

“一带一路”是共同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受制于对外开放次序、政策及地理等因素影响，我国的外贸、外资和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以2012年为例，我国西部12省、市、自治区在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仅占5.96%，外商投资企业注册数和投资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33%和8.17%，西部12省、市、自治区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占全国的比重为12.76%，而东部沿海地区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占全国的比重为75%，进出口总额为86.41%，企业注册数和投资总额分别为66.17%和80.8%。大开放促进大发展，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我国内陆沿边地区可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效发挥沿边地区紧邻南亚、中亚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通过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聚集产业，集中人口，能够有效克服地广人稀的劣势，不仅发展速度会加快，发展质量也会大大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2013年，中国GDP达到9.2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为12.4%。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基于国内资金缺乏，制造业发展不足，基础设施落后，较多的贫困和失业人口及逐渐扩大的贸易逆差等问题，也迫切需要在资金、技术、产业、发展经验上寻求中国的支持。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渐趋饱和，加之受土地、劳动力、产能过大等因素的限制，钢铁、服装、纺织、塑料制品、金属与非金属制品、电子信息等产业正在向周边国家转移。“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引进中国资本与产业、利用中国技术与发展经验创造良好的条件，为其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外部红利，有效促进中东欧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与我国共同发展。

中国在吸引外资、经济特区建设和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上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经验。中国进入国际生产网络所引发的价值创造活动对周边国家而言更具有补充性。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中国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填补国内资金缺口，缩小贸易逆差、扩大出口规模，推进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缓解就业压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等方面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中国服务业的有序开放与制造业的全面开放，也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资金充裕的国家来投资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

“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沿线国家对华出口提供便利条件。依据迈克尔·斯宾塞在2011年3月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报告，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潜力将成倍扩大。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的人口规模将达到40%以上；到2030年，中国中产阶级的人口规模将达到70%以上。按照中产阶级人口每人平均每天10美元的消费来计算，中国中产阶级将为本国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依据Arora（阿罗拉）和Vamvakidis（万瓦基迪斯）（2010）的研究，中国经济对周边国家的外溢效应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逐渐扩大，距离中国越近，其获得的

溢出效应越大。因此，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依托互联互通的交通设施与便利化的贸易制度，中国巨大的消费需求将为这些沿线国家发展生产、扩大对华出口贸易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三重内涵

孙志远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博士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为“一带一路”）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分别出访中亚四国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的中国和相关国家合作发展的重大战略构想，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其列为本届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一带一路”是对古代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继承和发展，古代丝绸之路始于张骞出使西域，它历史性地创建了一条由东亚至欧洲的陆上交通大动脉，将中国与中亚、西亚直至南欧的广大区域连接在一起。在奥斯曼帝国垄断东西方贸易、西方被迫开辟海上新航线以前，古丝绸之路一直是东西方沟通交流的重要陆地通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于陆上丝绸之路之前，秦汉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交流往来就已比较频繁；唐宋时期，从泉州、广州出发的商船经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到达了东非和欧洲；而明代，郑和的船队最远更是到达了非洲东南部的一些地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立意高远、内容丰富，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包含经济、安全、人文三方面的内涵，这一战略构想的规划实施必将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团结稳定、对外科技人文交流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经济内涵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南部、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联系在了一起，该区域覆盖60多个国家，总

人口超过40亿，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从资源富集情况看，“一带一路”覆盖区域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供应基地，区域内资源互补性强；从比较优势来看，“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多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禀赋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在农业、纺织、化工、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科技等诸多领域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空间广阔。

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一带一路”的经济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一带一路”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国与中亚、东南亚以及更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合作，有利于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形成。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江沿边开放、最后全面开放这样几个阶段。受地理区位条件制约，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水平明显较高，沿边地区特别是西部沿边地区在全国进出口总贸易额中的比重依然较小，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点和难点在中西部。“一带一路”国内段覆盖了我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使广大中西部地区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现在的“开放前沿”，为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契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给我们的重要教训是，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欧美发达国家、“一条腿走路”的风险很大。而现阶段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一带一路”构想将我国巨大的产品制造能力与沿途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需求联系起来，扩大贸易往来、深化经济合作前景广阔。

从经济转型升级角度看，“一带一路”为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过剩产能化解提供了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东部地区受到污染治理、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已是强弩之末，低端制造业向我国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劳动力成

本优势明显的地区逐步转移已是大势所趋。“丝绸之路经济带”要连接中亚等广大亚洲腹地，基本要求就是“道路相通”，这也就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即将迎来交通基础设施的一次建设高潮，这对减少中西部地区物流成本、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东南亚地区劳动力丰富、出口导向型经济比较优势明显，是各国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部分已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我国东部地区转移过去，可以为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同时日、韩等较发达国家同场竞技也有利于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客观而言，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产能“落后”，我国现阶段相对过剩的钢铁、水泥等产业可能正是中亚、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所在，因此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我国的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这些国家，既可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看，“一带一路”将政策重心放在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增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动力和对人才的吸引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一直凭借区位优势和经济极化效应在经济发展中独领风骚。国家虽然通过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等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扶持，但由于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备、人才人口吸引力较差、交通物流成本高等原因，各类人才、资源等要素“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目前“一带一路”规划中所涉及的14个省区市中有9个位于中西部，国家从基础设施、财政扶持、人才培养就业、对外开放等多方面予以更多扶持，有利于增强这些中西部省区市的发展潜力；同时这些省区市由“内陆”变“前沿”，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加强交通物流通达能力、设立内陆港和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多种措施将经济潜力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成果，不仅有利于实现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还能够增强中西部地区对人口人才聚集的吸引力，对新型城镇化三个“一亿人”的奋斗目标的实现大有裨益。

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国家安全内涵

虽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主要立足点在于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并不涉及政治、安全等敏感领域，但从客观效果上看，“一带一路”对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打击三股势力、营造和平相处的国际环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角度看，“一带一路”有利于实现我国资源、能源进口渠道的多元化，同时也为保障海上资源能源运输线的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粮食安全角度看，粮食全部自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中亚地区地广人稀，农业发展条件非常优越，农产品特别是畜牧业产品比较优势明显，而东南亚地区是世界重要的水稻、热带水果出口地。“一带一路”为亚洲周边地区优质农产品进入我国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食品需求、丰富普通百姓的餐桌。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30％，能源安全业已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最核心部分。中亚、西亚地区是全球石油、天然气最富集的地区，目前中哈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中哈两国的共同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我国深化与周边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海上丝绸之路”与我国目前的海上石油运输线在很大程度上重叠在一起，保持与沿途国家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对于保障我国海上能源运输线的安全意义重大。

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对三股势力的预防、打击标本兼治，为维护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奠定了坚实基础。边疆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岗位较少、生活有待改善，特别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处于贫困失业状态，容易滋生不满情绪，使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得以乘虚而入。只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一带一路”带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从而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消除三股势力兴风作浪的社会土壤；“一带一路”

建设在加强各国经济联系的同时，也将带动各民族、宗教间的沟通交流，从而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包容、融合，消除各民族、宗教间的各种隔阂和误解，从而消除三股势力产生的思想根源；三股势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任由三股势力恣意破坏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局面，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客观上需要沿途各国对恐怖主义等形成联合打压之势，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这样就极大地压缩了三股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

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注重平等协作、合作发展，这有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壮大的担忧和疑虑，为我国的和平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与某些国家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试图在军事力量退出后继续通过政治、经济、安全手段谋求地区主导权截然不同，我国明确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干涉他国内政事务、不谋求经济带发展主导权，更不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结盟对抗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地域和国别方面坚持开放原则，凡属于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范围的国家均可参与，甚至另外一些不属此列的友好邻国，只要有合作意向亦可参与进来；在合作机制上，我国不搞“拉帮结派”、建立任何新的双多边机制，倡导充分依托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峰会、欧亚经济联盟等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合作平台推动“一带一路”规划建设。通过“一带一路”的典型示范作用，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自古至今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发展壮大后的中国依然是维持国际和平、推动世界进步的中流砥柱。

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人文内涵

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传递的不仅有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西域的苜蓿和葡萄、南亚和东南亚的奇珍异宝、欧洲的玻璃和雕塑，还有

各地的音乐、绘画、舞蹈、宗教，以及甘英出使大秦、马可·波罗访问元朝、郑和下西洋等中外交流创举，为当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互通、人文沟通交流创造了条件。我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将“丝绸之路”延续千年的经济、文化、商贸友好交流传统继承下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含义，为各国间的人文交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扩大各国科技合作、密切人员往来，为中国及沿途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和智力支持。中亚地区拥有苏联时期航空航天、精密机械等方面丰富的科技文化遗产，时至今日某些技术装备仍位居世界先进行列，但中亚地区自身工业结构、市场需求等因素使这些技术装备长期处于尘封状态，而“一带一路”将东亚至欧洲的广大地区联系起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技术合作潜力必将使这些科技遗产重新焕发活力；欧洲城镇化建设经验、生态技术、精密制造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巨大，但目前欧洲先进技术、优秀人才进入中国还存在不少障碍，“一带一路”为中欧技术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的中间过渡地带；中东国家的节水农业、印度的信息产业等技术优势也比较明显，合作交流的潜力巨大。另外，随着“一带一路”经贸往来的频繁，各类高校、研究机构、企业间的学术交往、人才交流、技术合作等也将日益加强，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一带一路”为加强不同国家、民族、宗教间的人文交流和相互理解、消除彼此的隔阂与误解、增强尊重互信、共创人类文明繁荣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任何民族、宗教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要在保护、传承好自身独特文化的同时，积极吸取其他民族、宗教文化中的合理部分和优秀成果，“一带一路”沿途是世界上典型的多类型国家、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区域，古代“四大文明古国”诞生于此，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也发源于此并流传至世界各个角落，“一带一路”通过经贸合作带动人文交流，必将在各民族、宗教

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对外交往总是充满征服和奴役、刀剑和鲜血不同，我国的文化传统始终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礼相待”等为人处事的基本道德原则，因而平等友好、互惠互利是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交往活动的主旋律，“一带一路”的构建必将使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大范围地走向世界，使之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成为增强各国尊重互信、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重要原则标准。

“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与推进思路

陈耀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一带一路”确定为优化经济发展格局的三大战略之一。一年多来，国内外就“一带一路”战略展开了广泛讨论并积极谋划行动方案，但对该战略内涵的理解却有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国内各地区在积极参与过程中也凸显出盲目和无序。因此，本文就如何把握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谈些个人的看法和思考。

准确把握战略内涵

“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是一个内涵丰富、涉及面广、包容性强的巨大发展平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组对应平衡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

一是古今传承。丝绸之路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我国从汉、唐、宋时期通过陆路和海上把丝绸、瓷器、茶叶、冶铁、耕作等商品和技术，传播到国外，同时从国外带回国内没有的东西，这种互通有无的经贸联系和文化交流，改善了沿线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今天重新提出“丝绸之

路”，不是期望恢复古老丝路往日的辉煌，其现代的含义更加宽泛，丝路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一个大的国家发展战略。从古到今要延续历史的精神，传承并提升古代文明，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物质和文化等多方面开展更广泛的交流合作，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战略棋局。

二是内外开放。“一带一路”既涉及国内区域又涉及国外区域，是国内沿线区域与国外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过现代运输方式和信息网络连接起来的相互开放战略，对外开放是战略的核心。我国当代对外开放从空间上看很不平衡，沿海地区起步早，开放程度高，而内陆和沿边地区相对较晚，开放程度较低。丝路经济带要有包括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国内大部分区域参与，扩大这些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形成全方位的开放经济体系。

三是海陆统筹。“一带一路”既涉及陆上通道又涉及海上通道，陆路通过铁路、公路联通中国到中亚、东南亚、西亚到欧洲，形成若干条陆上大通道、大动脉；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路线基础上不断拓展新航线，也就是现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陆海连接双向平衡。“一带一路”将打破长期以来陆权和海权分立的格局，推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连接的陆海一体化，形成陆海统筹的经济循环和地缘空间格局。

四是东西互济。丝路经济带贯穿东西，联通南北，但主线是东西两个方向。从我国来看，过去30多年主要是依托东部地区通过海上贸易的东向开放，丝路经济带则更多是考虑通过连接亚欧的陆路大通道，加大西向开放的力度。我国西部地区由过去开放的末梢变为开放的前沿，向东开放和向西开放的相对均衡化，也必将促进国内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当然也考虑到南北向与国际的货物运输、贸易往来，除了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有北方对接“草原丝绸之路”联通东北亚的蒙古、俄罗斯等陆路通道，开辟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新局面。

五是虚实结合。“一带一路”是一个长远的国家战略，一个内涵丰富的大概念。由于它的边界不是完全确定的，它所涵盖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目标也不会是完全清晰的，因而使得这一战略显得有些“虚”。但是，从提出初期的基本构想到现在推进的过程看，这一战略正由“虚”变得越来越“实”。比如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大通道建设，陆上和海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源和矿产资源合作、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中国产品和投资“走出去”、油气管道在建、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建立，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成果，“一带一路”战略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已经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落实的工作。

六是中外共赢。“一带一路”是由我国提出的倡议，显然对我国自身发展有着重要战略意义，不仅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尤其是保障我国的能源资源安全、化解富余产能和经济转型升级，而且还有利于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但必须看到，“一带一路”又是一个中国与相关国家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一方面是中国的发展会对丝路沿线国家经济产生巨大的带动效应，例如带动这些国家的优势资源开发、满足这些国家对中国工业品和生产技术的需求，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充分考虑到周边相对落后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现实困难，出巨资与他国共同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并鼓励中国企业向外投资，这些都会使沿线国家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从而实现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科学规划布局重点

作为国家战略，对“一带一路”科学规划至关重要。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做好“一带一路”总体布局，尽早确定今后几年的时间表、路线图，要有早期收获

计划和领域。由于涉及国际国内特别是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初期规划应当依托已有基础，分层分类，先重后轻，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强调依托现有基础，目的是要充分利用现有设施资源，避免大量新建和新增投资，尤其是通道建设、港口和口岸建设；所谓“分层分类”就是要明确国家、地方、城市不同层次的分工，确定不同类型地区的重点任务（例如西北地区与中亚和西亚合作，西南地区与东盟和南亚合作，东南地区与港澳台地区合作，东北、华北地区与俄罗斯、蒙古、日、韩合作）；“先重后轻”就是对关系全局的重大项目优先部署，比如干线通道、基础网络、互联互通关键环节；“先易后难”主要指对国家间关系相对稳定、合作意愿强烈、容易达成共识的项目优先考虑，对那些尽管有合作意愿，但达成共识难、前景不明朗的项目，要缓期开展，严格控制风险。

从空间布局上，要按照“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内外对接”的思路，规划好陆上和海上互联互通的大通道、重要的节点城市和口岸，以及国内重点建设区域。互联互通建设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和前提，既包括铁路、公路、航空、管道、海路，也包括电信、互联网、物联网。目前亚欧大陆桥已经在丝路经济带上发挥骨干作用，今后还要加快中国与东盟国家大通道的建设，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中俄、中蒙大通道的形成。重要节点城市和口岸主要是指陆上和海上的交汇点，要重视那些海铁联运条件好、港口功能强、腹地广阔的城市，如华北地区的天津、华东地区的连云港和宁波、华南地区的深圳以及北部湾。从国内区域层面看，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是，陆上重点在西北地区，海上重点在东南沿海地区。

“一带一路”是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战略，战略实施的进度和程度不只取决于中方，还取决于沿线相关国家的认知和共同努力，因而国家层面的对接十分重要。从国家层面上，重点是要围绕“五通”着力推进。第一，政策沟通是关键。我国要与相关国家就“一带一路”战

略进行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战略实施“开绿灯”。第二，道路联通是前提。没有互联互通的跨境大通道和信息网络，经济带就缺乏依托和载体，所以完善跨境基础设施是基础条件。第三，贸易畅通是核心。“一带一路”连接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沿线各国要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尽快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第四，货币流通是手段。要推动实现各国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本币的兑换和结算，以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第五，民心相通是根本。建设丝路经济带要尊重各国的文化习俗，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国内区域层面，陆上应以西北省区为重点，使其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并打造西部开发的升级版。我国西部地区占全国71%的国土面积和28%的总人口，经济总量仅占全国不足20%，既是资源富集地区又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从西部地区内部看，西北和西南又有很大差异，西北地区经济欠发达的程度要高，对外开放程度要低。据2012年统计，西北五省区（陕甘宁青新）经济总量为31 844亿元，不到西南省区（云贵川渝桂）的一半。西北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仅占全国的1.5%，而西南地区占到4.0%；西北地区外商投资仅占全国地区总量的1.3%，而西南地区占到5.5%。

古丝绸之路途经的国内省份主要在陕西、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建设丝路经济带为西北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西北地区虽然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洼地”但却是资源禀赋的“高地”。石油、天然气、煤炭、风电、太阳能等能源，黄金、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以及生物和旅游资源，不仅丰富且组合条件好，广袤的土地也为经济开发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北地区的交通、通信、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均得到很大改善，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将使西北地区偏僻的地理区位劣势得以改变。借助“丝路

经济带”的建设，必将进一步完善西北地区的基础设施，促进西北乃至整个西部地区优势资源的开发，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并为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因此，笔者认为，将西北省区作为丝路经济带的重点是合适的。

此外，国内区域海上丝路建设重点应在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份。有大港口的地方都能成为起点，特别是有远洋航线、对外贸易发达的城市，要成为建设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依托这些重要节点城市及港口，促进我国与东盟、南亚、北非等国家的经贸合作。

积极稳步有序推进

按照中央的部署，2015年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要有一个良好的开局。目前，国际上尽管有不同看法，但总体上我国的倡议获得了热烈响应；从国内看，各地区都在纷纷谋划如何融入这一战略，甚至呈现出争“起点”、争“核心”等争先恐后、抢抓机遇的局面。针对现状，笔者认为推进战略的实施，要坚持“积极、稳步、有序”的总方针，避免出现国际上“剃头挑子一头热”、国内地区间无序竞争、超能力对外援助投资等问题和风险。

第一，尽快出台总体规划指导意见。编制一个完整翔实的“一带一路”规划需要时间和大量的调查研究论证，短期内难以做到。由于涉及国际层面，这样的规划也较为敏感，因而建议有关部门初期尽快先出台总体指导意见，重点明确推进原则、思路、主要任务、空间布局、国内相关区域定位以及保障措施，以指导部门、地区和企业行为，避免无序和重复建设。

第二，要重视该战略惠及沿线国家民众的国际推介。为体现“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

亲近、更支持，要加大在国际上的推介力度，特别是要突出“一带一路”战略如何能够使沿线国家民众受益。同时邀请沿线国家的普通民众来我国参观访问，增进民间交流尤其是青年学生交流和民众友谊。

第三，加强对各地区开辟国际货运班列和跨境物流的管理。目前我国至少已有8个城市开通了直达中亚和欧洲的国际货运班列，还有很多城市正在计划开辟新的铁路货运线路。这些班列对于我国商品更快地进入国际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是丝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内涵，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班列的增多，各地争夺货源的竞争也趋激烈；同时，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加快发展。有关部门需做好管控，防止恶性竞争损害国家整体利益。

第四，对外援助投资要严格论证，把控风险。我国周边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很大，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有助于对这些国家提供帮助，并逐步形成我国政府的海外发展援助机制（ODA）。对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必须遵循国际通行规则，严格进行可行性论证，既要考虑需要，也要考虑可承受能力，防止出现后续项目的“无底洞”效应。

如何认识“一带一路”大战略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在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由此，“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一个新时期对外大战略浮出水面。前不久，中央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就如何落实“一带一路”进行研究。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是“一个包容性的巨大发展平台”，“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他要求，“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要抓住关键的标志性工程，力争尽早开花结果”。这表明，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正式提上日程，要由计划见之于行动了。

中国为何如此重视“一带一路”的建设？究竟如何认识“一带一路”的深刻意义？要真正办好这件大事，还是需要加深对它的认识。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由中国倡议，而建设则需要得到相关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中国要能与他们取得共识，开展密切合作，共同参与建设。

“时代要求”的含义

为何说“一带一路”是时代的要求？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也就是说，追求和平，实现发展是各国人民最大的诉求。

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其中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强大了要干什么，如何干。世界以往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国必争，强国必霸。尽管中国一再宣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别的国家仍然不太相信，听其言，观其行，这也不难理解。人们担心，一旦中国采取扩张型战略，与美国争夺影响力，世界就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发生大国争端，进而引发大的战争。

作为不走传统大国崛起道路宣示的实践，中国主动提出与美国构建基于不对抗、开展对话与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也通过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破除人们对于中国会实施扩张性战略的疑虑。中国希望以此向世界表明，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的承诺不是空话，立志要把实现合作共赢的承诺付诸行动。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批新兴经济体崛起，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步入起飞门槛，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如何维护发展大势，为发展中国家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的要求。尽管中国是世界经济大国，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本身的需要出发，中国将会继续把发展放在首位。鉴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贸易大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需要为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创建更好的发展环境。“一带一路”可以作为推动发展合作的大平台，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中国的投入和带动，动员各方的积极性，打造新的发展空间，创建新的发展引擎。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与相关国家一起规划项目。长期以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融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长期项目工程建设融资，非常困难。而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能力有限，私人金融机构投资意愿不强，导致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发展的综合环境改善缓慢。通过“一带一路”，创建合作性融资机构和其他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可以打破融资瓶颈，中国

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中国倡导成立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宣布出资成立丝路基金等，目的就在于此。有人把中国这样的举动称为“新马歇尔计划”，这是不对的。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援助战后的欧洲经济重建，而如今的新融资机构建设理念是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和共享资源。有人批评中国是想通过此举破坏现有的国际机构设置，这也是误解，或者是中伤，因为中国倡建的这些机构并不是以搞垮现有机构为目的，而是作为它们的补充和加强。

因此，“一带一路”不是一种对抗战略，而是一种合作战略，它是开放、合作的。只有以开放的思维与合作的理念来认识“一带一路”，才可以理解和认识其时代要求的含义。

出于大战略的设计

“一带一路”是大战略设计，具有综合的含义，既是基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也是基于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因此，不能把“一带一路”作为短期行为的项目来对待。有人为“一带一路”画出了线路图，也有人为它确立了时间表，应该说这是不准确的。从落实的意义上说，它要有行动步骤、项目规划，也要有落实的时间表，但这只能作为分步的行动计划，并不是包揽全部的一揽子计划。

从中国发展的大战略来考虑，“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实现发展的地区均衡的战略，也是对外关系结构均衡的战略。中国开放发展从沿海地区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沿海地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但这也导致两个大的不均衡：一是国内的东西部发展不均衡，西部发展大大落后；二是对外关系的不均衡，东重西轻。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一则为中国西部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二则为发展与中亚、西亚等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今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主要的特点是贸易通道。当今推动“一带”建设，并不是要简单地恢复历史上的大通道，而是要以“丝绸之路”的互利交往精神，建设新的开放与合作的经济发展带，把中国与沿线国家以发展这个主线紧密连接起来，构建经济、政治、安全、人文全面链接的新关系，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

“一路”，即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倡导和建设新时代的海洋新秩序。西方大国崛起后所奉行的是基于控制海洋的“海权论”。中国要做海洋大国，是不是也要走海洋争霸、海洋霸权的老路呢？“一路”战略倡议就是一个最清晰的回答：中国要推动建设的是基于海上航行开放自由、海上共同安全和海洋资源共同开发的新秩序，合作发展的沿海经济带。公元前200年秦汉之际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延伸中不断拓展为交通贸易的黄金路线。这条海道自中国东南沿海，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远及东非、欧洲，构成四通八达的网络，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沟通全球文明的重要走廊。如今，“一路”战略下的内容不仅仅是打通基于开放安全的航海通道，而且还要推进发展合作，与海上相关国家共同打造沿海发展经济带，通过港口连接，港口经济、沿海经济可创建新的发展空间。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大战略设计的支撑基础。实现互联互通，就是要构建基于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全方位链接，发展四通八达的基础设施网络（陆、海、空交通网络），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互联互通的概念最早由东盟提出来，后来扩展到东亚合作机制、亚太合作机制，如今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构建自贸区是一个大趋势，自贸区的主要内容是推动市场开放，通过开放促进要素资源的流动，推动贸

易、投资的发展。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瓶颈是基础设施落后，各国间存在诸多妨碍物流、投资、服务以及人员流通的限制，互联互通网络建设不仅要发展基础设施网络，而且要消除妨碍交流的规制，制定统一的或者是互认的新规则。要打破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瓶颈，需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

显然，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认识，“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设计指导思想既超越了自贸区和多边贸易体制，旨在推进综合发展环境的构建，也突破了中国以我为主的利益观，强调共同建设，共同发展。“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不是通过谈判，而是通过协商，是新型的发展合作方式。

“一带一路”的棋局观

梁国勇 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经济事务官员

随着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一带一路”描绘的图景也越来越清晰。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中国发改委共同参与发布《愿景》，表明“一带一路”涉及外交、国际经济、投资和发展规划，是一项目标宏大的国家战略。另外，相关领导小组的人员配备也反映其政策优先级别之高。“一带一路”一端是活跃的亚太经济圈，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横跨亚欧大陆，涉及三大洲数十国，展现了大国外交的纵横捭阖。联通中国国内、国外，沟通开放、改革，贯穿投资、贸易，该政策反映了“走出去”战略的升级，也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乃至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升级。

然而，对“一带一路”的反应存在国内外的落差，也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人士观点的不同。自2013年推出以来，“一带一路”在国内风生水起，但海外的关注主要还是来自政界、学界及智库的专业人士。然而，随着具体规划落地，相关机构设立，特别是2015年“两会”和博鳌论坛的巨大传播效应，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身处海外的我也感觉到，国际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显著增加，微传播渠道中的相关内容也越来越多。更多的普通民众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例如我近期也接到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商界朋友的来电询问。那么，“一带一路”出招的目的是什么，影响会怎样，对国际政经大棋局意味着什么呢？

“外势”和“实地”的相互转换

在传统的围棋战略思想中，“外势”与“实地”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地”的累积决定胜负，而“势”却可以转化为“地”并对最终胜负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弈者须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必要时又需要在两者间进行转换。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的推出如同围棋中盘的必胜手筋，一旦落子，其影响将是深远的。

首先，“一带一路”可以将中国在经济领域多年累积的“外势”向“实地”转化。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带来了长期的超高速增长，同时也导致了工业产能和外汇资产的“两个过剩”，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方面的“两个经验”也特别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面对保增长的迫切需要，如何拓展海外需求，将资本和产能方面的“外势”向经济增长的“实地”转化，这是“一带一路”推出的现实考量。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之所长正是很多低收入国家之所短，这就提供了取长补短、互利共赢的可能，这正是“一带一路”经济逻辑的基础。

其次，“一带一路”可以帮助中国将经济规模上累积的“实地”向国际经济秩序的“外势”转化。实际上，基于其现有经济总量、贸易规模、外汇储备，以及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和发展融资，中国完全可以在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完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中有更大的作为，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在这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离不开国际发展融资的配套，而亚投行等多边机构的设立将弥补中国所擅长的双边渠道的不足，特别是有利于应对后者所面临的一些外部挑战。具体出资只占外汇储备的极小部分，但中国能从中获得的各方面收益则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一带一路”也蕴含着从经济“实地”到政治“外势”转换的意味。该战略所推动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

域合作将有利于加强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安全。而更深入地解读其政治逻辑，需要更好地理解“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2015年的博鳌论坛主题即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旨演讲也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很明显，现有各个区域一体化和其他合作机制都是迈向“命运共同体”的途径；而“一带一路”则是重要的助推器，其核心在于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

的确，“一带一路”的政、经维度是密不可分的：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对政治的“作用力”，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力”也不可低估。“一带一路”战略在陆上、海上两个方向展现了突围、突进的姿态。然而，面对动荡的国际政经格局，高速崛起、逆势而进的中国难免受到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经济行为也可能受到东道国政治环境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项目层面，这主要反映在准入阶段的政治阻力和投资运营阶段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对某些具有敏感性的基础设施领域而言。可以预见，因为“一带一路”涉及范围之广阔，目标之宏大，其面临的各方面挑战也将是空前的。

从“接受规则”到“制定规则”

棋类游戏的竞争都是在既定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的，但现实世界的竞争却可能涉及规则层面的博弈，特别是在“高手”之间。随着越过中等收入门槛，中国发展的棋局已过中盘。不可否认，过去30年中国的高速崛起是在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下实现的，但这一秩序自身问题不少，对中国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开始降低——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显然，对世界和中国经济而言，全球化的“列车”需要新的动力源，世界经济治理的“轨道”也亟待完善。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涉及贸易投资、货币金融和发展融资等多个领域，其具体改革可以是存量，也可以是增量，既反映在规则上，又反

映在机构上——而机构又往往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通过倡导新机构、引导新议程、影响新规则，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正在发生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转变。

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最近几年中国开始在双边、区域、诸边层面明显发力，积极介入和推动相关的自由化进程。在2014年11月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在中国的力推下“北京路线图”得以通过，使得亚太自贸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终极目标”。金融方面，以货币资金池为主要形式的区域性金融安全机制仍有巨大的完善空间，而最为重要的进展是在发展融资领域。通过倡导设立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等机构，中国开始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在亚投行筹建过程中展现了精彩的全球经济外交博弈。50多个国家（特别是英法德等西方大国）的参与使亚投行显示出成为“第二世行”的潜力。很明显，在存量改革遇阻的情况下，增量改革已经成为难以阻挡的潮流，而亚投行仅仅是一个开始。

展望未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对贸易、投资及相关领域的国际规则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面对形形色色的政治风险，中国在保护海外商业利益方面如何构建一个稳定、透明、有效的制度架构？这既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又需要制度创新；这意味着现有中国国内立法和国际协定体系的加强，后者则涉及协定数量的增长、内容的完善和规则质量的提高。另外，“一带一路”相关的微观主体很多都是“国家队”成员，其“走出去”可能加速面临国际规则的挑战，包括所谓“竞争中性”问题和出口信贷规则等。

可以预见，在内部推力和外部阻力的相互作用下，“一带一路”将有助于相关领域新规则的形成。最终，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运营过程中可望面临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但官方层面围绕相关规则的具体谈判过程及结果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平等参与和共同协商将是新规则产生的基础。

“算”与预测

善弈者必善“算”：“好点”的选择必然基于对盘面的分析，但也离不开对未来出招、应招的算计。的确，科学的决策离不开对未来的预测，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是如此。“一带一路”战略的直接经济影响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等多个领域，将在项目、地方、国家、区域等多个层面展开。对相关经济影响的分析和预测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非常值得重视。

然而，纵观各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分析和解读，可以发现对目的和动机的主观猜测多，对效果和影响的客观预测少。实际上，该战略的推出仅有两年，相关政策文件也刚刚发布，因此具体分析和预测必然面临数据支持的障碍；同时，“一带一路”影响相关经济变量的机制复杂，使得相关研究又面临理论和实证方法上的困难。但是，我认为，基于现有“早期收获”的项目数据还是可以做一些有价值的实证研究的；除此之外，模拟分析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首先应针对贸易（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融资等主要国际经济变量进行研究。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例，“一带一路”带来的资源增量和制度变量变化将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总量和结构，具体可能带来“创造效应”（增量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向沿线国家的转移）和“集聚效应”（投资向重要节点的集聚）。对投资总量方面影响的评估既要考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动机和行为，又要考略“一带一路”在政策方面带来的推动作用，以及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撬动作用。前者反映在国家战略引导企业行为的积极影响，后者则反映在公共资金带动私人资本的杠杆作用。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 160亿美元，已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三位。展望未来5~10年，中国海外投资增长的“基线场景”如何，“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变更场景”是怎样的，相关政策选项有哪些，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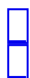
从更广泛的经济影响看，中国过剩的产能和资本将获得新的“出口”，经济转型和升级也将得到很大促进。金融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得到有力推动，国家资产负债表将进行良性重构，资源的配置也将趋向合理。中国之外，巨大的发展机遇正在出现：以中国为“枢纽”互联互通的程度将迅速提升；以中国为“头雁”的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的“新雁阵”有望形成。总体上看，“一带一路”战略推出和“走出去”战略升级正在为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弱化的全球化进程注入新的动力，并可望掀起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

制胜之“道”

“一带一路”通向何方，相关博弈如何制胜？建设绿色、和谐、繁荣、共赢的“一带一路”，既需要审慎的战略思考，又需要细致的具体规划。这不仅是中国的责任，也是沿线国家的责任；不仅是政府的事情，更是企业和公民社会的事情。对作为主导者的中国而言，应强调国家战略目标和企业经营目标的一致性，将国家层面的经济合理性建立在企业层面的商务可行性的基础上；对企业来说，应将海外投资运营建立在经济、环境、社会三重合理性之上。短期内，应避免“一带一路”出现外冷内热的倾向，防止地方政府借题发挥，盲目、过度投资。在当下的中国，以投资促增长是必要的选择，但必须注意将投资导向有助于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否则又会重复老路，以长期代价换得短期繁荣。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和亚投行等机构的设立，难免使人将其与“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协定相类比。的确，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变化，而中美两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方向和进程。“一带一路”、“北京路线图”、亚投行等等一系列的出招无疑使全球经济外交的大棋局更加精彩。

中国的大手笔、新举措有其现实考量，但其背后的思维方式更值得重视。以合作共赢的“发展思维”取代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也许这正是“一带一路”所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围棋对弈重布局而轻杀伐，双方在“地”与“势”的权衡取舍中共存，而输赢常在几目之间，或许这正是围棋这种东方游戏有别于西方思维的一个独特之处。



第二章
“一带一路”·高层解读

“一带一路”：全球共同需要 人类共同梦想

曾培炎 国务院原副总理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历史性机遇与全球性挑战复杂交织，能否实现共同发展梦想牵动着各国人民的心。中国以首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大国胸怀，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共圆发展梦想之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所倡导的高屋建瓴的中国方案。

回顾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思想，必然忆及他就任国家主席后主持的首次主场外交，也就是2013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在这个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重要国际平台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提出应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勇于变革创新，同心维护和平，着力推进合作，坚持开放包容。这为中国同各国一道以创新共谋发展、以合作共谋繁荣指明了方向。同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社会予以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APEC会议、G20（20国集团）峰会等重要国际场合，进一步阐释了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一带一路”、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观点，体现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使中国倡议、中国

方案更加深入人心。在2015年3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世界好，亚洲才能好；亚洲好，世界才能好”，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与会各国代表纷纷表示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分享中国和亚洲发展红利，实现共同繁荣。“一带一路”稳健推进，精彩可期。

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思想脉络清晰、自成体系、富有创见，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是从国际大局出发，推动各国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宏伟韬略，反映出独特的东方智慧。“一带一路”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共圆亚洲梦、世界梦的当下之路和现实载体。纵观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一带一路”植根于中国厚重的文化积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一带一路”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精髓，秉持“讲信修睦、弘义融利、协和万邦”的理念，致力于再筑东西方利益交融、文明辉映的盛世。“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推动相关各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交流与合作，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构建更强劲、更有效、更具亲和力的区域一体化合作大格局，实现人类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一带一路”强调包容发展、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文明互鉴、和平友谊，将助力人类社会在新时代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梦想。

“一带一路”是包容发展之路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和宗教信仰，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处在

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无论大小，选择何种道路，经济发达与否，都是平等的国际社会主体，只有彼此尊重、相互包容、休戚与共，才能走向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美好明天。但令人遗憾的是，冷战结束20多年来，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一些国家推行价值观外交，制造不和谐声音。与此同时，人类通向共同繁荣的道路上仍存在重重障碍：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仍在不断拉大；贫困问题突出，全世界仍有约12亿绝对贫困人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增强，气候变化、疾病传播、恐怖主义等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等等。应当说，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也更有条件朝共同繁荣的目标迈进，而“一带一路”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一带一路”倡导包容发展的理念，强调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作的原则，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构建多领域合作体系，打造多层次合作格局，发展多渠道合作框架，开辟一条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开展平等合作、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为最终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创造条件。在全球经济整体低迷的背景下，建设“一带一路”将为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发展构架和合作模式，它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将成为一条为全球繁荣创造新机遇、激发新活力的增长通道。

“一带一路”是开放合作之路

当今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各种形式和范围的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数不胜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性、制度性安排正在谈判，特别是涵盖东亚和南亚16个国家（10+6）的RCEP有望于2015年底初步达成。这些投资贸易安排

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相关国家的经济融合，但对于区域外经济体则相对封闭，彼此之间又缺乏协调，难以相互兼容，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全球经济碎片化的趋势，不利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该框架下的合作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完全向区内外所有国家开放，不搞封闭机制，不预设合作条件和门槛，不排斥和针对任何第三方，欢迎任何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广泛参与，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中国不谋求主导，更不是为一己私利。“一带一路”开放合作取得成功的基础是坚持互利共赢，强调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世界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各方应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发展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是互联互通之路

当前，全球基础设施仍显薄弱，不连不通、连而不通、通而不畅现象普遍，贸易投资安排趋于分散，国际资金融通依旧困难，互联互通建设滞后成为制约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人类需要做好互联互通这篇大文章，拉近各国在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的距离，保障全球生产要素自由流通，深化和扩大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全球发展打通经络、舒筋活血。“一带一路”致力于加快沿线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实现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的大联通。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相关各国应就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通过共同

打造若干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和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能够形成连接沿线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贸易畅通是互联互通的重点内容，应着力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共同商建更为宽泛、兼容的贸易合作体系。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通过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评价体系建设，能够打通融资贵、融资难的瓶颈。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通过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合作等活动，能够奠定双多边合作的民意基础。

“一带一路”是文明互鉴之路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推动文明互鉴是解决全球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同文明需要在平等对话中增进理解，在竞相展现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一带一路”传承和弘扬了古丝绸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倡导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文明互鉴取代文明对抗、文明冲突，把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使文明之花成为增进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进步的纽带、维护世界和平的润滑剂。“一带一路”将推动沿线国家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交流合作，推动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

“一带一路”是和平友谊之路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特别是一些国家和地区民生困苦，求和平、求稳定的心情迫切。加强全球安全合作，实现世界和平，是各国的现实需要和人类的共同愿望。“一带一路”倡导经济发展与和平安全并重，两者相辅相成，通过经济发展为解决安全问题、巩固安全成果提供坚实基础。随着沿线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本地区的人民生活将得到明显改善，这有利于增进各国的社会稳定，为地区和平创造条件。经济交往与合作所营造的互助氛围和命运共同体精神，将为解决政治安全领域的复杂矛盾奠定更好的互信基础，确立可持续的互利共赢模式，不断增进有关国家之间的友谊，促进政治合作意愿，共创有利于地区和平的环境。

“一带一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规律，契合全球共同需要，彰显人类共同梦想，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有效途径。一年多来，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了60多个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中国作为倡议者，正以实际行动推动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出访20多个国家，深入阐释“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中国政府与部分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与一些毗邻国家签署了地区合作和边境合作的备忘录以及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积极推进RCEP谈判、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进程；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起设立丝路基金。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于2015年3月28日正式公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丝路基金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稳步推进。这些早期收获标志着“一带一路”已经从概念发展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向我们展现了“一带一路”的广阔前景。我们相信，只要相关各国和衷共济、相向而行，就一定能实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让各国人民共享合作成果，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深化经贸合作，共创新的辉煌

高虎城 商务部部长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盟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为古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为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要准确把握“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深刻内涵和战略意义，与各国各方凝聚共识、共商共建、共襄盛举。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经贸合作的基础和先导作用，不断扩大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往来，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和共同繁荣。

建设“一带一路”对推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意义重大

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酝酿深刻调整，亚欧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域内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

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

弱”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深挖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潜力，必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沿线国家要素禀赋各异，发展水平不一，比较优势差异明显，互补性很强。我国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具备技术优势的产业越来越多，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对外投资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未来5年，我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5 000亿美元，出境游客将超过5亿人次。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我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促进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把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推动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应，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形成互补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

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打造区域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贯通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区域，连接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是世界上跨度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沿线国家面临转变发展模式、增强发展动力的共同任务，具有密切经贸联系、扩大经贸合作的共同愿望。建设“一带一路”将促进区域内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人文交流更加顺畅，使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建设“一带一路”还将促进沿线国家各界交

流沟通，增进理解互信，拉紧友谊纽带，为各国各方携手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创造有利条件，促进沿线国家和平发展、区域和谐稳定。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先导

古丝绸之路首先是通商合作之路。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条件下，各国商人排除艰难险阻，跨越万水千山，形成商品贸易走廊，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古丝绸之路历久弥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当前，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基础更加坚实，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着力发挥好经贸合作的先导作用，推动沿线国家形成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合作格局。

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具备坚实基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交流与日俱增，经济融合不断加深。目前，我国是不少沿线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地。过去10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年均增长19%，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6%，均明显高于同期我国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年均增速。2013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6%，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营业额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一半。同时，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区域、次区域合作基础较好，交通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稳步发展。

沿线国家与我国发展经贸合作意愿强烈。当前，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沿线国家普遍希望扩大与我国经贸往来、搭乘我国经济发展快车，合作愿望日益增强。我国坚持正确义利观的价值导向，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沿线国家反响强烈，一些国家正在着手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有

效对接，有的合作项目正陆续“开花结果”。在近期召开的亚信峰会上，多个与会国家表示愿意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的国家还与我国在油气、物流等方面达成了一些重大合作项目，早期收获成果正在加紧落实。

经贸合作将为实现“五通”注入强大动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关联性和耦合性强。通过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提高贸易投资水平，使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潜力充分释放，可以为互联互通建设、金融合作等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也可以促进沿线国家政策对接和人文交流，政府和民间往来更加密切，促进“五通”最终实现。

秉承丝路精神，把“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落到实处

“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不限国别范围，不是一个实体，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我们将同各国各方一道相向而行，秉承和弘扬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紧密结合各国各方发展实际，推动实施一批有需求和共识、影响力大、带动性强的重大合作项目，以点带面、从线到片，共同打造沿线区域合作的贸易流、产业带、联通网、人文圈，以更广范围、更高水平的经贸合作加快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挖掘区域贸易新增长点。相互扩大市场开放，深化海关、质检、电子商务、过境运输等全方位合作，提高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积极开展面向沿线国家的贸易促进活动，优化会展布局，搭建更多更有效的贸易促进平台。稳定劳动密集型等优势产品对沿线国家出口，扩大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通过对外投资和工程承包带动大

型成套设备出口。在增加自沿线国家能源资源和农产品进口的同时，加大非资源类产品进口力度，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大力发展国际营销和跨境电子商务，推动企业在沿线交通枢纽和节点建立仓储物流基地和分拨中心，完善区域营销网络。坚持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扩大运输、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培育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积极推进特色服务贸易，发展现代服务贸易。

扩大双向投资合作。推动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由简单商品贸易向更高级的相互投资转变，形成贸易与投资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引导我国轻工、纺织、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投资设厂，在更加贴近市场加工制造的同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加强与沿线国家能源资源开发合作，鼓励重化工产业加大对矿产资源富集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旺的沿线国家投资，实现开采、冶炼、加工一体化发展，推动上下游产业链融合。深化与农业资源丰富的沿线国家农业种植和畜牧业养殖合作。鼓励企业到沿线国家扩大对外工程承包业务，积极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一路”主要交通节点和港口共建一批经贸合作园区，吸引各国企业入园投资，形成产业示范区和特色产业园，带动沿线国家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同时，提升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水平，推进中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稳步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沿线国家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推进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抓住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加快构建紧密衔接、畅通便捷、安全高效的互联互通网络。统筹谋划陆上、海上、航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推进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骨干通道建设，努力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加强海上港口建设及运营管理，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强各国各方之间交通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推进

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降低国际货物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

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巴基斯坦第二阶段自贸谈判，尽快实施亚太贸易协定第四轮关税减让成果，推动重启中国—海合会自贸谈判，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与斯里兰卡等国家的自贸进程，积极与沿线有关国家和地区发展新的自贸关系，逐步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同时，注重发挥现有区域、次区域合作组织及双边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政策沟通，及时协商解决项目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推动将“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内容和重大合作项目纳入现有多双边合作机制。

蓝图已经绘就，实干托起梦想。建设“一带一路”是提高我国开放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增进沿线国家人民福祉的一项伟大事业。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勇于进取，群策群力，扎实做好经贸合作这篇大文章，全面提升“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水平，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王毅 外交部部长

国际关系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回顾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的历史进程，人类始终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国家间的相处之道。

300多年前，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诞生。它确立了主权、平等这些重要原则，开创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先河。但这一体系最终没能避免欧洲陷入群雄征战。

200年前，“维也纳体系”应运而生，根据均势原则对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重新做出安排，维持了欧洲较长时间的和平。但最终导致结盟对抗和军备竞赛，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数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每一段国际关系的形成，每一个国际体系的建立，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必须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完善，否则就会跟不上时代脚步，甚至会失去它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70年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硝烟中，各国携手创建了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相应国际体系，这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巨大进步，为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建设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70年来，我们的世界总体保持了和平稳定，人类的发展事业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演变，现有国际秩序和体系也日益面临新的挑战。比

如《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往往得不到真正遵守，国际关系中各种不公正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年来，经济低迷、地缘动荡、恐怖危机、文明摩擦，各种乱象此起彼伏，有西方学者甚至惊呼，我们正在走进一个“失序的世界”。

7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才能更好地贯彻和落实《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更好地维护和发展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近年来，有人提出“霸权稳定论”，主张打造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国来统领国际事务；有人提出“全球治理论”，主张各国弱化主权，制定共同的规则来管理世界；有人提出“普世价值论”，主张推广某一种自认为“先进”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来一统天下。

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习近平主席总揽世界大势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必将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新型国际关系到底新在哪里？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空前紧密，利益共生不断深化，各国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相互联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各方都会受到影响。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包打天下，需要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共进。这是我们面对的国际关系的现实，也是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背景。

中国率先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是偶然掉在我们头上的一个苹果，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结果。

中华文明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立身处世之道，至今仍在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例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境界，“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道德情怀，这些理念与基于人性本恶、物竞天择的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明显不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致力于与各国开展友好合作，既为自身建设添砖加瓦，也为别人发展雪中送炭。

40多年前，5万多名中华儿女来到茫茫非洲草原，用汗水和生命筑成1 860多公里长的坦赞铁路。我们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勒紧裤带”帮助了一大批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提供了无私的支持。

30多年前，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我们把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优势与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优势结合起来，不断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践行互利共赢的理念，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快速成长为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中国人民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深懂得，得道才能多助，合作才能共赢。今天，中国朋友遍天下，隔山拒海不能限，中国外交更有信心践行合作共赢，更有能力行稳致远。

中国自身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现在，我们愿与各国一道，再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如何推进这一目标？习近平

主席指出的是，我们要把合作共赢的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树立建设伙伴关系的新思路

传统国际关系中经常看到的现象或是结盟，或是对抗。构建伙伴关系，就是要在上述两者之间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就像习近平主席所讲的，国与国之间，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中国承认世界上仍然存在结盟政治的现实，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对外政策的权力，同时我们更希望各方着眼时代发展潮流，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近年来，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秉持平等、包容和共赢的理念，努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迄今已同75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我们推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双方更加注重战略沟通，更多聚焦务实合作，更好管控矛盾分歧，这既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的安定。我们期待习近平主席2015年秋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结出新的丰硕成果。我们保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运行，两国重大合作项目持续进展，国际战略协作不断加强。我们将中欧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致力于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我们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协作不断增强，使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更加充实，促进中拉建立起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的伙伴越来越多。

开创共同发展的新前景

2015年联合国将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千年发展目标提出15年来，全球基本实现了一半极端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但是还有十几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发展不平衡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当今世界诸多矛盾热点的根源所在。我们主张，各国应真正树立起利益共同体意识，在共同发展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正是秉持着这一理念，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既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发扬，又是有着巨大现实需求的合作构想，已经得到近60个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和优先，契合亚欧大陆的实际需要。仅就亚洲而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亟须升级改造，现有融资机构远远不能满足建设融资需求。有需求就意味着有机遇，潜力可以转化为动力。中国倡议成立注册资本1 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深受各国欢迎。随着最近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等国申请加入亚投行，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将更具代表性和广泛性。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建好亚投行，用好丝路基金，发挥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等机制平台作用，建设富有生机活力的多条经济走廊。这些措施的实施，必将从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产生广阔辐射效应，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地区热点降温，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我们欢迎各国、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能参与到具体的合作中来。

营造各国共享安全的新局面

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和平来之不易，维护和平尚需努力。我们应更积极运作好《联合国宪章》确立的止战维和安全保障机制，更有效发挥好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作用，提升预防冲突能力。我们

要进一步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观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走出一条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

中国积极参与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已经派出近3万人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不久前派遣的一支700人的步兵营已经抵达南苏丹参与维和行动。我们积极参与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行动，迄今已派出19批护航编队为5800多艘国际船舶保驾护航。

中国积极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推动打造地区安全对话合作平台。我们成功召开了亚信峰会，并愿以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合作框架为支撑，开展双多边防务安全交流合作。我们坚持通过和平方式处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已经同14个邻国中的12个国家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我们积极倡导处理南海问题“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和平解决，南海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得到地区多数国家理解支持。我们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网络安全、抗击传染疾病等国际合作，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着负责任的大国作用。

中国还在积极参与各种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可行之道。我们倡导并践行“解决热点问题三原则”，即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强加于人；坚持客观公道，反对谋取私利；坚持政治解决，反对使用武力。我们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和无核化进程，成功主办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深度参与解决伊朗核问题谈判，围绕中东一系列热点问题开展特使穿梭外交，倡导举办了“支持伊加特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我们运用自身的资源和优势，推动斡旋缅甸国内的民族和解进程，既有利于缅甸自身的长治久安，也有助于中缅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坚持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乌克兰的内部事务，同时希望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获得政治解决。我们认为，乌克兰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维护好两个平衡，即把握乌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利益诉求的平衡，把握同俄、欧两大邻居关系的平衡，使乌克兰成为东西方之间沟通的桥梁，而不是对抗的前哨。

形成不同文明包容互鉴的新气象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 500多个民族和众多宗教，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是人类共同的宝藏。中华民族向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千百年来，儒家文化与道教、佛教以及伊斯兰教等不同文化和宗教，在中国大地上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这在世界上是相当少见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有力地证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做到“并育而不相害”，关键是要平等相待而不是居高临下，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贬损，彼此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

中国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合作共赢的切实践行者。中国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为了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中国外交将继续立足国情与世情，从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使和平发展道路越走越顺畅，让合作共赢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坚持文化先行，建设“一带一路”

蔡武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最近，习主席在访欧时进一步指出，建设文明共荣之桥，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让亚欧大陆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携起手来，共同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活。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坚持文化先行，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

建设“一带一路”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出使中亚，开辟出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古丝绸之路；随着古代航海业的不断发展，中外之间的海上贸易运输日益兴起，逐渐形成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欧亚非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通道，更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正是在丝绸之路的引领推动下，世界开始了解中国，中国开始影响世界。丝绸之路在推动东西方思想交流、文化交融，全球经济一体化、人类文明多样化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与沿

线国家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建设“一带一路”，是我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建设“一带一路”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但局部动荡频繁发生，各类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影响人类社会存续发展。这些问题和挑战，各国都无法单独应对，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共创未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在这一构想中，中亚、俄罗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是优先方向，中东和东非国家是交会之地，欧洲、独联体和非洲部分国家从长远看也可融入合作。这一构想充分彰显了中国开明开放的精神风貌和互利共赢的合作态度，有助于中国同沿线国家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建设“一带一路”将为沿线各国发展提供新机遇。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尚未结束，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和资金流向酝酿深刻变化，亚欧各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经济发展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挑战。“一带一路”将成为横跨中西、连接欧亚的经济纽带，实现各国以经济合作为重要内容的区域大合作，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使区域内各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带动沿线国家经济转型和发展。

建设“一带一路”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需要。欧亚地区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由于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各大国都非常重视在此扩大影响。近年来，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在欧亚地区活动日益猖獗。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相关国家仍存在一些领海、岛屿和海洋权益争议，海盗等各类海上犯罪活动也不同程度存在。这些因素不利于维护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建设“一带一路”，有助于各国通过合作来促进共同安

全，有效管控分歧和争端，推动各国的协调与和谐，使沿线国家成为和睦相处的好邻居、同舟共济的好朋友、休戚与共的好伙伴。

文化交流与合作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我们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进程中，要积极发挥文化的桥梁作用和引领作用，加强各国、各领域、各阶层、各宗教信仰的交流交往，努力实现沿线各国的全方位交流与合作。

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发展。古丝绸之路既是一条通商互信之路、经济合作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对话之路。古代中国许多物质文化和发明创造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后，对促进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近代西方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知识，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这两条通道所展现的开放、包容的文化交流心态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出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充分发掘沿线国家深厚的文化底蕴，继承和弘扬“丝绸之路”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号，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使沿线各国都可以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合理内容，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

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夯实我国同沿线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各国间的关系发展既需要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交流的“软”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历史文化宗教不同，只有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才能让各国人民产生共同语言、增强相互信任、加深彼此感情。近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新、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

越大、影响越来越广。中国与沿线大部分国家都签署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高层交往密切，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与不少沿线国家都互办过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等，在不同国家多次举办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我们要立足现有基础，打造新模式、探索新机制，深入开展与沿线国家的文化艺术、科学教育、体育旅游、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密切中国人民同沿线各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夯实我国同这些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文化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我们要发挥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做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的前景对接起来，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把握机遇、尊重规律，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中国一直高度重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积极有为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有力配合了我国整体外交大局。我们要结合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契机，发挥“人文先行”的优势，制定规划、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进一步推动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多领域交流合作。

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推动政府间文化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我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稳定和牢固的官方文化交流平台；与上合组织、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多个组织成员国及中东欧

地区建立了人文合作委员会、文化联委会机制，这是我们今后可以进一步借重的重要基础。未来，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制定政府文化交流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落实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执行计划，视情况在相关计划中纳入共建“丝绸之路”的内容，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同时，要注意发挥上合组织、东盟“10+1”、中阿合作论坛等现有机制的作用，丰富现有机制框架下的人文合作内容。

发挥现有丝路品牌工作成果优势，精心打造新的文化交流品牌。长期以来，我们在境内外举办了多个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要依托现有成果和品牌，统筹现有项目资源，打造新的文化交流品牌，深化“丝绸之路文化之旅”活动，与沿线国家联合举办“丝绸之路艺术节”，举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论坛、展览、演出活动。要继续挖掘古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围绕“文化新丝路”的主题，联合译介、出版相关书籍，拍摄、播放有关影视片。注重利用网络平台和新媒体手段，通过音乐、演出、动漫、网游等文化产品，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注意发挥我驻外使领馆文化处（组）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中国文化中心的全面布局，抓紧就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设新的文化中心进行合理安排，加大文物修复、文博设施建设、艺术人才培训等对外文化软援助的力度。

整合各方面资源，形成建设“一带一路”的合力。要积极发挥中西部省区的独特作用。由于特殊的地缘地位，我国广大中西部省区在建设“一带一路”进程中有着特殊的历史、人文优势，我们要在国家总体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支持中西部省区制定有关规划，加大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乌兹别克语等多个语种的广播、影视、游戏节目的投入制作，向沿线国家传播和推介中国文化。中西部各省区也应当以积极有为的姿态，发挥文化先行作用，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战略构想。要积极发挥市场主体性作用，调动各类文化企业的积极性，分国家、分地区制定对外文化交流贸易政策，推动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产业合作。要充分挖掘“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遗产，引导和动员民间力量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支持沿线有关国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此外，还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和智库的作用，群策群力，通过定期召开研讨会、分专题开展调研等形式，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历史赋予重托，奋斗创造未来。我们要深入发挥文化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扎实做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为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优先基础设施建设

何立峰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相容、相通、相辅相成，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血脉筋络，以深化互联互通推进“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溯历史古丝绸之路上，欧亚大陆的人民排除艰难险阻，跨越千山万水，共同创造了互联互通的典范，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丝绸之路是当时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尝试和实践，是经济全球化的“幼儿版”，通过古丝绸之路实现的互联互通，推动了沿线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促进了不同文明的对话和沟通，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实现了“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比起筚路蓝缕的先辈，我们更有理由、更有条件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其内涵之一就是打造现代版的互联互通，通过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将欧亚大陆两端，也就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活跃的亚太经济圈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带动欧亚大陆广大腹地区域的发展，进而辐射到亚欧非洲，促进形成统一的欧亚大市场，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总体架构，从根本上提升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活力。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APEC会议上阐述的那样，互联互通不只是修路架桥，不只是平地化和单线条的连通，而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更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化的大连通，这种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可以拉近沿线国家在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的距离，深化和扩大各国之间的投资贸易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因此，促进互联互通既包括加强以基础设施为基础的硬件建设，又包括抓好制度和规划衔接融通为基础的软件建设，还包括便利各国之间人员跨境的往来与交流。在这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当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基础，也是目前制约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薄弱环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的领域，要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加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当中，沿线国家应当共同努力把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突破口，抓住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提升道路的通达水平，切实解决不连不通、连而不通、通而不畅等问题，实现“‘一带’方向的西出阳关有故人，‘一路’方向的直挂云帆济沧海”。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另一个重点。各相关国家应共同谋求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的排阻，推进跨境建立以输电通道的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的升级改造合作。信息化时代，我们还应当高度重视信息网络的互联互通，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的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的水平，打造信息丝绸之路。

国之交往在民相亲，民相亲则事竟成，加强互联互通还包括便利各国之间人员的跨境往来与交流，促进民间友好往来，让信任和友谊

生根发芽。

做好互联互通这篇大文章，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仅本身能够形成新的增长点，激发区域内各国的潜力，更可以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为区域各国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当前，世界经济继续处于大调整时期，实现全面复苏仍然面临许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2014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走势出现新的分化，部分新兴经济体遭遇新的挑战，一些国家甚至面临金融危机以来最困难的局面。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资、技术和治理基础，在公路、铁路、桥梁、隧道、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管理经验。无论是千年冻土覆盖的雪山高原，万里无飞鸟的荒漠戈壁，还是壁立千仞的丛山峻岭，婀娜汹涌的大海之滨，到处都留下了中国制造、中国建筑的亮丽名片。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稳步推进示范项目的建设，共同确定一批能够照顾双多边利益的互联互通项目，对各方认可，条件成熟的项目抓紧启动实施，争取早日开花结果，让当地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也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要相关各国相向而行，一方面要发挥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充分利用既有的合作机制框架，通过多边磋商、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涉及更多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项目能够早日开工建设。

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完善政府之间的交流，提升双边合作水平，对合作意愿比较强的国家，双方可以共同编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规划，推动一批跨境的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引导沿线国家或地区建设一批互联互通合作的项目典范。

“风起扬帆正当时，四海同心筑新梦”，“一带一路”为沿线各国人民开辟了实现互联互通，互享发展红利，通往美好未来的新途

径。中国愿意与沿线国家一道和衷共济、携手努力，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荣耀与辉煌，谱写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

“一带一路”将为中外工商界提供历史性机遇

刘劲松 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

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讲了一句很生动的话：“‘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到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外交部刘振民副部长曾全面介绍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看法，强调亚洲合作对话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仅做一个具体的注解，就是“一带一路”到底能给中外工商界提供哪些机遇，或者讲工商界应该把握住哪些商机。广东和福建人喜欢“发”和“8”，于是我概括了以下八点：

一是宏观经济增长的机遇

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全球增长3.5%，IMF总裁拉加德称世界经济可能步入“太平庸”。面对增长乏力、需求不足的形势，各方面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从两方面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一方面是“硬”拉动，就是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项目增加供应和就业，促进区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拉动沿线国家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是“软”促进，就是让亚欧非国家找到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从而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近期中国概念股及“一带一路”概念股显著拉升，表明市场高度看好“一带一路”建设。

二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大项目的机遇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和海上重要港口建设都强调交通大项目建设，商机不言自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效益，据专家测算，一单位基建产出将拉动上游相关产业1.89个单位的生产扩张，并推动下游相关产业3.05个单位的供给扩张。我注意到有关报道，2020年前中国将建设172个重大水利工程，投入资金6 000亿元人民币，2030年前将兴建1 600个通用机场，投入1 600亿元。我注意到，中国包括福建省在内的各地方都在制定“一带一路”的配套方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项目很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印尼佐科总统表示，印尼计划建设24个港口、15个机场、18个经济特区、近万公里的铁路，热烈欢迎中国企业参与。斯里兰卡官员表示，汉班托塔港口项目将使当地1.2万家庭受益，在中国企业就职的斯里兰卡工人的收入是当地平均工资的2倍多。斯里兰卡1 000卢比面值的纸币图案就是中国港湾公司在斯修建的首条隧道。

三是国际产能合作的机遇

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研究发现，埃塞俄比亚制鞋业的工资仅为中国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劳动生产率则为中国的70%，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前总理梅莱斯听了之后专门到深圳考察，邀请中国制鞋企业到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东方工业园开办鞋厂。2014年，华坚集团生产的女鞋占埃塞鞋业出口份额的50%以上，带动了当地皮革加工、运输、物流、农场等多领域发展，把一部分“中国制造”变成“非洲制造”。

2015年3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产能与投资合作备忘录，合作框架内双边商业协议共28个，总金额约236亿美元，涉及钢铁、有色金属、平板玻璃、炼油、水电、汽车等多领域的产能合作。最近，俄罗斯、印尼、埃及、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领导人都表示，愿积极与中方开展产能合作。印尼政府制定的2015~2019年中期经济发展规划显示，当前印尼钢铁产量仅700万吨、水泥产量6 000万吨、电解铝产量25万吨，造船能力仅有80万载重吨，同时玻璃、石化、通信设备、光伏、铁路装备等行业发展相对滞后，与中国开展产能合作互有优势、互有需要、互有机遇。

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已积极行动。河北省计划于2023年前，将2 000万吨钢铁，3 000万吨水泥和1 000万吨重量箱的玻璃产能转至国外。国内玻璃纤维龙头企业浙江巨石集团“巨石埃及”项目2014年正式投产，首期投资2.23亿美元，设计年玻璃纤维产能8万吨，全部建设成后年产量将达20万吨。项目投产以来，产销两旺、效益突出。

四是贸易投资提升的机遇

过去1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年均增长19%，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6%。2015年一季度，在全球贸易总体下滑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到2 360亿美元，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10%，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8%，大幅领先整体出口增速；进口915亿美元，占我国进口总额的23.4%。预计10年后，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有望突破2.5万亿美元。

投资方面，2015年一季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6.8亿美元，其中对福建省投资项目22个，同比增长100%。一季度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5.6亿美元。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70多个在建的经济产业合

作区项目，年产值超过2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20万个就业机会。总体看，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的占比不到20%，还有很大增长空间，我们也确实希望扩大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当然也希望有关国家为中国投资者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五是自贸区和便利化的机遇

2015年一季度，全球新增的反倾销、反补贴、特保调查案件同比上升了18.8%，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涉及中国产品，提示我们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仍然盛行。“一带一路”建设将自贸区合作作为重要方向，致力于降低贸易投资壁垒，逐步建设起高标准的周边自贸网络。目前中国约30%的对外贸易通过自贸区完成，其中大多是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伙伴进行的，正在商谈的有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日韩自贸区、中国—海合会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福建也在建设自贸区。中国正推进与各国海关合作，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提高签证便利化水平，本月将在西安举行“一带一路”海关署长会议。目前中国已与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缔结各类互勉签证协定，19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落地签证便利。外交部正在全力以赴增加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希望尽早实现中国公民到沿线国家旅游和工作“说走就走”的目标。

六是新投融资平台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未来8~10年，亚洲每年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将达到7 300亿美元，世界银行的测算是8 000亿美元。世行和亚行每年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总和只有300亿美元左右，各国能够自筹的资金只有2 000亿~3 000亿美元左右，资金缺口巨大，因此建立亚投行和

丝路基金十分必要，它们是现行国际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已有57个，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丝路基金已开展首个投资项目，通过入股三峡南亚公司参与开发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以及即将成立的金砖银行也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持。

我注意到媒体报道，至2014年底，“中农工建交”五大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32家，还有4家正待当地监管机构审批。中国银行2015年支持“一带一路”授信不低于200亿美元，未来3年达到1 000亿美元。中国工商银行在沿线国家储备项目131个，投资金额1 588亿美元。国家开发银行拟涉足沿线国家900个项目，投资金额达8 000亿美元。希望中外企业家与有关机构主动接洽，利用好既有资金池，搭上人民币国际化的快车，努力打破融资瓶颈。

七是海洋经济和旅游经济发展的机遇

“一带一路”要推进丝绸之路特色旅游，还要全面发展海洋经济。2014年全球旅游接待人数增长了4.5%，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预计2020年全球旅游者人数将达14亿人次，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市场国家接待的游客将超过发达国家，这将是一个历史性变化。2014年中国公民的出境游已超过了1亿人次，国际旅游收入达到569亿美元，增长率超过10%，计划到2020年旅游业占GDP比重超过5%。英国一个机构预测，今后10年世界游客人数平均每年增长5.4%，增长最快的区域是亚太。近日，一个中国公司组织1.27万员工分批次游览泰国，搭乘110架航班入境，泰国旅行社为此出动400辆大巴，预订了3.8万间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房间，显示出中国公民出境游的火爆。

就海洋经济而言，全球海洋航运和海洋工程的年产值已超过1.6万亿美元，仅海洋生物制药的年产值就达10亿美元。发达国家在传统的海上运输、海洋油气资源开发之外，大力发展新兴海洋经济，特别是海洋工程装备业、海洋旅游、海洋科研、海上可再生能源以及海运金融保险等服务业。过去7年，欧洲对潮汐能等海洋新能源的私人投资达8.25亿美元。中国的海洋经济也发展很快，2014年产值接近1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GDP总额的10%。希望中外企业家加大对这两个领域的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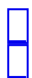
八是能源资源和生态环保合作的机遇

2014年，中国石油进口3.08亿吨，同比增长5.7%，石油对外依存度59.5%，天然气对外依存度32.2%。中国2014年进口铁矿石8.69亿吨，购买了约三分之二的全球海运铁矿石。上海铜库存为世界总库存的四分之三。

2014年，全球清洁能源总投资同比增长16%，从2013年的2 680亿美元增至3 100亿美元，中国约占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总额的29%，四分之三投入风能和太阳能，目前中国太阳能发电市场跃居世界第一，风力发电也名列世界前茅。尽管当前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下行，但生产生活都需要能源资源，对能源资源产业的长远发展前景应该保持信心。能源资源合作包括清洁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之一，在新时期的绿色丝路上，中国与沿线国家有很多大项目和中长期大合同，有许多生态城和大量环保产品、环保科技的合作规划，这些都对沿线国家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意义重大。

古代丝绸之路是和平之路，商贸之路，今天的“一带一路”更是财富之路和共同繁荣之路。有国外朋友讲，“一带一路”体现了四个C，就是合作性（Cooperation）、互补性（Complementarity）、国别

针对性（Country specific）和企业主力作用（Corporation’ key role），我很认同。“一带一路”建设将坚持市场运作，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相信中外工商界的朋友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会让自身事业更加红火。



第三章
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带一路”，助推对外开放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一带一路”是我国外交的新倡议、新战略，旨在通过沿线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往来，促进各国间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亚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普遍落后。该倡议实施后，短期内可为所在国增加就业机会，长期来看，可以提高其经济增长的潜力，帮助发展中国家逐渐完成从发达国家“输血”的发展援助模式向自身“造血”的发展合作新模式转变。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为了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我曾提倡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涵的“新马歇尔计划”。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是一种多赢的国际发展合作。

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倒闭促发了自1930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索，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真正复苏。但是，结构性改革所包括的降低工资、福利，政府减少赤字等措施，不仅会在短期内压低消费、扩大失业，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下推行，还会在政治上面临很大阻力。

过去的危机通常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建议发生危机的国家以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

间。此次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爆发，发达国家都有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一个国家想以货币贬值增加出口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必然引来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性贬值，结果大家都无法增加出口，也难以进行结构性改革。

预见国际货币组织传统措施的失效，我在2009年初提出了一个全球复兴的“新马歇尔计划”，主要内容是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这些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会消除增长瓶颈，促进所在国的经济增长，还会拉动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出口，给发达国家创造和货币贬值一样的结构性改革的空间。

之所以提出这个全球复兴的“新马歇尔计划”，是因为不仅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还有改进空间，而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非常差。发达国家与其以财政赤字发失业救济，还不如把同样的资金用来投资于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达到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的作用，还可以提高其经济增长潜力，增加财政税收，弥补财政赤字。另外，主权基金、退休基金、中国及石油输出国的外汇储备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收益率很低，也都不如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上述建议在提出以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2010年，20国集团首尔峰会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列为发展共识的第一项。2013年的圣彼得堡和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也再次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也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复苏的措施。但是，尚未有国家采取实际行动，为全球复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基金。如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率先推进亚欧间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球做出了榜样。

劳动密集加工产业转移

“一带一路”战略除为我国营造友好的外部环境之外，还扩大我国外汇储备的使用范围，培育我国出口增长点；沿线有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有利于我国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和建筑材料的供给上，我国拥有比较优势。

在推动为发展中国家“造血”的发展合作新模式上，我国还有一项法宝，即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工资上涨，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大量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将逐渐转移出去。自工业革命以来，类似的转移已经出现过多次，为承接国创造了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的发展中国家，就能够实现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摆脱贫困，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这次，我国劳动密集加工产业转移的新特点在于规模庞大。按照2014年公布的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员是1.24亿人，相当于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产业向外转移时的12倍，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产业向外转移时的22倍。世界上能够承接这么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地方只有非洲。非洲有10亿人，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年轻人比例高，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非洲方面，已有2012年东莞的华坚鞋业集团的成功案例。该集团以“两头在外”的方式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厂，创造2 000个就业岗位，当年实现盈利。它一跃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还使埃塞俄比亚鞋业出口翻一番。同时，这种做法也有利于我国附加值较高的中间部件和相关机器设备的出口，为我国的产业升级开创国外的市场。所以，和“一带一路”一样，这也是一个双赢的发展合作模式。借助“一带一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战略都可以为与我国开展合作的发展中国家“造血”。

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

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移为主要抓手的发展合作新模式对国际发展有很大意义。

“二战”以后，发达国家设立了很多多边、双边的发展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总署、世界银行、美国援外总署、英国国际发展部等，但并没有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在“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中挣扎。从“二战”以后到现在，在近20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中，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行列；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行列，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另外5个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未能取得成效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在这两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只能采取“输血式”的援助，并附带许多额外的和发展无直接关系的条件。

在推行对外发展合作新模式方面我国也面临不少挑战。一方面，中国企业没有做好“走出去”的准备。“走出去”战略在2001年才提出，国内外的政治、金融、法律环境都不一样，很多“走出去”的企业最终都失败了。这既需要企业提高素质，也需要政府提供帮助。

此外，中国对外合作政出多门，有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等，还有进出口银行、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他们都有对外援助资金，结果是力量非常分散，不能集中使用。中国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成立一个统一协调对外合作关系的国际发展合作部，把资源组合起来，推动建立我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格局。

“一带一路”需要加上非洲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倡议。这个倡议的抓手是什么？抓手是以基础建设为主，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当我们提出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时候，国内外的报纸经常把它称为“新马歇尔计划”，这和原来的马歇尔计划确实不同。“二战”后美国利用它过剩的产能，黄金储备最多，又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优势，即它的资金和产业帮助欧洲国家从战后复苏。

我们现在提出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倡议确实跟它不一样，可是为什么有的人还把它称为“新马歇尔计划”，我觉得倒是有一定的道理。这件事情实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在2009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的位置上，就曾提出那次的倡议，因为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一般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必然代表这个国家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存在，那么这个国家应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才能真正从危机当中复苏。

结构性的改革在发达国家目前的阶段来讲，内容包含了什么？发达国家工资太高了，必须降低；福利太多了，必须减少；金融机构杠杆率太高，风险承受能力太低；政府的财政赤字也偏高，在这种状况下发达国家的竞争力是低的，风险承担能力是低的，政府维持经济稳定的能力也是低的。

这些问题不改革的话，发达国家很难从这次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当中真正复苏，这是我在2009年初做的判断，如果不采取措施，这场危机可能会长期持续。但是如果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让这些发达国家能够真正恢复经济的正常竞争力，必须怎么做呢？

我们知道前面讲的这些内容如果推行：减少福利，减少工资，降低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减少政府的赤字，都会压低消费需求，压低发达国家的投资需求。在推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失业率会提高。但是大家很清楚，发达国家在2008年的这场危机发生以后，经济增长速度触底，甚至是负增长，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要推行这些真正帮助它长期恢复经济正常发展的结构性改革，政治上行不通，因为失业率很高的情况下，如果采取这些措施进一步推高失业率，对长期来说是好的，但是马上会引来社会上的各种动荡不安，进而导致推行不下去。当然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需要结构性改革这不是第一次。

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一般金融危机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失业率也增加，使得其必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申请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开出三个药方：第一是要求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的素质，经济的竞争力，这势必会增加失业。第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货币大量贬值，增加产品出口竞争力，用出口市场创造需求的增加来对冲国内因为结构性改革出现的收缩，即用货币贬值来创造国内结构改革的空间。第三是提供一笔短期的援助，让其渡过当前的难关，因为前两个政策的推行总是需要一段时间

的。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传统的“三把斧头”在2008年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是做不了的。

首先我们来看发生危机的这些国家，像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并没有自己的货币，没有办法让货币贬值，通过增加出口竞争力来创造内部的结构改革的空间。当然欧元可以整体贬值，但问题是美国也出现了危机，美国也需要结构性改革，美国也有很高的失业率，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这次的危机是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的。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欧元想贬值，给南欧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导致的出口增加，拿走的是美国的市场，拿走的是日本的市场，会导致日本、美国的失业率进一步增加，这种状况当然美国不干，就会采取一些竞争性的贬值来对冲欧元的贬值。

同样的情形，如果美国想用美元贬值的方式，欧元、日元也会贬值，这是我在2009年初判断的状况。实际上从2009年以后发达国家之间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形，一个国家货币率先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贬值，接着其他国家货币也用同样的宽松货币政策对冲竞争性贬值。

我们怎么帮助发达国家以及全世界走出这种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让它跟货币贬值一样可以给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也就是增加它的出口呢？我在2009年的时候提出一个全球复兴计划，主要内容是针对发达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

这些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在短期内不仅会创造投资国的投资需求、经济增长、就业，而且从各种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中，每百美元的投资会创造70美元的进口。如果全球共同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计划，投在发展中国家，那么就可以像货币贬值那样给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

这样的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对发达国家都是有利的，只要投资是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就会在短期创造就业，创造需求，在长期提高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提高以后，政府的税收会增加，税收增加了，经济发展速度快了，政府就可以把现在的投资债还掉，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跟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跟“挖一个洞，补一个洞”的凯恩斯主义是不一样的。当时我把它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投资。

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差

我们这次到美国访问，从波士顿到纽约，300公里走了三个多小时，摇摇晃晃，从纽约到华盛顿，300公里的火车同样摇摇晃晃走了三个多小时。如果在中国走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话，一个小时就到了，发达国家有这样的机会。相对来讲，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还比较完善，可是我们放眼世界，除了中国之外，每个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在拉丁美洲，在南亚，在非洲，基础设施都非常差，都是增长的瓶颈。

如果我们在那个地方投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有利于发达国家走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因为这次发达国家的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最严重的一次，所以这次如果真的要帮助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小打小闹不行，必须有全球的共同努力。

所以在2009年我当时的倡议是，发生危机的发达国家都是储备货币国，他们发生危机就走不出失业率高的困境，失业救济又进而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到最后就是通过印钞票来还债。与其将来印钞票还债，为什么不利用现在储备货币国的特殊地位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及他们自己国家的基础设施呢？

同时，储备货币比较多的，像中国和一些石油输出国，货币储备以后一般是买美国政府的债券，或者是投资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但美国的债券利率那么低，金融市场风险那么大。看样子不管是石油输出国还是中国，外汇储备还会继续增加，在这种状况下比较好的做法是什么？还是进行这种全球复苏的基础设施的投资。

传统的主权基金，还有发达国家的各种退休基金，过去一向是投资在政府债券上，但是现在政府债券回报率非常低，而且长期下去会货币贬值，风险特别大。如果投入到基础设施中去，变成稳定回报的投资机会，只要规模足够大我们真的可以得到双赢，不但帮助发达国家走出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而且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增长的瓶颈，得到一个更快速发展的机会。

中国具有率先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条件

我在2009年提出这个概念以后，开始时接受的人非常少，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首先是在首尔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首尔发展共识》的第一项，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在2010年峰会的时候，当时发达国家认为马上会走出危机了，所以那个共识没有被看得很重要。在莫斯科的20国峰会也强调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澳大利亚的峰会也认为这个很重要。

这次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率先实施“一带一路”的建设，以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以基础设施作为切入点。这是我们率先走出的一步，这一步对发展中国家当然是好的。我前面谈到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增长瓶颈是基础设施，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结合现有的国际项目，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等，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增加投资，并且撬

动像主权基金，退休基金等等的加入，必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其快速的发展能够给发达国家创造出口市场，给他们结构改革创造空间。所以这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国际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发展。

当然，这也有利于中国。在基础设施上，我们是有比较优势的，而且在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这些原材料，钢铁、水泥上我们产能利用率是低的。如果在国际上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加上我们在工程建设上的比较优势和我们的产能，对中国是有利的。

我们有4万亿的外汇储备，我想未来的外汇，贸易盈余还是会继续增加的，基本账户也可能有盈余，在这种状况下最好还是把这些钱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回报会比较高，而且有利于国际的发展。

除了利用我们现有的比较优势和多余的产能，还有利于开放市场。如果发展中国家打破瓶颈发展起来，市场就会扩大，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相对疲软，如果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倡议下能够发展快一点，那么我们的市场就有增长点，并且“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有很多是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样的投资也有利于保障我们在新常态下所需要的资源的来源，这是双赢的。我们可以创造好的合作关系，友好的关系，有利于我们的外交环境。

产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创造发展机会

我觉得“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一个倡议，从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来看，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巨大的劳动力

密集型加工产业。由于国内的工资上涨，比较优势逐渐在消失，这个产业要转移出去。

这个产业要转移出去会创造其他发展中国家难得的窗口机遇期。放眼历史，从工业革命以后，所有发展成功的国家除了少数几个石油输出国，都是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开始的。

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的时候率先在纺织业开展，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刚刚从农业社会进入大工业社会的时候，也是从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开始的。如果你今天到欧洲去访问，不管是荷兰、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瑞士、瑞典，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他们国家的产业是什么？基本上都是纺织业、制鞋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你到美国去了解，同样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少数几个赶上发达国家的，像日本，“亚洲四小龙”，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任何国家都会经历这个阶段的。而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基本上都是承接收入水平比自己高的国家，当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外转移的时候把它接过来。英国是率先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在18世纪中叶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19世纪逐渐往西欧、北美转移，在西欧、北美开始进行他们的工业化，现代化。

“二战”以后，日本抓住窗口机遇期实现了快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抓住日本产业转型的窗口机遇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抓住“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的机遇期实现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变成世界工厂，变成世界最大出口国，世界最大贸易国。这是历史规律。

非洲有能力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

经过35年的发展，中国从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我们展望未来十年还会继续增长。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充满生命力，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密集产业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如果转移出去，就会给收入比我们低的国家创造窗口机遇期。

但是，这次跟过去比较很大的不同是什么？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把产业往外转移的时候，日本制造业雇用的人数是970万人，20世纪80年代韩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往外转移的时候，制造业雇用的人数是230万人，中国台湾大概150万人，中国香港差不多100万人，新加坡50万人。这次我们国内制造业是多少人呢？按照第三次工业普查，前几个星期公布的数字，我们整个制造业雇用的人数是1.24亿人，是日本的12倍，是“亚洲四小龙”全部加起来的22倍，因此有大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往外转移。

我们要转移的产业这么多，打个比喻来讲，如果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太小的话，开始的时候工资水平比我们低一点，但是只要我们一转移，就像水缸里面的水往水盆里流，水就满了。传统上我们认为当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开始转移以后，像越南、柬埔寨的工资上涨速度甚至比我们还快，工资差距马上就变小了，比如说中国制鞋业的工资与越南比，越南大概是我们的1/4，现在越南的工资已经是我们的一半，而这几年不仅在越南、柬埔寨，甚至孟加拉都是这样。

所以，世界上哪个地方可以承接这么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呢？我看来看去只有非洲。非洲的情形非常像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量的劳动力在农村，是剩余劳动力，大部分是年轻人，没有就业，工资水平只有我们的1/10～1/5。当然你会说非洲那么远，基础设施那么差，能承接中国的密集型产业吗？

但是，我们看看20世纪80年代，外界不就是像现在形容非洲那样形容中国的吗？其实激励机制是政策的配套，如果非洲的国家懂得20

世纪80年代的中国，那些所谓积极的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给我们转移的企业创造有利的环境，即使基础设施很差，我们转移的企业也可以马上发展得很好。2012年东莞的一家企业在埃塞俄比亚总理亲自招商的状况下转移过去，一年就成功了，一年就雇用了2 000多人，一年使埃塞俄比亚的制鞋出口增加了一倍多。

所以只要思路对头，我们可以利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作为我们新的发展合作的方式，这种发展合作的方式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互补的，“一带一路”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主，然后以产业转移为辅。在非洲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产业转移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这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一样，是我们对外发展合作的两个支撑点。如果这个能落实，对国际发展会有很大的意义。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二战”以后，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发达国家设立了多边的、双边的发展援助机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还是陷在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中。第一个原因是从农业产业进入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真正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模式，但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前就已经走完那个阶段了，他们没有产业可以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帮其“造血”，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必须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他们也是20世纪以前就已经建成的，比较优势都已经消失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发展合作就只能发展援助，给发展中国家钱，给钱以后还要附带很多发达国家的理念和发达国家的标准。比如说会

强调一些发达国家看起来非常重要的东西，像教育、健康等等，但是这些东西都不“造血”，所以意愿非常好，效果非常差。

我们主张“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为主，如果说我们还有一个非洲战略以产业转移为主，这些都是“造血”的。非洲是我们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一带一路”有很多国家可以承接，他们就可以实现工业化，再由基础设施建设消除增长的瓶颈，这样就能够在真正的发展合作上实现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博鳌论坛上讲的“百花齐放春满园”。我想这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第二个原因是发展理念。到现在为止，发达国家给那么多钱，还有那么多机构支援，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呢？因为他们以发展中国家的理念作为发展援助的内容。我们新的对外合作的这种倡议实际上是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提出的，中国什么经验呢？“要致富，先修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么说。所以我们帮他们修路，他们要发展起来，发展的产业必须有比较优势，在市场上有竞争优势，我们现在准备转移产业，而且这个时候要创造有利的环境，例如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这都是新的发展方式，过去这些在世界银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很对的方法，在中国有效，在非洲一做也有效，可以带来新的发展理念。

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对于中国，如果真要落实战略，有很多挑战。一个是我们“走出去”的企业没有准备，因为这个状况对我们来讲，发生得太快了。我们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时候，人均收入连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都不到，所以我们当时大量从外国吸引投资，吸引援助，而“走出去”战略是2001年才开始提出的，中国的企业一直处在国内扭曲的经营环境下，到国外去，文化环境不一样，法治环境不一样，各种政商关系

条件也不一样。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走出去”的这些产业和企业失败的比成功的多。

比如说2012年，华坚在埃塞俄比亚成功了，突然间改变了国际上的投资者对非洲不可以作为现代制造业基地的看法，也改变了国际买家不可以在非洲下单的看法。埃塞俄比亚2013年自己设立了第一个工业园区，一期22个厂房，三年不到全部都租出去了，谁用的呢？土耳其的，韩国的，孟加拉的企业，他们的产业是成衣业，制鞋业。我们中国企业怎么自己不去呢？原因是没有准备。

大部分的企业知道在国内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国外逐渐发展，订单不断流失，却总是不敢迈出去，这需要我们克服，需要我们在“一带一路”以及非洲战略上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抱团出海”，帮助接收国设立工业园区等，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新的发展援助。过去我们都是接收国，现在我们必须是理念的倡导国，以及资金的提供国。但是我们现在的对外合作政出多门，有商务部、财政部、外交部，还有农业部，都有对外援助的基金，非常分散，不能集中使用。当然，我们还有进出口银行，他们都在做，但是很分散，形不成合力。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成立一个统一、协调对外合作关系的对外发展合作部，把这些优势资源组合起来，利用我们的基础设施比较优势，利用我们的资金外汇储备，利用我们对外援助的窗口，利用我们产业即将转移带来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机遇，既可以改变国际发展的格局，也可以真正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国际发展环境。

“一带一路”引发中国外交“哥白尼式革命”

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2015年3月8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记者会上明确提出，2015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两个重点”就是做好“和平”与“发展”这两篇大文章。这是中国外交部长首次就中国外交重点做出明确界定，标志着中国外交步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尤其是“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提出，成为中国外交的总抓手，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布局的先后次序。显然，对中国外交来说，这一变化是整个外交重心的转化，其影响无异于一场外交领域中的“哥白尼式革命”。

从服务经济发展到对接“一带一路”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以来，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就是服务经济发展，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一中心任务指导下，稳定压倒一切，维稳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形态。在冷战结束前，中国在外交上竭力维护国际战略格局的稳定，在美苏争霸的国际体系下维护在美苏之间的平衡，采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的外交态度。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心，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

重。无论是在解决台湾问题、达赖喇嘛等政治问题，还是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处理各种经济贸易摩擦等经济问题，中美关系都被中国外交视为优先处理的问题，只要中美关系不出现根本性的危机，中国外交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在岛屿主权争议、地缘政治热点以及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长期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劝谈促和”等态度，从根本上与维稳外交的总体思路是一致的。

“一带一路”伟大构想提出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成为中国外交优先关注的对象。从涵盖范围来看，“一带一路”涵盖亚太、欧亚、中东、非洲、南太平洋地区等，包括65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63%，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这些国家大多数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外资外贸的流入量每年分别增长13.9%和6.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很多。同时，“一带一路”将欧洲经济圈、亚太经济圈这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两大经济圈连接起来，成为未来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世界经济走廊，一旦跨越重重艰难险阻，将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地理布局，成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战略构想来看，“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统筹国际国内大局的总战略，中国外交将围绕这一中心任务，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为“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实现勇当开路先锋。

相比此前中国外交中的维稳特征，“一带一路”要求主动进取。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交，中国改变了“等客上门”的被动态度，转变为“主动登门”的主动姿态，积极提出合作倡议，率先规划合作项目，努力推动合作进展。自当选国家主席以来，习近平主动访问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斯里兰卡、印度、马尔代夫、巴基斯坦等众多“一带一路”国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向纵深发展。很明显，“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中美关系被纳入对接“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中，与美国一

起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一部分。换言之，中国外交越来越强调中美关系要服从和服务于“一带一路”构想，而非像以往那样一切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外交实现了从中美关系向“一带一路”的“重心转移”。

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

“一带一路”在推动了中国外交重心转移的同时，也实现了外交策略总方针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移。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实现战略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之后，在外交上也确立了收敛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光芒，一心一意谋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积累中国的总体实力，而对于国际社会中发生的诸多争端和热点问题，采取低调超脱的灵活姿态，全力营造有利于国内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对于此种低调务实的外交风格，邓小平同志将其概括为“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在此后的三十多年时间内，无论是处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际事件，还是应对海湾战争、科索沃危机、反恐战争、金融危机等复杂地区和国际性问题，中国都采取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各方发展关系，采取相对超脱的态度，不卷入冲突和纠纷，极力避免引火烧身，一心一意致力于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提出，是中国外交策略总方针突破“韬光养晦”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以习近平为主席的中国领导人在中央周边工作座谈会上已经提出奋发有为推进中国外交，但真正标志着向奋发有为转变的还是“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与此前中国外交给人的低调超脱的印象相比，“一带一路”给人一种极强的视听冲击力，意味着中国不仅善于谋划自己的和平发展，高调向世界宣示要努力寻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积极向国际社会大胆提出

倡议，一道实现“亚洲梦”“世界梦”。诚然，如同一些人士所担心的那样，中国主动高调提出若干合作倡议会引发一些国家的猜忌，甚至会招致一些国家添油加醋的挑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短期内难免会受到影响，但直面矛盾和挑战本身就是一种奋发有为的体现。说到底，奋发有为强调的不是中国想要做什么，而是强调中国外交要有一种负责任、敢担当的精气神。中国人毫不隐瞒自己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想法，也不愿对自己的战略意图遮遮掩掩，国际社会更关心的是中国此种敢于担当的行为究竟是一种积极的福音，还是一种消极的挑战。只要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开放和合作共赢的新国际关系精神，多做对自身和国际社会有益的事情，究竟是韬光养晦还是奋发有为，并不是那么紧要。

当然，强调奋发有为也不是像欧美国家在历史上所做的那样谋求地区和世界霸权，而是谋求建立命运共同体。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在国际社会中倡导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当年在谈到“有所作为”的时候，也强调所谓“有所作为”就是要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在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时候，更多关注在改革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上有所作为，以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中更多采取融入和学习的态度。“一带一路”的提出，则在继续推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也强调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上奋发有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众多奖学金名额、培训机会等，都是中国外交奋发有为的重要体现。

从全方位外交到立体化外交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逐步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广交天下朋友，发展务实合作，逐步形成了“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格局，与70多个

国家和诸多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着眼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走出了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对外交往新路，形成了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然而，中国外交建立起的这一形形色色的伙伴关系网更多停留在政府间关系的层面，所结交的“朋友圈”也多半局限于社会精英圈子，且更多以政府间合作为主，外交关系的热络势头与中国和世界互动的要求还不完全相适应，甚至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还出现了“政冷经热”“政热经冷”等不协调和不匹配的问题。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并成为近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因此，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频率和互动范围的展开，要求中国外交不断开辟新领域，提升新境界。作为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总抓手，“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倡导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领域，推动中国外交沿着三个维度展开，步入立体化外交的新境界。

一是协商外交

就“一带一路”构想而言，涉及基础设施、经济走廊、海上合作支点、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等众多领域的协商，需要外交部和其他相关部门与沿线国家进行大量的协商，有堆积如山的协议需要谈判，以此来扩大彼此利益的汇合点。此种协商既有双边层次的，也有多边层次、次国家层次乃至非国家层次的互动，甚至还会涉及域外国家的参与。所有这一切问题，都需要中国外交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汗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面对现实中的艰难险阻，打通新时期的“一带一路”犹如当年唐玄奘西天取经，要历经无数的劫难方可获得“真经”，面

对漫漫征程的“九九八十一难”，中国外交唯有通过耐心细致的协商才能突破，中国外交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能力准备。

二是公共外交

“一带一路”的开拓历程，不仅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系列工程，更是妥善回应来自各方面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质疑、批评、指责甚至冲突的艰难历程。且不论一些域外国家的百般刁难，仅沿线国家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和广大民众就有无数的解释工作去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既是一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之路，更是一条人文交流互联互通之路，搭建心灵理解之桥的难度丝毫不亚于修建一座大桥。为此，“一带一路”构想要求中国外交必须把回应各方面舆论的公共外交摆到更加重要的突出位置，以极大的耐心、细心和毅力来克服种种困难，澄清各种误解，真正让“一带一路”深入人心，成为一条跨越历史恩怨、超越文明羁绊和实现心灵相通的理解之路，信任之路。

三是统筹外交

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党、政、军、民、商、学、媒等众多领域，更大的困难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自身。如何统筹协调各层次、各领域和各部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步伐，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国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规划的公布，各方面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已经出现了一哄而上、步伐不一和自我混乱的局面，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出现忙于争抢项目、争夺资源和优惠政策的问题，这给统筹外交敲响了警钟。4月28日，外交部与河北省政府一起举办了以“互利共赢的国际产能合作·聚焦河北”为主题的第十一届“蓝厅论坛”，是外交部与河北省横向统筹的一次重要努力。

随着“一带一路”行动计划的陆续展开，统筹外交的任务会越来越重，要求中国外交不断提升统筹协调能力，避免混乱和失序的倾向。

总之，“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和实施，推动中国外交实现了战略重心的转换，要求中国外交必须与时俱进，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一带一路”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经济走廊

杨眉 郭芳 姚冬琴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世界因中国而精彩

古老的丝绸之路，曾是经济共赢、文明互鉴的合作范本；“一带一路”，将在开放、发展、和平、共赢、安全、交融的世界新格局下，再创丝路新辉煌。

在世界政经版图上，一个来自中国的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正在为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并将开启一个共创共享的国际合作新时代。

这一宏伟构想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新丝路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全球高度关注和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承接古今、连接中外，赋予了古老丝绸之路崭新的时代内涵，被誉为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一条和平发展的共赢之路、一项脚踏实地的伟大事业。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发现，“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约44亿人口；“一带一路”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上升期，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新丝路战略构想，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沿线各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一带一路”，是中央统揽全局、顺应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成就，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

但是，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需要通过持续的发展来解决新问题、新障碍，中国比以往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专家预测，未来5~1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大国呢？

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并相信，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包容的心态、更加宽广的视角，对全球共同发展、全球治理结构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梦与世界梦始终相通

“一带一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构想，更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有利于将政治关系、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中，经贸合作是基石。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必将迎来一个共创共享的新时代。

“一带一路”开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推动用人民币结算

“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带来经贸合作新机遇的同时，也给人民币国际化注入了动力，为沿线国家实现货币直接交易打开了大门。

2014年6月18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6月28日，中国央行与卢森堡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签署了在卢森堡、巴黎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并将在两地分别建立人民币清算银行。7月2日，韩国总统府宣布，韩国总统朴槿惠近期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协议，建立韩元兑人民币直接交易市场。

人民币加速国际化的背后，是当前全球经济联动性加大、美元币值不稳定的现实情况，和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的需求。与此同时，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人民币存在大量潜力可挖掘。2013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约12%，而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的市场比重尚不足2%。

“人民币国际化是为了防御外部不利冲击，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实现人民币国际地位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国家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涂永红表示，“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而是国际贸易格局变化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要求。”

“一带一路”建设，无疑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的契机。

货币流通势在必行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强调，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加强“五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货币流通”。习近平说，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本币结算方面开展了良好合作，取得了可喜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一好的做法有必要加以推广。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

随着双边贸易规模呈现不断增长和扩大的趋势，贸易结算中对人民币的需求也进一步攀升，这为人民币的区域化乃至国际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目前，中国央行已先后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3年9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举行会议时提议进一步扩大双边本币结算。这些协议的签订，一方面有利于双边以及多边贸易的有序发展，降低交易成本，规避因美元币值的剧烈波动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扩大人民币影响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统一、安全、高效的选择

尽管人民币已被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广泛接受，但专家认为，人民币离充当主要国际货币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需要抓住有利的战略窗口期，如“一带一路”建设，来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2014年5月23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风险首席分析师赵昌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财经智库国际研讨会”上发言时表示，“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中货币结算不统一的问题”。

赵昌会认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来说，此时将人民币列为结算货币是非常自然的选择。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后，沿线国家的贸易互通可以更加便捷，贸易的公平性和收益性也可以得到保障。而未来人民币将更多地以“载体”的角色，为提高沿线国家贸易的效率及安全性做出贡献。

专家认为，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契机，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有两个突破口：第一是积极推进能源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第二是扩大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投资和贷款份额。

中国是中亚油气资源最稳定、最可靠的长期客户，由于美元币值不稳，与中国进行贸易收取美元对中亚国家来说非常不利，顺势推动实现人民币的兑换和结算正是恰当的时点。

此外，经济危机过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纷纷提出改善经济结构、提升发展水平、促进社会稳定的发展战略。交通、通信、农业、教育等基础设施、民生领域合作已成为中亚国家关注的重要领域。在这些领域的投资项目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中国具有相对优势。

新丝路靠投资切入：中企对沿线国家投资年均增长54%

1999年，中国公司华为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代表处。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华为公司已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业务发展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提升了当地信息化水平，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华为只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缩影。2014年6月26日，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表示，过去10年，中国企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从1.8亿美元扩大到86亿美元，年均增加54%。这充分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潜力巨大。

事实上，活跃的投资合作背后，是经济增速作支撑。中国和中亚地区一度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经济低谷”，东西两侧分别是经济发达的东亚和欧盟。然而，受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反而是处于“经济低谷”的发展中国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使得沿线各国看到了投资合作的新机遇。

“我们在很多场合和国际各方面人士讨论‘一带一路’建设，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需要中国企业的投资，也需要扩大向中国的出口，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外直接投资，也就是企业‘走出去’，这是‘一带一路’建设一个非常现实的切入点和选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表示。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强调，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潜力充分释放，可以为互联互通建设、金融合作等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也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的政策对接和人文交流，政府和民间往来更加密切，促进“五通”最终实现。

对外投资，制造业先行

建设“一带一路”，需要深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我国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具备技术优势的产业越来越多，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对外投资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未来5年，我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5 000亿美元。

高虎城指出，未来将引导我国轻工、纺织、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投资设厂，在更加贴近市场加工制造的同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鼓励企业到沿线国家扩大对外工程承包业务，积极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赵晋平也表示，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走出去”，应当制造业先行一步。“目前制造业在对外投资中占比较低；产业布局面临调整压力；而周边国家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对制造业的需求可能远超过对服务业的需求。制造业先行更容易找到双方共同的利益关注。”

为了形成各国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产业带，中国官方还表示，将继续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稳步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吸引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企业来华投资兴业。

跨国工业园建设方兴未艾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就是借助‘一带一路’，在中国周边布局。这不仅能解决国内产业调整的需要，而且可以促进我们向西开放，同时也是产业安全的需要。”赵晋平认为，在中国周边布局，产业链更加稳定，不易因国际危机而受冲击。

高虎城表示，将在“一带一路”主要交通节点和港口共建一批经贸合作园区，吸引各国企业入园投资，形成产业示范区和特色产业园，带动沿线国家增加就业、改善民生。

“我们和周边国家之间有非常长的陆地和海上边境线，在沿边地区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各地具有非常强烈的积极性。我们应该鼓励企业到这些地区去投资，加强和东道国的合作，为企业投资创造好的条件。参照我们过去在‘走出去’方面的经验，和东道国合作，在对方国内建产业园区、开发区，能使中国企业获得比较好的产业政策。”赵晋平说。

企业走出国门建工业园区也有不少成功案例。例如，2006年开始创办的泰中罗勇工业园，是由中国商务部和财政部招投标确认的第一批境外合作企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该园区已成为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在泰国的产业集群中心与制造出口基地。目前，已有中国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60家企业到此投资。

中国广西的钦州与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关丹，则尝试了“两国双园”模式。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范力表示，“‘两国双园’模式，是中国与马来西亚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产业融合的创新和探索。”目前，中马关丹产业园区正在建设，由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主导的首个入园项目——总投资约80亿元人民币的钢铁生产基地将在7月正式开工，预计可于2016年投产运营。

新丝路贸易先行：我国为沿线国家最大出口市场

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通商合作之路，是一条开放的商品贸易走廊。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陆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贸易总额6 000多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15%左右。

习近平主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五通”倡议中，重要一条就是“加强贸易畅通”。习近平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做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

经贸合作为实现“五通”注入强大动力

目前，我国是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地。据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介绍，过去10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年均增长19%，明显高于同期我国对外贸易总体年均增速。

2013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营业额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一半。

1992年中亚国家独立时，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仅为4.6亿美元；2012年，中国与中亚的双边贸易额达到459.4亿美元，20年间增长近百倍。2012年，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贸易总额达5 49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14.2%；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贸易总额达6 900多亿美元，占外贸总额17.9%。

当前，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沿线国家普遍希望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合作愿望日益增强。

近日，高虎城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先导，将为实现“五通”注入强大动力。他认为，通过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提高贸易投资水平，使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潜力充分释放，可以为互联互通建

设、金融合作等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也可以促进沿线国家政策对接和人文交流，政府和民间往来更加密切，促进“五通”最终实现。

国务院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亦表示，促进沿线各国和地区间的贸易合作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切入点。

“对于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构想，有些国家可能比较担心，中国是不是想像美国一样通过一个‘马歇尔计划’，未来想要主宰全球？我们要告诉他们，建设目的就是要促进区域内参与各方的经济得到持续、良好的发展，同时为区域的繁荣、稳定创造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就是贸易、投资合作。”赵晋平说。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产生的广阔的经贸合作前景，让中国西部的沿线城市感到兴奋。2014年7月2日，在人民日报社举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媒体合作论坛上，时任青海省西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予波说：“这一战略机遇提出之前，像西宁实际上处在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末梢，在对外开放的大格局当中，并不占优势。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战略的提出，西宁从对外开放的末梢站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

“现在我们也是在向西走，向中亚去推广我们的技术、机械、先进的农产品，我们已经初步有了一些探索和尝试，非常成功。比如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去帮助他们发展农业，这个前景非常广阔。”新疆石河子市副市长乐旸在上述论坛上说。

中国与东盟共同打造下一个“钻石十年”

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也让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经贸往来愈发如火如荼。其中，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呼之欲出。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涵盖双方20亿人口、6万亿美元贸易总额和9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自贸区。2012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4 001亿美元，为10年前的7.3倍。目前，中国已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的绝大多数产品实现了零关税，大幅削减了贸易壁垒，降低了贸易成本，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增长。

2013年9月3日，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与东盟有能力在取得“黄金十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钻石十年”。实现下个“钻石十年”的举措之一就是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他表示，双方应进一步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措施，积极开展新一批服务贸易承诺谈判，推动投资领域的实质性开放，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今后8年新增双向投资1 500亿美元。

一个月后的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迅速成为舆论眼中中国与东盟下一个“钻石十年”的最大助推器。

不少区域经济学者预测，高层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可能将使得中国—东盟自贸区享受到更多的政策红利，未来或有更多涉及进出口关税、外商投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给予东盟自贸区。

能源合作成新丝路重中之重：覆盖俄罗斯等许多能源生产国

以中国为一端，北线连接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中线连接里海和黑海沿岸国家，南线连接南亚国家，联通欧洲，以北部非洲为延长线的这样一个交通网络与贸易通道，是为当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有学者统计，“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30多个国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被称为“21世纪的战略能源和资源基地”，集中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伊朗等重要能源生产国。

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原油进口量达2.7亿吨，对外依存度突破60%。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需要多元化的能源进口战略来解决国内的能源紧张局面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毫无疑问，能源合作应当置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中之重”的位置。

在2014年6月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首次对外公开的会议上，能源安全战略成为中央高层关注的重点。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务实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加大中亚、中东、美洲、非洲等油气的合作力度。

事实上，在目前中国的十大原油进口国中，西亚、俄罗斯、中亚国家已经占去了8席。

在地理版图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基地，中亚地区连接着世界上两大制造业中心。中亚地区以东，是经济仍在飞速增长的亚太经济圈，以西则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亚经济发展水平与其连接的两

大经济圈相比存在差距，而其自然资源、土地资源之丰富可谓世界独一无二，矿产品几乎可以覆盖所有制造业国家的需求，且开发潜力巨大。

地处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这一内陆地区主要的油气资源国。哈萨克斯坦是中亚目前最大的产油国，产量持续增长，拟于2016年将本国石油年产量提高至1.02亿吨，其中80%以上的石油产量将用于出口；土库曼斯坦的资源优势则是丰富的天然气，根据其国内的天然气储量和开发能力，具备1 000亿立方米以上的产能，而其国内消费天然气不足200亿立方米，大量天然气需要出口通道；乌兹别克斯坦则拥有超过50亿吨的石油资源量和逾5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资源量。

他们都希望依靠油气资源，走上富国之路。因此，寻求发展油气产业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成为这些国家的战略需要。他们一直主张与最稳定的能源需求国——中国展开能源合作。而作为中亚近邻的中国，则把中亚管道油气作为多元化能源进口的重要来源。

在这一点上，两者实现了国家利益的互补。如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丝绸之路经济带”课题组所认为的那样，当今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中亚各国深居内陆不再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使地缘变成他们的独有优势。

据《中国石油企业》杂志的报道，在中石油五大油气合作区中，“突出中亚”的部署，正在稳步落实、快速推进。1997年中石油成功中标阿克纠宾油田开发项目，拉开了中国与中亚能源合作的序幕。截至2012年底，中石油已在中亚地区投资执行了17个项目。据统计，2012年，来自中亚的天然气供应占中国天然气全年使用量的18%。

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俄罗斯亦是中国实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的重要能源进口国。2014年5月21日，中俄签署了《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丝绸之路经济带”课题组研究认为，于中东国家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将进一步打开中国能源消费市场。例如，伊朗希望向西开放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成后，自己能成为中国更重要的能源出口国。目前伊朗有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通向巴基斯坦，未来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双方可以通过谈判，共同修建伊朗通向中国的能源管道。

应该说，“丝绸之路”战略推动了中国陆上周边国家能源战略的布局，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保障能源安全的突破口，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安全可靠的石油进口来源，同时也使这些能源国家获得了新的稳定的能源出口市场。

“一带一路”战略交通为基础：沿线国家渴望互联互通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往来日益频繁，推动贸易便利化、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显得格外重要。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施行中，先行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被具体化为公路、铁路、航运等领域的联通项目，给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带来了庞大的市场机会。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与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与地区，渴望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改善积弱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通往富庶和繁荣的道路。

国内基建的繁荣

2011年，重庆开通渝（重庆）新（新疆）欧（欧洲）国际定期货运班列。渝新欧班列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最早开通的五定班列（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从重庆出发，经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通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最后抵达德国的杜伊斯堡。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杜伊斯堡专门出席了渝新欧班列抵港仪式，并对发挥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作用提出了要求。

据介绍，2013年，该班列货物运输量占经新疆阿拉山口至欧洲班列的80%以上，下一步将加强与沿线国家及国内省区市合作，更好地发挥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的作用。

其他省份也不甘示弱。

福建省正在研究拟定加快融合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行动方案，其中的内容就包括完善以铁路、高速公路和海空港为主骨干、主枢纽的交通网络。

而为实现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快速连通，安徽在2014年6月已经开通了连接新亚欧大陆桥的货运专列，途经西安、乌鲁木齐、阿拉山口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使安徽到中亚的货运时间大大缩短。

陕西省则推进交通物流枢纽和国际商品物流集散中心建设，为企业“走出去”打通物流通道。

一些对政策反应敏感的公司已经嗅到了市场的机遇。在媒体的盘点中，新疆当地的北新路桥、国际实业、新研股份已对外披露了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业务事项。

周边国家的基建热情

沿线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国内，事实上，这一历史性机遇给他们带来的福祉并不亚于国内。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将统筹谋划陆上、海上、航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推进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骨干通道建设，努力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

亚欧大陆桥，是横跨欧、亚大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铁路运输通道。截至目前，已经建成、正在规划建设的亚欧大陆桥共有3条，包括规划中、尚未实际开工建设的亚欧第三大桥。其中，新亚欧大陆桥，东起中国江苏连云港，横穿整个中国大陆，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奥地利、法国，最后至荷兰。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

2014年4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各国政要围绕“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讨论。

在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加卢什卡看来，新丝路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能够加强各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据他透露，俄罗斯政府已斥资180亿美元落实铁路建设项目，以缩短上海到欧洲的通道。

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表示，要借由“一带一路”建设，建立更好的交通运输网络，包括公路、铁路和航空航线。据他介绍，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已经启动。过去10个月中，中国与巴基斯坦已达成广泛的共识，围绕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经济走廊的建设。“巴基斯坦意识到丝绸之路上的合作伙伴关系需要建设强大的基础设

施、稳定的能源供应。现在我们做好准备在能源和基础设施方面实施一系列重大项目。”

东帝汶总理凯·拉拉·夏纳纳·古斯芒称，“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和地区还缺乏现代化的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有很大的潜力来推动基础设施的发展。“在这个框架内，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期待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铁路、港口、电信和石油以及天然气输送管道。”

然而，涉及这么多国家、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钱从哪里来？

2013年10月，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该倡议提出后，立即得到了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的积极回应与支持。据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步伐正在提速，目前已有57个创始成员国。这将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便利的投融资支持。

可以预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其中，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会是重点。

“一带一路”：第四次投资浪潮来临

管清友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

2015年3月28日，在习近平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后，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文件不仅标志着中国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旋律的外交战略将开启新篇章，也标志着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重构正式登台，中国有望迎来第四次投资浪潮的大变局元年。

盛唐大写意，大国新外交

“一带一路”很可能形成中国未来外交新战略，体现了中国务实、写意的大国外交文化。

第一，覆盖了中国新常态下最重要的外交要地。“一带一路”包括“两圈两线”，一头是活跃的亚太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丝绸之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横跨欧亚非，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我们认为，未来以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四大经济走廊以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特别是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T字核心外交圈层将形成。

第二，确定了中国新常态下的新型外交原则。按照“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一带一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的区域共建四项原则。

第三，体现了中国务实写意的外交文化。中国新外交战略处处体现着协调、沟通、灵活、弹性等特征，先勾勒出两个圈（亚太经济圈、欧洲经济圈）和两条线（“一带一路”）的草图，再不断充实那些内容。根据愿景与行动文件，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不断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

资产负债表重构，十年经济新逻辑

从历史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可能改变中国在宏观政策、经济增长、政府行为以及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运行逻辑，也会对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重构宏观政策的逻辑。“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央逐步从需求紧缩倒逼供给改革转向需求扩张配合供给改革的思路。2014年之前，中央的思路是通过相对中性的需求管理来倒逼供给改革，但由于内部反腐带来的地方政府消极怠工以及外部全球经济再平衡带来的压力，这种思路在实际执行中的紧缩效应超出了预期。从2014年下半年，中央开始逐步摒弃需求紧缩的思路，先后采取了降准降息等需求扩张政策，但总体上看，对总需求的管理仍然偏紧。2015年可能成为真正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一年，而这次转折的核心抓手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美国在“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列岛改造计划”，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如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大战略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转折点。

重构国家资产负债表。截至2014年，中国已拥有6.3万亿美元海外资产，净资产达到1.8万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海外净资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如此庞大的海外净资产却一直伴随着“负收益”，这主要源自对外资产和负债结构的不匹配，即我们的对外资产60%以上是央行手中低收益的外汇储备，对外负债则有接近60%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两者的收益差导致我们在手握巨额净资产的同时却要向别人支付投资收益。从宏观上讲，这实际上是通过牺牲GNP来换取GDP，并不符合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原则。现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的实施，推动国内企业赴海外投资，既能推动国家对外资产的多元化，又能拓展中国的海外存在，推动战略外交，一举两得。

重构全球金融版图。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重构还将深刻地改变国际金融版图。未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大有作为，打破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IMF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版图的垄断。历史上，日本和美国在这个阶段同样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当国家需要通过对外产能输出化解产能过剩时，外汇储备恰好可以用于为国内企业的海外拓展提供融资支持，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多边金融机构。美国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日本主导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这一方面可以支持本国的海外投资，另一方面也让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正是目前中国最为需要也最为欠缺的，而亚投行的出现将彻底改变这一窘境。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美国的西方盟友已经先后宣布加入亚投行，韩国、澳大利亚也基本确定加入，由美日垄断的国际金融版图开始悄然瓦解，这或许意味着一个金融多极化的新时代。

重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从政治角度看，“一带一路”可能重新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由此产生的经济带动作用可能远超预期。就像一颗炸弹扔进炸药库，它不单是一颗炸弹，更是一个导火索，新一轮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可能随之引爆。各地方政府都已经认识到，“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的最重要的国家战略，没有之

一。从2015年地方“两会”透露的信息来看，各地都在争先恐后的上项目，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这可能从根本上逆转近年来反腐导致的地方政府消极怠工现象，使地方政府被压抑的投资冲动重新爆发。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只把“一带一路”看成一个产能输出的中国式“马歇尔计划”，恐怕是严重低估了其影响。

2015年大变局，第四次投资浪潮

基建先行，“一带一路”有望改变中国，或将开启中国第四次投资浪潮。

第四次投资热潮逆转投资低迷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投资热潮。第一次是1993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各地掀起市场经济的第一波投资热潮，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创纪录的62%。第二次是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产能收缩告一段落，在2001年入世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叠加的影响之下，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迎来黄金增长期，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三年保持25%以上的高增长，直到金融危机爆发。第三次是2009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央果断推出4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0%，拉动中国经济迅速触底回升。在那之后，投资便在产能过剩的压力之下持续回落。尤其是2013年八项规定以来，地方政府明显消极怠工，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以上大幅滑落至15%，创2001年以来的新低。

不过，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进入落实阶段，投资低迷的趋势可能出现逆转，中国经济的第四次投资热潮可能即将拉开序幕。从纯经济角度看，相关项目建设将直接或间接地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我们根据公开新闻收集的信息统计，各地方“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

设施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约524亿美元，考虑到一般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通常为2~4年，2015年国内“一带一路”投资金额或在3 000亿~4 000亿元左右；而海外项目（合计524亿，每年约170亿美元）基建投资中，假设1/3在国内，2015年由“一带一路”拉动的投资规模或在4 000亿元左右。考虑到基建乘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影响，我们预计将拉动GDP增速0.2~0.3个百分点。

“铁公机+产业园”基建提速。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首要前提，核心关键，必须优先。2015年将启动的铁路、公路、水运、港口等重大基建项目即将公布，从公开新闻整理的资料统计看，各省201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关于“一带一路”基建投资项目总规模已经达到1.04万亿元。从项目分布看，主要以“铁公机”为主，占到全部投资的68.8%。其中，铁路投资近5 000亿元，公路投资1 235亿元，机场建设投资1 167亿元，此外港口水利投资金额也比较大，超过1 700亿元。我们预计，通向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宜率先启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等印度洋战略性港口或成为“一带一路”首批战略港口。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和中国交建三大基础设施建设与海外项目施工企业要主动作为，积极布局，加快推动海陆交汇、互联互通。

“一核两关键”勾勒重笔。我们认为，福建很可能成为“一带一路”“两圈两线”写意画的核心，而新疆、广西则有可能成为关键区，其他包括陕西、江苏、甘肃、内蒙古、云南等十多个省区市或为辐射区。福建，作为我国主要面向亚太地区开放的窗口之一，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福州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基地；2014年底，厦门也已经出台落实“一带一路”建设行动方案。新疆，地处亚欧大陆地理中心，周边同8个国家接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五个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中哈、中巴等“一带一路”重大工程项目清单有望受益。广西，中国与东盟国家

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中南经济走廊有望围绕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展开。此外，乌鲁木齐、满洲里、南宁等各经济走廊节点城市及厦门、连云港、大连等海上重要支点城市亦值得关注。

产业协同加速产能去化。“一带一路”涉及内地、沿边、沿海多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为产业协同、产能去化提供了条件。一是，“一带一路”大部分省区属于工业输出、服务业输入，而仅有沿海较发达的上海、天津、广东、海南等属于服务业输出省，第三产业区位商大于1。二是，落后地区“后发优势”明显，各行业发展较快的地区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东部除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等专业化程度要求较高的行业以外，增速基本上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长效应上并不占有优势。三是，产业转移升级的速度可能要比预想的快。传统制造业普遍转移，如纺织服装、化工、电气机械（家电）等从广东、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等东部地区向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转移。此外，新兴产业亦开始出现转移迹象，四川、重庆、河南、安徽等在承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方面明显快于其他中西部省份，而输出省份主要集中在北上广三地；汽车制造转移亦在提速，但速度慢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医药制造的区域转移特征并不显著。

“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投资新格局

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目前，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与相关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繁荣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我国主动应对全球形势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此前，“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于2013年底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此背景下，中国近期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亦即未来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这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将开启全新格局。

中国推动大规模资本走出去，有何收益？在此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风险？政府、国企与民营企业应当各自承担怎样的角色？中国未来应当如何稳妥推进海外投资？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背景

关于“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可以说源于邓小平的三句话。

首先是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和毛泽东同志论三个世界是一样的。30年前，他同时指出中国开放的重点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因为需要西方的技术、人才，这是30年前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开放战略。

当前，IMF和世界银行都预测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将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因此2014年将是“中国的世界”元年。而且，全球各机构都预测2014年中国将会首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ODI）超过外商对华投资（FDI），因此2014年也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元年。从2014~2049年的新35年间，中国开放的战略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也就是邓小平提出的统筹“三个开放”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构建新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培育引领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第二，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先形成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大局，然后形成中西部开放开发的大局。“一带一路”实际上也是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选择，将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开放，是举全国之力沿“一带一路”推动贸易开放的一个新战略。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的时间序列的动态比较优势在中国体现在横截面上，即在同一个时点，东中西部差距很大。所以，当前统筹两个大局，实际上是解决中国的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以实现新时期国内的城乡、区域间均衡性发展。

第三，邓小平在30年前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新时期的“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统筹改革、开放的全新战略，通过全球投

资、全球配置资源，形成新的全球影响力。这其中涉及美国试图用TPP使中国边缘化，中国则用TPP倒逼自己新时期的改革，因此开放和改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都涉及长期融资。可以看出，无论是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金融体系已经完全被西方控制。因此我们希望进行补充，因为市场需求很大，仅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开发银行就预测为8万亿美元（2010~2020年投资总需求），现有的开放性金融都是杯水车薪，而且他们不是以发展为主题。所以构建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都是为新时期新的战略格局变化提供长期融资工具，以促进实现这个大格局。

另一方面，中国从一个小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国经济。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道，对世界市场没有显著的影响。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估计的我国的经济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通常说的“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同时，就像大象再也无法藏身大树之后，大国经济很难再如过去那样“韬光养晦”。比如过去三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起码也是部分地得益于美国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都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时过境迁，虽然美国口头上还是表示乐见中国经济崛起、愿意进一步推进美中经济合作，但是竞争甚至围堵的声音在增加。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中国需要走出去，这不仅仅是因为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提出了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其实也是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外部条件。“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和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创新驱动

考察过去3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使用索洛增长模型，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为资源再配置产生的效率提升（即改革红利）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创新红利。过去35年中，每当改革动力、创新动力释放出来，这个时期的发展就是最好的。

过去35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加入WTO前，中国经济增速很快，因为，这期间中国的增长动力是靠创新和改革驱动。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在1993年，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进行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汇率、金融、贸易等方面。1994年前，汇率存在官方价格、调节价格、黑市价格三个价格，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官方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元人民币/美元大幅贬值至1994年1月1日的8.70元人民币/美元，并实行单一的管理浮动汇率制，而后逐步实现了并轨。

在加入世贸组织前，普遍认为是“狼来了”，为了应对“狼的冲击”，中央政府跑步前进，调整了三千多项法律法规、政策，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应对，银行、农业、汽车等各行业都担心跑得慢“被狼吃掉”，积极应对开放可能带来的“狼冲击”。为什么入世以后生产率增长贡献却减弱了呢？因为入世以后人们发现“狼不可怕”，改革就停滞了，所以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反而在2002年以后是减弱的。因此，考察过去35年的发展，可以推断，未来新35年，也就是2014年到2049年，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创新驱动。

从工业的角度来看，能源工业在过去35年生产率贡献是负的，说明其增长主要靠投资，而不是靠生产率的增长，因为能源的市场化、开放程度是最低的，基础原材料也是这个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经过35年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18岁了，18岁的市场机制要发挥决定性作用了，同时更好

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未来政府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积累的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只有5 000多亿美元，而美国人所持有的东亚资产71%以上都是ODI。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战略任务是如何提升ODI占比。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是5 000多亿美元，2020年估计能达到1.2万亿美元，在未来的25年内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即占比70%。

因此，过去35年都能看到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和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公平竞争条件下的创新驱动，这是支撑新增长动力最重要的源泉。所以说“一带一路”绝不是寻求新动力，而是在新时期推动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和高标准改革，所进行的战略布局。

“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性的大战略，虽然相应的在国内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或者投资品的输出必定会有益于经济增长，但过度解读它对挽救当前疲软的宏观经济局面的作用，反而可能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最终成功。“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的建设，支持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加快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形成新的长期增长的动力。这就意味着相关的投资必须大胆规划、谨慎推进，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带动经济活动的繁荣，直接关系到这些投资能否得到回报，从而影响到“一带一路”成功与否的概率。而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促进地区经济融合，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政府间的合作，但更需要政府间的长期合作。如果过度关注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支持，很可能导致盲目、仓促上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大降低投资的效率以及长远的效果。

布局全球投资的收益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

这个增长速率是比较快的。从过去35年中国“引进来”的情况来看，整个20世纪80年代主要引进的是港澳台企业，而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投资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的事情，但西方投资很快就进入稳定期。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速度确实非常快，主要原因是高储蓄率的推动，通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将这部分巨大的资本进行合理有效多元化地配置，确实能够支撑中国“走出去”。

“走出去”的动机有四种，在不同的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格局。一是市场，当我国的生产过剩以后，就需要在全球寻找市场。此时就会把一部分公司、营销渠道等扩展到国外去。二是资源，中国需要寻求资源的全球配置。三是成本，我们需要在要素成本低的国家重新构建竞争力。四是效率，中国要实现从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国家，离不开“走出去”。因为全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高端人才主要分布在美洲大三角地区。只有在该地区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人才中心、咨询中心，与世界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高端人才保持“零距离”的接触，才能获得最新的理念、概念和实践，才能对“引进来”进行大规模的管理和应用。

实际上“一带一路”沿线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从国内来讲是举全国之力，从全球来讲是全方位国际合作。举全国之力是综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东部发达地区和新疆、云南、宁夏等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实力。而全方位合作是指不仅仅只有中国大陆企业“走出去”，还有与港澳台、美日欧之间的合作。

十八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三句话，一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体制角度提出了如何与国际高标准对接的问题；二是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方面是要求举全国之力“走出去”，另一方面提出

了怎么统筹开放，哪些方面开放的问题；三是培育引领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从低成本的要素优势向技术、品质、品牌、服务和成本“五位一体”的综合竞争力优势转变。我觉得，下一步我国会在这些方面产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大规模资本对外输出的收益

过去我们是从国内的角度配置资源和市场，未来将从全球视角去配置。目前国内很多产业的产能过剩很严重，产能利用率平均只有72%，以往我们认为钢铁等传统产业要淘汰、转移，但是从全球来讲，都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在开国际会议时，非洲兄弟说中国的过剩产能恰好是非洲的发展机遇，比如发电能力、装备能力、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等，都是非洲严重短缺的。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调研也发现，中国产能过剩的设备，对他们而言都是先进的技术，因此国内市场可以沿着“一带一路”进行资源的全球配置。按照克鲁格曼的经济学理论，“一带一路”的增量部分，定价只需要覆盖固定成本，销量增加就可以摊薄固定成本，实现边际收益递增，也就可以增强竞争力。

当前国内很多的产业都是市场、资源、生产“三头”在外。有一个问题我困惑了很久，为什么要把铝土矿、铁矿石、石油运回国内，完成加工再卖到全世界，为什么不能在资源所在地，用当地的环境容量、排放容量，投资建厂生产电解铝、氧化铝和铝锭等产品，然后把产品卖到全球，其中一部分用来满足国内需要。从全球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只要不脱离实体经济为主，就不会产生空心化问题，同时还能把价值链放到全球范围内进行更合理的配置和调整，形成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服务、资本、人才布局，以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这是中国真正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全球扮演“领头羊”的重大决策，而中国所收获的利益也将是战略性和全球性的。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几个观点。一是未来10年中国的ODI将达到1.25万亿美元，在未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年均估计是27%，为世界其他地方创造的就业将达到700万人，中国的发展将惠及全世界，欢迎大家搭便车，共享新的发展理念。

二是发展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一带一路”沿线，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要更加重视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

三是发展必须要遵循社会规律，实现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将会给沿线的最广大的老百姓创造公平参与的机会。同时能够使沿线的国家和中国人民一道共享发展成果，创造全方位国际合作、共享发展的新模式。

未来10年对外直接投资1.25万亿美元，也就是每年平均1 250亿美元，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其实并非特别惊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2004年的时候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几乎为零，2014年全年可能超过1 000亿美元，按照这个趋势来看，未来10年平均每年投资1 250亿美元，这个估计相当保守。另外，2004年的时候我国的外汇储备为6 100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过去10年间外汇储备增加了3万多亿美元。假定未来金融改革包括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央行将大大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外汇储备的积累就会大大放慢，这样资本流出就会更多地以民间投资的形式。当然现在经常项目顺差已经大大缩小，资本流出的总规模可能会随之有所收缩。由企业替代央行进行对外投资，原则上看应该是一个进步，因为企业知道需要什么、能做什么，当然前提是企业面对硬的预算约束。如果是像过去一样由国有企业大把地往外撒钱，投资效率能否改善则不好说。

“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我们在2007年的研究得出，如果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加快、利率市场化加快，只需要6 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当前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中，至少有3万亿美元需要由储备资产转化成非储备资产，进行合理多元化的管理和运用，可能变成政府、企业或自然人的对外投资。2013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2 592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3 635亿美元，加工贸易中80%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已经从过去的占比55%下降到了38.9%，随着成本驱动型资本转移到越南、孟加拉、印度去，加工贸易顺差未来将会下降到非常有限的数目。我认为“十三五”时期，贸易顺差很可能会成为平衡甚至逆差，如果ODI持续大于FDI，随着资本市场开放，可能出现证券投资、短期资本流动逆差，使“双顺差”局面出现结构性变化。到那时，中国就进入用价格来出清国际收支差额的阶段，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

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毫无疑问也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走出去时，马上会面临外汇风险，这时人民币会开始逐步成为贸易结算、投资、储备货币，这是随着时间序列推移一步步变化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后，浮动汇率合法化，国际社会为什么没有抛弃美元，进入所谓的“后牙买加时代”？美元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欧洲美元市场和亚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尤其是欧洲美元市场，在美国境外形成了一个有相当深度的离岸美元市场体系，包括即期、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一整套货币和资本市场。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在贸易结算、投资、储备货币之外，核心问题是要在境外形成一个有深度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可以在境外形成人民币股市、期市、债市、汇市的市场体系，进行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业务，人民币就可以成为套期保值、风险对冲、融资的货币。这样，一方面能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通过离岸和在岸市场倒逼国内金融市场深化和市场化改革，在发展离岸市场时，通过学习伦敦、

香港等金融中心的基础设施、制度建设，加快国内金融现代化的制度建设。目前，关键问题是在过渡时期如何抵御风险。

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行为，我们最好就从企业获得最佳投资回报的动机来理解，不要过多地考虑其他方面的目的。比如，对外直接投资确实有可能帮助化解一部分国内的过剩产能，但究竟能发挥多少作用则不好说，过剩产能产品的输出是有运输半径的，很多建材恐怕还是在当地生产效率更高。同样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当然对人民币国际化会有帮助，但这不是一个直线关系，日本有很多企业在世界各地，日元国际化的程度也不见得就有多高。还是那句话，是什么事情就当什么事情做，人为地赋予它太多的功能反而更可能把事情搞砸。

亚投行与丝路基金运作方式

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由英美主导的，最大的问题是忽略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权益和利益要求，让穷国遵循发达国家的规则。可以看出，无论是GAT还是WTO，所有谈判都能成功，但符合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比如多哈回合谈判却失败了。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当今世界实际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金砖国家银行，是以发展为主题，探索能够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发展阶段和可承受能力，以长期融资为发展服务的开放性金融工具。因此，它对现有的世行是一个补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是为亚洲巨额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提供长期融资工具。还可以更多地培育亚洲的长期投资者，把保险、养老基金等资金通过创造长期融资工具，用于本地区的发展。

金砖银行、亚投行是有着巨大功能的，我认为不是中国的资本输出的工具。从资本额来看，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加总只有2000多亿美元。而中国对外金融资产有5万多亿，外汇储备有3.8万亿，

这几个机构的资金总额只是中国每年ODI很小的部分。这几个机构是从负责任大国的角度来探索、解决发展中世界所需要的长期融资工具和政策性、开放性金融工具，是全方位国际金融合作的新举措，而不是中国要输出新殖民主义、输出资本或输出霸权。

我认为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投行输出的最主要的还不是资本，而是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建立这些新的国际组织？起因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发现原来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不少缺陷，更重要的是它不能合理地反映最近以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事实。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试图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改革，但举步维艰。说得客气一点，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是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补充，说得不客气一点，它们就是发展中国家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创立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因为中国是最主要的资金贡献者，所以有人把它们理解为中国资本输出的平台也不算为过。但这不是它们创立的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与新的经济力量相适应的国际经济秩序，以更加有效的国际经济政策框架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和各国经济发展。

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协调分工

亚投行与丝路基金，不是中国称霸世界的工具，而是全方位国际合作的工具。在分工方面，中国总需要出资人和负责人，所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归属财政部负责。在开发性金融方面，过去亚洲开发银行的对接单位就是财政部，所以财政部有长期的和亚洲开发银行打交道的经验。丝路基金作为基金，毫无疑问人民银行是最合适的。我还是建议不要把他们看作是中国政府主导的，这样别人会认为是新殖民主义。

“丝路基金”作为基金，会根据基金的宗旨来决定投资方向、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多的是多边的、带有长期融资工具的国际金融机构或者投资机构，两者不完全一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多地可以看作是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丝路基金投资人肯定有着更大的话语权，有更多的权益要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多边的一个带有国际性、区域性的开放性金融，更多的是本着理念和标准，而不是投资人的要求来提供长期性的开发性金融的工具和金融的支持。

我认为二者应该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因为亚投行有57个成员国，且各国出资额、话语权不完全相同，亚投行应该更多地开展长期性、以发展为主题的、具有开发性质的融资项目。丝路基金可能更多地还是要考虑商业利益。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还在建立过程中，同时还有一个海上丝路银行即将筹建，现在要明确它们之间的分工可能比较困难。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亚投行是由财政部主导的，而丝路基金是由人民银行主导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目的是一样的，即通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如果望文生义地做一个推测，我们估计亚投行更像是一个典型的国际组织，其目的是帮助各国发展基础设施，因此提供的融资的条件会比较优惠，而丝路基金应该大致按市场规则运行，追求回报。不过这些只有等两个机构真正运作起来之后才能见分晓。

资本“走出去”的风险

中国在对外投资时遇到的风险很多。作为新进入国家，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不完善、不协调。因此，一套良好的“走出去”机制是公平选择承担不同领域、不同项目“走出去”角色的合格企业的重要武器。“十五”期间，我们鼓励“走出去”，鼓励到国外去找资

源、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十一五”，“走出去”开始强调更多地与国外开展合作；“十二五”，品牌、技术以及东道主的社会责任等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走出去”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更要考虑非经济因素。比如，给当地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创造发展机会，在教育和环保等领域有公益性贡献。举个例子，我到印度尼西亚调研了两家企业，分别是民营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主要经营中石油在印度尼西亚的油田，从企业雇员来看，其本地人雇用率达到100%，连总经理都是印度尼西亚人，另一个企业的本地人雇用率则是90%，它们都为当地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在中石油油田旁边，印度尼西亚农民耕种水田，住进新房，娶了媳妇。当时国际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油田，无论是环保，还是社会责任都做得很好，既然做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对全世界宣传呢？

现在全世界都认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是掠夺式的，损害当地环境和民生。当然中国的“走出去”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更多的是为当地人谋福利的好项目。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一个美国人问我，中国在安哥拉用贷款来掠夺石油，这是不是新殖民主义？我回答，西方人在安哥拉殖民了上百年，给非洲人民带来绝望。在安哥拉战争中，美国支持的派系输给了苏联支持的那方，西方认定安哥拉没有人权和民主，不提供战后重建资金，这时候是中国拿钱出来为当地修路搭桥，援建学校和医院，把安哥拉从一个严重的负债国变成有偿债能力、欣欣向荣的国家，为一个绝望的国家带来了新生的希望。

中国今后要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新殖民主义：我们拿走了资源，但不会留下资源枯竭的城市；砍树但不会留下光秃秃的山。中国的“走出去”会造福东道国国家人民！安哥拉部长向我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招投标；第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第三保护环境。我认为部长的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中国要用行动进行全民教育，造福非洲兄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此我们希望“一带一路”能体现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谓的“道”是指，不仅自己有饭吃，也要让对方有饭吃。在开放合作、共享发展方面，中国一直做得很好，只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相信我们可以在未来35年做得更好。

中国大规模输出资本可能会带来多方面的风险，一是容易引起接受国政府与民众关于国内经济安全的担忧，甚至出现反弹。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不少这样的事例，特别是在美国、澳洲甚至非洲国家。除了规模，真正引起担忧的是两个因素，第一是战略性产业比如电信和能源，第二是国有企业作为主要投资者。二是短期内企业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却蜂拥往外走，很难获得合理的回报。通常到海外投资的企业必定有其自身的竞争优势，企业通过到海外投资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目前中国往外投资的一些大型企业其实并无明显的竞争优势，能够往外投，主要因为它们是国有企业，容易获得国家在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但这样的投资多了，不但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声誉，同时可能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三是多数中国企业还不了解海外市场，尤其是商业环境。比如不懂得如何跟当地社区甚至工会打交道，也不了解法律以及经济环境等等，这些投资很难在短期内获得理想的回报。

稳妥推进海外投资

推动国际经济策略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比如美国执行“马歇尔计划”，不但已经通过“二战”确立了世界领袖的地位，而且其军事力量控制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在经济方面，美国在20世纪初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更重要的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已经成为科学技术的绝对领导者。这些都保证了战后美国国际经济战略的成功。与当时的美国相比，我国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经济方面还是

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企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还比较落后，其军事力量还缺乏全球性的威慑力，政治上也没有可靠的同盟者。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一个全球或者地区的领袖，需要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的支持。因此，我们现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并将其付诸实施，是一个值得赞赏的举动。但在推进的过程中需要步步为营，小心从事。最有效的做法应该是选择一两个项目，积极推进。如果做得好并且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进一步推进就会比较容易。如果前几个项目做砸了，后面的道路就会更加艰难。

打个比方，中国就像是一个18岁的孩子，刚开始挑大梁，但是与45岁的美国相比显然还嫩得多。所以，我们要求18岁的孩子不犯错就能成长那是不可能的，要允许他交点学费“吃一堑，长一智”。那么，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交学费呢？那就得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就是制度改革。这次我去广东调研，最大的体会就是广东省的制度变化比我们想象还要快。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在变化。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国企是有社会责任心和进取心的，它们是中国经济的脊梁；但民营企业也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所以，我觉得全面深化改革，实行混合所有制比较适合。

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政府、国企、民企的角色

首先，应该是共建基础设施。在其他国家修建铁路时，一定要考虑自身利益和对方的利益，确实需要合作和协调双方的利益。过去很多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报告都认为中国的支柱是国企，所以他们要探索限制国企的方式，最后使用了澳大利亚提出的“中性原则”，来限制政府利用优惠政策帮助国有企业战胜民营企业，在很多方面把中国“妖魔化”了。很多外国企业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土地、贷款都是得到补贴的，因此对我们进行反补贴税诉讼，这是非常荒唐的。他们认为中国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政府可以随意对国企进

行补贴，是严重违反WTO条约的。中国的国企经过35年的改革，都是高度市场化的，应该公正地看待中国的国企在世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

此外，国内也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民企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毫无疑问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客观来讲，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还是国企做得更好一些，由于部分民企历史不长、实力不够，往往更加趋利，产生了很多问题。当然，国企也有类似问题，但是毕竟目前民企不如国企实力雄厚。未来应该采取公私合营，或国企和民企混合所有制联合走出去。

如果将东亚经济成功的经历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东亚各国的政府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也可能会反映到未来亚投行及丝路基金甚至酝酿中的海上丝路银行的运作之中，明显区别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基础设施领域更是如此，政府需要在新的国际组织的帮助下积极地规划并融资。即便如此，政府也不应该替代企业与市场的作用，比如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完成以后，施工完全可以交给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来做。

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防范政治风险

关于海外投资，从海尔收购美国第二大家电企业美泰克失败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吸取的最大教训是，非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不可避免。即使是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规范和成熟的国家，都避免不了会存在这种制约因素。所以，需要我国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同时增强软实力和硬实力，软硬兼施才能给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由于大国竞争和中国非法移民等因素的存在，非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我国企业“走出去”肯定会有影

响。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需要学会慢慢适应这种变化，同时中国政府也应该从全球视野来帮助企业降低非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视野、操作重点与影响展望

张可云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

“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是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宣言，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带一路”战略的明确，是中国在世界上真正崛起的一个标志；“一带一路”行动方案的实施，会在促进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国最近公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框架，但具体行动方案尚在探索与讨论之中。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实现多赢，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愿景与行动》展现出中国崭新的国际视野，其落实不仅会为低迷的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同时必将改变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超速崛起与随之而来的世界影响力日益提高，正在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格局。2013年9月与10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构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标志着“一带一路”这一彰显中国国际影响

力的战略构想已经进入实施阶段。由最初的构想，到战略的确定（由《决定》提出），再到行动框架（由《愿景与行动》提出）的敲定，期间仅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在中央决策者心中的分量之重。

《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目的：“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由这一表述不难看出，在世界格局发生明显变化后中国调整了全球定位，确定了新的国际视野。这既展现了中国通过全方位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发展水平的雄心，又展示了中国谋求通过充分发挥日益增大的国际影响力来充当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能量的愿景。“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中国的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0.69%，而这一时期全球经济总量居前10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巴西、意大利、俄罗斯、印度，按2012年经济总量大小排序，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的原始数据计算）的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总计为59.43%。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超过了世界前10中的其他九国之和。正因为如此，“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走出去”战略的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设计清晰地勾画出了“东西两翼张开、海陆并举”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众所周知，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施的是沿海开放战略，对外开放处于局部地区探索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中国实施了沿边开放战略；2001年3月，“十五”计划纲要进一步提出要“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些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优势。这些优势与强大的经济影响力

综合作用，便形成了推动中国“走出去”和吸引世界其他国家积极与中国合作的强大驱动力。毋庸置疑，中国在技术创新、资源禀赋、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腿”，与“走出去”相辅相成的“引进来”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一些先天的不足。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展开，全方位开放将会为中国增添更多的活力。在全方位开放的同时如果能在国内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方面下足功夫，中国还会迸发出巨大的发展活力。

回顾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国的强盛曾经影响了整个世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中国就已经搭建起了贯通东亚、中亚、西亚、欧洲与非洲的桥梁——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通道在世界经济交往与文化传播等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海上丝绸之路，又名陶瓷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宛如一条丝带，将世界各大洋周边的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上，“一带一路”的盛衰，折射出了中国发展的起起伏伏。

中国最近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虽然承接了历史留下的一些元素，但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比较，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一带一路”已经不只是单纯的陆上与海上国际交往通道，而是一个借助历史符号构筑的全球联系网络；如今的“一带一路”已经不只是中国的丝绸与瓷器等传统优势产品的输出和其他国家的产品与作物输入的通道，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融合经济、文化、技术、资本、资源等方面的交往平台；如今的“一带一路”已经不只是一个局部地区的联系通道，而是远远超越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而构建起的中国融入整个世界的战略设计。总而言之，新提出的“一带一路”在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远远超越了历史上强盛时期中国封建王朝构建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

虽然《愿景与行动》明确了未来“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以及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等重点问题，但依然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研究。概括起来，要实现《愿景与行动》提出的目标，有四个方面的具体操作问题需要明确：第一，谁管？即“一带一路”建设由哪个部门协调。第二，管谁？即“一带一路”包括哪些国家与地区。第三，咋管？采取哪些手段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第四，管效？即如何评估“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与成效。

——“谁管”问题。在《愿景与行动》出台之前，中央已经成立了以张高丽副总理为组长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但这只是国内的协调机构，未来可尝试建立国际综合协调机构。

——“管谁”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举措，是一个举国战略，因此不存在将哪些省份排除在外的问题。但是，“一带一路”连通哪些国家，目前还不可能确定，而且所涉及的国家范围不会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建设进程的推进会发生变化，这正是国内公布《愿景与行动》而非“一带一路”规划的原因。中国许多媒体将《愿景与行动》理解为“一带一路”规划是不正确的，从学术的角度而言，愿景与行动（Vision and Initiatives）同规划（Planning）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咋管”问题。《愿景与行动》提出，合作“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并提出了合作机制与中国各地方的对外开放方向，但具体的政策工具尚未完全明确。中国主导建立的“一基一行”（即丝绸之路发展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无疑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但科学确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工具，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管效”问题。目前，只能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事前评估，中期与事后评价工作尚不到时候。对如此重大的行动，建立评价机制是必要的，但《愿景与行动》并未提及评价机制问题。建立“一带一路”科学评估机制，是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

展望未来前景，可以预见“一带一路”建设会在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带来新的变化。

在国际方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会得到更多实惠，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进一步提升。2014年，中国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超过了14万亿元。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带”与“路”串联起来的国家会因得到中国政府的援助而得到更多的发展与融入全球化的机会，而中国在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过程中必定会提高全球化程度与全球影响力。

在国内方面，举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必将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开放水平等多方面落后于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生命周期规律，中国区域经济新常态将呈现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超过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会成为支撑中国增长的中坚力量。借“一带一路”建设之东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可望得到深入挖掘，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可望缩小。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背景下的必然选择。这一战略设计展现了中国新的国际视野；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谁管、管谁、咋管与管效”这四个方面的操作问题会逐步解决；这一战略设计落地，会惠及世界许多国家，同时将有利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崛起，因而助力中国整体腾飞与中国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一带一路”是欧洲文明复兴的机遇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2015年是中欧建交40周年，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来华参加中欧战略对话，并与中方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时刻。“一带一路”是中欧战略对话的重要内容，为欧盟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共同塑造全球化未来。概括起来，“一带一路”给欧洲带来八大机遇。

一是欧洲经济振兴的机遇

欧洲经济尚未完全走出欧债危机的影响，又遭受乌克兰危机的打击，欧盟央行不得不推出欧版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欧元不断贬值。为提振欧洲经济，提升欧洲经济竞争力，欧委会提出3 510亿欧元的战略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容克计划，完全可以和“一带一路”对接，推动欧亚互联互通建设，帮助欧洲经济复苏。

二是欧亚大市场建设和文明复兴的机遇

历史上，亚欧大陆一直是世界文明中心。欧洲的海洋文明扩张直至“二战”结束，美国成为海上霸主，欧洲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欧洲被迫回归大陆，通过一体化达到联合自强的目标。然而，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严重冲击欧洲大市场建设成果，欧洲人日渐认识到，

只有涵盖俄罗斯的欧亚大市场建设才能平衡好安全与发展的问题，以欧亚文明复兴带动欧洲振兴，是历史的选择。

三是欧洲地区融合的机遇

长期以来，欧盟政治在“东部伙伴计划”与“地中海伙伴计划”孰重孰轻上纠结，实施效果也各有各的问题，现在的乌克兰危机又在撕裂欧洲。看来，加强欧洲地区融合眼光不能局限在欧洲，即便欧洲内部也要创新思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得中东欧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新门户，尤其是波兰、希腊、巴尔干，匈塞铁路、比雷埃夫斯港成为“16+1”合作的拳头产品，连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桥梁。“一带一路”倡导的包容性发展，促使中国沿边十几个省份，建立起与欧洲各地区的紧密经贸、投资联系，是欧洲地区融合的机遇。

四是欧俄和解的机遇

北约明确将“Keep Russia out”（赶出俄罗斯）作为战略目标，今天的乌克兰危机就是这种战略的恶果。事实上，欧俄和解是欧洲稳定的基石。“一带一路”超越古代丝绸之路，特别注重将俄罗斯的远东大开发项目等包容进来，取道莫斯科，与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架构兼容，目的在于“Keep Russia in”（吸纳俄罗斯）。邻居是无法选择的，将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对接是化解乌克兰危机，求得欧洲长治久安的明智之举。

五是欧盟更便捷参与亚太事务的机遇

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欧盟表示出明显的战略焦虑，担心被边缘化，于是加速推进与亚洲国家的FTA战略，然而进展不尽如人意。“一带一路”让欧洲从陆上、海上同时与亚洲铆合在一起，增加了欧洲参与亚太事务的便利性，也将增加欧盟抓住亚太发展机遇的能力，拓展欧盟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六是欧盟全球影响力提升的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少是欧洲的前殖民地，故此强调与欧盟的大周边战略对接。这样，汲取欧洲在全球治理、地区治理方面的经验、做法十分必要——“一带一路”是绿色、环保、可持续的，是按照市场化运作和国际规范进行的，这些都是欧洲规范性力量所强调的，本身就体现了欧洲的软实力。中欧合作开发、经营第三方市场，比如西亚、非洲、印度洋、中亚等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有了更多的成功机遇。欧洲的经验、标准、历史文化影响力，十分为中国所看重。“一带一路”秉承和弘扬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与欧盟的理念相通，与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产生共鸣，有利于共同提升中欧全球影响力。

七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充实的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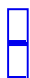
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基础上，中欧正在谈判双边投资协定（BIT），甚至考虑在此基础上研究中欧FTA可行性。“一带一路”计划为此带来更大动力，推动中欧“四大伙伴”——和平伙伴、增长伙伴、改革伙伴、文明伙伴关系的发展。渝新欧、郑新欧、义新欧等多条欧亚快线铁路网越来越将中欧铆在一起发展。围绕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合作将成为中欧合作新亮点。围绕建设信息丝绸之

路，互联网领域的合作也会成为中欧合作的新亮点，完全可以发展为中欧新的机制对话。

八是跨大西洋关系平衡发展的机遇

“二战”后欧盟倚重跨大西洋关系，然而总是难以摆脱欧洲与美国竞争与合作中的不对称地位，“以一个声音说话”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带一路”强调开放、包容，不排斥域外国家，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事扩张，主张包容美国，这就超越了TTIP的双边排他性。美国除了TTIP外还有TPP，欧洲就只有TTIP，在未来跨大西洋关系中更处于劣势。如今，“一带一路”增加了欧洲向东看的选择，改变欧洲相对于美国的被动地位，平衡发展跨大西洋关系。

从中国出发，欧洲是“一带一路”的终点站，对“一带一路”建设应该非常积极才是。然而，欧盟总是慢半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欧洲公众认知不够。为此应加强对欧洲议会、欧洲社会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不仅消除其误解，更帮助欧洲国家认识到，“一带一路”包括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还有油气管道、电网、互联网、航线等等，是多元网络，是中国对接欧洲，连接欧亚大市场的重要计划，帮助欧洲与中国携手重新塑造世界。



第四章
“一带一路”助飞新常态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是“一号工程”

管清友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

作为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的“一号工程”，“一带一路”可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国家战略布局。如果仅仅把“一带一路”看成一个区域规划，那肯定低估了“一带一路”的影响。对内，这是加强区域协同、盘活存量经济、消化产能过剩的重要抓手。对外，这是资本带动产能输出、拓展外交存在、扭转国际收支困境的突破口。

战略意义之一：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优化空间格局

“一带一路”打破原有点状、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无论是早期的经济特区，还是2013年成立的自贸区，都是以单一区域为发展突破口。“一带一路”彻底改变之前点状、块状的发展格局，横向看，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看，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这将改变中国区域发展版图，更多强调省区之间的互联互通，产业承接与转移，有利于我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国家领导人重点调研新疆、福建、宁夏、陕西。“一带一路”几乎覆盖中国大多数省区，地方也在积极主动地融入该战略，其中，国家领导人重点调研新疆等地区，确定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战略地位，推动福建建设通向中西部和东南亚的运输大通道，发展陕西临空经济产业，构筑空中丝路。地方战略目标明确，功能定位清晰，重点开发特色资源和优势产业，改变各地同质化发展问题。

战略意义之二：推动全方位开放，加快外交突围

习近平出访路线涵盖“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自2013年9月，习近平首次提出“一带一路”以来，出访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亚、德国、蒙古、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家。访问期间，习近平多次强调双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如中哈共建油气管道建设，加强油气开发和加工合作；中蒙促进亚欧跨境运输；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在亚洲各国逐步形成共识。“一带一路”在亚信峰会、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等国际会议上成为最受关注的主题，各国领导人认同感不断加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设立等都是“一带一路”的资金保障。“一带一路”的推进也有利于扩大在周边区域的人民币跨境使用，推广人民币支付系统。对鼓励中资企业在境外设立机构，鼓励沿线国家金融企业来华设立机构也有帮助。

战略意义之三：消化过剩产能，化解债务风险

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症结之一。通常健康且创利的产业产能利用率应当在85%以上，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1年中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尽管中央自十八大以来加大力度去产能，但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并没有明显缓解，甚至有所加重。根据央行公布的5 000户企业调查数据显示，设备能力利用水平从2013年末的41.2%进一步下降到40.6%，距危机前45%左右的水平仍有较大缺口。PPI已经连续32个月负增长，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31个月。

2014年发电设备的平均利用小时数大概在4 300小时左右，远低于2013年和历史正常水平。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国仍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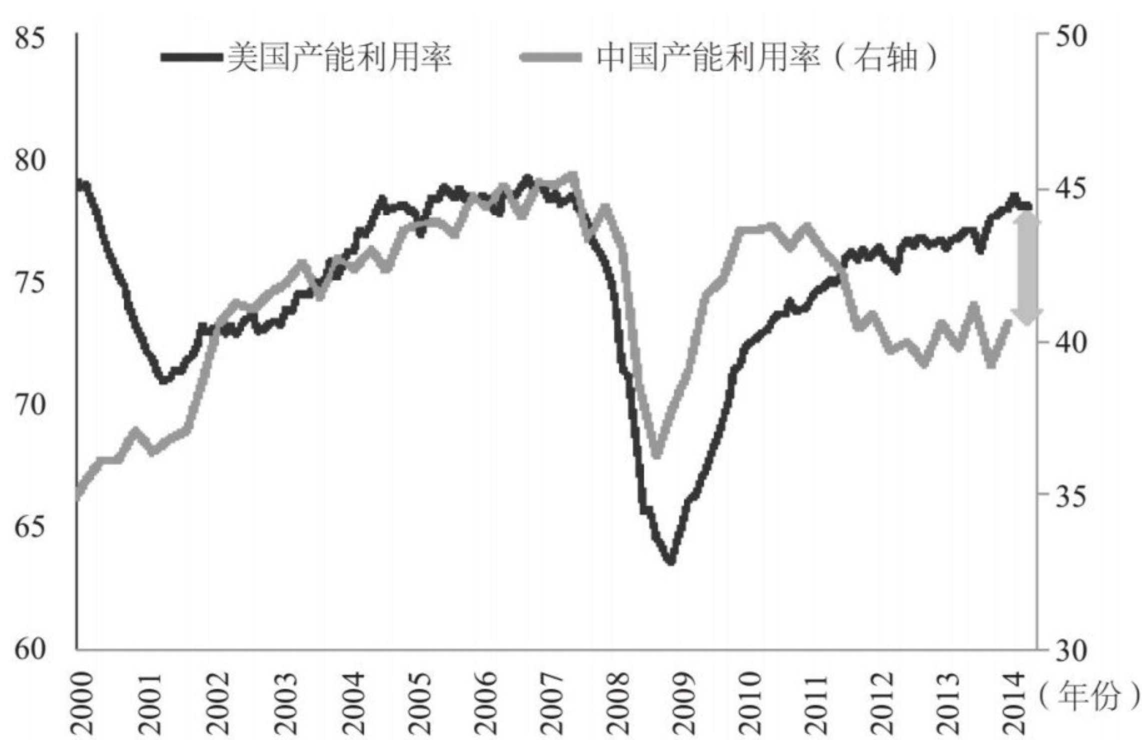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过剩产能出清缓慢导致产能利用率低下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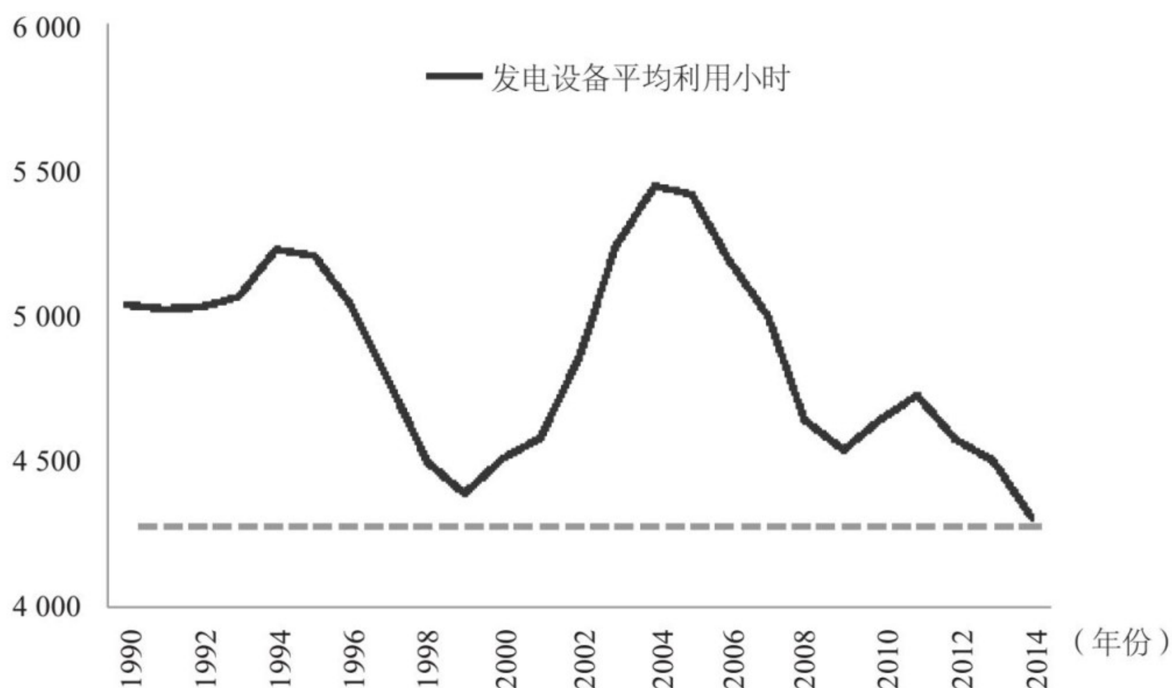


图2 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在国内房地产等传统需求引擎低迷的背景下，出口是化解产能过剩为数不多的途径。上一轮去产能和加入WTO带来的外需红利就有很大关系。但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传统的出口市场增量空间不大，国内的过剩产能很难通过他们进行消化，在国内消费加速启动难以推进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以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开辟新的出口市场是很好的抓手。

战略意义之四：获取战略资源，拓展经贸合作

中国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较高，现在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铁矿石依赖于澳大利亚和巴西，石油依赖于中东，渠道较为单一。中国与其他重要资源国的合作还不深入，

经贸合作也未广泛有效地展开，使得资源方面的合作不稳定和牢固。“一带一路”新增了大量有效的陆路资源进入通道，对于资源获取的多样化十分重要。

战略意义之五：强化国家安全，开拓战略纵深

我国的资源进入现还主要是通过沿海海路，而沿海直接暴露于外部威胁之下，在战时极为脆弱。我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也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的打击，整个中国会瞬时失去核心设施。在战略纵深更高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工业少，还有很大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潜力，在战时受到的威胁也少，通过“一带一路”加大对西部的开发，将有利于战略纵深的开拓和国家安全的强化。

战略意义之六：提升国民收入，扭转国际收支困局

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过度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而忽略了GNP（国民生产总值）。GNP与GDP的差异主要是对外净资产收益，在这一点上，中国一直深陷对外净资产与负收益并存的窘境。

截至2014年三季度，中国的对外净资产虽然高达1.8万亿美元，但前三季度的投资收益却只有负的231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对外净资产是负的4.6万亿美元，也就是净负债国，但美国的投资收益却是正的2 288亿美元。简单来说，中国作为借给别人钱的人竟然还要给别人支付利息，而美国作为借钱的人竟然有巨额的利息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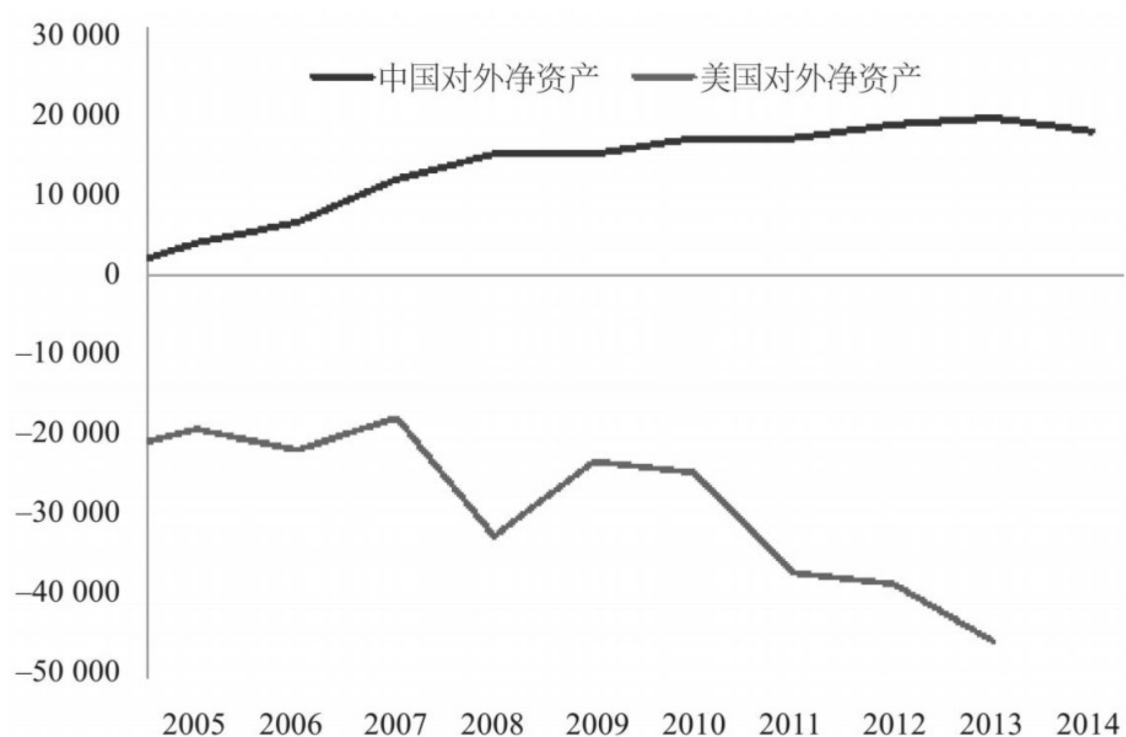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有巨额对外净资产，美国有巨额对外净负债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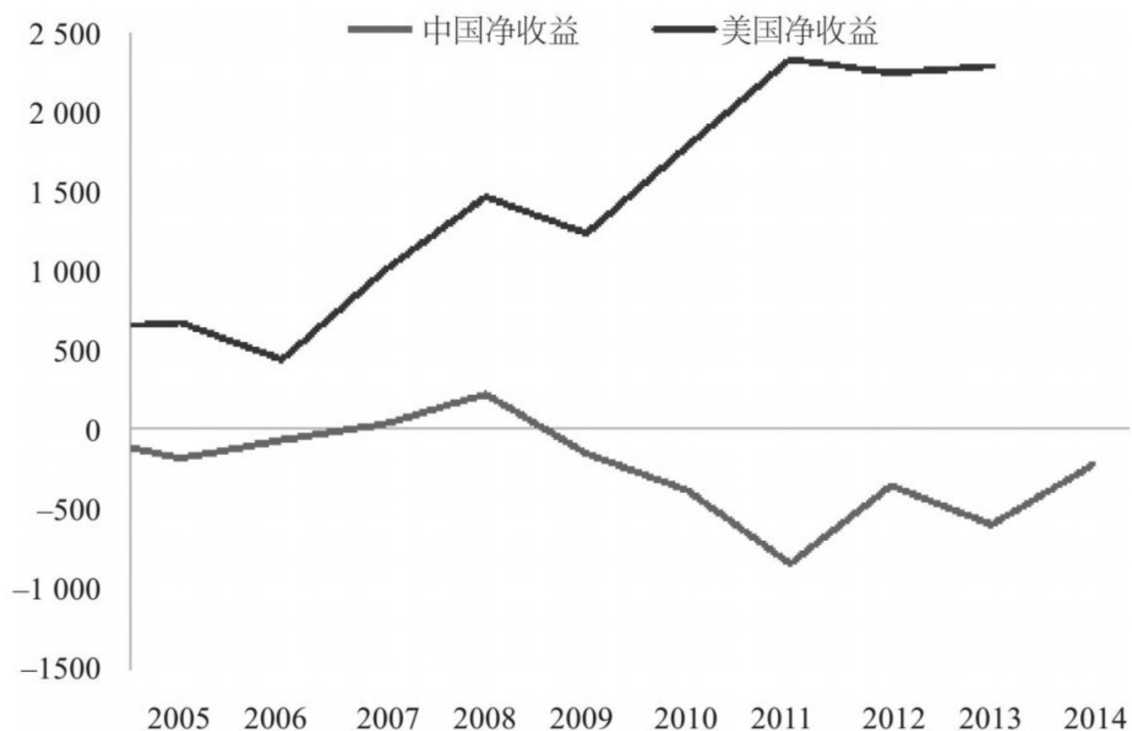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对外净收益为负，美国净收益远高于中国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从对外负债端来看，中国引入外资的方式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FDI），而FDI由于享受了地方政府的诸多优惠政策，收益率普遍较高，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华FDI的投资收益率可能超过20%。但更重要的是资产端的问题，中国对外投资的收益过低。

中国对外投资收益低下主要原因是：中国6万多亿美元的对外资产头寸主要是央行近4万亿的储备资产，占比超过60%。相比之下，日本近7万亿美元的对外资产中只有16.8%是央行掌握的储备资产，大部分的对外资产是由私人部门持有。中日两国都在长时间的出口繁荣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对外资产头寸，但不同的是，日本的对外资产主要由私人部门来持有和经营，主要形式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最著名的案例是日本人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而中国的对外资产通过强制结售汇都转移到了央行手中，由外管局和中投公司集中管理，集中管理的结果是只能被动地大量配置美元和美债资产，由于美债收益率低下、美元持续贬值，严重影响了这部分投资的收益。

对外净资产的收益低下抑制了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事实上是国民福利的损失。为了扭转这种国际收支的困局，必须加快调整对外资产结构，降低储备资产的比例，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而这种资本输出正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涵。

“一带一路”的三大主力军

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也是“一带一路”的积极推动者、实施者。庞大的中国经济总量和超大规模的人力资源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物质基础。其中，以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和环渤海经济区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和港澳台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具有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和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是整个“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力源头。如何发挥沿海和港澳台地区的先发优势和引领功能，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沿海地区：“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目前，人们对“一带一路”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新疆和福建两个核心区，很多人要么将“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更多分析沿线国家存在的政治风险和各方面的挑战，要么把目光更多锁定在西部地区，从历史上的古丝绸之路着手，分析复兴古丝绸之路的种种方案，将“一带一路”理解为一种对西北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误以为是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反向补贴和政策优惠。其实，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诚然，如同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首先从东南沿海启动一样，“一带一路”重点建设西北边疆地区，注重打通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陆经济通道，实现互利共赢。但是，无论是作为东部沿

海地区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福建，还是东北、西北和西南经济实力更加弱小的诸省区市，根本无法扮演“一带一路”的龙头角色，它们不仅缺乏发挥引领作用的经济能力，也缺乏扮演龙头角色的开放视野、开创能力和体制机制。尽管中央已经在新疆和福建两省区设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但从两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让它们引领整个“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恐怕是要求过高了。就目前来看，新疆和福建除了通过自身体制机制的大胆改革创新盘活自身一盘棋外，其他的基本上无法指望，更何况新疆还面临暴力恐怖主义、政治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的严峻挑战，在南疆面临着不是引领“一带一路”的问题，而是如何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问题。福建的情况尽管要比新疆好得多，但要想让福建引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这样实力雄厚的经济圈，也无异于是“小马拉大车”，很难有大的作为。在此，我们完全没有否定中央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战略决策的意思，也不存在有意贬低或看不起两省区的改革创新能力的意思，只不过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两省区更适合做好自己的事情。因为两省区的改革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成功了固然很好，一旦失败了也不应影响中国发展战略的全局，“一带一路”最好不要“押宝”在两个核心区的探索和创新上。

既然新疆和福建两省区以及中西部各省区无力胜任“一带一路”龙头和引擎的角色，谁可以承担这一角色呢？毫无疑问，就“一带一路”倡议整体而言，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其统领的整个中国经济应该是“一带一路”的龙头，中央“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是“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总指挥部”和“总前委”，所有重大方针政策和实施方案要从这里传达到各个部委和地方各级政府，依靠党、政、军、民、商、学、媒等社会各界，团结海内外一切愿意参与的力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然而，具体而言，在中国经济总体布局中，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为核心的东南沿海各经济区，包括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

潭、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区、舟山群岛新区、浦东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等东南沿海地区众多经济活力强劲的地区，经济总量占据了全国的七成以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扮演龙头和引擎角色。同时，这些地区与港澳台、日韩、欧美等发达经济地区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对整个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体系有着灵敏的反应，如何发挥沿海地区的先发优势，在自身扩大开放和转型升级的同时，带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展开，将是新常态下沿海地区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认真对待和高度重视的战略课题。

在国务院授权三部委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中央对沿海地区在“一带一路”规划中的定位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引领”，“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从中央的定位来看，“一带一路”建设的火车头还是确定在沿海地区，并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将发展重点完全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只不过对东部地区而言，核心问题是通过深层次改革实现转型发展的问题，沿海地区要调整现有过多中低端产业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更多向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国际竞争的蓝海地带进军，建设具有世界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经济增长极，这是“一带一路”总布局对沿海发达地区的总要求。具体来说，所谓“排头兵”，是指沿海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走在国内各省区市的前列，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前列，主动通过扩大开放倒逼自身深层次改革，在与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和地区竞争过程中形成“一带一路”的新优势。因此，沿海地区不仅要作“一带一路”的排头兵，而且还要作与发达经济体竞争的排头兵，两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所谓“主力军”，是指沿海地区还要承担“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承担更多的项目，发挥更大的作用，形成连接东中西、沟通境内外的经济大通道。很明显，尽管“一带一路”意在调整发展布局，重在振兴中西部地区，但沿海地区仍然是实现“一带一路”构想的王牌，是主要的依靠力量。沿海地区对于这一点必须心中有数，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勇挑重担，切实履行和发挥好引领作用。

二、三大主力军：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发展水平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经济圈，尽管土地面积并不大，但人口密集，经济产出效率和集约化程度都非常高，很多省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在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拉动下，沿海地区已经深深地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之中，成为拉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极。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环渤海湾城市群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扮演着连接中国本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枢纽和桥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海地区需要调整角色，除了继续扮演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枢纽之外，还要扮演“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角色，特别是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主力军，可能决定着“一带一路”的进展乃至未来。同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各有其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等特色，三大经济圈在发挥“排头兵和主力军”作用上不可能平行用力，需要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彼此呼应，分别从南方、东方和北方三条战线展开，沿海路和陆路两个维度延伸，如同两个巨大的经济发展翅膀，驱动“一带一路”在欧亚

非三大洲和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两洋范围内展开，稳步构建连接欧洲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圈的跨区域经济合作圈。具体来说，三大经济圈可能在“一带一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一是作为资金融通和设施联通主力军的长三角经济圈

长三角经济圈是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约30多个城市组成的经济圈，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经济实力最雄厚和最具活力的地区。该地区从1992年开始加强江浙沪协同发展，建立了15个城市间合作机制，到2010年国务院批准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际化城市群和增长极。在2014年，全国GDP超过63万亿元，仅长三角核心区16个城市就贡献超过10万亿元，被国际公认为当今世界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与其他两个国际化城市群经济圈相比，长三角经济圈最大的特点是有着超一流的基础设施条件、雄厚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和国际化水准的现代服务体系，是国际资本投资青睐的“天堂”。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纷纷确立“转身亚太”战略的背景下，长三角经济圈成为跨国公司、国际财团和研发中心聚集的所在地。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长三角经济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群经济圈，成为和伦敦、纽约相媲美的世界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鉴于长三角经济圈所具有的各方面优势，应该将该地区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任务的主力军。

首先，打造长三角经济圈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主力军。尤其是作为长三角经济圈核心城市的上海，中央在上海设立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明确指示希望上海成为全国开放度最高的自贸试验区，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角色，成为吸引全世界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强大磁极。重点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推行货币自由流通，打通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香港证券交易所、纽约证

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等世界各国证券交易机构的联系，逐步推动上海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推动上海在构建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其次，推动长三角经济圈成为引领“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主力军。长三角经济圈在基础设施上与世界连接最为紧密，浦东机场、虹桥机场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枢纽机场，洋山深水港、宁波—舟山港是国际集装箱运输运力最大的港口，在通信、能源、新能源、高科技技术等领域，长三角经济圈不仅是国内水平最高的，在世界上也位居前列。但是，受体制和政策影响的原因，长三角经济圈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却并不十分紧密，尤其是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存在落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落差就更大。因此，“一带一路”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起点可能是从国际化水平最高的长三角经济圈出发，打通从西太平洋沿海到北大西洋沿海的经济大通道，为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扫除障碍。

二是作为贸易畅通主力军的珠三角经济圈

珠三角经济圈背靠内陆腹地，面向南中国海，包括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等城市群，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并与港澳紧密融合，是一个有着崇商重侨传统的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不同，珠三角经济圈有着毗邻港澳台和背靠东南亚的地缘优势和华侨之乡的人缘优势，呈现出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大城市驱动的城市群格局。尽管在经济实力上比不上长三角经济圈，但各个城市之间互联互通，联系方便，市场化程度高，以“三来一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起步，吸引了大量以服装、玩具、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外资进入，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日用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是中国经济国际化和外向度最高的地区，外贸依存度超过150%以上。世界银行2015年1月26日公布，中国珠江三角洲已在2010年超越日本东京，成为世界人口和面积最大的城市带。尤其是

随着2014年广东自贸区的设立，珠三角经济圈的国际化将获得进一步加速发展。

因此，鉴于珠三角经济圈拥有贸易国际化的巨大优势，应充分利用其商业网络优势，加强与内陆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推动珠三角经济圈成为“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主力军。要积极推动珠三角经济圈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动广交会等展会平台转型升级，加强与欧美、亚太等世界各地的商品交易所对接，建设高水平的“一带一路”商品交易平台、拍卖行、典当行、物流中心等贸易体系，增强带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能力。同时，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畅通，在数据共享、自动报关、检验检疫、监管体系等方面推进互联互通，切实增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激发和释放合作潜力。

三是作为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主力军的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圈

环渤海经济圈位于中国北方渤海周围，涵盖了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省市，区位特殊，工业密集，城市密布，是中国首都经济圈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门户。与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相比，环渤海经济圈国际化水平低，发展也不够均衡：北京与天津发展要明显快于山东、辽宁与河北；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高，特别是以重化工——资本密集型的国有资本企业占主导地位，是中国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不过，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圈最大的特点是政治资源和人文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尤其是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把京津冀计划作为国家战略，通过科学规划和顶层设计，推动首都经济圈的一体化。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把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群协作列为当年一项重大任务。随着京津冀协

同以及环渤海与京津冀地区经济群协作的启动，必将对“一带一路”的北线和中线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因此，从京津冀协同和环渤海经济圈协作的特点出发，应该着力发挥这一经济圈在“一带一路”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方面的主力军作用。其中，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十分丰富，要通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和发展服务等渠道，举办各种政策论坛，完善对话机制，举办社会文化活动等，创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沟通交流的机会，在交流中实现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同时，京津冀协同和环渤海经济圈协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区域内陈规难破、市场分割严重、经济发展缓慢和彼此之间协作不足的问题，要想释放该地区在“一带一路”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方面的活力，必须致力于打破壁垒，增强互动协作，从政治、经济、人文等各个层面搭建合作共进的平台，形成规模优势。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强与蒙古、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的联系，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环渤海经济圈协作发展的互动，增强“一带一路”北线的带动能力。

三、重在打造经济增长极

总体来看，尽管中国三大经济圈各有优势，但在对接“一带一路”上存在着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行政体制分割引发的地区间恶性竞争、不同区域存在的贸易壁垒和花样翻新的地方保护以及资源配置不合理和特色不明显等。由于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主权国家，这些问题在中国发展战略全局中只要不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可以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但是，随着“一带一路”的启动，如果还存在此种自相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的情况，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伤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信任度。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整合中国三大经济圈的特色，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致力

于打造“一带一路”的区域增长极。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提升核心城市的引领效应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三大经济圈中，都有其发挥引领作用的核心城市，比如长三角经济圈的上海、珠三角经济圈中的广州、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北京和天津等，三大经济圈能否真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归根结底要看核心城市的引领效应发挥得好不好。以上海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经济圈的发展是与上海浦东新区开放开发紧密相关的。在1991年以来的浦东开放之中，第一轮开放是土地批租和招商引资，表现为设立开发区，上新项目。第二轮开放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现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搞资本兼并，资本运营。此次“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可以看作是上海的第三轮开放，主题是资本开放，包括探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和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的投融资制度改革；通过要做强做大股市和积极对接华尔街金融体系，以股市开放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上海股市，推高股市，为中国企业提供优越的融资环境，培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世界500强企业，以及探索建立离岛金融区的问题。总之，展望未来，上海和长三角经济圈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重点不是招商创业，也不是推动探索自由贸易，而是建设金融创新服务区。要借自贸试验区之名，探索金融创新区之实，上海的出路在金融，上海的竞争力也在金融。因此，上海要确立“金融强国”的战略，以金融创新带动其他一切领域中的创新发展，打造上海国际化战略的升级版。

二是提升三大经济圈的协同效应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想发挥三大经济圈的引领效应，仅靠某一两个省是不够的，必须大力加强区域内的协同整合，通过抱

团取暖的方式，追求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要通过制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规划，制定“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长三角经济圈协同发展规划”等，明确经济圈协同发展的目标和发展路线图，以公路、港口、机场的衔接配套和交通、物流网络的完善为重点的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强化信息资源互通共享的信息一体化，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城市布局一体化，最终推动建设区域内的一体化商品物流共同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人力资源共同市场、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市场、基于信息网络平台的信息共享及信用征信共同市场，以及文化旅游共同市场等。唯有将共同市场的协同效应释放出来，才能转化为“一带一路”的带动效应。

三是提升三大经济圈的带动效应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中国国家发展的全局中，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实际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对外连接发达国家，扮演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门户角色，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一地区已经被纳入整个国际资源配置的大循环，成为追随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二是对内连接内陆腹地，扮演着拉动中国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角色，成为面向内陆腹地的辐射中心。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沿海和港澳台地区的这一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仅仅是全球经济的追随者，而是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领导力，也不再仅仅是内陆拉动发展的引擎，也具有拉动整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引擎效应。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要求沿海和台港澳地区转变传统的角色定位，在继续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同时，更强调确立主动进取，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总之，“一带一路”能走多远，能走多快，从根本上取决于市场拉动力和政府引导力。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一带一路”建设的成

败还是取决于东部沿海地区引领带动效应释放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圈的市场发展需求对接、“一带一路”新发展理论的指导以及中国政府与沿线国家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三者缺一不可。从目前情况来看，所有这些努力还刚刚起步，首要的还是大力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搞清楚区域内一体化和跨区域协作之间的关系，为增强三大经济圈的带动能力提供理论指导。当然，在理论没有搞清楚之前，“一带一路”也需要从实干中学习，边实践、边总结、边提炼，因为“一带一路”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一定是在实践中走出来的，不是在书斋里论证出来的。

“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

刘枭 王旭 汪术勤 安邦咨询研究员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公布了“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方案。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与合作机制，并介绍了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和中国积极行动等相关内容。这份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旋律的外交战略开启了新的篇章，也将成为中国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共筑繁荣富强“亚太梦”的新起点。

《愿景与行动》的要点

综观《愿景与行动》，可提炼出要点如下：

1. 覆盖范围较预期更广。市场对“一带一路”战略覆盖范围的理解，大多认为主要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13个国家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52个国家，共计65个。这65个国家覆盖全球超过64%的人口、全球30%的GDP。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1990~2013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8%和9.7%，而这65个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1%和16.5%；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是全球贸易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

一般理解的“65个国家”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范围，“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从《愿景与行动》看，这是一份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明确表示，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言下之意，中国不仅欢迎“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参与共建，区外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也可加入其中。这一点，从近段时期不断扩容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也能看出，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及奥地利等欧洲国家，都申请成为“一带一路”核心金融机构的创始成员。开放的体制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撬动更多资源，并使得相关政策性金融机构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运行。

2. 合作重点更为丰富更有深度。在“一带一路”战略酝酿与筹备的一年多时间里，市场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产能输出与人民币国际化（或者金融输出）三个方面，着眼点主要是“一带一路”该怎样为中国经济服务，如何利用这一战略缓解本国内部的经济转型压力。如果仅仅局限在这样的合作框架里，“一带一路”的格局和前景显然将受到限制。仅以市场较为看重的产能输出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和中国处于差不多的产业链位置，在工业产能方面竞争大于合作，产能输出的空间有限，也容易招致目的国的反感。在与一些过剩行业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业内并不像市场那样对“一带一路”带来的产能输出前景感到兴奋。毕竟，在可预期的将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大可能像过去十余年的中国那样，发生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运动。当前的产能过剩是全局、全球性的，并非“一带一路”所能消化。

相比之下，《愿景与行动》涉及的合作重点更为丰富，更有深度，全面覆盖“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不仅将加强基础设施、经济建设与国际金融方面的合作，还包括宏观政策、投资贸易以及民间交流的互联互通。在这其

中，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政府间的合作将主要集中在政治互信、制度建设以及必要的公共品投资等方面。对于“一带一路”这样大体量的规划来讲，只凭各国政府的单方面努力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充分盘活市场与社会力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3. 对既有资源的整合力度更大。“一带一路”的构想宏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由中国单方面出资建设，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诚然，在长期贸易顺差的影响下，中国的确积累起了丰厚的外汇储备，截至2014年底为3.84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可视作外储多元化利用的重要战略。但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截至2020年，亚洲需要的基建基金总额约为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即使完全不考虑回报，将中国的外汇储备全部投进去，也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基建投资的需求。推论则是，中国政府需要整合更多资源，撬动更多资金，共同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仅以一国之力，中国是没有能力同时兼顾“一带一路”的，而且容易让周边国家搭便车，这绝非各方之所乐见。

有鉴于此，《愿景与行动》对既有的国际国内资源进行了整合。在国际上，提出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内，则将上海自贸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舟山群岛新区、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以及北部湾经济区等国家战略予以统筹，试图将这些原本旨在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级战略，统一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之内。通过不断整合国际国内各种资源，“一带一路”将能撬动更多

力量，吸引更多国家、地区以及资本投入其中，中国政府则起到一个相对轻松的居间协调的作用。只有这样的操作方式，才有可能使得如此庞大的设想一步步落到纸面成为现实，而不仅仅停留在空想的层面上。

中国的准备与国际上的响应

为务实推进“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中国倡导成立了两大政策性金融机构——亚投行与丝路基金；同时，中国另外两个政策性银行——国开行与进出口银行，也相继表态将重点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亚投行的设立是近段时期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主导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投行总部已确定设立在北京，有报道称将选址北京金融街，位于全国政协礼堂附近。对于外界关心的决策权机制和股份分配问题，据筹建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主席、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介绍，这是亚投行章程的内容，目前各方正在进行磋商。亚投行是互利共赢的倡议，是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有益补充，将遵循公开、透明、高效的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另据一些报道称，参与亚投行筹建的各国将从3月底就出资比例等进行磋商，计划在6月底缔结有关设立亚投行的协定。关于1 000亿美元的资本金，参加各国将围绕（1）亚洲国家出资750亿美元；（2）亚洲以外国家出资250亿美元——的出资比例提案进行调整。各国的出资比例原则上将由经济规模决定。以此估算，中国的出资比例将达到35%~40%，排在第一位，拥有最大话语权。

亚投行引发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同样令人瞩目。在亚投行筹备过程中，略微令各方感到意外的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倒

戈”。这些欧洲国家的加入在国际上引发震动，并促使美国与日本对待亚投行的态度出现缓和。美国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劝阻，转变为表态可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及世界银行与亚投行合作；日本的态度更为复杂难明，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表示日本将最迟在6月加入亚投行，外相岸田文雄却予以否认，并称对中国设定的亚投行申请截止日期并不关心。

西方国家纷纷参与亚投行，对于中国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亚投行能够吸引包括英、法、德、意四个G7国家的参与，的确算是一个成功。多个发达国家的参与将显著增强亚投行的代表性，今后将更有可能在多边金融合作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多个西方国家的参与，对中国驾驭亚投行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作为主发起者以及拥有最大话语权的国家，中国能不能做好这个逐渐“高大上”的国际金融合作平台，又该怎样驾驭这个平台机制，使其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毕竟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的参与都还只是一种“面子”，希望通过站队表态搭上中国经济增长的顺风车。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经历的事情看，中国一向在国际规则制定、国际关系管理等方面缺少有效的能力。当把“面子”做实到“里子”，亚投行开始实质运作，中国方面仍将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丝路基金是中国政府为“一带一路”设置的另一个政策性金融机构。与亚投行不同，丝路基金完全由国内机构出资，不涉及国际资本层面上的合作，因此早于2014年12月29日便在北京注册成立，总规模为400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出资65%。丝路基金选址金融街英蓝国际金融中心，首任董事长为金琦，到目前为止，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团队都已经搭建完成，下一步在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同时，将尽快开展实质性业务。

据金琦介绍，作为中长期的开发投资基金，丝路基金的运用将遵循四项原则：

一是对接原则。丝路基金的投资首先要与各国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相衔接。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一带一路”没有严格的地域限制，只要有互联互通的需要，丝路基金都可以参与相关的项目。具体来说，丝路基金将通过以中长期股权为主的多种投融资的方式，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这些领域尤其要重点支持国内高端技术和优质产能“走出去”，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是效益原则。丝路基金的资金分别来自于不同的股东，包括外汇储备、中投公司、进出口银行和国开行，这些资金都是有相对应的人民币负债的，所以丝路基金不是援助性或者捐助性的资金，在运作上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原则，投资于有效益的项目，实现中长期合理的投资回报，维护好股东权益。

三是合作原则。丝路基金是按照公司法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不是多边开发机构。丝路基金一定要遵守中国和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法规，维护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和国际金融秩序，注重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的发展。丝路基金的优势在于可以提供中长期的股权投资，要与国内外其他的金融机构发挥相互配合和补充的作用，通过股权、债权以及贷款相配合的多元化的投融资方式，为一些可以在中长期实现稳定的合理回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融资选择。

四是开放原则。丝路基金是开放的，在运作一段时间之后，欢迎有共同志向的投资者能够进入到丝路基金来，或者在子基金的层面上开展合作。丝路基金也愿意与国际和区域的多边金融机构，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各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有中非基金这样已经成立的基金开展投融资的项目合作。

除上述两家机构外，国开行及进出口银行也表达了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表示，针对“一带一路”已建立项目库，涉及64个国家约900个项目、投资金额

逾8 000亿美元。更早些时候，时任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李若谷则表示，将综合运用多种渠道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大力支持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项目。

地方政府的期待与部署

“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政府着力推动的“天字一号”工程，备受各地政府期待。在2015年早些时候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全部31个省市自治区都提到了“一带一路”。很明显，“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拉动投资的重要由头，虽然对外的部分还没有实质性动作，但对内的地方规划已经纷纷出台。

中部省份是个有代表性的观察窗口。在地理空间上“不东不西”的中部省份与“一带一路”的直接关联不大，但大家全都在积极争取纳入“一带一路”规划。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长江经济带的湖北段将成为长江经济带、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与结合部。江西省出台《关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措施和意见》，提出了33条具体举措，计划用5年时间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连接点和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从中掘金4 100亿美元。湖南省则提出，要充分挖掘和放大“一带一路”区位优势，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安徽也提出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扩大东西双向、对内对外开放。山西提出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到将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谋划建设亚欧大宗商品商贸物流中心、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心、能源储运交易中心。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各地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如果能借着“一带一路”把自己的项目塞进国家规划，将地方经济发展捆绑上国家战略，无疑将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关键在于这些“小算盘”能否得

到中央的支持？此次中央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不负众望，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明确提到了其中28个，重点圈定的则为18个，只有江苏、河北、贵州3省成为遗珠。这3省中，又以江苏省的缺席令人备感意外。此前的报道称，作为“一带一路”的两大起始点，新疆与连云港将率先突破，更称“一带一路”规划将连云港确定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节点城市。但在谈到沿海城市港口建设时，文件却并未提及包括连云港在内的江苏一众港口城市，或许要等到最终规划出台，才能知晓其中的具体安排。

“一带一路”在国际上面临两大挑战

“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下发后，相关战略即将步入实施。在看到“一带一路”带来的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目前在对外方面，“一带一路”战略面临两个重大挑战。第一个重大挑战是这个规划本身是G2G的总思路，也就是“政府对政府”的思路，带有要求各国政府间规划协作的强烈意味，要求的是协调一致的配合。比如类似的表述：“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这就是明确提出要求，希望各国来对接“一带一路”。不过要注意的是，G2G的合作方案重点关注了政府（或者说执政党），但对各国的市场、对各国老百姓的好处并未体现在明处，容易遭遇各国反对党的狙击以及各国社会层面的抵制。中国过去在缅甸、越南、斯里兰卡都遭遇过类似的事件，中国的许多重大投资项目都受到抵制甚至被强行叫停。

第二个重大挑战是，“一带一路”战略中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从项目的性质来看，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会消耗掉大量

的资本。我们对阿富汗重建计划等国际项目的跟踪研究显示，自2002~2014年，美国已对阿富汗提供了1 040亿美元的援助，以支持数百个阿富汗发展项目。虽然这一计划的投资额已超过了当初的“马歇尔计划”（相当于现在的1 030亿美元），但效果却很糟糕。援助资金或物资“打水漂”的现象到处存在：尽管阿富汗收到76亿美元禁毒专项资金，但近三年来阿富汗鸦片产量却逐步上升，并达到历史最高水准；美国和欧盟斥资30亿美元建设阿富汗员警队伍，但如今仍有5.4万名“幽灵员警”——每月领工资，却不见人影；市场和超市中售卖大量过期货物；中上水准的私立小学校舍和设备可谓陈旧。美国总结认为，阿富汗重建专案耗资巨大而成效不彰的重要原因是“缺乏规划、豆腐渣工程、机械故障和监管不力”，阿富汗政府的腐败和低效，阿富汗严峻的安全形势也是重建耗资巨大却效果不佳的原因。像这类重在基础设施的资本计划，对老百姓的益处同样难以体现在明处，而且这个类型的投资是最容易招致腐败的领域，阿富汗重建计划的失败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一例。

中国政府下发“一带一路”顶层设计方案，标志着此项历史性进程正式揭开帷幕。中国将借助“一带一路”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发展，“一带一路”也将成为下一个十年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全方位影响的重要战略。面对“一带一路”，中国在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上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同时也存在不小的挑战，唯有谨慎行事，尽可能动员更多力量参与其中，才能盘活“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令投出去的真金白银不至于“打水漂”。

引导民间投资加入“一带一路”

吴士存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当下语境中的具体落实；是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过程中，承担国际责任、谋求国际认同的宏伟规划。这一构想提出后掀起国内外研究热潮。本文就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构想，预测和管控其可能面对的挑战和风险；探讨其落实机制等具体问题上谈几点看法。

1.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建构“立己达人、互利互惠”的新时代精神。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某种时代精神的传播和引领。19世纪英国的“自由贸易”和20世纪美国的“民主自由”等理念无不如此。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也需要升华和凝练自己的时代精神。在当下的国际语境中，这种精神绝不能是重商主义的“零和博弈”，也不能成为传播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应该在和平互利的前提下，发展自身、利及他人。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是以古代海陆丝绸之路精神为依托，融合承载了“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时代理念，并通过“丝绸之路”精神引领世界进入“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新时代。本着这一原则为本地区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灌注着“立己达人，成己惠人”的中国精神。

2. 建立透明、专业、规范的“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落实机制。如何平衡好“官办”与“民间”关系是这一工程能否得以高效落实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虽然“一带一路”战略并非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但其成功的经验颇值得学习。例如其设立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合作机制，积极引导私

营企业的参与等。“一带一路”的实施，可建立以官方引导，民间投资和合作机构为主体的新机制，并鼓励私营企业和机构参与其中。这一机制可以降低周边国家的安全忧虑，减小“走出去”的阻力。

3. 处理好“一带一路”与现有其他机制的关系。目前在亚太地区存在着众多涉及政治安全、区域经济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机制。例如在政治安全领域，有上合组织、亚信、东亚峰会等；区域合作领域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东盟10+1、亚太自贸区、TPP等；金融合作领域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拟议中的上合组织银行等。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应处理好与这些现有机制之间的关系。否则，会打乱和冲淡“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效果。

4. 做好国内统筹，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多个中央部门、国内各省（市、区）积极参与，提出各自的建设方案。但这些方案存在着定位重合、项目投入重复等现象，且地方更多是从“要政策、争项目和拿投资”的角度参与到该战略中来。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应统筹考虑中央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省（市、区）的优势与短板，通盘考虑，合理分工，有效配置，充分整合现有国内资源，为与沿线国家开展务实合作提供到位可靠的对接平台。

5. 在推进和实施项目过程中，要做好风险评估和管控，规避可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风险。“一带一路”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应该理性地面对投资冲动，在项目实施之前必须进行风险评估，从而规避因为当地政治等因素而带来的经济、安全风险。既要有工程做，又要保证不烂尾；既要勇于拓展，又不能做“冤大头”；既要涉猎多元，又要有精品意识。在项目规划方面，需根据中国和沿线周边国家的发展计划周期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

利用互联网金融优势，打造网上丝绸之路

李麟 浦发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近年来，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又一次飞跃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当前，世界上各主要经济大国都正在加快信息化进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我国也在此进程中，形成了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相对领先优势。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中长期国家战略。我国应该借助全球信息化的浪潮，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的优势，大力打造网上丝绸之路，使线上和线下的丝绸之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助力我国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一、各国以信息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轨迹，本质上就是利用工具延伸人体机能的进程。在计算机产生前，生产力进步主要是通过工具对人类肢体的延伸而实现，主要体现为“机械化”。近代以来的几次工业革命无不是这一过程的体现：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能够以强大的机械力量来改造世界，从简单人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电力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则进一步放大了人类的“肌肉力量”，使大规模生产制造成为可能。

而信息技术与以往的技术不同，它实现了对人类大脑的延伸。自计算机诞生以来，生产力进步的主线就由“机械化”转向了“信息化”。“信息化”之所以能带来生产力的飞跃，在于一旦人类的生产生活行为被数字化，这些信息就能够被存储、分析、传输，人们就能在此基础上发现这些行为的模式、规律，进而对相关活动进行改进、优化乃至变革。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普遍适用摩尔定律，存储容量、计算能力、通信带宽等都是以指数级速度飞速发展，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全面信息化成为可能，进而带来生产力的又一次飞跃。计算机出现至今，已使人类从重复性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自动化生产广泛普及。而互联网的出现，则使信息化向深度发展，推动智能化生产时代的到来。当前，各主要大国都充分认识到信息化对于生产力革命的重大意义，正大力推动信息化建设，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

美国：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力推“工业互联网”

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领先全球，拥有雄厚的技术创新力。在全球前20大互联网上市公司中，美国企业就占据了13席。因此，美国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注重发挥其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优势，以软件的力量激发沉睡的硬件（机器设备），以信息流的网络化带动制造流的网络化，推动制造业的升级。全球制造业巨头通用电气公司（GE）提出的“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代表了美国以信息化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流趋势。

通用电器公司2012年首次系统阐述了“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的概念：工业互联网是全球工业系统与高级计算、分析、传感技术以及互联网高度融合，它通过智能机器间的连接并最终将人机连接，结合软件和大数据分析，重构全球工业、激发生产率。工业互联网是对互联网概念的延伸。GE认为过去十年是消费互联网的时代，而未来十年工业互联网将成为主流。通过将企业、机器设备进一步接入互联网，将形成一个比消费互联网大得多的工业互

联网，信息化将从消费领域全面拓展到产业领域。工业互联网是近两百年来继工业革命和互联网革命之后的第三次创新和变革浪潮，其汇集了两大革命的进步：工业革命带来的无数机器设备、设施及其网络，以及互联网革命中涌现出的各类信息通信技术，将带来生产力的又一次飞跃。

工业互联网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升级。工业互联网的三大关键元素分别是智能机器、高级分析技术、工作中的人。工业互联网把世界上各种机器设备、生产设施和系统网络与先进的传感器、控制和软件相连接，从而产生能够进行自组织、自调控、自生产的智能化机器。同时，工业互联网借助高级分析技术，对智能机器运行中产生的数据加以收集分析，进而对生产的各个环节流程进行分析、预测、监控和调节。此外，工业互联网还将工作中的人连接起来，发挥人的智力决策作用，支持智能机器的生产。

工业互联网通过智能化生产，将推动下一波生产力大爆发。工业互联网带来了企业生产制造和经营信息的联网，使生产方式走向互联网生产，并使其逐步走向智能化，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工业互联网将大大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优化生产流程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商用航空、铁路运输、电力、石化、医疗等领域都有着极其广阔的应用前景。

德国：加快制造业信息化，实施“工业4.0”战略

德国以“工业4.0”战略应对制造业面临的挑战。德国长期以来在装备制造、工业自动化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近年来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美国力推的工业互联网都正在蚕食德国制造的优势地位。德国认识到在互联网时代，必须以信息化改造传统工业，才能使制造业焕发新的生机。为此，德国推出了“工业4.0”战略，提出

要在其制造业的雄厚基础上，利用互联网联结整个工业体系，构建智能化的生产制造体系。德国政府于2013年将“工业4.0”项目纳入了《高技术战略2020》的十大未来项目中，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随后，德国设立了“工业4.0平台”并发表了德国首个“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

“工业4.0”通过网络化实现智能制造。“工业4.0”就是利用互联网把产品、机器、资源和人有机结合在一起，构建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智能制造模式。未来，企业将建立全球网络，把它们的机器、存储系统和生产设施融入“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中。在此模式中，CPS系统推动生产对象直接或借助物联网通信自主实现信息交换、运转和互相操控；智能工厂能够自行运转，产品与机器可以相互交流，机器可以自组织生产，供应链将自动化协同，产业链分工将被重组。

“工业4.0”是制造业升级的全新革命。蒸汽机发明带来机械化生产，造就了“工业1.0”；电力驱动的规模化生产带来了“工业2.0”；“工业3.0”则伴随着信息化的到来实现了制造业的自动化生产。在经历三次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基本解放了我们的四肢，并代替了大脑部分的决策。“工业4.0”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要代替生产中更多大脑的智能，是基于物联网基础上的制造业升级。

“工业4.0”将推动制造业实现三大转变：一是实现生产由集中向分散的转变。规模效应不再是工业生产的关键因素，工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将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转变。二是实现产品由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规模化定制生产转变。未来产品都将按照个人需求进行生产，极端情况下，将成为自动化、个性化的单件制造。三是实现由客户导向向客户全程参与的转变。客户不仅出现在生产流程的两端，而是广泛、实时参与生产和价值创造的全过程。

中国：互联网金融是中国信息化的优势领域

在全球信息化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发展呈现出快人一步的态势。尽管中国在“软”（信息产业）、“硬”（制造业）两方面领域的实力离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差距，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也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中国却走在世界前沿，互联网金融生态已初步形成。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我国互联网金融生态已初步形成。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功能在与新兴的信息通信技术叠加与嬗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型金融模式，在金融资源配置上具备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生态，已经覆盖了支付、融资、投资理财、风险管理这四类基本金融需求。在支付领域，出现了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在融资和投资理财领域，出现了P2P（Person-to-Person，个人对个人）贷款、众筹、网络银行、网络资产交易平台、网络微贷、网络基金、网络证券、网络财富管理等。在风险管理领域，网络保险已经出现，网络征信也崭露头角。新兴的互联网金融领域正在迎来大发展的时代。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在第三方支付领域，我国起步较早，已经成为网上零售和线上交易的重要支付手段，并正向线下交易加速渗透。据艾瑞咨询统计，2013年我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53 730亿元，同比增长46.8％，整体市场持续高速增长，作为支付清算工具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在移动支付领域，我国移动支付市场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2013年全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1.22万亿元。未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O2O（Online To Offine，线上到线下）的兴起，以及近场和远程支付方式技术的进步，移动支付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在P2P贷款领域，我国近一两年发展迅猛。据网贷之家统计，到2014年底，国内P2P贷款

平台达1 575家，平台数近4年增长150倍。2014年P2P贷款累计成交2 528.17亿元，是2013年的2.39倍。众筹融资：根据清科集团的统计，2014年5月，国内各众筹平台（包括回报类众筹和股权类众筹）共募集资金总额约2 053.67万元。在网络银行领域，民生、兴业、平安等商业银行先后建立直销银行，同时腾讯和阿里巴巴旗下的微众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也有望成为首批纯粹的互联网银行。在网络基金领域，余额宝、理财通、百赚、天天基金网、爱基金网、数米网等互联网基金销售平台快速兴起。截至2014年8月，互联网货币基金总规模达到7 856.20亿元。在网络征信领域，芝麻信用、腾讯征信、拉卡拉信用等互联网征信企业，已经获得央行批准开展个人征信业务，未来有望成为我国征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走在世界前沿。尽管许多互联网金融模式起源于欧美等信息化程度领先的发达国家，但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毫不落后，甚至走在前列，在某些领域还有独创性的发展。例如，在第三方支付领域，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超过250家，超过美欧等国该类企业数量的总和。并且，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企业，不仅起到了支付媒介的作用，而且起到了信用担保中介的作用，为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首创。在P2P贷款领域，我国P2P贷款平台的数量和发放贷款规模均超过美国。在互联网理财方面，阿里巴巴的余额宝2013年6月推出，到2014年一季度末规模已超过5 000亿元，跻身世界前十大基金之列。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走在世界前沿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中国支付体系的覆盖面尚待进一步的完善，互联网金融填补了支付领域的空白。中国银行卡普及程度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第三方支付的出现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丰富了网上交易的支付手段。二是中国的信用体系不健全，互联网金融解决了网上交易的信用问题。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网络交易存在较大风险，第三方支付发挥了信用担保中介的功能，解决了买卖双方的相互信任问题；三是中国的小微融资需求难

以从银行体系得到满足，互联网金融提供了新的融资手段。与发达国家同行相比，中国的商业银行由于成本、体制等原因，在消费金融、小微金融领域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客户的需求。而互联网金融能够以低成本、低门槛服务广大个人消费者、小微企业的投融资需求，有效服务这类长尾市场，因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互联网金融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对我国信息化发展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大大支撑了电子商务的发展，为网上交易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另一方面，随着移动支付等互联网支付手段的发展，对于打通线上和线下，加快O2O模式的普及提供了基础，促进线下生产和服务的互联网化，将对我国的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二、“一带一路”是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新常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更加依靠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此，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大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结合历史渊源，通过推动相关国家和地区间发展更为密切的贸易、金融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往来，带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平衡发展。

“一带一路”的范畴

从国内来看，“一带一路”涉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四川、广西、云南等西部9个省区和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等东部5省。从国际上看，“一带一路”覆盖了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欧和北非中与中国有经贸合作基础或合作意向的

国家，初期将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在中长期则有望逐步扩展，覆盖到更多与中国有经贸合作意愿的国家。

“一带一路”对于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

第一，扩大外需，化解国内产能过剩，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部分领域产能过剩阻碍了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与产业转型升级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能够获得资金回笼，为技术改造、研发创新等产业升级所必需的活动创造条件。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我国能够以支持周边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扩大外需化解相关过剩产能。同理，在我国相关西部地区，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相关产业的梯度转移，也能够促进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稳定的资源保障。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有稳定的能源和资源供应作为保障。随着我国对油气、矿产资源需求的提高，我国在能源和资源上对外依存度显著上升。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与周边资源类国家的合作，也有助于稳固和丰富我国能源和资源的获取渠道。

第三，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也可以减缓TPP和TTIP等协议对中国贸易的不利影响，巩固和加强我国对周边贸易的主动权和区域影响力，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重在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的战略方向在于互联互通。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应为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一是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策略

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法律政策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二是道路联通。同各国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一带一路”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三是贸易畅通。各国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做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四是货币流通。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五是民心相通。加强人文交流，将历史丝绸之路建立起来的民间文化提升至更广义的国与国、民与民之间进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宗教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三、打造网上丝绸之路，助推“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是对古已有之的丝绸之路的复兴，并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但我们认为，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构建网上丝绸之路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线上的丝绸之路与线下的丝绸之路相互促动，将大大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取得成功。

加强“网络互通”，促进“互联互通”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已提到要加强“五通”。“五通”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互联互通，增进相互理解和交流，促进经贸往来。而我们认为，“互联互通，服务普惠”是国际电联（ITU）的核心原则，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互通”是促进“五通”战略的利器。

互联网是最高效、最快捷的信息沟通平台。通过网络互通，增进“一带一路”相关地区的信息联络，能够促进政策互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做好网络互通，有利于跨境跨地区了解对方的政策，促进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政策互通。做好网络互通，搭建网上交

易平台，能够便利“一带一路”相关地区的商户互通商品信息，扩大商品信息发布范围，促进相互之间的经贸往来。做好网络互通，搭建网上支付平台，也有助于促进跨境跨地区的货币流通，更好地发挥网络金融对于经贸往来的润滑剂作用。做好网络互通，搭建网上信息资讯平台和社交平台，便利各国各地区民众获取新闻信息、文化资讯，将大大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信任，促进民心相通。

借助信息技术优势，搭建四大平台

网上丝绸之路建设重在实现物流、信息和资金流的互通。为此，我们认为应着力围绕交易、物流和贸易环节，着重搭建信息平台、电商平台、支付平台和社交平台四大平台。构建信息平台，促进“一带一路”各方的信息交流，消除阻碍落后地区发展的“数字鸿沟”。搭建电商平台，为包括个体户、小微企业在内的广大商家提供网上商品发布平台，发挥网络无边界的优势，大大拓宽商品交易的地域范围限制。打造支付平台，则为线上消费，未来还能为线下消费，提供方便快捷的支付手段，解决阻碍商品交易的支付难题，促进商品的交易和流通，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建立网上社交平台，为各国各地区的人们提供低成本、便利的沟通方式，将大大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加强文化沟通，增进理解，激发创新，有力促进民心相通。

利用技术特点，夯实“网上丝绸之路”基础

互联网金融凭借其独特的网络属性，具有高渗透、快反应、优体验、低成本等特征，特别是对贸易壁垒、行政垄断、市场分割有颠覆效应和蝴蝶效应，能够解决传统金融、传统市场难以解决的诸多难题，是构建网上丝绸之路必不可少的利器。

第一，互联网金融提供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服务边界近乎无限大，有助于我国商品、服务、货币走出去。互联网金融的一

个重要特征是，企业前期为搭建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的IT投入成本较高，但互联网金融生态圈建好以后，其提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边际成本近乎零，因而与传统金融模式相比具有很高的效率。再加上互联网世界中的技术无边界、资金无国界的现实情况，理论上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边界可以无限大。网上丝绸之路与线下的丝绸之路相比其范围可以无限延伸，能够大大拓展我国商品、服务的市场空间。而只有互联网金融才能满足无边界的网上丝绸之路的金融需求，对于我国货物、商品、贸易和人民币“走出去”将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互联网金融在成本、效率和创新方面优势突出，能够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和优秀的用户体验。信息经济学理论表明，与传统金融模式相比，互联网金融基于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递、信息甄别、信息处理等方面具有快速、准确、便捷等优势，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信息的不对称。在互联网金融生态中，信息流能高效连接物流和资金流，并能实时匹配企业和用户之间的供给与需求，并动态地创新推出个性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实现金融服务模式的多样化。因此，互联网金融不仅能支撑线上交易活动，还能通过O2O等模式服务线下商务活动，支撑多样化的线上线下商业模式。互联网金融在有效改善资源配置方式、提高金融配置效率的同时，提供了远超传统金融服务方式的用户体验，并给予金融消费者更多的消费者剩余。网上丝绸之路跨越众多国家和地区，信息不对称和用户需求多样性问题更加突出，互联网金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手段。

第三，互联网金融能够聚焦长尾市场，有利于促进金融普惠。与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不同，互联网金融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有力支持下，能够通过聚焦长尾市场，率先从个别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枝独秀”发展到形成一种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从而实现快速地成长。因此，与传统金融机构在服务小微企业和偏远地区金融消费者遇到的困境和不足相比，互联网金融不但能够提供低成本、广覆盖、高效率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且还能提供差异化、个性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金融普惠，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这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和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广大民众来说无疑是个福音。

利用先行优势，推进网上丝绸之路建设

我国应充分运用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先行优势，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积极支撑网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助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动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

第一，以第三方支付促进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在互联网时代，线下商务活动越来越多地向线上迁移。对于“一带一路”中跨境跨地区的交易而言，电子商务具有众多显而易见的优势。商家便于以低成本的方式接触到境外区域外的客户，买卖双方也便于进行沟通，商品交易行为也在网上变得有迹可查，客户分析和洞察也更易于开展。第三方支付还能发挥信用担保的作用，对于征信系统普遍不太健全、信用环境不理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功能是促进网上交易发生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大力发展第三方支付，为网上交易双方提供快捷、安全、可靠的支付手段，对于电子商务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支付宝在中国电商市场的成功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第二，以移动支付满足欠发达地区人们的交易需求。“一带一路”涉及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金融环境比较落后，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普遍较低。许多身处偏远落后地区的人们，往往无法享受到基本的金融服务。基本金融服务的欠缺，往往限制了这些地区商业活动的发展。这些地区即使有资源、特产可以和外界进行交换，但由于缺少基本的支付清算手段，而难以通过商品贸易改善自身生活。移动支付则能够为这些偏远地区的人们带来福音。由于即使在偏远地区，手机的普及率也远远高于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因此移动支付为每个拥有手机的人都能提供支

付结算等基本的金融服务，大大扩展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从而使每个人都不会因为缺少支付手段，而错过商业机会。M-PESA这一移动支付方式在肯尼亚的大获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证。只需要一部手机，并注册到肯尼亚移动通信运营商Safaricom的M-PESA服务，用户就可以在几秒钟之内付费，不需要现金，不必前往银行排队。这项服务允许用户和企业没有现金和银行账户就可以进行支付，因此在金融服务不发达的肯尼亚大受欢迎，其用户已经超过1 700万。

第三，以网络贷款、众筹融资解决小额融资需求难题。在“一带一路”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和我国西部欠发达的地区，往往存在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低收入人士、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往往难以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融资。传统的商业银行体系限于成本、体制等因素，针对这类客户群体的消费金融和小微金融业务往往发展缓慢。而互联网金融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P2P贷款能够通过互联网以极低的成本运营，从而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来满足客户对于小额融资的需求。而基于电商平台的网络小微贷款，则能够根据网上商户的交易数据等信息准确评估客户信用，并在此基础上为小微企业发放快捷便利的小额贷款，为网民网购提供小额消费信贷。此外，众筹融资则为个人创新创业创造了条件，具有创新和创业点子的个人和中小企业，都可以通过众筹的方式向广大的互联网用户进行融资，大大降低融资的门槛，增强了融资的便利性，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创业活动将是极大的鼓励和促进。因此，互联网金融能够为满足低端客户、弱势群体的融资需求提供新的手段，对于实现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民生发展、创新创业活动具有深远的意义。

四、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要利用互联网金融优势，打造网上丝绸之路，涉及政府、产业、金融等各个层面，必须要在政策层面加大统筹和协调，才能促进相关方的紧密配合、通力合作、高效推进，共同打造好网上丝绸之路。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从国家战略高度统筹网上丝绸之路建设。我国应借鉴德国推广“工业4.0”的经验，从战略高度推进网上丝绸之路建设。德国政府在国家“2020高科技战略”中明确了“工业4.0”的发展方向，并由联邦教育和研究部资助行业协会及科研院所制定了“工业4.0”实施建议方案，明确了“工业4.0”的路线图，大中型企业积极参与共同推进实施“工业4.0”，形成了国家倡导、产学研合力推进的良好局面。我国也应从国家战略高度，明确建设网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方向，将网上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同推进，使线上和线下丝绸之路形成有益互动，发挥最大的协同效应。同时，政府也应牵头各界制定网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路线图，明确政府部门、企业界、学术研究界的不同分工，统筹各方力量共同推进网上丝绸之路建设。从具体政策上，国家可以通过优惠政策、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参与网上丝绸之路建设，同时加强国内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网络的普及，加强网络的互联互通，为网上丝绸之路建设打好基础。

第二，坚持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构建互联网金融生态的规制体制。互联网金融对于打造网上丝绸之路至关重要。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服务形态，具有互联网和金融的双重属性，并且具有跨业跨界经营的特征，有着不同于传统金融的经营特征和风险特征，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规制体制，才能保障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应从国家战略层面，从立足打造网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建立一个涵盖互联网金融生态发展所涉及的工信部、一行三会、发改委等

相关政府部门在内的规制体制，确定有效的治理架构，并制定总体的发展规划，实现各施其责、高效有序的规制。

第三，构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金融生态跨国司法体系。互联网时代，资金是没有边界的，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互联网会超越一个国家主权管辖范围，阿里巴巴集团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点。随着网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互联网金融在相关国家的普及和推广，传统国际金融法律规范在调整国际互联网金融新秩序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盲点和空缺，跨境的互联网金融交易行为亟须新的法律规范调整。为了推动互联网企业包括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全球的发展，应当从国家层面采取积极措施，构建有利于互联网企业发展的跨国司法体系，包括跨国民事诉讼、国际仲裁、国际执行、其他国家法律查明等制度。

第四，建立行业规范标准，促进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互联网金融属于新兴金融领域，很多相应的行业规范标准尚未建立。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逐渐发展，需要建立相应的规范标准，才能促进互联网金融真正实现互联互通，并保持稳健安全运营。首先，应建立互联网金融的技术标准，确保互联网金融能够实现互联互通，才能发挥互联网金融服务无边界的特性，使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够服务“一带一路”沿线的广大地区和民众。其次，应建立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标准，使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规可依、有法可依，确保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另外，还应建立互联网金融的安全标准，防范病毒感染、黑客攻击、系统崩溃、隐私泄漏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互联网金融成为网上丝绸之路可靠的金融服务手段。

“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

俞平康 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

中国推新版“马歇尔计划”支持中国经济的“走出去”战略，设立规模达400亿的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以及我国相关西部、东南部省份的基建、能源、金融合作等方面提供融资支持，达到输出国内过剩产能，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目标。

经投入产出模型严格计算后，我们认为：

1. 中短期内，“一带一路”有助于消化过剩产能，但对推动本国经济增长效益不大。以投入产出模型计算，1单位的基建投资将拉动上游相关产业1.89个单位的生产扩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上游产业，1单位的基建投资可以推动下游产业3.05个单位的生产扩张。“一带一路”将有助于国内部分行业如钢材、水泥、煤炭等过剩产能的消化，因为虽然1单位的投资走了出去，但是1.89个单位的生产还是源自于国内的。然而在“基建走出去”的情况下，1单位的基建投资对下游产业所产生的3.05个单位的推动效应就完全贡献给了国外，而不是推动本国经济。

2. 中长期内“一带一路”助力亚太经济一体化，战略意义重大，且有助于我国外储投资方向多元化。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带动区域间贸易活动的增长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通过充分利用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做到贸易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促进区域间资源的合理配置。此外，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着眼于能

源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将带来经济体外延的扩张。同时，此战略有助于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投资方向的多元化。

3. 与美国“马歇尔计划”不同，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对世界经济具有更广泛的经济效益。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不同，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一种更无偿的“赠予”，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更加显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主要资金都用于购买最终产品进行消费，而这些最终产品又多数来自于美国，对于美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而中国的“马歇尔计划”采取基建输出的方式，基建投资作为中上游产品，其产生的引致投资、引致消费的结果完全留给了“一带一路”的沿线地区，因此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确实会繁荣一路、富强一带，这是中国赠予地区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

4. “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循序渐进地展开，加强危机应对机制，并在海外援助中增加对中国下游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地缘政治十分复杂，并且从中国多年开发欧亚的经验来看，有必要保持较高的军事水平应对海外投资可能面对的多方困难。对外的基建输出仍应当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在资金的投放上采取“试水”的态度，充分保障投资的回报率。同时，借鉴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我们在今后的海外投资和援建中应增加对我国下游产品的需求，扩大海外投资和援助对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

在现阶段国内经济缓慢筑底，国内需求相对疲弱的局面下，“一带一路”为国内部分产业中短期内消化过剩产能和去库存提供了契机。依托于港口、公路建设公司等投资主体，通过“走出去”战略，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运营管理收回部分的投资收益。

一个仔细计算过的数字胜过千言万语，我们可以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来理解“走出去的基建投资”具体有何效应，该方法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列昂惕夫创立，主要贡献在于可以测量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

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而对产业结构及国民收入的构成做出合理判断。

投入产出表的系数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某行业对其上游行业的总需求的拉动效应和对其下游行业的总供给的推动效应的测量方法。经过仔细计算，我们获得了各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拉动效应）和完全分配系数（推动效应）。下表列出了基建行业和房地产建筑业两个大行业的系数。其中，与基建相关行业有6个（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房地产建筑业相关的行业有两个（房地产业，建筑业）。

行业	拉动效应系数	推动效应系数
基建行业	1.89	3.05
房地产及建筑业	2.11	0.18

在拉动效应方面，1单位的基建产出将拉动上游相关产业1.89个单位的生产扩张，这个效应可能更大，因为我们在这里仅囊括了6个基建的相关行业，但大体上基建投资与房地产业的拉动效应是相当的，或者说略低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从中短期内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导致的“走出去的基建投资”将对国内部分行业如钢材、水泥、煤炭等的去化产生积极作用，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虽然投资走了出去，但是生产还是源自于国内的。

在推动效应方面，主要指该行业对于下游生产所激发的总供给，例如1单位的基建产出将总体推动3.05个单位的供给的扩张，这集中体现了基建作为上游产业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用。相对而言，房地产作为下游产业，推动效应就小得多，这是符合经济直觉的。然而在“基建走出去”的情况下，基建行业这一部分的推动效应对我国经济而言就损失了，因为基建投资发生在国外，推动效应也发生在国外。我们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就描述了基建作为供给所能给其他行

业带来的推动效应，若是道路修在国外，虽然修路所用的设备、材料对我国经济仍然有拉动作用，但我们就无法同时享有道路的使用给当地经济带来的推动效应了。

中长期内“一带一路”助力亚洲经济一体化，战略意义重大，有利于外储投资多元化

虽然损失了基建投资带来的推动效应，但“一带一路”在中长期内的战略意义仍然可圈可点，因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将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首先采取资本的输出引领亚洲经济的增长，从而带来区域间贸易活动的增长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通过充分利用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做到贸易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促进区域间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一点与欧美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是十分类似的。例如，美国和加拿大在“二战”中基础设施受损最小，他们比战前要繁荣得多，但是出口贸易只占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马歇尔计划”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援助被欧洲用来从美、加处购买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这就促进了区域间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一带一路”战略也将使中国自身从这一类似的路径中受益。

第二，中国的“一带一路”着眼于能源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将带来经济体外延的扩张。这些基建投资，尤其是后续的运营，将带来与国外更多的能源领域的合作机遇，这将会回补常年以来我国经济对于部分能源的议价权方面的劣势，而对外的投资也将逐渐带来国防外延的扩张。

第三，“一带一路”的基金融资来源中我国外储占比在65%以上，这有助于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投资方向的多元化。基建投资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基础上，长远看可能实现比美国国债更高的收益。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与美国不同，对世界经济具有更广泛的经济效益

“二战”结束后，为消化美国在战时的过剩产能，美国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马歇尔计划”，将庞大的资本输出到欧洲，刺激消费品、就业市场复苏，拉动欧洲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潜能，进而带动美国出口贸易，并且增强了欧洲地区对美国中枢的向心力，奠定了美国的战略地位。美国输欧的资金总量为131亿美元（赠款90%、贷款10%），其中88亿美元流入货品采购，27亿美元进入原料市场，16亿美元流入工业机械领域。

欧洲经合组织（OECD）的前身在美国援助款项的分配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求必须以各国的资源、生产指标、进出口贸易、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等为依据，进行某种程度的跨国调节，因此“马歇尔计划”无形中促进了西欧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形成了实际上以美国为核心，各国依据美方统筹进行经济重建的机制。

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不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种更无偿的“赠予”，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更加显著。理由是美国“马歇尔计划”虽然主要为赠款，但主要资金都用于购买最终产品进行消费，而这些最终产品又多数来自于美国。由于欧洲国家在“二战”中耗尽了外储，“马歇尔计划”的资金援助几乎是他们从国外进口商品的唯一资本。在计划最初，进口最多的是必需品——比如食物和服装，而在后期消费方向转向了重建所需物资——这也是“马歇尔计划”最初的用意所在。关键在于消费品属于下游产品，被消费后不再对欧洲产生效益，但从投入产出模型可以看出，它们对于美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却是十分显著的。服装业对上游产业的拉动系数为2.57，即购买1个单位（例如，美元）的服装能拉动美国上游产业2.57个单位的产出。而1个单位的服装仅能推动欧洲当地产业0.87个单位的产出。这与基建投资有天壤之别。

而中国的“一带一路”采取基建输出的方式，基建投资作为上游产品，若投资于国外，其产生的引致投资、引致消费的结果并没有留给中国，而是留给了“一带一路”的沿线地区，因此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确实会繁荣一路、富强一带，这是中国赠予地区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

“一带一路”必须循序渐进地展开，加强危机应对保障机制，并增加海外援助中对中国下游产品的需求

“一带一路”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注意到三点。

其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基建投资收益有赖于后续军事保障。美国“马歇尔计划”有充分的军事保障。美国作为“二战”后第一军事强国，需保障经济的后花园欧洲与苏联对抗。当今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式十分复杂，从中国多年在欧亚开发的经验来看，必须对海外投资可能面对的多方面困难有充分的准备。

其二，循序渐进的原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对外的基建输出也应当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在资金的投放上采取“试水”的态度，充分保障投资的回报率；在地区选择上，可以选择试错成本较低，国际关系相对良好的国家首先进行合作。

其三，借鉴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我们今后在海外的投资和援建计划中，可以增加对我国下游产品的需求的比重，用以扩大对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

以长效机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给了世界一个合作共赢的宣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相连相通。它将为世界架起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也必将为全球合作发展提供新契机。

“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赋予古老丝绸之路崭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将与沿线各国迈向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开创更加美好的新未来。“一带一路”构想实现后，将构建起时间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沿线各国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上升期，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

“一带一路”将推进沿线各国互相对接发展战略，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将给中国海外投资和企业“走出去”带来历史性机遇。过去10年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年均增长19%，高出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4个百分点；中国企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

各国的直接投资额从1.8亿美元扩大到86亿美元，年均增加54%。这充分表明共同投资与合作的潜力巨大。

中国将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探索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调整和变革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建设将再一次唤醒沿线各国对经贸文化交流的热忱，有利于共同塑造世界人民世代友好的新秩序、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中国将与沿线各国共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风险，顺应国际社会对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新期待。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将实现动力机制、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管理方式的重大转换，使中国继续成为充满活力和最具潜力的经济体。中国愿意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分享发展的机遇，满足世界特别是沿线各国的新期待，和平发展、惠及各国。

中国将与沿线各国形成国际国内互动、互通、互补的跨国界大区域和次区域的新布局、产业新动力、合作发展新格局。“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将改变长期以来产业布局仅限于国内现有区域和资源条件的状况，真正做到以外带内、以内促外、内外联动、内外一体化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以外部通道建设加快内部各主要经济区域联系和整合，改变西部内陆地区区位和空间劣势，把西部地区、珠三角和东南亚地区横向连在一起，推动形成具有跨国境要素集成能力、市场辐射能力的我国区域和产业发展新布局。

“集体大合唱”有望“歌声嘹亮”

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集体大合唱”的歌声越来越嘹亮。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我们可以梳理出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经济通道和廊带的大致方向：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方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进一步推动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将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和共同发展之路，与沿线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较快进展：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沿桥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部分东部沿海港口及若干内陆城市为起点，以港口后方铁路为通道的多条亚欧国际运输线路。新亚欧大陆桥将成为连接欧亚的重要通道。

——中巴经济走廊。2013年上半年，中巴双方启动中巴经济走廊规划建设事宜。双方都在积极推进喀喇昆仑公路、加达尼和塔尔能源项目、瓜达尔港口运营、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等项目，加快建设中巴经济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积极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并向西北延伸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进入欧洲，形成第三亚欧大陆桥。逐步形成泛亚铁路网的西线经济走廊，将中国经缅甸与泰国、马

来西亚、新加坡乃至印尼连接起来。云南是中国唯一可以同时从陆上沟通东南亚、南亚的省份，将是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战略节点。域外的曼德勒、吉大港等也是重要节点。

——中蒙俄经济走廊。目前蒙古正加紧规划建设连接俄罗斯、俄罗斯太平洋港口的铁路运输网。建设与之连接的经济走廊，形成更紧密的中蒙俄合作发展格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当前重点是共同建设哈尔滨—满洲里—俄罗斯—欧洲路径，以满洲里、绥芬河口岸对接俄罗斯和欧洲市场，拉动欧亚经济带沿线共赢发展，盘活俄方铁路沿线、港口，形成辐射或连接我国沿海各港口和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海铁联运和陆路货源地，同时为日本、韩国经我国海铁联运过境出口欧洲（俄罗斯）货源提供新通道。

沿线国家和地区将共同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逐步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预计将有几个重点区域较快见效：

——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质量和标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可以进一步发挥地缘优势，在农业、渔业、能源、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加强对话和合作，建立和健全地区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提升东盟与中国产业在全球的竞争能力。建议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争取到2015年双方双向贸易额达到5 000亿美元，今后8年双向投资1 500亿美元，力争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让东盟国家更多从区域一体化和中国经济增长中受益。

——中国—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正日益成为全球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以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重要切入点，可以辐射南亚地区。近期内应重点提升中巴自由贸易安排水平，启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机制，建设昆明—曼德勒—达卡—加尔各答的铁路或高速公路。打通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以

及中国云南与缅甸皎漂港的交通线，使中国与中亚、南亚经贸关系更加畅通。

——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海合会是西亚最重要的区域组织，由西亚社会最稳定的国家组成，通过海合会辐射西亚地区是理想选择。重点是推动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尽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中国与海湾国家合作由能源领域转向产业链合作，加强双方在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与阿联酋合作建设迪拜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

——中国—欧盟。欧盟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中国与欧盟合作的重点方向，是推动中国—欧盟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争取尽快启动中国—欧盟自贸区谈判，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自贸区战略。全面深化中欧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提高中国与欧洲区域合作的水平，争取使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

——提高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的合作水平。力争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2 000亿美元。中国与俄罗斯签订的一系列战略合作决定，特别是未来20年能源合作的4 000亿美元大单和东西线输油管道实施，将使中俄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与中亚经贸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重点，已经开创了良好局面。“一带一路”将使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经贸关系更加密切。

沿线国家和地区将共同推进和深化金融合作。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了50多个国家响应。金砖国家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金融机构也在筹建之中。“丝路基金”将发挥独特作用。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步伐正在加快，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亚洲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正在推进。中国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

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日益紧密，正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将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

沿线国家和地区将形成产业互补互动的新格局。“一带一路”将全面系统地提升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共同营建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核算体系与政策环境。应重点建设一批跨境工业开发区、产业园区和农业示范园区；鼓励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到沿线国家设立研发中心；设立海外营销和服务网络，实现产品价值链向高增值的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环节延伸；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产业合作；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深度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

沿线各国的民心将日益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民心相通要提升文化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还要消除文化障碍，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同“一带一路”发展的广阔前景对接起来。

国内区域经济新布局前瞻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重塑国内区域经济布局。

新疆、福建分别是建设“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新疆位于亚欧大陆中部，把其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可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源地，昔日东方大港——泉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海丝”起点。将福建作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将从历史积淀中汲取营养，全方位强化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

全面部署国家“一带一路”节点和高地。

——从西北、东北地区看：除新疆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亮点频现。西安为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宁夏是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兰州、西宁将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内蒙古拥有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成为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从西南地区看：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云南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开展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将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

——从沿海和港澳台地区看：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通过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舟山群岛新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都将成为“一带一路”新增长点。

——内陆主要从三方面与“一带一路”对接：

依托长江经济带，对接“一带一路”。以海陆重点口岸为支点，形成与沿海连接的西南、中南、东北、西北等经济支撑带，推动长江经济带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于构筑H形经济大格局。要积极构建流域、陆地、海上、空域等综合交通体系，以黄金水道贯通长江沿线11个地区，实现东中西联动。推动新的“中三角”变“平”，推动各种要素自由流动，使皖江城市带、成渝经济区、黄河金三角区域、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北部湾经济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更好地协同发展。

依托中国五大港口群，全面对接“一带一路”。目前，我国港口运输行业已初步形成环渤海、长江三角洲、海峡西岸、珠江三角洲和北部湾等东南沿海5个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港口群体。战略节点城市与五大港口群可充分对接“一带一路”，积极拓展沿海港口集疏运功能，谋划建设向西、向北的国内乃至国际大通道，使沿海港口成为新丝绸之路的重要出海口。特别应关注阿拉伯世界中的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三条海上通道不仅是我国商品出口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石油进口的主要通道，关系我国国家利益在国境之外的延伸。同时，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瓜达尔港、关丹港、比雷埃夫斯港、科伦坡港、亚丁港、塞得港、雅加达港、新加坡港，通过一系列交通体系建设，打破现有世界经济地理格局，重构全球性物资运输网络。

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进行重点交通、环保和产业对接，将使三地经济发展融为一体，形成世界级大城市群和大首都经济圈。这将使北京和河北腹地不仅成为沿海地区，而且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节点和支点。

逐步形成“一带一路”建设体制化、机制化安排

建设“一带一路”，要促进各方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能源共享等多领域形成广泛持久的合作机制。

——充分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创新多边合作方式。在“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进程中，应充分利用、整合和对接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如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亚欧会议等。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

——完善双边合作机制，有效地进行重大规划和项目对接。与沿线国家建立和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现有的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与沿线国家共同推动合作项目实施。对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双方可共同编制“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确定双方合作的领域、项目、投资主体等内容，尽早建设一批取得积极成效的合作典型项目。

——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通关机制，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各国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与沿线国家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达到“一次通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便捷通关目标。推动与沿线国家海关监管和检验检疫标准互认，实现检验检疫证书国际联网核查，推进海关监管制度创新，支持跨境电子商务、边境贸易、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型贸易形式发展。

——继续深化和利用好现有合作平台机制，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务实合作。通过对有关机制进行补充，加强规则的制定与对接，形成照顾各方利益的柔性联动机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同时，要充分利用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中国与东盟“10+1”，全面加强“一带一路”下的双边、区域、多边合作机制。

——强化政府间合作交流机制，带动多方面推进“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一带一路”构想能否实现并持续健康运行，取决于各国参与的内在积极性。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诉求各异、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对沿线国家应一国一策，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实做细政府间合作。同时，应注重发挥我驻外使领馆和国内外智库的作用，有分工地加大国别研究，密切关注各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反应，收集各国的合作意向、项目建议，跟踪反馈项目执行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一带一路”全面优化我国发展战略环境

王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针对日益复杂的内外部挑战，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推动沿海内陆开放，致力于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多领域合作交流，促进共同繁荣进步而实施的一项全局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共识和支持响应，这是因为，它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与沿线各国求和平、谋发展的诉求高度契合，与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时代要求不谋而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生动体现。“一带一路”战略既符合现阶段我国现代化、全球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也与沿线国家的发展利益高度契合，对促进区域内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意义重大。同时，对我国营造更加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刻背景和内涵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但发展与变革、冲突与危机、竞争与合作交织并存。全球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调整变革之中，新一轮技术革命孕育突破，对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地理将产生深刻影响。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将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

杂深刻的变化，大国之间围绕地缘政治、经贸秩序、国际规则制定等的角逐日趋激烈，海洋、太空、网络、极地等新兴战略领域日渐成为竞争热点，全球治理格局深度调整，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资源安全等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趋于强化。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自身日益成为影响世界格局调整的关键力量，全球发展的中国因素越来越举足轻重。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呈现出新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传统需求拉动力减弱，投资、出口增速明显回落，住宅、基础设施、制造业需求增速大幅放缓，新的消费热点仍在培育之中。传统要素供给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人口红利效应减弱，投资边际收益下降，技术进步速度减慢。与此同时，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积累的风险逐步显现，房地产、产能过剩、金融信贷、地方债务等风险不断累积，必须审慎应对。社会矛盾日渐突出，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区域二元分割，社会治理机制不健全，社会公平正义受到挑战。生态环境形势不容乐观，自然生态系统退化，雾霾频发，水、土壤污染严重，能源资源低效粗放利用的局面仍未改观。

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全局，着眼未来，统筹内外，系统谋划，着力营造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内外环境，着力拓展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要素空间，着力提升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能力，着力加强生态环保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深刻背景，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战略是新时期我国统筹陆海开放、协调东西开放，深化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贸、人文、科技、生态等多领域合作交流的形象概括，是对2100多年来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是在新形势下中国与沿线各国共同倡导和提供的一项重要全球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在促进沿线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

同时，也有助于构建经济融合、文化包容、政治互信的紧密合作关系，增强维护和平发展的战略能力；有助于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增强全球化资源配置和管理开放型经济的能力；有助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拓展发展空间，增强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能力；有助于加强生态环保的国际协调协作，增强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有助于参与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增强全球治理格局的能力。

“一带一路”推动全面优化我国发展战略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于我国拓展战略机遇期、谋划发展新格局，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十分关键，对于我国优化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

一是有利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亚太地区日益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博弈的重点和热点地区，我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然而，客观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旋律，现阶段亚太地区爆发大规模对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国情相似，发展阶段相近，经济互补性强，利益交集点多面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愿望都十分迫切。因此，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合作，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促进要素资源优化配置，释放沿线各国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在交流合作中构建命运共同体，进而拴牢利益纽带，深化战略互信，形成和平、稳定、和谐的周边环境。

二是有利于构建宽松有利的经济环境。经济新常态下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必须优化需求结构、拓展需求空间，促进内外需、进出口、

“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近年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速明显回落，2014年，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出口和进口总额分别增长3.4%、6.1%和0.4%，增速继续放缓。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规模已接近平衡。适应新形势，必须持续扩大出口和增加进口，巩固出口市场份额；同时，应改善投资环境，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对外投资效率和质量，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合作，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国与沿线各国的经贸关系，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优势企业“走出去”开拓市场，在促进沿线国家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从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两个方面拓展了我国发展空间，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创造了更加充分的条件。

三是有利于形成高效协同的区域环境。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事关经济社会全局。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已有明显优化，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质量差异较大，区域同质化竞争、产业同构化严峻，部分地区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已近极限，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能够不断深化向东开放，加快扩大向西开放，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水平，完善全方位主动开放格局，把内陆地区邻近“一带一路”国家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力，推动东中西部协调发展。这是对我国现有区域经济格局的总体优化和战略提升，将有助于构建内外统筹、南北互动、东中西协调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四是有利于打造和谐包容的人文环境。不同国家、文明、民族、个体之间深入的沟通交流，对于维系良好的合作关系、增进相互理解信任、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摩擦系数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曾有过辉煌灿烂的交流历史，近现代以来，亚欧大陆地缘政治复杂多变，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与对立屡见不鲜。“一带一路”战略合作，秉持古老丝绸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共赢的精神，

赋予其平等、包容、互鉴的时代内涵，通过全方位的文化、艺术、旅游、学术、医疗、科技、媒体等合作，努力实现民心相通，巩固和扩大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努力促进中华文化与各国优秀文化的互学互鉴，不断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为我国发展构建和谐包容的人文环境。

五是有利于维护绿色永续的生态环境。近年来，随着人类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全球范围内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地方都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而且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有助于推动沿线国家把加强生态环保国际合作提上议事日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多领域的生态环保科研活动，加强海上合作，推广节水农业，妥善处理跨界河流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问题，推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共同探索绿色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几点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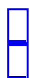
“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我国顺利推进现代化、成功迈入高收入社会具有全局意义。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建议关注以下方面：

一是把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放在突出位置。“一带一路”战略涉及东中西部十几个省份，各具特色、各有比较优势。其中，东部沿海省份应积极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更加深度地融入全球分工、更高层次地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形成引领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对于众多西部省份，一方面应发挥区位优势，为我国企业深化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合作搭建平台；另一方面应苦练内功，着力提升自身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层次，加快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经济增长

新动力。应特别避免以“一带一路”为题材，简单重复“招商引资”，铺摊子、上项目的老路，而忽视了以开放促改革、促转型的战略意图，从而贻误战机、贻害无穷。

二是科学评估、有效防范投资风险。“一带一路”战略规模宏大、涉及面广、牵涉复杂的战略利益，推进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着许多风险和挑战。例如，一些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大国竞争激烈，将对大规模对外投资和项目建设带来潜在风险；一些地区投资环境尚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足，对企业投资、资金、人员往来带来较大不便；部分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履行社会责任存在缺陷，具有风险隐患。同时，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仍在完善之中，对外投资风险预警和应急管理机制尚不健全，信息渠道、人才储备、应急管理能力都有待提升。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投资风险，加快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在稳妥、审慎的前提下循序渐进扩大对外投资。

三是全方位深入推进人文交流。把深化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提高到事关“一带一路”战略成败关键的位置。可考虑在“一带一路”总体规划下，制定实施人文交流专项规划，统筹协调已有各类人文交流渠道，系统规划、形成合力。应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弥补中外人文交流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增进对中国发展道路和价值观的理解认同。应创新合作方式，注重发挥地方和民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重互联网等新媒体手段应用，考虑设立“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专项基金，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人文交流中的积极作用。



第五章
丝路经济带，重建亚欧大陆桥

新丝路经济带：谁将扮演当代的“张骞”

阎海东 中国网络电视台央视网记者

公元前138年与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不但全方位地了解了中西亚及南欧地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而且使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力投射到上述地区。张骞带回的大量政治经济及社会信息，成为汉武帝调整对中西亚政治战略的根本依据。张骞的两次“凿空之旅”，很快激活了中国与亚欧大陆广袤地区的商贸活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也由此发生改变，由中国主导开拓并跨越两千年历史的陆上“丝绸之路”就此开启。

汉王朝对丝绸之路的开拓不仅仅停留于张骞开拓的两条路线。张骞之后，班超便将丝路延伸到欧洲直达罗马，至此，中国到达欧洲的商路完全接通。而此前旨在对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已基本建立，远达马来半岛及印度。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以其无可取代的国际交流和商贸作用一直延续到元代，世界也因此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辉煌。公元14世纪，因被称为“明清小冰期”的气候变化，横贯亚欧的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落。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沟通欧亚大陆的东西大道称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随后被世界广泛接受。

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9日来到位于德国西部北威州的杜伊斯堡港参观，目睹了来自中国的满载货物的列车进站。杜伊斯堡港是世界最大的内河港和欧洲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也是由重庆经新疆跨欧亚直至欧洲的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的终点。这趟历时16天、

行驶上万公里的列车从重庆出发，经过新疆进入中亚，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最终抵达德国的杜伊斯堡，其路线基本与传统的亚欧大陆丝绸之路重叠，而其沿途所经过的地区，便是被我国近年来在战略上高度重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条连接中国和欧洲的国际铁路动脉，成为现代版“丝绸之路”的又一个载体及中欧经贸合作广阔前景的象征。

习近平在杜伊斯堡港表示，中方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秉承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联动亚欧两大市场，赋予古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造福沿途各国人民。

全球视野下的丝路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辐射40多个国家，人口总量为30亿，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其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目前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高度重视这条丝绸之路的复兴。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习近平的这一倡议得到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的热烈呼应。这一计划将让亚欧经济共同体走向深度融合，由此形成的新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必将再度深刻影响世界。

此后，习近平三度在重要出访中倡议构建新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

要理解中国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战略意义，就不得不先了解一下美国政府于2011年7月正式提出的美国版“新丝绸之路”计划。美国版“新丝绸之路”集中反映了美国在中西亚地区最新的战略构思。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几乎是与美国重返东亚及其亚太战略同时提出的。美国积极重返亚太一个引人注目的动作便是主导形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一“高标准”的小型自由贸易组织，这一旨在重树美元信用体系的组织平台所涉及的经济体将占据全球一半的GDP和40%的贸易份额。最为微妙的是，这一地区自由贸易组织目前却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外。

而在美国版的陆上“新丝绸之路”设计中，美国则试图主导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南亚，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这一“新丝绸之路”不是指一条路线，而是指在美国主导和支持下形成广泛的地区交通和经济的联系网络，使中亚、阿富汗、南亚地区成为共同的经济市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意图明显。但美国“经营”阿富汗失败，使得美国版“新丝绸之路”计划目前无法有效实施。与此同时，俄罗斯也表示其应在“新丝绸之路”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过，中国目前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十分活跃，这一有利形势，为我国与中亚建立紧密联系创造了条件，是我国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重要契机。

2013年10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新丝路的承载者

经济全球化时代，横跨亚欧沟通世界贸易的路桥建设之意义重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欧亚大陆桥经营并不是近年来才开始的。早在1990年，横穿中国大陆、东西贯通的第二亚欧大陆桥就正式开通，这条被称之为“新亚欧大陆桥”的铁路由陇海和兰新铁路与哈萨克斯坦铁路接轨，东起连云港，向西经陇海铁路的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天水等站，经兰新铁路的兰州、乌鲁木齐等站，经北疆铁路到达边境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斯坦，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至荷兰鹿特丹港。新亚欧大陆桥是目前亚太经济圈至欧盟最为便捷、性价比最高的通道，几乎辐射了中国东西部重要的经济区域。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对中国与世界经济贸易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巨大。

2011年3月，以重庆为起点的第三亚欧大陆桥“渝新欧”正式开通运营。“渝新欧”的开通极大地弥补了第二亚欧大陆桥无法辐射大西南的缺憾。渝新欧铁路经达州、安康、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向西过北疆铁路到达我国边境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斯坦，再转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至德国的杜伊斯堡，全程11 179公里，不远的将来将直接连接欧盟总部所在国比利时。渝新欧铁路的巨大现实意义正在凸显：一个辐射我国南方及东南亚的大物流圈由此建立起来。目前从中国南方如上海、广州到欧洲，海运一般都要36天才能到欧洲，而通过渝新欧铁路，从长三角、珠三角到重庆只需2天，从重庆到欧洲需12天，时间大大缩短。而南亚丝绸之路的谋划，将更广泛地辐射我国西南地区。

新亚欧大陆桥沿途所通过的区域，在经济上有着较强的相互依存性与优势互补性，互利合作前景相当广阔。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能源极为富集，煤炭储量2万亿吨以上，石油储量约1 500亿吨，天然气储量近7 500亿立方米。

进入21世纪以来，该地区成为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大国注意的焦点，美国屡屡在该地区显示自己的存在。而由于能源贸易，中亚各国也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活跃地区。近年来中亚四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处于高位，而中亚通往中国的能源运输管道，更是对双方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的“能源丝路”。2008年以来，中国的中亚能源路线图渐明，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能源合作由此越来越密切。从目前的现实来看，中亚能源并没有按照美国的设想输往印度洋，也没有按照欧洲的设想输往欧洲，而是输往中国。专家认为，这种基于能源的贸易沟通，对地缘政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基于有利良好的地缘优势，中国同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彼此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专家分析认为，这首先源于双方高水平的政治互信。能源合作是战略性合作，没有良好的政治互信根本无法顺利开展。长期以来，中国对中亚国家坚定奉行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政策，同中亚五国全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同四国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这种相互信赖的密切政治关系成为双方能源合作的独特优势。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四国。在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强调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创造现代化、多方位、立体的丝绸之路的重大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预期将极大地改变目前亚欧大陆经济发展“两头高中间低”的现状，极大地促进沿途经济的整体发展。目前，中国与中亚各国贸易额达400多亿美元，与1992年相比增长了近100倍。

西欧板块是“一带一路”的突破口

赵磊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一带一路”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在文明层面，它正在弥补中欧之间的认知鸿沟。在中国人眼中，西欧不再是古老僵化的“城堡”；在西欧人眼中，中国不再是刻板古老的“城墙”。世界中心也许会逐渐由以“美国—大西洋—欧洲”为核心的“基督教文明圈”开始转向以“中国—欧亚腹地—西欧”为核心的“多元文明圈”。就“一带一路”规划的落地而言，西欧板块值得期待。

亚投行的成立使西欧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朋友圈”，可以看出西欧国家高度重视中国市场、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机遇。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西欧国家不知道如何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中国的城市和企业不知道如何开拓“西欧板块”。对此，既要去弥补双方的认知差异，也要去弥补需求差异。就需求而言，中国城市和企业要首先明白的问题是：中国向西欧卖什么，中国向西欧买什么？对西欧国家来说，也要思考同样的问题：什么样的西欧对中国有吸引力。当然，西欧国家不是一个整体，各有各的竞争优势和利益需求，中国要做到游刃有余，必须先知己知彼。

“优势产能高度同质”的法国

法国是西欧面积最大的国家，5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新疆三分之一的面积大小），约为欧盟面积的五分之一。法国的优势产业有民用核能、高速铁路、航空与航天等。今天，核电以及高铁是中国企业率

先“走出去”的“优势产能”，但是这两块“金字招牌”也是法国经济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毋庸讳言，中法之间存在同质化竞争关系。

对法国而言，“法国制造”有两个层次，一是以幻影战机、高速列车以及核电站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二是以香水、名包等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与时尚产品。在第一层面，高调“走出去”的中国高铁与核电无疑对法国形成了相当大的竞争压力。

但是，“丝路经济”的本质不仅仅是竞争，更强调资源整合基础上的包容共进。以法国高铁为例，需要中国“鲶鱼”激发活力。法国高铁TGV，是由阿尔斯通公司和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设计建造并由后者负责运营的高速铁路系统。1981年，巴黎—里昂高铁专线投入使用。这是继日本新干线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投入运营的高铁线路。

由于在欧洲运营最早，法国高铁的多项标准一度成为欧洲高铁技术的基础，法国高铁至今仍是列车行驶最快速度的保持者，法国成为有欧洲高铁话语权的国家。例如，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欧洲之星”等列车无不是法国出产。因此，TGV一直以“法兰西骄傲”著称于世。

但是，在日益竞争的全球高铁格局中，法国高铁昔日独领风骚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一方面，除传统竞争对手如德国、日本外，韩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新兴力量日渐强大。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价格已取代速度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因素，法国高铁的乘客日渐稀疏。

因此，中国高铁同法国高铁合作具有战略意义，首先法国高铁不仅是中国高铁的老师，也是欧洲其他新兴高铁市场的老师，中国有很多技术来自法国；另外法国更了解欧洲市场，中国需要借助法国的人才与经验去开拓欧洲市场。在这方面，中国的高铁市场要对法国开放，法国的高铁市场要对中国开放（法国高铁通车里程目前为2 000多公里，未来要把高铁里程扩展到5 000公里，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上

台阶”“进主流”的好机会）。预计，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出现在法国以及西欧国家的高铁、码头、港口、机场、核电等基础设施领域。中欧企业也会一起合作共同走进非洲、拉美，甚至美国市场。

文化产业是法国的另一大优势，也是中国的“硬需求”。法国是全球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是世界文化创意与时尚之都。法国被称为“优雅的霸权”，即法国的文化实力是其最强大的、可持续的动力。中国各地市都非常重视发展文化产业，但目前的起点很低，还基本停留在“卖门票”的阶段。因此，除高铁、核电外，中法两国可以在文化创意产业、旅游服务业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建议两国在丝路节点城市建立“中法文化产业园区”，孵化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各类企业，提升中国企业以及城市的文化品位与艺术气质，让丝路城市带有浓浓的“香水味”。

“重商主义”与“人文主义”并重的英国

24万平方公里的英国（相当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面积大小），兼具“重商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重性格。“重商主义”来自英国略显被动的地缘条件，缺乏资源必须灵活务实地寻找经济上的合作伙伴。“人文主义”来自英国“推崇渐进主义的民族性格”，不轻易破坏什么，而且重视传承。所以，英国至今没有“国庆节”（National Day），但英国在文学领域有莎士比亚、在科学领域有牛顿、在经济学领域有亚当·斯密、在自然科学领域有达尔文……，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海德公园等景点成为英国“人文主义”的标志。

英国重视中国不是背弃美国，而是“重商主义”基因使然。英国需要中国的投资去“更新”老旧的“世界工厂”和基础设施，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在英国更受欢迎。最近，笔者在伦敦与英国政府政策

内阁部长奥利弗·莱特文交流，部长曾是牛津大学教授，他直率地表露：英国希望中国各类企业加大对英投资，以升级英国制造业水平，从而将产品出口到中国。可见，全球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中国既是投资的需求国，也是投资的被需求国。

英国加入亚投行，有巩固其国际金融优势的考量。英国是第一个和中国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七国集团成员国。目前在中国之外的人民币支付有62%在伦敦进行。伦敦是全球最大外汇及债券交易中心和欧洲金融中心，而且是主要面向亚洲市场的汇丰银行及渣打银行的总部所在地，这让伦敦在争取成为欧洲主要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方面具有多重优势。“一带一路”有五通建设，其中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而以货币流通为核心的金融支持是重中之重。英国显然意识到，在中国人眼中，英国是有“金融魅力”的；英国人自身也充满了自信，认为世界的四大金融中心，有三大是与英国有关的，即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在目前的城市定位中，陕西等很多省份提出要打造金融中心，据此中国城市的确要利用英国的金融优势以“借船出海”“借力发力”。预计，陕西、上海等地区会主动加强同英国的合作与交流，既包括金融信息发布、金融人才培养，也包括“丝路金融”标准的打造等。

“人文主义”“绅士风度”等吸引着中国留学生远赴英伦。今天，英国大学对中国留学生的依赖程度不断升高。目前，英国大学本科学费不断上涨，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人数显著减少，而中国学生日益激增的出国需求也能够弥补这个空缺。2014年，中英签署了一系列新协议，其中包括旨在未来3年加强中英教育合作的框架协议等。目前，中英教育合作有很多成功的典范，例如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在苏州创立的西交利物浦大学，以及英国诺丁汉大学与浙江万里学院合作创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在中国，很多社会精英都知道英国的“志奋领”留学项目，笔者2010年也参加了英国“志奋领”高级奖学金项目，期间英国主办方还主动安排大家赴比利

时、科索沃等国家和地区实地走访，英方的细致与高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2014年一年，笔者先后去诺丁汉大学和牛津大学，充分感受到中英教育合作的广阔前景。牛津大学的副校长对笔者说，英国教育的宗旨是培育社会的精英意识，即批评性思维、独立性思考、跨学科知识、国际化视野、高度的社会责任。上述精英意识也是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中英人文合作前景广阔。

中英两国要加强“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传媒业在英国相当发达，英国是有传媒话语权的国家，中国有正在崛起的传媒市场。媒体合作的内容可以包括，联合开展问卷调查，了解受众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倾向；联合拍摄纪录片，展现真实的“一带一路”面貌；加强传媒理念与产业沟通，联合培养传媒类人才；全面加强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广播以及各种音像制品等传媒领域的双边合作。笔者在英国访问期间，常常去英国的书店看有没有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很遗憾，在书架上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少得可怜，而且主题常常是“神秘”“异类”的中国，这样的片面知识难以铺设平坦的合作道路。总之，传媒影响力属于文化软实力范畴，理应成为中英两国丝路合作的焦点。

得意“制造业”的德意

有人认为，“欧洲只有两个国家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一个是德国，另一个是意大利。”德国是当今世界第四、欧洲第一的经济大国。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德国经济表现相当耀眼，被称为欧洲危机的“中流砥柱”。“德国制造”是德国的“金字招牌”，代表着品质与卓越。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是世界第一大机械设备出口国，75%的机械设备产品销往国外。在机械设备业32个产品领域中，德国产品在16个领域为世界出口第一。汽车、机械制造、化工医药和电子电气是德传统四大支柱产业。

德国企业成功的秘诀，是高度重视研发，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目前，中国企业的短板是：渐进性创新不少，但突破性创新不够。“德国制造”对中国的启示是：丝绸之路要有产品可卖，就要做真正有品质、有品牌的产品。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国人却要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一则我们的很多产品缺乏品质，假冒伪劣产品太多；二来我们的产品没有品牌，没有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忠诚感和美誉度。就中国企业而言，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要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的尊重与信赖。“世界一流企业”不仅要“做大，做强”，更要“基业长青”，要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伟大公司。德国奔驰诞生于1886年，他的宣传语是“我们不需要去编造一个动听的故事，自从1886年我们就书写了历史”（We do not need to invent a good story - We write history since 1886）。可见“百年老店”的最大财富是时间积淀和信任积聚。因此，致力于“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要有品牌意识，要做有文化的中国企业，要做有社会责任的中国企业。以城市为例，广东阳江是中国“刀剪之乡”，但在广东之外，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美誉”。因此，对阳江而言，“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是升级传统优势产业，要主动同德国进行刀剪产业合作，要打造中国版的“双立人”。总之，中国的丝路城市要学习德国做“精致资源”，而不是“大开大合”。

意大利有“中小企业王国”的殊荣，致力于发展中小企业的中国丝路城市要主动对接意大利。食品、服装、家具是意大利的传统优势产业，俗称“3F产业”。意大利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解决就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小企业吸纳了全国近82%的员工。目前，意大利中小企业发展面临难题。一方面，意大利政府外债缠身，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另一方面，意大利人思想相对保守，骨子里有小富即安的思想，缺少创新的主动性。所以，意大利企业的优势不断被外国企业所蚕食。为此，意大利需要开拓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也要积极对接意大利。预计会有更多的中国中小企业家前去意大利“拜师取经”，意大利也不会放弃这个“有前途”的学生。从某种程度来说，

中小企业是一国经济健康状况的“晴雨表”，也是丝路经济活跃的“晴雨表”。

思考与建议

“一带一路”注定成为2015年世界经济的关键词，在国际社会“热议”的同时也要保持“冷思考”。

第一，不要误读中欧关系。在经济上“亲近”中国，并不意味着西欧国家在战略与安全上“背弃”美国。在经贸上充分合作，并不意味着在人权与价值观上，西欧国家会降低审视或“刁难”中国的标准。西欧国家在人权问题以及西藏等问题上的负面干预仍将会成为影响中欧合作的破坏性力量。

第二，要摒弃“一带一路”的宿命论。“一带一路”既不应被过度政治化，也不易对其贴上“宿命论”的标签，如“‘一带一路’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大的烂尾工程”“‘一带一路’是新版朝贡体系”等。“一带一路”是进行时，成败与否关键看大家怎么做。当大家汇聚智慧、聚精会神重视“一带一路”的时候，它已经成功了一半，成功的另一半是“逐步落地、惠及民众”。当然，中国是“一带一路”成败的关键力量，要首先想清楚建设“一带一路”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如果目标不明，率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先锋会一个个倒下，变成中国企业“先烈”。在笔者看来，“一带一路”不是去“吸血”，而是要“输血”和“造血”，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赢得尊重的国家。

第三，落实推动是关键。对中国政府而言，要尽早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各类信息进行系统整理，动态性地提供给中国城市和企业；同时，要把国内致力于“一带一路”的城市和企业的竞

争优势和现实需求提供给国外相关国家和跨国企业，让彼此都知道发力点在哪里，一是尽量不留盲区，二是加强不同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对外国政府而言，要创造条件和提供便利，组织企业到中国去参加展会或办展，动态性地进行丝路经济的信息发布，寻找满足需求的对口企业。

第四，组建“一带一路”对口城市。对口城市一方面开展大型的产品推介会或者是推动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谈判与合作。另一方面，对口城市要加强人文交流，既包括企业、政府，也包括智库、学者，要先有人气，以思路的活跃推动丝路的活力。今天，欧洲最缺乏的是活力与创新，中国最缺乏的是国际化的人才与经验，两者资源的高异质性也展现出战略合作的高互补性。

第五，加强中欧“一带一路”协调机制建设。最近，中国政府“一带一路”领导小组名单首次公布，其人员构成表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包括经济、政策、民族、外交等多重领域；中国政府会加强力度推动双边和多边项目尽早落地。为此，可在中英或中欧等双边或多边框架下建立丝路协调机制，以期取得早期成果；要尽早建立中欧丝路合作的“样板工程”，以发挥可复制、可推广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总之，丝路魅力的基础是中国潜力。今天，广大的中国民众还没有过上自身所期望的“幸福生活”，所以中国依然有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需求。换句话说，为了“幸福”，中国人依然会加倍努力、会积极消费。结构转型会激发中国国内市场的新机遇，丝路建设会提升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层次，中欧合作对任何一方而言都是利大于弊。

中国—西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

柳思思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研究中心博士

2014年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海合会代表团时提出中国与包括海合会国家在内的西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设想，这是中国政府就跨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进程提出的具体构想，勾画出双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宏伟蓝图。这一构想是对当前中国—西亚区域合作模式的创造性发展，着眼现状又展望未来，以点带面，由线到片，逐步形成复合型、多元化的跨区域合作形式。

中国—西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渊源与背景

“丝绸之路”是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达伊朗，并连接海湾各国，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的历史通道。在这条著名的国际通道上，各国人民、各色人种曾经穿梭其中，五彩丝绸、中国瓷器和香料络绎于途，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上，丝绸之路上来往不绝的商人及驼队昭示了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繁荣与鼎盛，也增进了中国与西亚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友谊。这条贸易通道曾经被誉为世界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欧洲板块与亚洲板块的结合已远超地理上的意义，历史上辉煌的中国和位于亚、欧、非三大陆交叉点的阿拉伯世界都曾经是世界活跃的商业中心，中

国商人与阿拉伯商人跨越辽阔的内陆和海洋，在亚、非、欧三大洲之间交换货物、交流情感，为中国历史上的西汉、唐、宋等王朝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从此走向世界，各国王公贵族均以拥有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为荣。阿拉伯及西域各国的商队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为中国带来了药材、香料、珠宝及各种水果植物。然而，随着19世纪世界工业化的蓬勃发展，世界权力与商业中心向西方转移，相应的，行走于丝绸之路、连接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中国商人、沙漠驼队也逐渐消失，伴随沧海桑田的变迁，岁月也渐渐磨平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痕迹。

从历史回归现实，作为富含文化底蕴的丝绸之路，近年来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明确提出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她还鼓励和敦促印度参与其中，“不仅要向东看，还要继续与东面进行接触，并在东面发挥作用”。随后，该计划在美国和印度国内被紧锣密鼓地摆上议事日程。2011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召开“新丝绸之路部长会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3年10月29日指出：“从东京出发，经过伊斯坦布尔，最终抵达伦敦。日本要做新亚欧丝绸之路的起点、地缘政治的操盘手。”但迄今为止，美国版、日本版的“新丝绸之路”都带有牵制中国或排斥中国的色彩，目标是借丝绸之路谋求这一地区的主导权，没有获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认可，是与古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友好精神相违背的。

中国—西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中国—西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来自于双方高层的重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当前，中国与西亚已在多个方面展开商谈，双方高层取得了初步共识。就中国方面来说，该经济带日渐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关切点，中国企业对外参与的热点，并且得到国家在政策上的重点扶持。就西亚国家而言，美欧施加的重重压力已让他们

不堪重负，“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也使他们开始反思，适时“向东看”与中国合作，共同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合作领域，创造多样化的经济基础，符合西亚国家的利益。

此外，经过多年来的积累，中国—西亚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的合作基础，特别是在与对方国家经贸交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一方面，中国推动跨区域经济开发与合作的力度不断增强，中国知名企业在资本、技术、信誉等方面都严格参考国际化标准，不少成为开发、运输、国内销售和对外贸易一体化的超大型跨国企业，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赢得了赞誉，树立了品牌；另一方面，全球急剧增长的石油需求为西亚的石油输出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催化剂，为之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阿拉伯国家财富基金也因此成为全球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

尽管双方合作成绩斐然，但就当前事实来看，中国—西亚还存在合作领域狭窄、重局部轻整体、企业缺乏长期战略目标等诸多问题，西方国家的竞争与干扰也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面临的挑战。

一是合作领域较窄，集中在能源领域。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显示，中国在西亚几个主要贸易伙伴中，向中国出口原油占双方贸易总额的比重较高。比如沙特、科威特、阿曼、伊朗、伊拉克等。中国对西亚投资的85.3%仍然集中在能源、矿产采掘等少数几个领域，集中于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因而在对中国的整体贸易中，有的国家出现较大盈余，如沙特，有的国家出现了较大赤字。对于那些存在较大赤字的国家极容易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影响中国与整个西亚地区的贸易发展。2011年以来，基于对社会动荡的反思，西亚阿拉伯国家更加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积极改善民生。中国方面应继续把握机遇，积极探寻双方经贸合作发展的新思路，努力拓宽经贸合作领域，着力加强对西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培训、人力资源培训、新能源

开发等领域的投资与帮助，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转型，实现互利互通，共同发展。

二是重局部轻整体，企业战略规划不明确。长期以来，中国与西亚的经贸交往缺乏整体性、全局性规划。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西亚，但是国家对这些企业在当地的运作未能有效规范，而企业本身也缺乏“西亚通”式的人才，对西亚各国文化、宗教、习俗了解不足，再加上有些企业人员缺乏培训，注重短期利益，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乃至中国国家形象。例如，在对西亚出口中占较大份额的家电产品，在售后服务上口碑不好，少数不法商人贩卖劣质产品等。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跨学科、跨部门、多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要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支撑。但目前中国与西亚的合作机制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运行效率也有待继续提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和西亚由于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国家体制等方面的差异性，整合国家利益和目标、确认共同归属感的难度较大；二是双方目前合作的随意性较高，注重局部而缺乏整体规划，难以进行有效的统筹管理。因此，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求中国与西亚关系中的机制支撑因素更加健全，保障自身经济的持续发展，并给予对方整体经济发展更多的关注。

中国—西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设计

1. 从能源到整体，扩大合作规模

中国—西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不能只等同于进出口石油、矿产，必须要有更加丰富的内涵。除能源领域外，应努力扩大双方合作领域，诸如农业合作、制造业合作、金融合作、人力资源合作等，

合理利用双方广阔的市场。近年来，由于水资源缺乏及人口增长率不断上升的原因，西亚各国粮食、食品、蔬菜等的进口贸易额不断上升。以沙特阿拉伯为例，其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是谷物、乳蛋、蜂蜜及其他食用动物产品、活动物、食用水果及坚果等。其中，谷物是沙特进口最多的农产品，其进口增长速度自2001年以来逐年递增，到2009年，其谷物进口额为33.8亿美元，占全部农产品进口额的31.3%。在西亚各国农产品市场中，美国、巴西、印度和法国占有的市场份额较高，他们是西亚的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巴西和印度稳居前三名，美国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数年来占据第一位。中国农产品在西亚各国市场占有率较低，排名靠后，双方农业领域的合作也相对滞后。因此，中国需要详细了解西亚各国的食品法律、标签要求和市场准入限制。在西亚国家，一些商品的进口因宗教、卫生和安全等因素而被加以禁止，如法律禁止进口不符合伊斯兰教规定的产品及含酒精类饮料、酿酒设备、肉类产品。此外，还要求家禽和家畜肉类产品装载时附带额外的健康证明，以说明出口到该地的屠宰动物并没有喂食促进生长的激素。此外，双方在水产养殖、防治土地沙漠化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应该继续加强农产品信息、科技研发、人员管理等方面的交流。

此外，日用消费品也应是中国与西亚各国可以进一步关注的热点。除了石油及石油衍生产品，西亚各国其他大量商品大都依赖进口。中国经济这些年快速发展，由于价格优势，原来以消费欧美产品为主的西亚阿拉伯国家消费者已渐渐地接受中国商品，比如家具、鞋子、服装、文具、箱包、袜子、小五金、电动工具、大小家电、强化地板、洁具等。

2.从政府到企业，落实合作理念

中国—西亚虽然通过各种声明和协定等一系列文件，承诺在相互关系中遵守互利原则，在国际领域进一步加强协作，但双方对此较少

规定更加具体的内容，执行和监督机构也不明确，导致上述合作出现结构松散，不同领域运行不齐、效率差异等问题。因此，双方应积极推动机制建设，采取各种措施积极落实协议，把合作落到实处，在国际问题领域进一步加强协商，同时，进一步发挥经济合作机制对政治、安全等其他领域机制的协调作用。

具体来说，影响中国—西亚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双方经济合作中所建立的机制还不完善，只是官方层面达成某些共识，但并没有在企业层面得到落实。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双方企业的长期合作。目前，双方企业合作的规范性不强、合作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对双方经济潜力的发挥远远不够。因此，双方政府应进一步制定政策，向合作企业倾斜，推动双方企业合作向纵深发展。此外，中国—西亚经济互补性强，但经济技术合作滞后，要使双方经贸合作关系迈上新的台阶并长期保持稳定，大力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尤为重要。因此，推动经济技术合作，加大横向和纵向信息交流和协调力度，充分发挥整合优势，加强技术交流和探讨，才能真正建立起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关系。

3. 从官方到社会，加强人文交流

一方面，要加强双方官方和民间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建立在雄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上。新闻媒体要加强舆论宣传力度，说明中国是西亚各国的可靠朋友，中国的发展不仅不会威胁西亚国家的利益，反而会有利于双方共同抗衡西方的压力。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中国永远不称霸，通过舆论宣传最大限度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打消西亚各国公众的疑虑，使西亚各国的人民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为双方整体关系进一步稳定发展做出贡献。目前双方在人员交往数量上比以往增多了，但这并不等于彼此人民交往的质量和理解的程度得到了提高。中国政府应积极与西亚各国政府协调起来，对当前无序的民间交流进行引导，有

组织、有计划地输送人员到对方国家进行交流与学习，进一步推动各方面交流，在彼此深入了解和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培养热衷于友好关系发展的青年群体。双方还应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和落实地方城市间的合作（互为友好城市的形式），更加积极地开展政党、学者的交流，逐步建立起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多层次，形式丰富多样，稳定而繁荣的交流机制，以确保双方关系在稳定和可预见的环境中发展。

另一方面，为提高双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成效，在观念上要继续倡导平等、互利，培育共同的理念，增强双方的相互认同感，提高遵守共同达成的合作原则的意识。在实施步骤上，我们有必要从易到难，由浅入深，从最能体现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的领域入手，外溢到其他领域，以使它们的作用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只有在共同理念的指导下，在对方国家国民认可的前提下，在众多企业都乐于参与的形势下，才能获得长足进展。

4. 从局部到大局，完善合作机制

中国—西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一定的基础和良好的机遇，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利益差异及机制发挥作用的认识不对称等问题，都可能影响其发展走向，因此，双方应从大局出发，从战略高度着眼，互谅互让，妥善处理分歧。

目前中国—西亚之间的某些合作平台也可以进行调整。例如，“中阿合作论坛”参与的层次主要是部长级会晤机制，这同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与东盟成员国、与欧盟成员国集体会晤已经上升为元首或首脑峰会级别并以机制化固定下来的情况相比，明显暴露出不足。面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需要，很有必要将部长级升级为政府首脑级甚至国家元首级，包括元首级（首脑级）、部长级和高官级的多层次多边磋商机制，当然，可以由

易到难，先行上升为副首脑或副元首级别并机制化，以适应中国—西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需要。此外，中国—西亚关系中的机制建设多集中在能源领域，尚未建立共同的宏观战略协调机制，也没有明确提出系统性的可操作的协调政策等，这些都成为进一步深化合作的主要障碍。

总结

总体来说，中国—西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从涵盖的领域来看，既包括能源、家电、农产品等国家利益中的实体部分，也包括科技、文化、教育、民间交往等比较软性的部分。双方交流的领域和范畴要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从发挥的功能来看，既包括日常的交流、对话、合作，也包括在发生紧急事态甚至经济危机情况下的沟通和危机管理机制。中国—西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础应该是双方形成的合力，核心是彼此的相互认同感以及相互需求的程度，是伙伴关系的合理延伸，因此，中国—西亚之间的互信程度和需求状况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成效至关重要。

中东欧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作用

刘作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中东欧在连接欧亚市场、推动中欧合作上将发挥一定的作用。快速发展的中国和中东欧合作，可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简称“丝路建设”）的积极推动力量。因此，详尽、客观地评估中东欧推动丝路建设的能力和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东欧参与丝路建设的现实基础

早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之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已开展多领域合作，为丝路建设打下了现实基础。中东欧如能充分利用其市场潜力和地缘优势，将在丝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可在经济上获益颇丰。

市场潜力和地缘优势

中东欧是转型经济体的代表，正经历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过渡阶段，对中国有较大的融资需求，是中国企业投资欧盟市场的重要“试水区”。中东欧地区人力、产业等投资基础相对较好，在该地区获取欧盟技术和市场也较为便利。正因如此，近两年来中国企业在中东欧的投资和并购逐渐增多，多层次合作交流日益铺开，从而为丝路建设对接欧盟大市场做出了前期铺垫。

中东欧位于欧亚大市场的枢纽地带，是丝路建设的枢纽地区之一。中东欧国家大部分与中国有传统友好关系，双方没有突出的历史矛盾，也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双方在此区域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会遇到明显的战略阻力。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不仅对华友好，而且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充满兴趣，他们是中国打通欧盟后院、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

通道建设的双边合作

目前，亚欧大陆已完成或即将建设的有三条洲际大陆桥。一是西伯利亚大陆桥（亦称第一亚欧大陆桥），东起俄罗斯东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途经中东欧，远达荷兰鹿特丹。二是新欧亚大陆桥（亦称第二亚欧大陆桥），东起连云港，经陇海、兰新铁路，由新疆阿拉山口出中国境，穿越中亚地区，连接俄罗斯、波兰、德国等欧洲国家，最后抵达鹿特丹。三是新的亚欧大陆桥尚在战略构想中，其起点始于以深圳港为代表的广东沿海港口群，沿途由昆明经缅甸、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从土耳其入中东欧，再到西欧抵达鹿特丹。

由中国方面运营的丝绸之路物流通道，主要使用第二亚欧大陆桥。2011年10月，重庆发出第一班横跨欧亚的“渝新欧”国际货运班列（重庆至德国杜伊斯堡）。2012年10月，武汉发出了第一趟“汉新欧”货运专列（武汉至捷克布拉格）。2013年4月，成都开行了通往波兰的货运班列“蓉欧快铁”（成都至波兰罗兹）。2013年7月，由郑州开行了前往德国的“郑新欧”货运班列（郑州至德国汉堡）。相较于现有的海运、航空运输，铁路还具有一定竞争力，它比空运便宜，比海运速度快，而且也可改变中国对外贸易长期过度依赖海运的状况，为货物运输和能源运输的多元化创造条件。这些通道的运营，为推进中东欧参与丝路建设奠定了基础。

多样化的合作机制

目前，中东欧参与丝路建设的机制较为多元，可以借重的主要有中国和中东欧合作机制、中国和欧盟相关合作机制以及亚欧会议机制。其中，具体针对中东欧与丝路建设而言，中国和中东欧合作机制显然是重点。

借助中国和中东欧合作机制，中东欧国家“向东看”的外交政策日益强化，寻求从中国获得更多发展机遇的愿望较为迫切。无论是中欧国家还是巴尔干国家，大都提出了加强与中国合作的举措，双方高层互动频繁。原来与中国存在问题的国家，例如捷克，与中国的关系也出现改善的势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进一步良性互动，中东欧势必成为中欧合作的新增长点。在此发展态势下，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持续发展的中国和中东欧合作机制打开了新的“机遇之门”。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蕴含着多重机遇，已经得到部分中东欧国家的积极响应。2012年，波兰政府推出面向波兰企业的“去中国投资”（Go China）项目后，又启动了面向中国企业的“去波兰投资”（Go Poland）项目，积极推动中波双边经贸与投资合作。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官员表示，希望通过“渝新欧”能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尤其是重庆企业，到波兰投资，波兰将是中国企业进入欧洲的桥头堡。波兰智库认为，以欧亚大陆桥为基础的丝路建设会给中波双边合作带来机遇。从四川成都到波兰罗兹的铁路运输专线，尽管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已为中波双边合作开辟了新渠道。从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有33班次列车从成都到达罗兹，运送货物价值达9 000万美元。鉴于中国已把西部地区纳入丝路建设当中，波兰驻华使馆官员表示，波兰政府需要加强与中国西部地方政府合作。在6月9日至10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波兰地方合作论坛上，成都市和波兰罗兹市，作为中波两国23对友好城市交流合作的典范，被大会授予“中波友好合作奖”。6月14日，在四川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四川）进口商品展览会，波兰罗兹和四川成都的合作成为亮点之一。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两国对于参与中方提出的丝路建设表现出极大兴趣，并已在实践上做出积极响应。尽管中、匈、塞铁路的筹划建设面临诸多困难，但对于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欧洲的建设做出了有益尝试。

二、丝路建设的路径与中东欧的角色

横跨欧亚的丝路建设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各国情况不同且复杂多样。丝路建设的路径选择将直接决定中东欧所能扮演的角色。依据目前形势判断，可能存在下列三种路径：

“分步推进”模式。把丝路建设作为一个战略整体，按阶段分步推进，先期的丝路建设重点是周边国家及中亚。依据“十二五”规划的表述，在圈定的沿边四大开放地区（向北开放、向西开放、东盟合作高地、向西南开放）中，向西开放主要针对的是建立亚欧之间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深化新疆与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国家的合作，加快与内地及周边国家物流大通道建设，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依据这一模式，中东欧作用和角色尚需等待到下一阶段，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亚扩展到欧洲阶段。该模式之推进，主要取决于中国与周边相关国家和区域合作推进的速度。因此，中东欧的介入也只能停留于未雨绸缪中，其何时发挥作用（具体将扮演何种角色）尚未明朗。

“通道建设”模式。以通道建设为抓手，试点推进，积极建设横跨欧亚丝绸之路物流大通道，将欧亚两大市场有效地连接起来。中国领导人已在多个场合强调，在丝路建设上，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的抓手，互联互通是突破性领域。如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上指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融合发展的基本条件，地区各国应携起手来，加快推进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基础设施建设。基于此，中东欧国家当能成为丝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亚欧物流大通道的重要一环。

如果未来三大欧亚大陆桥都能充分利用起来，则中东欧的大部分区域都将发挥物流枢纽作用，该区域国家的积极性将被充分调动起来。需要强调的是，中东欧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建设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之一是从广东到达希腊，经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腹地，其行程比之传统海上丝绸之路可缩短7~10天，战略价值很大。

“东西并举”模式。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亚洲和欧洲两边同时展开，可进一步夯实与亚欧“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目前，中国在欧亚大陆两头的经贸合作不断升级，建立自贸区的步伐加快。亚洲这边，中国—东盟自贸区已于2010年正式全面启动；中日韩也于2012年11月启动自贸区谈判，中韩自贸区谈判进展较为顺利；新疆等地区也在积极推进与中亚等相关国家建立自贸区。欧洲这边，中国对双边投资和自贸区谈判表现出一定的兴趣，目前已同瑞士和冰岛签署自贸区协定，且正在推进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与两头相比，中国与中间地带的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发展自贸区的计划并不十分明朗。但随着俄白哈等组成的欧亚经济联盟将于2015年成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区域间自贸区建设与联动应会渐显活跃，尤其是考虑到中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中俄之间探讨自贸区建设问题应有所突破，可以进行积极探索。如实施“东西并举”模式，中东欧将扮演重要角色。首先，中东欧国家或位于欧盟的周边，或处于欧盟的中心位置，一些国家拥有重要港口，一些国家占据陆路要冲。中东欧国家是从亚洲步入欧洲的“门户”，中国必将借重其地缘优势来推进中欧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其次，在与欧盟商讨双边投资协定以及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具有开放市场的中东欧国家可能会成为中欧相关谈判的推动力量之一。再次，中东欧可作为中国产品升级、销售（分销）中心，中国产品生产、流动、销售和品牌塑造可先经中东欧“本土化”，再进而“欧洲化”。因此，中东欧市场对中国的投资和中欧自贸区建设具有“探路”效应，将为中国推进西半球丝路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总体而言，丝路建设是个综合性工程，除了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谋划和推进外，还要看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边国家的反应和支持力度。最终有可能是多种形式相结合，并根据各方战略需求的轻重缓急而有所侧重。

三、丝路“通道建设”面临的挑战

在丝路建设中，中国和中东欧的物流通道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抓手。丝路“通道建设”目前虽进展相对顺利，但也面临一些挑战。

国内因素

近年来由于中欧贸易量增加，中国已打通多条经第二亚欧大陆桥到达中东欧和西欧的国际铁路运输线路，形成了所谓“X新欧”现象，如“渝新欧”“成新欧”（蓉欧快铁）“汉新欧”“郑新欧”“苏新欧”“陕新欧”等。在这些中国不同城市出发开往欧洲的铁路专列中，“渝新欧”起步早、开通时间长、货源充足，探索出了一系列同中东欧乃至欧洲合作的物流新模式。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返程货源难以解决，导致运输成本上涨。当然，更大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中国多省份的同质化竞争。综合起来，主要有下列问题：

中国国内物流运输互不统属导致不良竞争。“成新欧”“郑新欧”与“渝新欧”铁路始发站距离很近，前两者与重庆铁路运输距离都在300公里左右，但物流管理互不统属，缺乏协调，这必然在货源上产生竞争。西安、郑州等的加入，导致中国到欧洲的整个运输线路竞争日趋白热化。为维持生存，各地过度借重政府力量，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中西部相关省份为搭建各自到欧洲的物流通道，采取政府补贴物流费来培育市场。这种做法本无可非议，但为争取货源，地方政府通过提高补贴、降低运费来吸引客源。部分省

份叫价过低，极大地破坏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加剧了政府的补贴负担。

中国地方省市“各自为政”为境外合作国家提高要价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国内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与外方博弈，降低对方的物流要价，反而被外方认为是提高要价的机会。目前，欧亚通道上中国境外某些运输段可以进一步进行线路优化来降低运输时间和成本，但由于中方谈判支撑力量不够，导致外方并无动力和兴趣来提高运输效率，而外方的“不作为”造成的叠加成本反而分摊到中方身上。

产品运输存在偏离市场规律现象。在物流分工日益精细的情况下，哪些产品走空运、铁运和海运要根据市场需求才能做到经济节约。比如，手机产品体积小、重量轻、总价高，适合空运。而笔记本电脑等产品比手机体积略大、重量比手机偏重，适合铁运。像电视等大体积、低总价产品则适合海运。中国国内部分路段并没有遵守上述特点，货品迁就物流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绝大部分物流运输没有回程货，不得不在到达目的地后将空集装箱通过海运返回，导致物流运输资源和资金的浪费。

国外因素

欧亚大陆通道之争日趋激烈。

一些国家和地区组织看到亚欧市场的巨大潜力，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通道建设”方案。迄今为止，联合国、美国、欧盟、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日本等均提出了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建设方案，这使得亚欧的国际通道竞争异常激烈。

1998年国际道路联盟提出了“复兴丝绸之路”计划。联合国随后发挥了巨大作用，于2000年和2005年启动了“丝绸之路区域合作计划”第一、二期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也

纷纷提出各自的项目支持“丝绸之路区域合作计划”。1995年，欧盟在“丝绸之路区域合作计划”的基础上，提出了“欧洲—黑海—高加索—里海—中亚”运输走廊方案（即塔奇卡计划）。“塔奇卡计划”主要由欧盟资助，赞助商还包括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伊斯兰开发银行等。“塔奇卡计划”走廊避开了俄罗斯，强化了欧盟与中亚的连通。

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追求主要体现在欧亚联盟上。2011年11月1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总统签署协议，确立了2015年建立欧亚联盟的目标，强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通道便利化是重要合作方向。美国也曾明确提出类似“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201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第一次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新丝绸之路”计划是一个针对阿富汗以及中亚和南亚的综合战略，实施的途径是重建连接欧洲、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贸易与能源走廊。美国欲借该计划来主导南亚、中亚甚至西亚的地区发展进程，保持并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弱化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

如此众多的丝绸之路倡议，隐藏着大国对地缘政治的角力和巨大能源及资源利益的追求。俄罗斯和欧盟是两大主要玩家，二者之竞争集中体现在俄式1 520mm宽轨和欧式1 435mm标准轨在扩展欧亚铁路运输上的争夺。俄罗斯想保持对原苏联地区的控制，努力抓住欧亚物流大通道所能带来的巨大财富与商机，而欧盟则一直想消减俄罗斯的影响力，在物流通道上摆脱俄罗斯风险，确保欧洲和亚洲的贸易有着更为便捷、高效的通道，同时发掘更多的途径确保能源安全。美国虽与“丝绸之路”没有历史渊源，但美国在西亚和中亚的战略与此息息相关，因此也密切关注该区域的大通道，并支持欧盟的做法。欧俄竞争给欧亚大陆通道建设带来不小麻烦，中国推进丝路建设将面临复杂的国际博弈。

中国行经欧亚通道面临选择困境

在欧亚大陆上，多元竞争使中国可以选择的运输走廊较多，除原有的西伯利亚铁路（第一亚欧大陆桥）、新欧亚大陆桥（第二亚欧大陆桥）之外，还可利用“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以及拟议修建的“中国—哈萨克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运输走廊、“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运输走廊。但中国的欧亚通道易受制于中俄关系的发展以及其他大国的干预。俄罗斯一直担心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会对其造成威胁，并在中国的物流通道选择上施加压力。为增加西伯利亚铁路利用率，俄罗斯希望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北线，而中国则倾向走距离更短的南线。在俄罗斯和部分欧洲国家中，对中国试图控制中亚能源的担忧一直存在，“中国威胁论”也不时冒头。欧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大国在这一地区角逐异常激烈。中亚国家和独联体国家政局不稳，极有可能对现有和即将构建的物流通道造成影响或冲击。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后，美俄博弈加深，使得本区域蕴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受乌克兰危机影响，中国投资克里米亚深水港计划基本“泡汤”，而早些年中国投建乌克兰后勤中心计划也不明朗。

就中国通向中东欧国家的物流通道来说，部分中东欧国家各干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标准不统一，车站、仓储、通信、供水及后勤保障系统都不健全，铁路复线率、电气化率等占铁路营运里程的比重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中东欧货物运输、储存、搬运等过程的机制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提升。

四、政策建议

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原则。在战略步骤上，政府加强战略布局的同时，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强调企业的主体地位，以重大项目

为牵引。有条件可积极推进，无条件可做务实灵活处理，规避经济和政治风险。在战略内容上，强化经贸为主（贸易畅通），金融合作（货币流通）和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等多维度推进的策略。

充分利用现有机制，扩展新的交流渠道，积极深化双边合作。中国应利用好中国和中东欧经贸合作论坛以及中国和中东欧地方领导人会晤机制，积极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多领域交流、多层次合作。建立具体的经贸和投资政策多边沟通平台，积极推动投资贸易、人员往来便利化；开展各个层次双边合作交流，例如国家、省州、城市，甚至工业园区之间的直接的、具体的交流合作。同时，还应用好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研究基金等，加强相关课题研究。

在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合作机制的同时，也要充分扩展新的交流渠道，如已经被搁置一段时间的亚欧会议机制。亚欧会议至今已经举办多年，是未来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很重要的合作平台。根据首次亚欧会议通过的《主席声明》，亚欧会议的目标是在亚欧两大洲之间建立旨在促进增长的新型、全面的伙伴关系，加强相互间的对话、了解与合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该机制是一个能提供中国和欧盟以及中国和中东欧等众多国家点对点交流的平台，倡导形式多样、主题开放灵活的交流方式。通过亚欧会议来推进丝路建设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审时度势，多线选择物流通道，确保贸易畅通。既要保持与俄罗斯合作，利用俄罗斯物流空间，也要积极与欧洲和中亚国家合作，开发新的物流运输空间。

积极参与欧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局工作，推进道路连通。中东欧国家在轨道技术与标准、电气化水平和运载效率等方面需要改造和升级，这既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好时机，也是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础，有利于推进交通运输便利化。但由于中东欧铁路网建设大多处在泛欧铁路建设框架下，加上基建情况复杂，中国基础设

施建设进入中东欧要避免与欧盟发生冲突，在基建地点的设计和选择上也应审慎而为。

突出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强调丝路建设对于欧亚两大市场的积极作用。中国、俄罗斯、欧盟（包括中东欧）等参与丝路建设是多方共赢的举措。中国应向欧盟和俄罗斯等积极传递和阐明丝路建设主要是要建设经济走廊，将会惠及沿途所有国家。丝路建设是多元、开放的进程，没有地缘政治目的和动机，也不会与现有国家或组织的类丝绸之路建设方案发生冲突。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布局中亚

傅斯鸿 陈宁 专栏作家

当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使得全球能源格局发生骤变，远在亚洲中部的中亚地区也正在改变着自己的能源出口格局，他们需要为自己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寻找一个新的市场；而日益崛起的中国，能源需求的渴望也愈加强烈，于是，在紧邻的中亚地区，中国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布局。

中亚地区，位于帕米尔高原西面，里海东岸，原属苏联。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分别独立，成立主权国家，然而，这五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密切，因此中亚也有俄罗斯的“后院”之称。

中亚困局

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十分丰富，然而，一个里海似乎成了挡在中亚地区与中东、欧洲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使得中亚地区的油气，只能通过当年苏联在这里修建的中亚地区油气管网，与世界相连接。从而也使得这些踩在丰富油气资源上的国家，为了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依靠向俄罗斯管网输送油气资源来获得资金并换取货物。可以说油气收入是这些新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也导致了中亚地区能源出口长期受制于俄罗斯的局面。1993年，俄罗斯就曾以经济低迷为由，中断了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土库曼斯坦则转而依靠棉花和有限的石油产量勉强维持经济运行。这也使得中亚国家迫切希望转变自己的能源出口格局，以摆脱俄罗斯的控制。

作为俄罗斯“后院”的中亚，自己却没有能力修建油气管网，别国也很难进入该地区。俄罗斯甚至把位于哈萨克斯坦的田吉兹油田看作是“我们的油田”。为了尽快摆脱俄罗斯的控制阴影，哈萨克斯坦背着俄罗斯与美国的雪佛龙公司签署了共同开发田吉兹油田的协议，这使得俄罗斯异常愤怒，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甚至当面向哈萨克斯坦总统提出“把田吉兹油田给我吧”。

进入新的世纪，国际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也不断加大。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需要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东进口石油、天然气；同样对能源有着巨大需求量的欧洲却不得不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在欧洲天然气总量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俄罗斯，对此俄罗斯深谙能源外交的重要性，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每当俄罗斯与欧盟国家意见相左时，俄罗斯便会随时举起天然气这根“胡萝卜”对抗欧盟。

2006~2009年间，由于乌克兰与俄罗斯政府之间的冲突，就曾导致俄罗斯向乌克兰的天然气输送多次中断。因此，俄罗斯对于欧洲的天然气垄断无疑是欧洲人的噩梦。这同样也是靠输送油气给俄罗斯换取经济利益的中亚各国的噩梦，除了卖给俄罗斯，他们别无他途，油气价格也被一降再降。

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爆发，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从2005年的60.3%降至2011年的45%。原本是世界最重要的天然气进口潜力国之一的美国，因页岩气产量的增长正在减少来自加拿大的天然气和中东、非洲地区的液化天然气量，并大幅降低天然气价格。

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对于欧洲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美国减少对世界石油天然气的进口，从而使得这些出口国有了更多的资源出口给

欧洲，这使欧洲能够用上来自中东和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为他们摆脱俄罗斯的能源垄断开了个好头。

然而，这却给本就处于利益链末端的中亚国家雪上加霜。如同1993年那样的情景再次降临到了土库曼斯坦的头上，俄罗斯再度中断了与他们的天然气贸易。

投向东方

如同一位俄罗斯地理学家在几个世纪以前就预言的那样："大草原上的人民需要向东方寻找他们拥有的自然资源市场。"

在中亚地区的油气出口长期受制于俄罗斯，同时还要面临中断的危险下，中亚国家领导人开始向草原东面的中国寻找新的市场。2006年，时任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到访中国，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了《关于实施中土天然气管道项目和土库曼斯坦向中国出售天然气总协议》。

这不仅是中亚国家迈向油气出口多元化的契机，更是中国在中亚开辟的一个新的储量丰富的天然气气源。2007年，中土两国正式签订了购销协议，一条从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延伸至中国新疆霍尔果斯的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开始开工建设。

然而，这条管道却必须在2009年底投入使用，原因是俄罗斯在此之后将再次中断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进口。

如今，这条天然气管道已如期建成并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从中亚输送到了中国境内。看到了好处的过境国也纷纷要求通过这条管道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就提出了中亚天然气管道过境绕行乌国产气区的要求。据中亚天然

气管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乌兹别克斯坦也与中国签署了天然气购销协议，每年将向中国出售100亿立方米天然气。

而过境国哈萨克斯坦不仅希望能从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下载天然气，更希望中国能帮助其修建一条天然气输气管道，把哈国北方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输送到南方缺气的地区，以实现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哈萨克斯坦人民的承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同意了哈国的要求，2013年4月初，哈国南线天然气管道的主体焊接工作已完工，年底便能投入使用。

布局中亚

1993年，中国从能源出口国变为能源净进口国，中国的石油企业便开始了“用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模式。一条是进一步发展国内石油工业；另一条则是到海外去拓展更多的石油资源。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吉平说：“如果你想成为一家真正的石油公司，你就必须走出去。”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于能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攀升。据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进口原油27 109万吨，原油对外依存度为54.6%。如此巨大的能源消费量，也促使中国必须在海外开拓更多的能源进口渠道来保证国内的供应。

如今，“走出去”战略所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石油企业在非洲、南美、中亚甚至俄罗斯都有了立足之地。他们不仅在油田开发的技术上具有了先进的经验和条件，而且还有着雄厚的资金实力。

中亚地区早在1997年便成了中国油气“走出去”战略中的一块宝地，中国石油在这一年成功收购了一家名叫阿克纠宾的哈萨克斯坦石

油公司的大部分资产，并且开始铺设中哈原油管道。

而中国的另外两家油企中石化和中海油也于2003年斥资百亿进入哈萨克斯坦。中海油和中石化均以6.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英国天然气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英国天然气国际拥有的哈萨克斯坦北里海项目8.33％、大约1/12的权益。

2010年3月，中石化一子公司又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一家价值12.6亿美元的聚丙烯生产工厂，并出口该工厂的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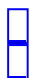
中石油在中亚天然气管道A/B线建成后，又开始了哈国南线项目的建设。这条管道的建成，不仅可以使哈萨克斯坦天然气实现自给，更能将中石油产自里海的天然气、油田伴生气等输送到中国。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也将向中国出口每年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加上土库曼斯坦增加的100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增加的100亿立方米，一条输气能力在250亿立方米以上的新输气管道，已经在中亚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建设着。

2013年4月在海南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的周吉平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代表别尔利巴耶夫共同签署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关于中哈原油管道扩建原则协议》。届时，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油气合作将更为紧密。

当美国页岩气革命使得全球能源格局发生巨变之时，处于能源出口末端的中亚国家和处于能源消费增长迅速的中国表现出来的紧密合作，让这一地区的能源出口格局也在发生着改变。

摆脱了俄罗斯控制的中亚地区也在中国油企的布局中找到了自己的资源市场，而有了中亚油气注入的中国，也将在这一“机遇”面前

迎接新的“挑战”，随着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海外项目的资金投入也在不断增加，所承担的风险也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内项目。



第六章
海上丝路，迈向海洋强国

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思考

邹立刚 海南大学教授

中国倡导与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和周边外交战略的重大举措。丝绸之路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坚实的政策、法律和实践基础。

一、丝绸之路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

（一）丝绸之路及其核心价值

《中国大百科全书》将“丝绸之路”解释为：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中国海上丝路大体可分为三大航线：1. 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大量史料证实，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有着一条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海上丝绸之路”。2. 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根据《汉书·地理志下》可以明白看出，西汉时期中国和东南亚一带，已经开展海上交通和商业贸易。20世纪50年代以来，合浦先后挖掘汉墓500多座，出土物品超过1万件以上，大部分是舶来品。3. 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直至拉美。《汉书·地理志》所记的海上航线，就有南海与印度洋上的航线。由于葡

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的东渐而发展起来的东西贸易，包括非洲及美国，成为近代以后丝绸之路的中心课题。1565年西班牙殖民者开辟了自菲律宾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墨西哥银元运载到马尼拉，换取由福建商船运载到马尼拉的中国丝绸等商品。

虽然海上丝路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贸易、渔猎、航海、宗教和文化传播、移民、异域考察、国家外交等。从贸易上说，有学者列出了自秦汉到明清时期的中国进出口商品表，当时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五金、糖、中药、漆器；输入货物主要有香料、药材、珍贵珠石、金银器皿。1990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从威尼斯出发，对海上丝路进行沿岸港口考察，于1991年2月14日到达泉州市进行考察并召开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2011年宁波大学龚缨晏组织撰写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和《2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集萃》较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学界相关研究的全貌。陆芸对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路研究进行了述评。

当中国作为世界最早的海洋强国时，并未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国力去掠夺和征服其他国家和民族，而是带着“丝绸”平等交易，友好交往。即丝路的核心价值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郑和七下西洋，其率众之多、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航迹之远，成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对所到之地竟然保持着那样的平和、友善，这是怎样的泱泱大国的气度和德行！而西方海洋文明几乎是侵略、殖民的同义词，将北美和澳洲等土著民族的家园占为己有，将世界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几乎全部殖民地化；而日本对西方海洋文明亦步亦趋，沾染了海霸恶习；旧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之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蒙受了百年屈辱。

（二）海上丝路与中国和平发展国策

和平发展是中国一贯奉行的长远国家战略。2005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深刻指出“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庄严宣布：“中国积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绝不搞侵略扩张，永远不争霸、不称霸，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早在1978年邓小平先生就钓鱼岛争端的处理就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1984年他多次谈到南海问题时提出“把主权搁置起来，共同开发”。此后中国领导人在诸多国际场合表述了这一立场，例如1990年6月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出访印尼时，表述了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1990年8月，李鹏在新加坡表示：对南沙群岛的争议先进行搁置，可以共同开发。1992年7月钱其琛外长在参加东盟外长会议时，也作了类似表示。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先后对中亚四国进行国事访问，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3日，习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演讲，殷切建议“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他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他衷心期盼“开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他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海上丝绸之路将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动脉与桥梁。

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海上丝路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此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把海上丝路建设作为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2月14日，国家发改委和外交部举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目前，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等部委正在制定相关政策规划。

（三）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路的要义

中国倡议共建海上丝路，契合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定位、周边外交基本方针和建设海洋强国的内在精神。该倡议的直接目的主要是：1. 营造中国今后数十年甚至“两个一百年”和平发展的良好周边环境；2. 使南海从一个周边各国烦扰纷争和区外大国纵横捭阖的角力场，甚至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火药桶，逐步演变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维护南海的和平和稳定；3. 作为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美日以各种手段拉拢东盟各国，在海上全面遏制中国的基本对策之一；4. 某些海上邻国近些年来不断在南海问题上骚扰甚至挑衅中国，而中国则通过“柔软丝绸”以柔克刚、以和为贵，维系和发展中国—东盟平等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

共建海上丝路的核心是加强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对中国和南海邻国涉及岛礁归属和海域划界的争端，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妥善解决；在争端解决之前，优先推进低敏感领域的海上合作机制作为承载海上丝路核心价值的主要载体。海上合作机制包括南海安全、科研、环保、油气资源开发、渔业、搜救等方面。如安全合作可先建立情报交流机制继而建立联合巡航机制，以应对海上犯罪；海洋科研可先建立服务于气象、减灾防灾方面的合作机制，进而建立南海资源调研合作机制；海洋环保可先建立环境监测和信息交流合作机制，进而规避非开发性的海洋污染，再推进到开发活动的环保合作；资源开发合作可先推进渔业合作，递进为油气资源开发合作。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路，也包括中国有理有据有节地在管辖海域包括争议海域自主发展海洋经济，才能具有较强的海洋经济实力，丰硕的海洋经济发展经验，领先的海洋经济发展技术，从而有力推动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路。然而，海上丝路建设作为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载体之一，并不仅限于中国—东盟之间。中国也尝试与更多国家共建海上丝路，如中国向斯里兰卡和印度提出了该建议。

二、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路具有坚实的法律和实践基础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技术性多边合作机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第74条和第83条的第3款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表述，规定了临时安排制度。《公约》要求当事国在尚未达成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协议之前，暂时搁置相关争议，共同开发以取得经济利益；并通过临时安排缓和矛盾，维持区域内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最终促进和解与划界协议的达成。《公约》第123条要求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特别是：协调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协调行使和履行保护及保全海洋环境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协调其科研政策。特别是《公约》将“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作为一般义务规定于第192条，有人认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符合人类基本道德价值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是一项“对一切义务”。此外，还有诸多其他国际公约及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可适用于南海地区，尽管东盟各国对这些公约和机制的接受程度不一。

（二）中国—东盟双边政策法律基础

200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6条概括性地规定了“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有关各方可探讨或开展合作”，且非穷尽性地列举了可以优先开展合作的5大领域。此外，中国—东盟还有诸多涉及和平友好解决南海有关争端，在南海地区开展各种合作的条约、宣言和文件，例如1997年中国—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2011年以来中国—东盟发表的反恐声明和制定的反恐合作措施、2002年《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2003年中国加入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2006年《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

（三）中国—东盟政治、经济基础和机制化磋商场所

中国致力于与东盟及东盟各国发展全面关系，比如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1991年中国开始参加“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1994年中国成为东盟地区论坛的成员，并参加了该论坛的海洋安全合作；2002年中国—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商谈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共同绘就睦邻友好的美好蓝图”。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特别是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提出组建CA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同意先行减免关税，次年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较快，2002~2012年贸易总额分别为547.67亿、782.55亿、1 058.8亿、1 303.7亿、1 608.4亿、2 025.08亿、2 311亿、2 130.1亿、2 927.8亿、3 628.5亿、4 000.9亿美元。

就机制化磋商场所而言，东亚地区的合作以“10+3”（东盟加中日韩三国）、“10+1”（东盟与中国）以及“东亚峰会”（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多层框架推进，这些都是由东盟倡导和领导的，其中10+3合作框架下已开辟了17个合作领域，建立了13个部长级合作机制。

（四）中国—东盟安全保障合作机制

南海问题是中国—东盟关系中存在的最重要的安全问题。随着中国—东盟关系的不断增进，中国不断推进在安全政策上的合作和增进军事互信。1998~2010年和2013年陆续发表了8个“中国的国防”白皮书；1995年发表《中国的军控与裁军》，2003年发表《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和措施》，2005年发表《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中国于1996年正式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1999年中国率先承诺签署修改后的《东南亚无核区条约》议定书。此外，东盟与中国军舰互访较多，例如2005年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先后成功访问新加坡、泰国。东盟国家还多次邀请中国海军观摩有东盟国家参加的海上联合军演。此外中国与东盟国家也有国别性合作，如2005年《中马联合公报》表示将启动中马防务安全磋商机制和马方欢迎中方愿参与马六甲海峡安全合作；中泰在泰国湾举行的“友谊—2005”海上搜救演习以及中泰“突击—2007”和“突击—2008”陆军联合训练、中泰“突击—2010”陆军特种部队反恐联合训练和“蓝色突击—2010”海军陆战队联合训练；中国新加坡在广州举行的“合作—2009”安保联合训练。

中国—东盟在传统安全方面主要基于建立互信开展一些军事合作，而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合作成效显著。“9·11”事件后，中国—东盟逐渐将非传统安全合作作为重心。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认为“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恶

化、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趋突出”。特别是“9·11”事件后，因应国际国内反恐形势的需要，我国在国际法和国内法方面分别采取了系列措施。中国—东盟签署《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后不断深化各方面的合作机制，如海上安全合作、反恐合作、禁毒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合作、防灾减灾合作、重大疫病控制合作。

三、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路需要处理的现实重大问题

（一）积极推动与邻国的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谈判

目前中国与海上邻国存在岛礁和海域划界争端问题，中越达成了北部湾海域划界协定，并成立了中越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工作组和中越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专家工作组；中韩也达成“尽早解决中韩海域划界问题”的共识。在解决海洋争端谈判中，中国的基本立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以及中国政府在诸多国际场合，都有明确表述。在相关争端解决之前，中国应尽最大努力避免军事冲突，并且通过外交、经贸、管海等手段，遏制其他国家采取单方行动改变现状。

根据争端双方不同诉求和争端缓急，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中国可优先谈判解决中越北部湾湾口外海域的划界、中朝北黄海划界和中韩南黄海划界。在此之前应做好证据、法理、人才等方面的准备，为争议海域谈判做好充分准备。此外，尽管中日谈判解决岛屿争端和海域划界争端的条件不具备，但中国仍应把握时机，与日本就海上安全问题和防止海上突发事件开展对话磋商。

（二）妥善解决中外海洋渔业纠纷

近些年来中国渔船和渔民被驱赶和扣留的数量之多，被罚款数额之巨，堪为世界之冠，此外不时发生严重侵害中方渔民人身安全的恶性事件。在此打压下，中国渔民损失惨重。中外海洋渔业纠纷突出，本质是海权争夺。有关国家恶意竞争性行使管辖权，通过强力手段，彰显本国权利，排斥他国权益。对此应采取一些应对措施：1. 建立中国远洋渔业组织、渔业保险、渔业补贴等制度；对被捕渔民进行外交保护，对被诉渔民提供司法援助；强化在争议海域的护渔措施；对在争议海域恶意竞争性实施渔业管辖权的他国采取反制措施等。2. 通过渔业合作协定，禁止在争议海域使用武力或扣留他方渔船和渔民；或确定扣留的法定条件，但迅速释放不以担保为必要条件，允许国家间以协商的方式解决相关争议；或预置迅速释放条款。3. 在无争议海域选择性运用《公约》“船只和船员的迅速释放”程序。

（三）处理好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争端案

2013年初菲律宾就与中国的南海争端提出了13项事项诉请国际海洋法仲裁法庭裁决。虽然仲裁法庭对本案不应具有管辖权，但不排除其错误地确立对本案的管辖权或确立对本案部分事项的管辖权。中国就此可采取如下对策：1. 证明菲律宾提交仲裁的13项事项，属于中国2006年8月25日声明所排除的仲裁事项范围。2. 论证菲律宾1984年5月8日批准《公约》时发表的声明，属于对《公约》第298条的保留。3. 运用《公约》规定的“初步程序”和“初步反对的权利”，对仲裁法庭管辖权提出反对；若仲裁法庭拒绝之，则中国可以径行发表声明，或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声明，表示拒绝仲裁法庭对本案的管辖权以及由此而做出的实体裁决。4. 坚持用谈判等双边方式解决争端。中国采取上述作为，是反对仲裁法庭错误地确立管辖权，而非应诉。

（四）适时商签《南海行为准则》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0条规定南海各方应就最终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而努力。在2012年7月11日举行的“10+1”外长会议上，菲、越强推“南海行为准则”，中国暂时拒绝讨论。但中国仍应把握时机商签《南海行为准则》：区外大国不能作为准则的签字方；寻求冻结周边各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强调安全互信，提出南海争议海域非军事化和反对区外大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在争议海域资源开发利用上，强调合作和利益分享，循序渐进建立南海全面合作机制；在争议岛礁归属和海域划界争端上，强调在现代国际法包括《公约》的基础上独立自主通过双边和谈解决争端。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战略意义透析

林宏宇 国际关系学院国政系主任

习近平主席2013年10月在印尼国会演讲时提出要构建面向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提法在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他强调指出“我国要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表明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战略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国内外的密切关注。目前学界可能更多关注它的经济发展意义，把它视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面临新一轮全球化挑战的新包装，但笔者认为它的国际战略意义也许更为重大，可视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深层战略谋划。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海上丝绸之路”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战略意义。

从现实主义视角来看，“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维护海洋权益的战略需要

自2010年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另外，受“冷战”遗留的历史问题与冷战后现实冲突的影响，东亚地区国家矛盾交错，利益交织，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海洋地缘状况拥挤不堪，如处置不好，极易酿成危机。中国如何突破美国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导致的这种“东紧”困境，“海上丝绸之路”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战略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东向”转变为“战略西向”，它暂时避开了地缘政治拥挤不堪的东亚，转向大有可为的西线，达到扬长（经济贸易、基础设施）避短（军事、安全压力）之目的。另外，“海上丝绸之路”还可视为中国长期以来海权与陆权之争出现战略变化的一种迹象。中国虽是一个海陆大国，但却是一个海权的小国，长期以来我国偏重于陆权，对海权与海洋权益是不够重视的。而海洋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尤其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海洋权益的重视与维护，我们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就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说明中国将更加重视海洋，更加重视海权与海洋权益的维护。

从自由主义视角来看，构建“海上丝绸之路”是宣扬富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一次外交演讲中指出，一个大国要不仅能生产丰富的物质产品，还必须能生产丰富的精神产品，二者缺一都不是世界大国。她这里的“精神产品”所指的内涵很丰富，但价值观与话语权是很重要的方面。不可否认，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大国，但我们还不是精神产品的大国，我们的国际话语权还不够强大。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越来越重视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命运共同体”“新义利观”等概念的提出，都表明了中国要发出不同于西方的声音，要让国际社会看到更多“中国的点子”。“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正体现了这一战略诉求。

近年来，亚太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这个地区有影响的大国纷纷提出本国对该区域发展的战略构想，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都提出过类似于“丝绸之路”这样的战略设计，但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提法最有历史的文化底蕴与现实的

可行性，因为，中国政府所提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对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与发扬。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是联系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交通走廊。通过和平的航海贸易，带来了经济的共赢，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以及相关国家的和睦交流。这与近代西方海洋文化中的侵略性和扩张性是不同的。近代西方国家通过地理大发现，发现了世界，统治了世界，主导了400年的全球化，但残酷的血腥、冲突与战争却充斥其间。

可以说，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对人类和谐美好精神的贡献，它体现的价值内涵主要包括：互联互通、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命运共同。这些思想也正是中国政府所提的面向“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要秉承的价值观念与国际规范。有影响力的国际话语与规范，往往有悠长的历史传承与积淀。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两千年，似涓涓细流，绵延不断，交流了商品，传播了文明，是一个刻有中国印迹的优质历史文化符号。笔者认为，作为“中国梦”国际延展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样需要这个符号。

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大亚太”的区域认同

认同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构建认同是减少战略误判、避免国际冲突的重要方法。不可否认，当前我国和平崛起进程之所以遭遇这么大的困难，与当前亚太地区的国家身份认同混乱与缺失有很大关系。

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亚太地区国家发展状况非常复杂，这个地区既有最发达的国家，也有很落后的国家；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既有远在域外但时刻不忘亚太的国家，也有身处东方却以西方自居的“区域人格分裂”的国家。如此复杂的国家身份认知，导致亚太地区国家矛盾重重、纷争不断，这是影响当前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作为地处亚太地区的大国，有责任推动这个地区的国家身份认同。笔者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可视为中国政府推动亚太区域构建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的是东亚、南亚，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是地缘上的“大亚太”区域，该战略的实施显然有利于培育该区域的认同。中国将发挥其作为该地区最大经济体的优势，为构建“大亚太”认同做出贡献。目前，中国和东盟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中国连续4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再通过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力推动自贸区升级版建设，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这既有助于构建“大亚太”的区域认同，也有助于加强中国的大国亲和力，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总之，“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具有非常重大的国际战略意义，对我国来说，其经济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固然很大，但这还是表层的，从深层次来看，这更应是一个顶层的战略设计，其战略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源源不断地发酵，可谓“经济为表，战略为里”。“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贸易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外交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对于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推动全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携手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2013年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得到沿途各国的广泛支持。这一战略构想既唤起了我们对古老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更激发了我们关于新型丝绸之路的时代畅想，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前景。

一、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传承历史的重大举措

远在2 1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启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大门。随着交往交流的日益增多，在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两条重要的国际通道，一条在陆地，一条在海洋，这就是时至今日人们仍啧啧称道的丝绸之路。其中，贯通东方与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与东南亚乃至于非洲的许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一条贸易之路，也一条文化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堪称古代社会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互联互通的典范。

早在汉代，中国即开始经营与南洋各国的海上通道。公元八九世纪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延伸。中国船舶自南海向西航行，

经东南亚及北印度洋沿岸抵达中东、欧洲。中国的广州、泉州、明州等地成为当时中西贸易互通之地。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更加发达。宋高宗充分认识到发展海商的重要性，为此曾明确晓谕臣下：“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在朝廷的鼓励和利益的驱动下，庞大的商船队纷纷扬帆出海。元朝政府也非常重视海外贸易，中国东南沿海很多港口成了当时联系世界各国的纽带。东至朝鲜半岛，中到南洋地区，西抵北印度洋、波斯湾以及东非沿海地区，有数百个国家和地区的船只、人员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到明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延续兴旺繁荣态势的同时，线路得到进一步延伸。明代永乐帝前后七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历时28年，最远到达非洲的肯尼亚。郑和船队下西洋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同许多国家文化的交流。

现在，很多东南亚国家还流传着有关郑和这位传播中华文明使者的故事。郑和七下西洋不仅给所经国家带去了丝绸、茶叶、瓷器等货品，而且调解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维护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提高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威望。

我们无法想象，两千多年前人们在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时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历经了多少曲折。但是，我们知道，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岁月里，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的使节、商队、游客、学者、工匠川流不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正是因为海洋通道有其独特的便利性、承载力和开放性，才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从两汉以来绵延不绝，一直昌盛至明清两代。

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时期沿路各国的重要海上交通线，而且是沿路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生命线。

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

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明代中期之后，我国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屡屡实施“海禁”政策，严重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而此时，西方列强开始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亚洲。此后近四百年时间里，西方侵略者的铁蹄几乎踏遍了亚洲各地。

从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具有悠久历史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逐渐走向衰落，中国的海外贸易无论规模或范围都大为缩小，海上丝绸之路也就由盛转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崭新一页。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同时也获得了大多数国家的高度认可。

此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国际格局如何调整，中国政府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丝毫没有发生改变。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迄今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事务，扩大合作交流，推动互利共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要发展，必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走和平发展道路；必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这是当今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以海洋为纽带，在市场、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交流更加频繁，一个更加注重海洋合作与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与东盟的贸易额已超过4 000亿美元，有望在2020年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

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双边贸易额稳步增长。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对外输出资金、技术和投资项目，而且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增进与各国各地区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取得了显著效果。

毫无疑问，在世界经济走势持续低迷、充满风险和变数的今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积极作用和实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它并不是什么历史旧景的复制或再现，而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必然选择。

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的目标与定位

中国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扩大与沿路国家的利益互惠，与沿路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实现沿路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如果置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去考察，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多重意义。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提出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

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参加G20峰会、上合组织首脑峰会期间以及在其他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打造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进一步深化。

这一目标的提出，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其他国家携手共建、同舟共济，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良好意愿，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具有创新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促进沿路各国共同受益、共同发展的意义。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目标应是在继承和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精神，全面发展沿路各个国家之间关系，在加强经济合作基础上，深化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共同促进沿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区域和谐和文化融合。

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也让沿路国家共同受益，切身感受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真正走出一条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之路。

其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促进沿路各国文化交流、政治互信、友好往来、和谐和平的意义。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但也必将加强沿路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巩固沿路各国的友好往来，推动沿路各国的文化交流。

总之，通过加强政府间的战略互信，增进沟通了解，真正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成友谊之路、和谐之路、和平之路。

再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世界意义。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合作范围极其广泛，必然要求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

要吸引域外力量参与，在加强沿路各国经济、贸易合作的同时，不断拓展新渠道、新领域，以积极的姿态，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联系在一起，以推动全球经济的大发展与大繁荣。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既是沿路各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共同任务，同时也是各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应当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作为中国最大的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愿意进一步加强与沿路各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智库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中国走向世界

梁颖 广西大学原党委书记

“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东西方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海上通道，曾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海上丝绸之路”以深化改革开放、建设海洋强国、构建和平外交战略的时代内涵，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并走向世界。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路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关系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在新形势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把改革开放推向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显示了中央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坚定决心；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是“中国梦”所蕴含的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路径。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重要布局，是新形势下我国以新的方式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海上丝绸之路”将充分利用海洋的连通性、流动性和广布性，采用与东盟国家携手合作共建的方式，在世界走向中国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双向互动过程中，与东盟各国以及沿路各国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走好友好交流之路、海上商贸物流之路、互联互通之路、产业投资之路、海上合作之路、旅游观光之路、资金流通之路、人文交融之路。

共建海上丝路，不仅深化了中国—东盟互利关系，促进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形成，而且还将重新打通阻滞多年的亚欧经济动脉，将中国、东南亚、西亚、北非乃至欧洲联结起来，构建起一个海上“连通东盟、南亚，甚至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市场链，形成覆盖数十亿人口的共同市场”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将以其深化改革开放的独特作用推动中国梦的实现并走向世界。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举措

作为一个海洋面积占陆地面积三分之一的海洋大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海洋强国应属题中应有之义。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全球范围的“蓝色圈地运动”高潮迭起，海洋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比重，海洋安全也在国防和军事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海洋方面的主权纠纷和问题处置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外交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意义尤为重大。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举措：通过共同建设，我们将在发展国际海洋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在海洋科学、技术、管理方面的前沿成果和先进理念，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带动和促进海洋经济转型升级，使海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通过共同建设，我们将积极参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积极参与国际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海洋可持续利用和发展；通过共同建设，我们将在推进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海上旅客和货物运输以及海洋经济等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在共同建设进程中，我们将借助于我国传统的“和”文化理念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以和平、合作、和谐的新“海洋观”，推动海上共同安全和海上共同利益的和平战略，建设海洋强国，推动世界的和谐发展。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实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

古时郑和七下西洋，无论沿途国家大小，均采取普遍平等的公平政策进行商贸交易与文化往来，从未以强凌弱。郑和下西洋不仅证明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商贸作用，还印证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有的只是中华“和”文化的传统。如今，十八大报告在我国外交政策上突出了“合作共赢”的外交方针，既是对中国古代“和”文化的传承，又是以全球视野和大国情怀，将“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外交传统与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有效结合，倡导“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以“和”的文化理念引领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正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外交战略，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构想和布局来看，就是要在促进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中国连接东亚、西亚、南亚、北非、欧洲海洋交通运输网络，以点带面，从线到片，实现区域大合作，为沿途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是中国重视周边外交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延续，充分体现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以“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式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蕴含着我们勇于担当的大国责任，推动世界“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在合作共赢中维护共同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大国情怀；借助于“和”理念的历史符号，以“和”为魂，以和平、友谊、合作、发展为要义，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与东盟国家及沿线国家共建共赢的合作进程中，把“海上丝绸之路”打造成为和平共处的和平之路、稳定畅通的安全之路、情感相依的友谊之路、互助共赢的合作之路、持续共赢的发展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必将实现于同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发展繁荣的“世界梦”的交相辉映之中。

“海上丝绸之路”的21世纪新构想

杨保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海道交通的大动脉，与经过中亚通往亚欧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相呼应，见证了两千余年来中国与世界的政治关系演变及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

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东盟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并出席APEC峰会。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对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所经地区及相关各国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政治稳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将给中国带来地缘政治利益

这条海上大通道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为基础的。因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规划也是以其所具有的极大经济价值为出发点的。

从目前的部署来看，打造新“海上丝绸之路”首先以东盟及其成员国为依托，这就为该设想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和东盟是这一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之下，依然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达到7.7%的较高水平。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的进出口总值达到4.16万亿美元，其全球货物贸易将首次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使包括东盟及其成员国在内的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实惠。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地缘关系，东盟及其成员国在经济发展上也一直希望能够“借力”中国。中国同东盟携手合作，为双方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和不竭商机，从而有利于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目标。目前，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4 000多亿美元，是10年前的6倍；双向投资超过1 000亿美元，是10年前的4倍。此外，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讲演时还提出，中国愿提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水平，争取使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支持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表达了中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东盟国家开放，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东盟国家的良好愿望。

当前，中国和东盟都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东盟已经明确规定了2015年建成共同体，实现互联互通的一体化建设目标。为此，需要落实一系列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例如，开展庞大的基础设施建

设，增加商品、物资、人员往来的便利就成为当务之急。中国领导人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够为东盟解决基础建设缺乏资金的现状提供一个有效的融资平台，无疑将有益于东盟共同体的建立与巩固。从长远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将有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升级，从货物贸易和投资，更多地发展为包括信息流、人员流等在内的一个立体的互联互通网络，从而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使中国—东盟自贸区实现实质性的飞跃。

此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立足于夯实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基础，也能够更加凸显东盟所具有的特殊地缘优势，充分体现其在东西方经贸交往中的桥梁作用。因为“海上丝绸之路”将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联起来，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不仅能够造福中国与东盟，而且能够辐射南亚和中东，这与正在力图通过加快实现一体化以提高其影响力的东盟战略利益是相符的。

与此同时，中国和东盟合作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与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得益彰，从而保障中国自身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从地域上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有望覆盖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并与中国此前提出的建立“中缅孟印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等战略构想连为一体，极大地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战略支持，也有利于促进中国自身进一步深化改革进程，加大对外开放，从而为推动经济转型的顺利实施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切都说明，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无疑将增强中国和相关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和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并将给中国带来地缘政治利益。

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从历史来看，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经贸通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渠道。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之所以能够形成文化相通，血脉相亲，成为天然的合作伙伴，正是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为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并不止于向海外传播了中国的丝绸。中国古代的许多发明创造，例如举世公认的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等四大发明，以及中医学、中草药等也主要是通过这条海路远播各国的。又如，宋代以后，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外销的主要商品之一，以至于有人把这条海上商道称为“海上瓷器之路”，或者“海上丝瓷之路”。与此同时，许多外国的特产，如珍珠、宝石、象牙、犀角以及各种珍稀矿产、药材和经济作物新品种，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些交流不仅改善了双方人民的生活，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此外，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人民往来的主要途径。据史籍记载，早在唐朝以后，就有大批华人通过这条海路前往各国谋生。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定居当地，并与当地妇女结婚，繁衍子孙。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原因，明末清初以及19世纪中期以后，更是出现过多次华人大规模移居东南亚等地的高潮，使这一地区至今仍是海外华人数量最多的地区。定居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华人与当地民众和睦相处，艰苦创业，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华侨华人也是其所在国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

因此，在今天倡导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虽然经济贸易仍然是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但还必须把社会文化交流提升到足够的高度予以充分的重视。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以及海上丝绸之路

所经各国的互联互通中，人员及文化交流将成为经济合作能否得以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笔者认为，也正是出于对文化交流重要性的充分认识，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的演讲中才会特意提及郑和七下西洋途经东南亚、中国名著《红楼梦》对爪哇珍宝的形象描述等回顾双边民众友好交往的片段，以说明打造新“海上丝绸之路”符合双方人民的真诚愿望，是血脉相亲的共同要求。

也正因此，中国倡议将2014年确定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等具体举措，才会赢得广泛赞誉。

三、为地区稳定繁荣创造新机遇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激发各国发展活力，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这不仅会带来经济利益，而且还将构建更广阔领域的共赢关系，有利于打造稳定的合作环境，为地区的长久稳定与繁荣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习近平主席在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时就已提出“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循序渐进的建设思路，并为此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举措。可以看出，这些举措不仅致力于经济发展，也重视政治关系的稳定。同样，这“五通”举措无疑也适用于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须看到，习近平在提出建立“海上丝绸之路”设想的同时，还提到要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强合作、寻求共赢。这体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强调改革开放、合作共赢理念，在发展中更多强调惠及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理念，而且反

映了中方对通过促进区域合作以实现维护地区稳定、发展与繁荣的期望。

因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由中国一家主导的地缘经济合作计划，更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称，中国试图通过重建“海上丝绸之路”来恢复历史上由中国主导建立在“朝贡制度”基础上的“华夷秩序”。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将是一个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正如习近平在印尼国会的演讲所提：欢迎域外国家为本地区发展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希望多做对本地区有利的事情。在此过程中，中国与有关各方将持相互尊重、多元包容的态度，通过平等协商和协作共同解决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并循序渐进地逐步推进和落实各项目标。毫无疑问，在新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符合相关各国维护地区稳定、谋求经济发展、扩大经济合作的利益需求，并得到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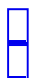
四、挑战与未来

如上所述，中国所倡导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无论对中国、对所涉及的地区各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打造新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还面临着一些风险和挑战。与该计划相关的个别国家政治局面不稳，基础设施落后，经贸法规薄弱；中国与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对双边关系造成一定的干扰。但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以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已经有着相当坚实的基础。特别是目前中国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着重点是立足于东盟及其成员国，而通过中国与有关各国长期以来的共同努力，密切的合作确实已经给各方都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利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

都是近邻，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可谓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兴衰相伴、同舟共济。

因此，双方关系的本质是立足于互利共赢的。我们可以从中国领导人的反复表态中看出，中国将始终坚持在这些地区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排他性合作，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与东盟不断巩固政治和战略互信，与其各成员国继续真诚相待，携手共进，以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来处理同有关国家的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国和东盟双方都牢牢把握战略合作的大方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有美好的未来，并将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形成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局面奠定扎实的基础。



第七章
“一带一路”的潜在风险

“一带一路”的障碍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在习近平主席首先提出这一概念之后，以“一带一路”为方向的“走出去”大战略已变成了中国开放的一个主轴。作为一个有着美好愿景的战略，“一带一路”要最终成功，需要处理好国内与国外、政府与民间，以及长期与短期三个关系。

国内与国外

“一带一路”在中国国内已经引起热烈反响。国内许多人都将其视为有利于中国产能输出，以及获取资源的新机会。但别忘记，“一带一路”是一项国际合作战略，仅凭我们国内的热情很难做好。就算中国不缺资金、技术和意愿来帮助相关国家发展经济，别人是否领这个情还不一定。所以，“一带一路”的主要阻力在国外而非国内。因此，处理好国内与国外的关系是推进“一带一路”的关键之一。

首先，我们得同时站在国内和国外两个视角来思考“一带一路”，这样才容易发现别国的关切和顾虑。比如，我们国内高谈产能输出的时候，别国就可能担心我们产品倾销；我们热议资源获取的时候，听在别国耳里就可能变成资源掠夺；我们这边热心地想着给别人修基础设施，别人有可能担心主权受到威胁。类似这样的国内外认识偏差不在少数。这是国内在推进“一带一路”时必须要考虑到的。

其次，“一带一路”在国际上的宣传工作也非常必要。我们需要清晰地阐述这项战略的目标和内涵，给相关国家一个明确的预期。只有明了战略的具体内容后，外方才可能真心投入其中。至于外方可能存在的顾虑，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解释。比如，中国的过剩产能很可能正好是别国所缺，双方合作是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博弈。

再次，“一带一路”的推进需要充分尊重别国的意愿。对于这项战略，别国在认识、接受上会有一个过程，而国外政府的执行力也未必赶得上中国，这些都可能造成其行动的迟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别国的选择，而不能将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强加于人。只要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做好工作，让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尝到甜头，不愁别国不赶着要搭这条大船。

政府与民间

毋庸讳言，“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的国家意志。因此，中国政府的参与是必然的。但“一带一路”仅靠政府也远远不够。相比这一战略所勾勒的宏伟愿景来说，中国政府所能提供的资金规模是有限的。更重要的，如果这一战略完全变成政府行为，势必会增加外部的疑虑，给推进带来更多阻力。

所以，“一带一路”必须也要吸引民间参与。这个民间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外。而要协调好政府和民间的关系，政府需要做到“稳预期、担责任、敢放手”三点。

首先，政府需要给民间提供稳定的预期。民间资金要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自然需要赚取合理利润。事实上，持续给民间创造有吸引力的商机，是“一带一路”战略能内生性持续发展的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需要清晰地告诉民间：战略的长、中、短期目标分

别是什么，会在哪些领域展开，推进的方式将会如何。有了这样清晰的图景，民间自然会发掘其中的投资机会，积极参与进来。

其次，政府要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一带一路”的基础是通过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便利相关国家与中国的人员、资源和信息流动，从而加深经济的融合。基础设施虽然有较大社会效益，但也有投资大、周期长、回报率低的特点。它的这种公益性决定，政府必须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担起主要责任。就算要引入民间资金参与，前提也必须是政府给出足够补贴，从而将项目的回报率提升到有吸引力的水平。另外，基建投资至少在短期内会产生很大债务负担，这些也理应由政府承担起来。政府如果没有承担起这些责任，而寄希望于民间，那将极大迟滞战略的推进。

最后，政府还要在该放手的时候“敢放手”。政府“搭了台”之后，就应该放手让民间来“唱戏”。互联互通做好了，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怎样更优地配置，就应该交给民间、交由市场来决定。要相信，对于该生产什么、该在什么地方生产、该怎么生产这样的问题，企业家比政府官员更清楚。资源该向什么地方、向什么行业配置，市场也能给出更好的答案。事实上，只有这种囊括了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大市场建立起来了，“一带一路”在经济层面的目标才算基本实现。

长期与短期

“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战略。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一块当然会对经济总需求有拉动作用。但不能因此将“一带一路”理解或操作为短期的刺激性政策，否则既贬低了这一战略的意义，也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

这方面，中国2008年推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是个前车之鉴。应该说，“4万亿”有力地对冲了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在稳定经济和社会方面发挥了不容抹杀的功劳。但是，“4万亿”的急放与急收也给国内经济带来了两次大的冲击，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后遗症。

“4万亿”推出之时，财政和信贷资金投放快速放大，建设项目也大规模上马。这确实在短期内带动了经济增长的复苏。但是，宽松政策也快速推高了物价和资产价格，并恶化了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4万亿”退出也同样迅速。2010年初，强力的地产调控措施就开始陆续出台，货币政策也快速从扩张转向紧缩。那些在2009年受信贷支持而上马的投资项目，转眼就碰到了银行抽贷的困局。

正是快放与快收带来的两次冲击，让为稳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的“4万亿”承受了不少骂名。以至于后来政府再要出台任何刺激性政策，都要极力与“4万亿”做好切割。如果类似的情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生，那将对中国的声誉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为中国未来任何“走出去”的计划制造障碍。

因此，“一带一路”计划必须着眼长期，稳步推进。短期不能急，长期不能松。

建设将为历史铭记的“一带一路”

对于“一带一路”计划，观察者必然会将其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做比较。二者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

在1948~1951年的三年半时间里，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国家提供了127亿美元的援助（占同期美国GDP的1.2%），帮助西欧经济完成了战后的重建。不过，这些援助在拉动西欧国家经济增长、缓解其物资瓶颈方面发挥的作用其实是次要的。“马歇尔计划”的真正

意义在于帮助西欧国家完成了从战时管制经济向战后市场经济的转变，为接下来西欧的高增长打下了制度基础。1991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了一篇总结“马歇尔计划”的文章，标题就叫作《马歇尔计划：历史上最成功的结构调整计划》。

“马歇尔计划”给了我们启示。要把“一带一路”建成一个为历史所铭记的工程，一定不能只着眼于对国内外经济增长的拉动。更何况，考虑到目前中国和有关国家的GDP水平，“一带一路”的规模还赶不上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因此至少在短期内，它能给相关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直接拉动不会太大。

但“一带一路”在改善沿线国家经济结构方面大有可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可以缓解长期制约这些国家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而通过互联互通设施的建设，这些国家与中国，以及这些国家相互之间也能加强经济融合，从而打造互利共赢的经济共同体。这些都有利于挖掘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如果“一带一路”能够帮助这些国家跨越低收入陷阱，减少贫困，并走上更快发展的道路，它就一定会被历史所铭记。

在这样的愿景之下，切实处理好国内和国外，政府和民间，以及长期和短期这三个关系，“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就能少一些障碍，多一些进展。

“一带一路”勿陷日本海外投资困境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通过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不少人对这个新战略持积极期待的态度，因为它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开放举措，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承担大国责任的初步尝试。不过疑虑也不少，国际上有人担心中国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把亚洲变成变相的经济附属区，甚至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无条件“撒钱”，扰乱国际经济秩序。国内也有专家提出，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有不少低收入人口。因此，发展国内经济仍然应该是政策重点，现在政府决定将大量的资源投向海外，其合理性值得仔细推究。

过去三十几年来，中国一直采取“韬光养晦”的国际策略，低调谋发展。不过现在情形发生了变化，中国已经从小国经济变成了大国经济。按市场汇率算，中国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第二，按购买力平价算，中国已经排名第一。通常说的“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也证实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再想低调发展经济已经不太可能。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公开呼吁中国要承担大国责任，不能总是“搭便车”。所谓大国责任，就是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让其他国家“搭便车”。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刺激经济增长，曾经获得国际社会的正面评价。

与此同时，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也出现了一些与现实经济不匹配的缺陷。一是缺乏稳定、可靠的国际货币体系。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对全球金融稳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美联储只对美国经济稳定负责，是一个很难调和的矛盾。二是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出的一套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理念，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三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但他们在重大国际经济事务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出现了改革国际经济体系的呼声。过去几年，中国也积极参与了IMF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重建、G20峰会机制创立等工作，不过，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工作成效不是很大。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第一次独立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张。最近IMF和其他一些机构也开始倡导基础设施投资，但推不动。通过建设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几年间的一个重要经验，也就是通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中国在发展政策方面的比较优势。现在中国把自己成功的经验介绍给国际社会，对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提供一个有益的补充。这个战略也是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发展中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当然，中国在推动“西进”经济合作的时候，客观上也降低了短期内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坚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件好事。

在最近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主张和风险，在实施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

第一，不要把“一带一路”当成冷战的工具。最近有国际关系学者提出，太平洋地区已经形成以中俄和美日为两极的状态，两极要竞争新规则的制定权。他们认为唯一能保障规则制定权和经济利益的就是军事实力，所以中国必须在军事上争当“老大”。这种试图另起炉灶的冷战思维是极其有害的，当年一些国际关系专家建议中国不参加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至今我们还被排斥在这个旨在建立全球经济自由化新标准的谈判之外。目前中国也根本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虽然经济规模已经排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苏联的经历告诉我们，没有以强大的经济为基础的军事实力只能是空中楼阁。

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仍然应该遵循发展优先的原则，“一带一路”的目的应该是继续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一直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包括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现在我们承担大国责任，就应该积极和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补充而不是挑战或替代现行体制，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蕴岭研究员所说，我们要“修庙、建庙、不拆庙”。既然作为一个国际倡议，中国应该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保持开放的态度，在包括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海上丝路银行等问题上，不但要平等对待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应该在时机合适时欢迎日本和美国参加，共同提供资金、创建规则。

第二，不要让“一带一路”战略演变成国际版的西部大开发。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投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现在近20年过去了，除了个别地区曾经得益于大宗商品市场的繁荣，总体看来，西部经济没有显著起色。事实上，后来政府主导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经济崛起也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些政策效果不理想，原因各异。但其中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中央政府投资，对地方来说相当于免费午餐，无论是投资决策还是项目实施，经济回报都不是重点考虑的因素。“一带一路”战略要避免这个问题，不能主要由中国政府提供资金，各国应该平等合作，而且要设计合理的政府与市场合作机制。选择项目要特别谨慎，成熟一个，实施一个。如果中国政府大包大揽，不但投资容易“打水漂”，在国际上花钱买怨恨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第三，不要因“一带一路”战略引中国步入当年日本海外投资的困境。客观说，日本有相当一批中高端制造业企业在海外运行得非常好。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劳动成本上升和日元升值，大规模的资本以直接投资的形式从日本流向海外，特别是一些高调的金融和地产投资案例，引发了“日本将买下世界”的惊呼。但后来日本不但没有买下世界，很多投资最后也都不了了之。类似的情形似乎已经开始在中国上演，有人把2014年中国安邦保险买下纽约曼哈顿华尔道夫酒店与1989年日本三菱财团买下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相类比，甚至惊呼“中国将买下世界”。但现在中国企业走向海外，能不能避免当年日本企业的困境呢？

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著称的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曾经指出一个普遍的规律：即发展中国家输入资本、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但经济学家卢卡斯提出了所谓的“卢卡斯悖论”，即低收入国家输出资本，后来的学者为这个现象提供了各种解释。不过，仅就直接投资而言，邓宁的发现应该还是成立的，因为一个企业能够到海外去投资，必须拥有独特的国际竞争力，这样才有可能在海外市场获得高回报。按照这个标准判断，目前中国只有两类企业拥有国际竞争力，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二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直接投资国，但超过一半的对外投资都不赚钱。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带一路”盲目地带动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后果堪忧。

总体看来，“一带一路”是一个好的国际经济策略，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取得成功却不容易。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但不要过多介入经济决策。比如建设基础设施，最好是由东道国提出，通过国际合作机制来安排。同时要引入市场体系，保证有回报才开始建设，尽量不要做“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要解决企业决策机制的问题。很多国有企业投资失败也不承担责任，它们盲目对外投资其实很危险，不但容易引起东道国的反感，也很难获得好的投资回报，实际是白白浪费国家的外汇资源。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失

败的案例也很多，但它们投资的是自己的钱，会很快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政府和社会应该尽量提供信息和服务，降低企业犯错的可能性。

“一带一路”建设的十大错误认知

赵磊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在丝路建设中，要时刻思考什么样的中国对丝路国家有吸引力，什么样的中国身份对丝路国家有吸引力。简单来说，第一是发展、稳定，第二是开放、便利。丝绸之路的魅力不仅是一条经贸通道，更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

自2013年11月至今，笔者在参加“一带一路”相关学术会议以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常常感受到“一带一路”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为一个大蛋糕，大家都在忙着争抢，很多认知错误不断地发酵、传染……这些认知错误如不纠正，必然会导致“一哄而上、一抢而光、一哄而散”的窘境。

1. 慎用“桥头堡”：很多省份定位自己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Bridgehead），但是桥头堡是军事术语，他的本意是防御性的，即“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进来”，这个词汇翻译成外文，不具开放性、包容性，而且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 慎谈“过剩产能”：常有媒体提到，“‘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把过剩产品销售出去。”这个词汇，让沿线国家听了很反感，你不要的、过剩的，别人会要吗？

3.“沿线有65国家”的表述不准确：千万别把丝路沿线国家限定在65个。全世界有230多个国家，只要致力于“一带一路”发展的，都是丝路国家，这样看既包括美国，也包括拉美，等等。

4.“丝绸之路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表述不准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是中国西北五省以及中亚五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以及东盟十国，但他们的两端一头连着繁荣的亚太经济圈，另一头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因此，发达经济体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也是丝绸之路的宝贵财富。发达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成员。

5.“资源、能源合作”不是“一带一路”的唯一主题：有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保障中国的资源、能源供给，确保稀缺性资源的战略安全。的确，丝路沿线国家大都有丰富的资源和能源储备，例如黑金（石油、煤炭）、蓝金（天然气）等，但是这些国家非常不喜欢“一谈生意就是资源、能源”，他们不希望成为“骑士的马”。

6. 有为才有位，不用忙着定位：很多省份在忙着争抢历史上谁是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有的叫丝绸之路的“新起点”、有的叫丝绸之路的“黄金段”、有的叫丝绸之路的“节点”……。这在全球化、互联网经济时代的意义是有限的，关键不是叫什么，而是要有内容、有亮点、有突破，即在今天本省份有哪些“错位竞争、不可替代”的丝路优势。

7. 中国向丝路国家卖什么：有很多省份一想到丝绸之路，还在丝绸、茶叶、陶瓷等“老三样”上做文章，但这是历史上中国的主打产品。今天，我们要卖什么？首先，需要了解合作伙伴需要什么，要超越“有什么卖什么的阶段”：对方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要多卖必需品（如美国的“三片”：薯片为代表的餐饮、芯片为代表的科技、影片为代表的娱乐）、少卖奢侈品，既是卖产品，也是卖价值、卖文化，通过消费中国产品要上升到对中国的欣赏和认同（而不是与之相反）。有很多省份抱怨，有了宽马路，但车上没有产品，“通道经

济”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与辐射作用远远不够。所以，要在卖什么上做文章。

中国向丝路国家买什么：我们需要什么，就买什么。今天中国企业特别需要提升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整合资源能力，品牌价值是中国企业最需要购买的。中国城市特别需要好的创新与创业经验，中国省份需要找到真正治理现代化的路子，艺术气质、文化品位、坚持与坚守是中国城市最需要购买的。

8. 丝路战略既要顶层设计、更要基层创新：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地方干部最后的总结往往惊人得相似：希望中央重视我们，给予特殊的政策，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倾斜；我们有干劲，就等中央一声令下，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种现象概括为“寄希望于高层怎么说”，但是，北京的专家再聪明，他们不一定比新疆的干部更了解新疆，中南海的领导再英明，也不一定比广西的干部更了解广西。所以不能等，要有基层创新，要先做起来。

9. “一带一路”不能自娱自乐，要深入了解每一个丝路国家：中国人往往把22个阿拉伯国家看作一个整体、把五个中亚国家看作一个整体、把54个非洲国家看作一个整体……，据此制定整齐划一的政策。但“一带一路”要真正具有生命力，我们就不能想当然地、自娱自乐地、简单片面地同丝路国家打交道，要真正去了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群体对中国的期望、对我们的需求。战略避讳的是肤浅。

10.“一带一路”不易过快、过急，没有时间终点，但有时间节点：要适时推动“一带一路”落地，特别是要在智力支持上下功夫。海南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他们的淡定与远见是因为他们有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建议整合全国人才资源在南方省份建立海上丝路研究院，在西北省份建立陆上丝路研究院，同时配套建立智库产业园区，提供中国企业“走出去”所急需的信息交互、对接服务、风控管理等

平台。同时，要积极发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的作用不可低估。

总之，在丝路建设中，要时刻思考什么样的中国对丝路国家有吸引力，什么样的中国身份对丝路国家有吸引力。简单来说，第一是发展、稳定；第二是开放、便利。丝绸之路的魅力不仅是一条经贸通道，更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今天，中国丝绸之路2.0版，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不仅要产业升级、市场扩容，更要思路升级，有思路才有丝路。

未雨绸缪“一带一路”的风险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一带一路”的“三五效应”

从人类文明史和全球化格局看，“一带一路”伟大倡议具有“三五效应”：

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推动中华陆海文明协调发展。中华文明长期受制于北方威胁，局限于内陆。海防还是陆防，一直困惑中国的防御布局。“一带一路”明确中国同时从陆上和海上走出去，既发挥传统陆上文明优势，又推动海洋文明发展，使中国真正成为陆海兼备的文明型国家。

二、五百年未有之变局：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性方向发展。

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古代丝绸之路，是西方从东方输入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制造”，中亚、中东等地只是贸易通道，成为东西文明的洼地。“一带一路”倡议对这两方面都实现了超越。“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这将极大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

先获益。这就超越了之前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

三、50年未有之变局：推动中国塑造欧亚一体化。近50年来，中国通过武斗——朝鲜战争、文斗——中苏论战，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但是中国始终不是世界潮流的开启者。“一带一路”是中国从“融入全球化”到“开创全球化”转变的标志。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通过全方位开放所塑造的新的比较优势。两条“丝绸之路”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从开放的内涵上来讲：“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从开放的广度上来讲：为发展中国西部地区，实施向西、向南开放的战略，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从开放的深度上来讲，顺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两条丝绸之路首先是一个欧亚地区交通网络：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沿这些交通线路将会逐渐形成为这些网络服务的和相关的产业集群，由此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形成建筑业、冶金、能源、金融、通信、物流、旅游等综合发展的经济走廊。这个交通网络将把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亚太地区与世界最大经济体欧盟联系起来，给欧亚大陆带来新的空间和机会，并形成东亚、西亚和南亚经济辐射区。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是两条丝绸之路建设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对域内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

近年来，欧盟提出从里斯本到海参崴的欧亚一体化战略构想。俄罗斯也提出欧亚经济联盟战略。“一带一路”比这些更大、更切实、

更包容。为此，中欧、中俄关系更具战略性，中欧俄合作将破解美国旨在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等更高标准全球化排斥中国的企图。欧亚大陆被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誉为“世界岛”，其一体化建设将产生让美国回归“孤岛”（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的战略效应，和让亚欧大陆重回人类文明中心的地缘效应，重塑全球地缘政治及全球化版图。中国模式和丝路精神的推广，也将极大增加中国的软实力。

发展“一带一路”面临海上安全风险、国家猜忌以及“三股势力”挑战。如何确保安全的发展与发展的安全？这就要将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外延。“一带一路”也切实回答了中国崛起后给世界带来什么——发展的机遇与安全的责任。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中仅有的非美国盟国，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没有海外盟友与军事基地，只能通过租赁、特许经营权、合建港口等方式解决海上通道安全及未来航母补给站等问题。

然而，打铁还要自身硬。“一带一路”最大的风险在于国内能力与认识未到位，出现一窝蜂上的情形和“山寨丝路”计划现象，从产能过剩到丝路过剩；一些做法是将国内那套发展模式推广至丝路沿途国家；习惯走上层路线，可能遭遇来自不稳定国家和地区的底层革命冲击，将来中国可能陷入疲于应对海外利益维护、海外法人安全的挑战，崛起进程夭折。

不可忽视的是，“一带一路”是需要10年以上时间推进的伟大工程，面临不少地缘政治风险，这些风险还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种种不确定性，必须未雨绸缪，妥善应对。

战略风险

基础设施都是战略性投资，互联互通需长期经营。“一带一路”改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战略，至少需要10年谋划、经营，战略风险是多重的：

1. 中国的战略扩张。包括战略投入与战略补给两大风险。“一带一路”沿岸、沿途国家对美国霸权的失落，可能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邀请中国战略介入中东、中亚、西亚和北非等地，对中国战略诱惑不小；丝绸之路经济带要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而战略资产易投不易守，这些都可能使中国陷入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警告的“过度扩张”的危险。丝路基金采用国际融资手段，也可能陷入杠杆化风险。如果这些投资都是中国人民银行托底，会出现又一个“4万亿”问题。

2. 美国的战略围堵。“一带一路”是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艰苦努力才能建成的伟大事业，如何处理好与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及全球化关系？对其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绝不可低估。美国还看不懂“一带一路”构想的意义，或不看好其前景，认定那是个“Illusion”（美梦），目前忙于应对两大中国挑战：一是以“亚洲新安全观”为风向，试图动摇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二是在现行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外另起炉灶，比如搞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但美国一旦醒悟过来，认定“一带一路”计划可能成功，并且对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产生重大挑战，一定会怂恿盟国和沿途国家进行反对或破坏。美国在加速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可能重拾“新丝绸之路”计划并加以改造，从海陆两路进行搅局。

美国可能的破坏包括：一是美国的联盟体系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与沙特的特殊关系怂恿三股势力搅局？二是为维护海上霸权，不断强化印太战略，加强亚太、印度洋军力，重点利用东亚海洋领土争端，挑唆声索国制造事端，企图“以邻制华”“困龙浅滩”、遏阻中国“海洋崛起”。三是策动沿途国家（尤其是缅甸、越南、中亚国

家）的颜色革命。四是加紧通过利益集团代言人对我施加影响，策划推动“五独”势力的合流，推动中国台湾加入TPP。五是与日本一道利用亚行阻止AIIB（亚投行），败坏“一带一路”声誉。

3. 俄罗斯的战略猜疑。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衰与俄罗斯、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密切相关。“一带一路”的关键挑战海上是美国，陆上是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投入运营，其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该组织还将吸纳新成员，亚美尼亚近期即将加入，吉尔吉斯斯坦则拟在2015年5月加入，不排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未来加入的可能性。如果算上吉尔吉斯斯坦，将有3个联盟成员国与中国接壤，其中哈、吉均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普京曾表示，经济联盟将成为独联体地区的一个经济引擎，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因此，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麻烦不只是以其主导的地区合作组织分化有关国家，更在于欧亚经济联盟的不接轨，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与“一带一路”理念、体制不兼容——无论铁轨的不兼容还是技术层面的不兼容，观念上的不兼容更麻烦。

4. 印度的战略不合作。印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刚称，印度未表态支持“一带一路”理由有三：一是成本巨大（要8万亿美元大规模投入），印度不愿投入，担心无法获益。二是所经地区争议、动荡，比如经过克什米尔地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经过缅甸不稳定地区，中巴经济走廊经过不稳定弧等。三是担心被中国包围，尤其是从海上、陆上恶化印度安全环境，担心美国的介入影响其独立自主性等。中国应效仿中日21世纪委员会建立与印度的二轨机制，争取印度支持。

5. 日本的战略搅局。作为美国的盟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者，日本一定不会坐视“一带一路”成功，可能成为美国联盟“使绊战略”的排头兵。日本在丝路沿途国家经营多年，“一带一路”动其“奶酪”，可能采取如下措施破坏：一是在中南半岛、孟加拉湾搞互联互

通与我唱反调；二是利用其FDI优势搅局；三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破坏我项目；四是利用亚行基建项目与我竞争。

6. 地缘政治风险。美俄战略对抗影响“一带一路”沿途、沿岸地区稳定，相关国家可能成为美俄代理人对抗的牺牲品，尤其是乌克兰危机走势、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沙特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影响，滋生种种地缘政治风险。此外，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三股势力”再度抬头；东亚海洋领土争端加剧，中国在海洋安全方面面临的严峻现实威胁对建设海上丝绸之路颇为不利；气候变化、极端天气、水资源冲突等也可能将中国搅进去。

“一带一路”沿途、沿岸64个国家中，目前表态支持的有50多个，但是无条件支持的并不多。多数国家指望“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多多收益，并未准备好投入，一些国家甚至公开恐吓，“支持不足而捣乱有余”，可能配合外界干扰“一带一路”建设。政局不稳或对华关系紧张，更导致立场的逆转。基础设施投资都是战略性、长期性的，有赖于沿途国家的政局稳定、对华关系稳定。要防止可能的颜色革命干扰和对华挑拨。

归纳起来，跨国投资可能面临的安全风险有4个层次：

1. 企业和企业经营者（“一带一路”可能涉及的派遣人员人身安全）：主要是企业选择的投资和运营方式、企业文化（与投资流向的国家文化是否冲突）、企业处理风险的方式和能力等。就私人投资而言还需考虑企业经营者个人安全的因素，这主要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2. 与相关国家内部治理有关的风险：主要包括政权稳定性，主要政治机构变更或更迭的可能性，是否有改革（反腐等）及改革强度、法治情况等，可有不同指标衡量。如中亚地区：长时期的独裁（领导

人更迭时可能有风险）、经济自由度、法治指数、移民情况等。希腊：债务、政权更迭与党派间竞争。

3. 国家间冲突造成的风险：乌克兰危机后俄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中国东海与南海的边界冲突，宗教、民族冲突，其他武装冲突愈加突出等。另有由美国撤军导致的地区安全形势恶化。跨国移民，尤其在欧洲地区，移民所导致的安全风险正在大幅增加。

4. 全球性问题：主要可提大宗商品价格、网络安全、海上安全。

如何应对风险

确立“两容、两分、一抓”的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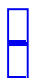
所谓“两容”，一是与当地已有合作架构的兼容，尽量不另起炉灶；二是与域外力量的包容，不是排挤俄美欧日等域外势力。美国的比较优势是军事联盟体系，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人、技术、经验和地缘，可以参照北约与欧盟的合作模式——北约提供欧洲的硬安全，欧盟提供软安全服务，避免重复、竞争——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一带一路”的兼容。历史上，英国无法承担全球霸权体系，主动请美国帮忙；不久的将来，美国可能对中国提出类似请求。中国要做好准备。

所谓“两分”，就是分好工，分好责，不能全包。金融投资不能央行托底，安全风险不能解放军托底，必须让当地利益攸关方和社会力量对接上，把我要维护安全变成他们要维护安全，把我的风险变成他们的风险。

所谓“一抓”，就是抓住欧洲。“一带一路”并非我单向推，终点站是欧洲，需要西头来主动对接。尤其是要借助欧洲运筹好中美俄

大三角关系，调停乌克兰危机。以中欧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欧海洋合作、第三方合作、网络合作，共同致力于政策、交通、贸易、货币、民心等“五通”，管控好“一带一路”风险。推动欧盟加入“海上合作组织”；与欧洲国家合作共同经营中亚、中东、西亚、北非市场。提升互联网国际治理的话语权；抓住美国“放弃”在互联网域名权给私人公司的计划，联手欧洲推动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民主化。

此外，推动地方与沿途、沿岸、沿线国家结对子。丝路沿线省份的政府承担国内、国际两大功能，为此应调整其工作理念，改变工作作风，帮助其寻找“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地区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全球伙伴网络要接地气，夯实“一带一路”安全的社会基础。另外可考虑创设安全外交机制。将丝路分区、分段，以支点国家外交实现区、片联动，先近后远，先点后面，有序推进，按领域建立安全网。与此同时，加强丝路公共外交，也是化解“一带一路”风险，消除“丝路威胁论”的必要举措。



第八章
丝路历史·大家谈

“一带一路”的历史被误读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

“一带一路”离不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概念，也离不开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和交通路线。对历史不了解或误解，往往会错把历史教训当经验，甚至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如果认真看一下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的讲话，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理性，某种程度上是以低姿态，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利益共同体，而不是有些人在不久前炒作的：中国人在推行新的“马歇尔计划”。

有些人把“一带一路”的成功称为“万国来朝”，这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出现这些有偏差的想法，是因为不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

一、“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背景

1.“丝绸之路”的概念变化

今天“丝绸之路”的概念跟最初出现时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实际上当初李希霍芬（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命名“丝绸之路”时，指的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路线，而现在指的地方已经离开了当初李希霍芬命名的路线。实际上，到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内容已经不是以丝绸为主，确切讲它只是作为交通线路，而不是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商道。

我们以前更多只看到中原对今天的新疆、中亚，或者华夏各族（也就是汉族、农业民族）对这一带的影响，实际不止如此。欧洲对这里的影响早就开始了。

比如，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已经扩展到印度、巴基斯坦，把希腊的文化传播到此。新疆阿斯塔纳古墓中有不少2 000多年前的干尸，其中有很多欧洲白种人。再比如，高加索到中亚这一带的人是人类最早驯服马、掌握骑马本领的，这是在3 000多年前甚至更早。

而在中国内地，汉人的祖先到战国初年才学会骑马。孔子时代，中原的马是用来拉车，而不是骑的，所以孔子教学生的六艺之一就“驭”。学会骑马后，服饰也发生变化了，高加索一带的游牧民族发明了裤子。中国考古界也发现，全国最早的裤子是在新疆发现的，有3 000多年历史。

再如汉传佛教，就是从三条丝绸之路之一传过来的，再从河西走廊传到中原，也有从印度、尼泊尔直接传到西藏，就是藏传佛教。阿拉伯势力强大后，伊斯兰教扩展到新疆，整个新疆特别是南疆就皈依伊斯兰教。

有观念认为，新疆这一块地方的文化好像是从内地传过去的，这是不对的。有汉族的文化，但也有其他地方的文化和宗教，而且往往其影响还在汉族文化传播之前。

这一带跟中原地区的交通早就有了，人类早期是喜欢交往的。河南安阳曾经出土过3 000多年前的商朝妇好墓，以及其他商朝墓中已经有玉器，经鉴定为和田玉，证明3 000多年前已经能把和田玉运到中原甚至更远。比如张骞是陕西人，他要通西域也是有向导的，证明交往早就有了。

但要称之为“丝绸之路”，是有特殊含义的，涉及主要贸易手段是什么，存在于哪一阶段。

2.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维护动力来自外界

从以上角度，我发现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是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这条路主要不是由汉朝人，而是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动力来自他们。“一带一路”白皮书中，习近平主席说与各国人民共同创建了丝绸之路，这个说法比较客观，但我想强调的是，汉朝当时没有创建丝绸之路的主动性。

首先看“丝绸之路”名称的来历。十三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都检索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187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亚进行了三年多调查后写了一本书，正式提出“丝绸之路”，而他指的是公元前2世纪前形成的一条由洛阳、长安一直到中亚撒马尔罕，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以后慢慢为地理学界、历史学界所接受，之后才出现了将对外交通命名为“丝绸之路”的现象。

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是张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但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贸易。汉朝初年，匈奴对汉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过70多年积累，到了汉武帝，汉朝实力增强，陆续打败匈奴，基本将其驱逐回了秦朝长城以西。汉武帝考虑怎样一劳永逸打败匈奴，他得到情报说原来居住在祁连山河西走廊一带的乌孙人跟月氏人，被匈奴压迫而西迁，其中月氏人迁到了大夏（即今天阿富汗这一带）。大夏与匈奴是世仇，汉武帝派使者前去，希望大夏与汉朝一起夹攻匈奴，但这并不容易，双方隔了太远的距离。

当张骞到达以后，大夏君主在那儿已经住得很舒服了，不愿与匈奴作战，结果张骞在那儿“不得要领”，没有达到实际效果。

张骞出使西域非常艰苦，路上被匈奴扣押十年，但他找到机会逃离匈奴到达大夏，而回程又被匈奴扣押一年。当回到汉朝，形势已发生变化，汉朝已经打败匈奴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没有达到，但他带回来的关于沿线的丰富情况深深吸引了汉武帝，他认为应该将汉朝影响扩大到这些地方，因此第二次派张骞出使，组织使团，带去大量丝绸、黄金、工艺品等，赏赐给将要出使的小国，扩大了丝绸在中亚的影响。

但丝绸也不是张骞出使才输出的，实际时间更早。拉丁语系、英语称中国为China，第一种说法是波斯人将中国称为“丝国”，这个发音慢慢演变为China读音；第二种说法是与“秦”谐音。至于称瓷器为china，则是倒过来，因为是来自中国的东西。可见张骞之前，外界尤其是波斯已经知道中国产瓷了。

但不自觉的、带偶然性的流通，与自觉的贸易是两回事。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中国丝绸在中亚的影响，引起了更远地方人们的兴趣。但商品经济的形成很重要的原因，是罗马帝国对中国的东西有需求。罗马帝国实力强大，对丝绸有强劲需求，罗马帝国贵族都以穿上丝绸为贵，随后丝绸价格甚至高过黄金，而汉朝是丝绸的唯一来源，且丝绸非常适合在长途的艰苦条件下贩运，丝绸质地轻，经得起炎热、寒冷的气候变化，更重要的是获取的利润足以抵偿昂贵的运输费用，甚至付出的生命代价。

但丝绸之路无论是哪条路线都是非常艰苦的，从南面要穿过帕米尔高原，从北面草原则距离更长，而且绕不过寸草不生的戈壁。在没有导航、机械交通，主要依靠骆驼、牛、马、人力的情况下，代价相当高，没有强劲需求是不可能支撑的。

3.历史上中国没有动力进行丝绸贸易

汉朝有效统治区域约有三四百万平方公里，人口6 000多万，汉武帝开疆拓土遭到很多人反对，良田的毁坏，换来的是干旱、寒冷的土地，而河西走廊开拓地是成功的，有大片绿洲、祁连山、稳定水源。

中国没有向外开拓的动力，中国的丝绸尽管一般人不穿戴，但也不是太昂贵的奢侈品，百姓也没有想到拿丝绸出去牟利。

中国历来以“天下之中”自居，无所不有，自给自足，对外无需求，没有对外贸易的概念。汉朝也不许百姓随意出关，历史上商人往往是没有其他出路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低，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利用过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路贸易中获利。

而现在不同，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们主动，但如果没有各方的主动响应，就建不起来，所以习近平主席再三强调互利，不搞零和，建立经济共同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端的一些国家来说，中国并非唯一选择。

建设“一带一路”出于中国主动，如何使各方积极响应并能持续，需要有相应的对策。

在商言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要考虑怎样使对方有动力，不要认为我们想建就能建成功，而对方一定会感恩戴德。

对方有对方的考虑，例如以前两国要建中哈边贸城，但中国基本建好了，而哈萨克斯坦基本没动。为什么他们积极性低，因为地理原因的限制，对方靠近边界是无人区。这与越南不同，中越就一河之隔，边贸禁都禁不了，跟朝鲜也一样。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国家地理就不一样了。经济带的建设，别的国家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在哪里，对方的油气、棉花不一定要卖给中国。

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上前提。

二、历史上，中国对中亚的控制是丝绸之路畅通的保障

丝绸之路通少断多，大规模畅通的时间少，民间零星局部畅通的时间多。

公元9世纪以后，海运发达起来，这条“丝绸之路”就大多是作为中亚内部交通线了，比如新疆喀什到中亚，而不是从内地到中亚。这个过程往往被忽略。

公元前60年，西汉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新疆有众多大大小小的绿洲，管理困难，因此采取松散的、监护性质的管理，都护就地解决问题。由中央政府派出军队利用中央权威的就地监护管理，其中的小国只要每年上报户口，表示服从统治即可。

西汉后期的著名人物陈汤发现，被自己打败的匈奴北单于逃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一带，于是擅自调动六小国兵力将其消灭。但汉朝有争议，有的认为，他不费一兵一卒，立下了不世之功；有的却认为，他假借命令，没有汇报。这反映了汉朝在遥远的西域的困境，对西域的统治仍不稳定。最终对西域的统治只维持到西汉结束，王莽时已经不能维持，西域都护府最终撤掉。

东汉“三通三绝”，此后时断时续。

丝绸之路恢复了三次，又断了三次，而且有时的维持完全靠杰出个人，比如班超，以及西汉留下的威望。但国力无法维持时，朝廷就下令撤退。东汉之后，这条路经常名存实亡。北魏实力强大，历史记载来自大秦的商人也到了中原，但当中原战乱，无暇他顾，正常的贸易、交流又会断掉。只有中原政权能够牢牢控制中亚时，丝绸之路才畅通，中国能掌握主动权。

唐朝初年，疆域最远扩展至今天的咸海，控制了锡尔河流域和阿默河流域，南面到了阿富汗，在西边有个军事行政的中心碎叶城，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丝绸之路就变成唐朝内部的交通路线，很畅通。“安史之乱”爆发，西域空虚，藏族祖先吐蕃扩张到今天新疆大部。此后，唐朝西界只到今天的甘肃，不可能再控制西域，早期发达的丝绸之路也就不存在了。

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已经找到了海上交通要道，大批阿拉伯人来到广州、泉州、宁波、扬州，海上交通线取代了陆路，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变成了中央内部的交通线了。

明朝初期一度控制哈密，但哈密以西明朝无法控制，明朝中期退至嘉峪关，连今天的敦煌都守不住，更不用说丝绸之路。

海运一通，商贸往来就更没必要走陆上丝绸之路的崇山峻岭了，而且海运不是以丝绸为主，还包括茶叶、香料、瓷器等，这是重大的变革。

三、为什么要强调“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背景

我们不要认为，从张骞通西域以后，历史上一直存在畅通的丝绸之路，这也就是习近平主席强调新疆问题有其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原因，我们要正视历史问题。

回顾历史不是说中国要去重新控制中亚，而是必须承认，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畅通是以中国对中亚的控制为保障的。中亚的稳定对陆上丝绸之路的安全非常重要，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应有相应对策，例如美国、俄罗斯的影响，宗教、民族（突厥语系）、水资源等问题的存在。

中亚是建设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方向，但我们有必须面对的一些局面。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中亚的影响日益扩大，出兵阿富汗，就租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用机场。2006年我们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入阿富汗才知道那里的友谊桥就是北约运输物资进入阿富汗的重要通道。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比哈萨克斯坦人还多，这是斯大林长期移民的结果。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变化很大，有亲西方的，有以民族独立为主的，有亲俄罗斯的。再如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的重要接口，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哈之间并非没有利益之争，比如伊犁河水的分配问题，伊犁河是哈萨克斯坦的主要水源，但也是新疆重要的水源。中国应该怎样跟纳扎尔巴耶夫之后的哈萨克斯坦保持关系？

我们互相不干涉内政，但什么是内政，如果他们的内政影响到了我们的国家利益时，我们应怎么办？我们跟周边国家的关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政权更迭，总统更换，执政党更换，如何遵守原来的协议。

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则应考虑马六甲海峡、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苏伊士运河、中美洲地峡等。马六甲海峡是我们目前主要的运输通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朋友；缅甸的形势很微妙，我们应该回过头想想我们对缅甸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我曾想，为什么希拉里是第一个会见昂山素季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照理应主动调停昂山素季与军政府之间的关系，那样的话现在局面就不同了。

建设“一带一路”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对这些地方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怎样在战略上保证中国的利益？

四、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往往有很多误解

现在我们习惯于拿西方的海洋观来看海洋，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他们的海洋观都来自于地中海，但地中海只有一个，非常特殊，基本是内海，海中还有非常多的岛屿、海湾，地理原因使古代国家在地中海的航行是非常便利的。中国最接近于地中海形态的是环渤海地区，中国古代环渤海地区是比较开放的，因为地区交通方便。但中国不具备地中海周边群星灿烂的文明，如希腊、罗马、小亚细亚、亚速、两河文明等多种文明交汇，文化不断交流。而环渤海地区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岛历史上较为落后，他们学习中国的积极性高。

海洋不过是载体，海上的航行终点在哪儿，能带出去什么，带进来什么，这才是本质。沿线牵涉到什么文化，他们有怎样的生活生产方式，我们要在这个前提下看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开辟和掌握的。因为中国观念中，海就是边缘，“四海之内”“山陬海澨”“天涯海角”等说法都是体现。西汉海上探索最远已经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中部，汉朝还有负责翻译的译使。但这之后的初级探索发现别的地方都比自己落后，所以就没有继续探索，海上技术反而倒退。

海上丝绸之路完全是由阿拉伯人开辟和掌握的，南宋泉州一度有很多阿拉伯人，广州的番坊、番长，都有阿拉伯人。郑和下西洋未超出阿拉伯航路，采取其经验和技术（针路，牵星过洋）出海，无经济目的，目的在宣扬国威，通过政治活动，建立明成祖政治合法性，号召沿线小国家到明朝来朝贡。

官方对外的海上活动往往只重政治目的，轻经济效益，导致维持丝绸之路缺乏动力。对民间贸易的禁止和限制，更损害了中国的实际利益。所以中国历史上不承认有正常的外贸需要，只想让人来朝贡。而外国通过朝贡比贸易获得的利益更多，也愿意甚至希望来朝贡。清朝一度禁止日本来朝贡，日本想办法冒充琉球人来朝贡。朝贡不是剥

削，而是变相的政治投资，一般情况下，不计较经济效益，只讲政治。

但这种朝贡中的对外赏赐无度，使外界期望值越来越高，造成财富流失，国库空虚，官民嗟怨。而且国家不主动经营外贸，主要利益为外方所得，对民间贸易却一贯限制甚至禁止，或课以重税，以致民间非走私不能获利。这些都是历史教训。

我们今天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如果什么都看成政绩工程，不考虑经济效益，全部依靠政府、依靠免税政策，而不是依靠民间经济上的交流就不会达到我们的目的，反而会增加外界对中国的抵制。相反，正常的民间交流、贸易倒是容易使双方都获得好处。

此外，我们还要在文化、民族、宗教上做准备，了解外界的情况。

坦率地讲，以前我们对外界、对自己历史的了解，基本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现在建设“一带一路”，要重新好好认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当地文化的关系，在文化上要像费孝通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珍爱自己的文化，但也要理解、欣赏、赞美别人的文化。“一带一路”建设如果只考虑经济因素，不考虑文化、民族等因素，同样很难达到我们的目标。

古丝绸之路，汉唐盛世的开放、交融

张伟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2 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自此之后华夏大地与西域诸邦之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同样，在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带去的是瓷器、茶叶、丝绸、工匠，而没有带去总督，没有带去扩张和称霸的野心。

汉唐盛世，曾经花雨缤纷、舟楫络绎的古丝绸之路，彰显着古老中华文明“和平、开放、包容”的历史血脉。

古丝路有几条

从亚欧大陆上的东西文化交流通道来说，现在学术界较为公认的丝绸之路有三大路线：沙漠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

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即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洛阳，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至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 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联结亚欧大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沿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

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它由“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大干线组成。东海航线从中国通向朝

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南海航线从中国通向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没落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但只有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草原丝绸之路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长城至塞外，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通向欧洲的陆路主干线。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向西亚、欧洲贩运丝绸也多走此道。由于其路段多在北方高寒地区，来往运输的货物除丝绸外，皮毛占大宗，故也称“皮毛之路”。

此外，中国古代还有一条重要的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于汉代，从洛阳出发，经陕西、四川、云南，前往缅甸、印度，是一条深藏于高山密林间的贸易文化通衢，它是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纽带，加强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在汉唐时发挥着重要作用。

古丝路涉及中国哪些省份

根据上述四条“丝绸之路”，有学者统计称，中国涉及丝绸之路的省份及地区有：辽宁、吉林、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港澳台、湖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

官方主导下的古丝路贸易

丝绸之路以贡赐（纳贡与赏赐）、边界互市的官方贸易为主，但也开展广泛的民间贸易。比如，唐朝特设鸿胪寺和典客署，鼓励朝贡

贸易以及互市或交市贸易。宋朝曾先后在今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除官方积极经营对外贸易外，还允许私人出海贸易。而在陆上丝绸之路，众多的胡商不仅组织庞大的商队进行长途贩运，还涌入沿线的城镇组织社团或单独经营，或与当地汉族商人合伙经营。

隋朝的官办“丝绸之路招商活动”

隋代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吏部侍郎裴矩在河西走廊开展的招商活动，是丝绸之路繁荣昌盛的序幕。隋王朝统一中国后，国强民富，遂拓通丝绸之路，大力经营西域。

开皇年间，吏部侍郎裴矩奉旨到当时的中西商贸重镇张掖“监知关市”，广泛开展招商活动，以扩大隋与西域地区的经济联系，使隋王朝的经济、政治影响迅速扩展至亚欧大陆的广阔地区。

此后，隋帝还亲自在燕支山下会见西域30余国国王及使节，决定在张掖设立互市，并派驻特使宣传、招揽官私贸易。在“张掖盛会”的影响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西域地区有更多的国家来到洛阳。为广泛宣传、推动国际贸易，隋朝官方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盛大的洛阳国际交易互市及游艺大会，其间，还举办了盛大的文艺会演，仅管弦伴奏人员就有1.8万人，歌舞表演者达3万人，丝竹之声，数十里外都能听见。

中国丝绸，古丝路上的“国际结算主要货币”

在丝绸之路上，丝绸不只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货币。很多大宗贸易就是用丝绸作为货币进行交易的，特别是牲口和奴婢。例如，唐

代敦煌和吐鲁番一带的马价一般在15匹练（匹练指一定数量的丝绸绢练）左右，较次的在10匹练左右，而奴婢的买卖价格有时可达40匹练。

用丝绸作为货币的另一个好处是不会贬值。丝绸之路沿途，特别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流通着波斯银币、铜币和丝织品三种货币。据史料记载，唐武周年间（公元690年前后）到天宝时期（公元745年前后）的55年间，银币与丝织品之间的兑换率一直是一匹练换十文银，而铜钱则贬值约30%。很显然，相对来说，绢练对于中西诸方来说具有公认的价值、较高的信誉，可以作为硬通货来使用。

古丝路上的“互利共赢”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的西传，最能反映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约在公元4世纪初期，中国的纸已由粟特人传到中亚，以后又传至非洲和欧洲。直到18世纪末，欧洲各国还是用中国的造纸术制纸。随着造纸术的西传，中国的印刷术也传至西方。公元8世纪，中国的火药技术，随着炼丹术一并传入阿拉伯国家，被称为“中国雪”。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的养蚕、冶铁、水利灌溉技术、天文、医药、文学技艺等也不断西传；出口的货物则以丝绸、茶叶、瓷器、金、银、书籍为主。

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影响很大的是宗教，故有人称丝绸之路为“宗教之路”。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传入中土，使中国宗教进一步多元化。唐代时，佛、道教盛行。众多中土名僧前往天竺求法，玄奘法师就是杰出的代表。

另外，通过丝绸之路，外来文化技艺和货物也大量涌入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文化技艺有：制糖、酿酒工艺，造船缝合技

术，东罗马、阿拉伯、波斯、中亚诸国、印度的医药、音乐、歌舞、天文、历法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货物有：葡萄、苜蓿、胡麻、黄瓜、胡椒、芦荟、核桃、琉璃、地毯、毛织物、蓝宝石、宝石、象牙、金银器、玛瑙、琥珀、沉香等。

乾隆版“一带一路”实践：经营大西域

雪珥 澳大利亚华人学者

1760年，清王朝大军彻底平息新疆地区（此前称为“回部”或“西域”，按后来左宗棠的解释，“新疆”之名称，即“故土新归”）的长期叛乱。在胜利捷报传向北京的同时，一个难题也摆到了执政者面前：如何建设新疆、发展新疆？

乾隆皇帝的行动是：复苏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繁荣。

简化行政审批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起来了。

此前，凡是前往新疆的商人，一律必须到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汗省乌里雅苏台城）“定边左副将军衙门”领取执照。乌里雅苏台远在漠北，内地商人们要先绕道这里办理手续，再万里迢迢前往新疆，如此一来，等于是筑起了一道行政壁垒，阻止商人入疆。

在战时，这一政策有其合理性，既便于政府控制入疆的商人数量，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不稳定，又便于政府调控入疆的商品种类，以优先满足军用。

平叛战争结束之后，乾隆的注意力放到了如何发展新疆经济上。而加大新疆的开放力度，鼓励新疆与内地的商贸，成为战略布局的关键。简化入疆经商的行政审批程序，顺理成章地成为乾隆的第一个改革举动。

中央推出了新的改革措施，内地商人入疆，一律改由鄂尔多斯、阿拉善、推河、阿济等地的沿疆地方政府核发入疆执照。在圣旨中，乾隆明确指出："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所关最要"，此次改革，"较之转向乌里雅苏台领照，程站可省四十余日，商贩自必云集，更于新疆有益。"

这样的改革，自然受到商旅的欢迎，这不仅是节省了40多天无谓的艰难跋涉，更提升了商人们对新疆—内地贸易的信心。

中央对于新疆的开放，不断加大力度，除了鼓励商人到天山北路经商外，还鼓励他们进入天山南路。乾隆皇帝多次亲自批示，阐述发展商业对新疆建设的关键作用，如"客民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耕亩日开，愚迁日众，则中外生计更饶"。乾隆皇帝还多次强调，在鼓励新疆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中，必须严格约束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谆谆教诲此事"须听商民自便""不可官为勒派""毋使青吏需索"。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起来了。一时之间，内地商民掀起了到新疆去的热潮，尽管新疆的条件十分艰苦，尽管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一个宣示要安守本分的政府，似乎解除了资本的顾虑。

入疆的两条主要通道上，车旅不绝——一条经张家口、归化，走蒙古草原入疆，另一条是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前者是晋商、蒙古商人的主要通道，后者是陕甘及南方各省商人的通道。

中央还鼓励新疆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同样在1760年，乾隆在圣旨中提出：“回疆今就平定，所有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等部人，均为大皇帝臣仆，尔部如欲遣头目入期，以展归化之诚，必代奏闻。”而对于内地商人和外邦商人，清政府在新疆都给予低税优惠，甚至免税待遇，大大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1762年，乾隆再度发布上谕，对于“自平定回部以来”该地区的局势稳定、治安良好、民族和谐予以高度肯定，继而提出应“晓谕商民，不时往返贸易”，同时，强调指出：“贸易一事，应听商民自便，未便官办勒派……若有愿往者，即办给照票，听其贸易。若不愿，亦不必勒派。如此行之日久，商贩自可流通矣。”

在政府的鼓励及有节制的管理下，新疆与内地的经贸交流大规模地推进。“中兴以来，西陲底定，拓地周二万里之广，内地商贾持币帛以来者，论蹄万计。天山以南、玉门以西，昔为游牧佳场者，今则为商埠重地矣。”（《新疆图志・赋税》）南疆地区的“南八城”，也迅速成为贸易中心，如叶尔羌，“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西域闻见录》）

法制推动繁荣

对于新疆的成就，连英国人都心生艳羡。大英帝国著名学者包罗杰，在其初版于1878年的《阿古柏伯克传》一书中，回顾了乾隆时期的新疆政策，盛赞道：“他们（中国人）能够给予当地的最大的恩惠当然是维持秩序。公平地在许多诉讼者之间保持平衡，乃是中国行政长官的第一条信条。在这个混乱的地区一旦能安定下来，贸易就复活了。大为衰落的当地工业又重新活跃起来；外国企业也被吸引到这个地区来，中国政权很快就使之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

“但中国人并不仅仅以维持良好秩序为满足……他们自己还做出榜样，使旁人感到应予效仿。富于进取性的甘肃、四川‘和台’商人不仅到达哈密和吐鲁番的市集，他们之中有许多还深入到喀什噶尔本部，并定居在那里。这些难能可贵的经商者填补了在这个地区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补足过的空白，因为他们带来了高度的事业精神和实践的智慧，还有他们特有的东西——资本。

“随着这些‘和台’商人之后，财富和繁荣都增进了。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田成了一等城市，1800年这个地区的人口达到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高）的数目。”

包罗杰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在贸易上一切不同民族之间也有完全的平等”，内地来的商人，“必须准备与浩罕人、喀什噶尔人、阿富汗人进行机会平等的竞争，他的籍贯并不能为他取得免税的优惠，或给他什么优于外国商人或当地商人的便利”。因此，如此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当地社会与当地商人。

而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怎样使用税收，它的行政管理以怎样的为公精神把税收用在当地的公益事业上”，包罗杰认为甚至都值得英国人学习。正是有着如此“为公精神”的政府，推进了新疆的普遍繁荣。

这是西方文献中罕有的对中国政府行政成果的称颂。包罗杰所总结的新疆成功之道，概括起来就是：

1. 公平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公正，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2. 廉洁高效的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3. 敬业的商人带来资本、经验与市场；

4. 平等的民族政策减少了无谓的冲突——此前及此后的历史都证明了，有任何偏向性的民族政策，对各方、包括受其庇护的

一方都未必有利。

稳定地开放了5年之后（1765年），新疆乌什地区发生暴动。暴动平息之后，对于内地商人入疆，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管理——“商民则北路携眷，而南路不得挈眷”，前往南疆的商人，禁止携带家属。后世一些人将此解读成隔离政策，实在有点刁难古人，毕竟，南疆限制的仅仅是商人不得携带家眷——在一个反暴恐成本高企的特殊时候，这样的限制符合情理。更重要的，这一限制令在半个世纪后也取消了。而即便在限制令推行的半个世纪中，除了曾对作为敌国的浩罕国商人实行过禁止之外，内地商人及外邦商人依然可以在新疆自由地经商。

当代美国汉学家濮德培认为，在当时的新疆，不同民族的“商人精英和官员结合得以获益”，而另一汉学家穆素洁也认为，乾隆时期新疆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发展，将该地区“引入国际贸易范围”。

这，当然不可能仅仅出于维稳“羁縻”的短期需要，更多的或许是基于一种大国自信的战略远见。

南疆货币特区

这无疑是最为与时俱进的“铸剑为犁”，兆惠实际上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体现其对新疆维稳大局的自信。

以军功而铭刻史册的兆惠将军，在写给中央关于新疆善后的报告中，却不惜笔墨，详尽地论述了货币制度在稳定新疆和发展新疆中的巨大作用，提出要实行货币体制改革，发行自主货币。

此时新疆，面对的最大金融困境是白银外流。乾隆在1760年的一份上谕中，坦承新疆遭遇的白银外流：“内地所用银两，携至外藩交易，有发无收，将来恐致耗散”。

新疆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结构单一，不少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必须依靠与周边邦国的贸易，造成出超；二是南疆长期被准噶尔势力盘踞，包括货币在内的主权实际上难以行使。

在兆惠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议：“回部钱文应行改铸”。所谓“回部钱文”，是指此前在南疆地区通行的准噶尔货币。这是一种铜质铸钱，当地称为“普尔钱”。

当时世界上最为通行硬币，铸造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西方通行的所谓希腊罗马式，以打压法铸造；二是东亚地区通行的所谓中国式，以浇铸法铸造。新疆虽然早在汉唐就纳入了版图，但总是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动，而常常游离于主流之外。

兆惠率军收复南疆，重新铸币发行，即便在主权宣示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回部钱文应行改铸”，不仅是经济战略需要，也是政治战略需要。

兆惠提出的铸币方案有两种。

第一种方案是“照内地制钱，每一文重一钱二分”。“制钱”，即制式铜钱，外圆内方，对于铸造方式、含量、铭文，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一方案的好处，一是简单，直接将内地铸钱所用的模型带到新疆即可；二是便捷，可迅速将新疆经济融入全国一盘棋中。而其不利之处，一是不符合南疆当地人的使用习惯；二是新疆经济百废待举，一步到位与内地货币并轨，可能会给新疆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

第二种方案是“即照回钱体质，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叶尔羌清文及回字”，即对南疆原先通行的“普尔钱”进行改造，铭文去除宗教教条，突出“乾隆通宝”这一主权标识，并使用汉满回三种文字。显然，这种折中方式，既顾及了主权宣示，又顾及了当地的使用习惯。

乾隆其实并未在这两种方案中选择，而是做出了“一疆两制”的第三种决策：在北疆地区发行内地的制钱，而在南疆地区，则采用兆惠的第二种方案，发行“新普尔钱”。

整个新疆地区，政府体制有三种形式，一是北疆地区的郡县制，与内地完全相同；二是吐鲁番、哈密及厄鲁特、哈萨克等地的札萨克制；三是南疆地区的伯克制。实行郡县制的北疆及实行札萨克制的吐鲁番等地，长期与内地经贸来往频繁，早已纳入了制钱的实际使用范围，可以一步到位推行内地的货币。乾隆的方案，是因地制宜的现实做法。

战争刚刚结束，铸造新钱所需要的铜材，短期之内还难以运抵新疆，尤其南疆，因此，兆惠建议：“现有铸炮铜七千余斤，请先铸五十余万文，换回旧钱另铸。”将铸造大炮的铜材，改为铸造钱币之用，这无疑是最为与时俱进的“铸剑为犁”。兆惠实际上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体现其对新疆维稳大局的自信。

“新普尔钱”弃用了此前“形椭首镜、中无方孔”的形状，而改用外圆内方，定重二钱，按照1∶2的兑换率回收旧钱，次年改为1∶1回收。如此优惠政策，大大加快了旧钱的回收速度。

与内地制钱多用黄铜且“铅四铜六”的比例不同，“新普尔钱”“悉提净红铜而成，并未配铸他项铜铅”，铜的含量高达90%，色泽呈现红色，因此民间又称“红钱”。

“新普尔钱”开始发行后，南疆地区出现了铸币厂，最早是在叶尔羌，而后扩展到阿克苏、沙雅等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原先相当原始的铜矿业，开始兴旺。政府鼓励南疆民众开采铜矿，铜矿的规模得以迅速扩大、技术得以迅速提高，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新普尔钱”在整个南疆地区发行，大大超过了此前准噶尔统治下只有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三地使用铸币的局限，解决了南疆其他地区的货币“短板”，令南疆商贸流通提速。南疆各级政府设立集市；中央财政则对南疆棉布等，实行政府采购，输往北疆以换取马匹。这种“绢马贸易”，既盘活了南疆与北疆的资源，又提高了南疆与北疆的生活水平，南疆以“新普尔钱”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也得以不断壮大，为数十年后在全疆地区推行“新普尔钱”打下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南疆实行单独的货币体系，有效地保护了当地新生的经济。晚清时期，内地多次发生“钱荒”，导致银价暴涨、铜钱贬值，而南疆地区的“新普尔钱”则因保护而一枝独秀，令南疆避免遭受内地货币波动的池鱼之殃。

对于政府来讲，南疆实际上已经成为货币特区，大大减缓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原先需完全从内地调拨的军饷和新疆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有相当部分可以“新普尔钱”替代。

压服西边强邻

乾隆皇帝的丝路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是西边的强邻阿富汗，时称“爱乌罕”。

按西方史学界的说法，彼时的“爱乌罕”，是一个与中华帝国、“准噶尔帝国”（实为中国之叛乱势力）在中亚地区足以鼎立的一

方，领土面积包括了今日的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以及印度旁遮普地区，其地位及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30年后派遣马戛尔尼到访的大英帝国。西方史学界一般称为“阿富汗帝国”，或者杜兰尼帝国。

阿富汗帝国皇帝爱哈默特沙（Ahmad Shah Durrani，此处循《清史稿》译法），也是一代枭雄。当中国在新疆的平叛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阿富汗帝国耗费数年时间，积极筹建反华同盟，于1757年计划挥师东进，与中国争夺南疆。这场可能的战争，对于已经在新疆陆续征战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平叛部队来说，压力不小：毕竟供给线过于漫长，且已经是疲敝之师，要与以逸待劳的敌军对抗，风险不小。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阿富汗帝国后院起火。这一年年初，被其征服的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发生了暴动，当地军民起而反抗阿富汗占领军，逼迫爱哈默特沙放弃东进，回师印度，镇压德里的暴动。这给了中国一个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顺利地结束了平息南疆暴乱的战争。

阿富汗帝国稳定了印度后，却再也无力东进，因为此时，被后来的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影响到亚洲了——英国人来了。就在同一年（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一举击败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孟加拉王公，取得了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为最后征服印度奠定了基础。无论是衰弱的莫卧儿帝国、彪悍的阿富汗帝国，还是强大的中华帝国，都将不得不面对这个从未遭遇过的劲敌。

在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中国与阿富汗都无心再发动新的战争，中国收复南疆之后的第三年（1763年），阿富汗帝国选择了向中国称臣纳贡。

阿富汗帝国遣使上贡，当然是乾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成果，因此他十分重视，为接待事宜就曾一天内连发三道圣旨。第一道

圣旨要求使节团所经过的“沿途各督抚，预备筵宴”，热情接待，“爱乌罕系一大部落，其使人初次经行内地，天朝百技，俱所未睹，所有经过各省会，理宜预备筵宴，陈设戏具，以示富丽严肃。”第二道圣旨说，对于阿富汗的使节，“理宜派出大臣护送。”第三道则是给阿富汗使团回程时，提供免费的骆驼，驮运“赏赉物件”，考虑得极为周详。1763年的正月初六（2月18日），乾隆在紫光阁宴请蒙古、回部外藩时，阿富汗使节是重要客人。三天后（正月初九），乾隆在畅春园之西厂进行大阅兵，阿富汗使节仍然是座上贵宾，接待规格很高。

然而，半个月后（正月二十四日，1763年3月8日），乾隆却在发给军机大臣的圣谕中说：“爱乌罕爱哈默特沙，初次遣使入觐，曾降旨各省督抚，沿途筵宴。今该使臣礼毕，回伊游牧地方经过处，应供给之项仍当妥协照料，不必筵宴。”取消了此前沿途接待宴请的待遇。

原来，在那些表面上洋溢着温情的觐见背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阿富汗使节居然拒绝叩头！这场争论，没有被记载到堂皇的正史中，但在正月初四（1763年2月16日）乾隆写给新柱等人的满文信中，有清晰的记载：“今爱乌罕使臣抵达后，虽跪呈奏章，却不肯叩头，恳请仍以伊等之礼朝觐。军机大臣等责称，尔汗遣汝何为，莫非不是前来朝觐？大皇帝乃天下一统之君，不但尔爱乌罕，凡俄罗斯、西洋人以及从前准噶尔人等来朝，无不行以叩拜之礼。君即如天，尔等难道亦不拜天乎？等语。反复晓示，和卓方转行叩拜之礼，但终究勉强。”（《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

这一“叩头”事件，比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的“叩头之争”，足足早了30年。但是，在这背后，并非乾隆真的为了所谓的天朝脸面，而是有着更为重大的战略考量。

乾隆皇帝在写给叶尔羌官员的满文信件中，指出：“纵览爱乌罕所遣使臣等举止，便知爱哈默特沙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久而久之，恐巴达克山人等或与安集延等处之人，伺机纠集骚扰我回疆地方，俱未可定。”因此，乾隆要求驻守在西域的军政要员们，“暂缓办理哈萨克事宜，要以全力应付回疆地方，一旦用兵，即遵陆续所降谕旨而行。”（《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

接见阿富汗使节，是乾隆本人的一次摸底调查。对于阿富汗帝国的好战与野心，乾隆皇帝并没有沉浸在其遣使朝贡的虚荣中，而是清醒地做出了两手准备。

1763年2月23日，乾隆向阿富汗使节颁发了赐给爱哈默特沙的敕书。这是一份表面十分客气，其实却是绵里藏针的外交文件。

乾隆先对爱哈默特沙“远在外藩，向慕仁化，遣使入觐”的“诚悃”表示赞赏，并给予丰厚赏赐。而后列举了爱哈默特沙的若干征伐，指出：“尔又云欲往攻布哈尔，闻已归附中国不便侵伐，足昭恭顺之忱。”乾隆说：“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赏善罚恶，惟秉至公。……且如尔奏、数年来各处攻战，未获稍安，则尔之属人，亦殊劳苦，尚其和协邻封，休养部落，俾群享太平之福，以受朕恩泽于无穷。”

从文字上看，乾隆是劝导爱哈默特沙少折腾、不打仗，但“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赏善罚恶，惟秉至公”一句，却含有浓烈的警告成分。叩头的礼仪事件之后，防范阿富汗及后来崛起的浩罕国，就成为清帝国中亚政策的准则之一。在乾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通商贸易与军事震慑两手齐备，两手都很硬。

低税未必有效

南疆初定，乾隆大力实行商贸开放政策，税收优惠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最初的税制，沿用了准噶尔的旧税率，即本地商人10%，外来客商5%。但不久，为了鼓励商业，这个税率又下降了不少，对于交易量很大的牲口贸易，本地商人为5%，而外来客商为3.33%（三十分之一），“其余皮张缎布，仍照旧例收纳”。

这一相当优惠的税率，自1759年开始成为大清国在新疆南部地区的法定税率，甚至，《户部则例》中还规定，对于来自巴尔替尔、克什米尔前来进行牲口交易的客商，税率低至2.5%（四十分之一）。而对于途经南疆的外国贡使团的随贡贸易，再给予半税、甚至免税的优待。

税收优惠力度如此之大，极大地促进了南疆地区的商业贸易，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舒赫德向中央不无得意地报告：“现在回部安静，其布鲁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贸易之人，络绎不绝”。

如此低税，当然是为了“放水养鱼”，外资大量进入新疆。而在经济上的考量之外，政治因素也相当重要：以低税换取政治上的安宁，“使各外夷凛遵天朝法度”。怀柔施恩是关键，经济利益其实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不幸的是，这种着眼于“羁縻”的顶层设计，到了基层执行者的手中，“柔”性被过度放大，尤其是一味减免外商税收，日渐成为常态，外商实际上享受到了超国民待遇。本应恩威并施的以外贸为工具的外交，“恩”成了唯一工具，“威”则荡然无存，反而示弱于外。

与南疆进行贸易的诸多汗国、土邦、部落中，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哈萨克、布哈拉及浩罕，而尤以作为地区强权的浩罕国为主。浩罕国虽从1759年开始对清政府表面称臣纳贡，但实际上对南疆怀有极大的

领土野心。浩罕商人遍布南疆各地，成为低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但其对此不仅丝毫不领情，反而四处宣扬这是因为中国出于对浩罕国的畏惧。

凭借其作为地区强权的国力依托，及在南疆境内的巨大经营网络，浩罕商人不仅承包其他外商的进出口，申请免税，从中渔利，甚至有组织地进行茶叶和大黄的走私，根本无视中国法律。更为过分的是，浩罕国甚至向中国提出，将自己的税收机构派驻到中国境内，对在华经营的浩罕商人征税。此举的真正目的，是要替换中国政府所认可的“呼岱达”——在华浩罕商人自治机构的领袖，将在华商人的自治机构改造为浩罕政府的外派机构，直接将其行政权伸展到中国的境内。

对于这种无理要求，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尔霍罕（浩罕）部落，不过边外小夷，天朝准令来往贸易，已属格外施恩，今尔敢为无厌之请！”清政府还希望浩罕国能换位思考：“天朝之人，岂无在尔处贸易者”，如果中国因此也要求“在尔境内添设官员，稽查税务”，无疑是“越界之事”，这是中国政府“不肯为”的。

苦口婆心的说理，毫无作用。当大小和卓在南疆发动多次叛乱，浩罕国不仅为其提供庇护，活跃在南疆的浩罕商人甚至还给予积极配合，这导致了清政府对浩罕实施贸易禁运，浩罕则悍然出兵侵入中国。

吊诡的是，双方最终在1833年达成议和，清政府居然同意了浩罕在中国境内的南疆征税的要求，其对象不仅限于浩罕商人，甚至包括别国商人。最初出于“羁縻”的税收优惠顶层设计，终于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丧权辱国。而这，比鸦片战争足足早了7年！

《剑桥晚清史》曾列举了18世纪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除了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欧洲人的到来”之外，还有两个就是

“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及“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后两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第一个变化。“到了19世纪初年，中国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看作是‘现代化’，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

新疆地区的开拓、乾隆版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行，正是这种“质变”的关键一步。

即便有诸多瑕疵，在新疆地区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维稳的思路，终清一代基本保持下去，在促使新疆顺利纳入1800年之前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框架的同时，也保持了国家西陲比较持久的稳定，并最终在左宗棠西征、新疆建省之后，得以收获更多的改革红利。

附录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

2 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一、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共建原则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

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三、框架思路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努力实现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基本形成，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

四、合作重点

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

要内容，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

政策沟通。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设施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

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

贸易畅通。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

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

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中国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鼓励本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促进企业按属地化原则经营管理，积极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

资金融通。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有关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在妇幼健康、残疾人康复以及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扩大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

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

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交往的桥梁作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立法机构、主要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欢迎沿线国家智库之间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等。

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强文化传媒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工具，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五、合作机制

当前，世界经济融合加速发展，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合作蓬勃发展。

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建设一批双边合作示范。建立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

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支持沿线国家地方、民间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联合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办好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倡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六、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西北、东北地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

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西南地区。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

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出妥善安排。

内陆地区。利用内陆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打

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加快推动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的合作。建立中欧通道铁路运输、口岸通关协调机制，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布局，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

七、中国积极行动

一年多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收获早期成果。

高层引领推动。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出访20多个国家，出席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发展问题，多次与有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进行会晤，深入阐释“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泛共识。

签署合作框架。与部分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与一些毗邻国家签署了地区合作和边境合作的备忘录以及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编制与一些毗邻国家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推动项目建设。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目。

完善政策措施。中国政府统筹国内各种资源，强化政策支持。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发起设立丝路基金，强化中国－欧亚

经济合作基金投资功能。推动银行卡清算机构开展跨境清算业务和支付机构开展跨境支付业务。积极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

发挥平台作用。各地成功举办了一系列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国际峰会、论坛、研讨会、博览会，对增进理解、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共创美好未来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的、包容的，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不断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

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在既有双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框架下，通过合作研究、论坛展会、人员培训、交流访问等多种形式，促进沿线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内涵、目标、任务等方面的进一步理解和认同。

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稳步推进示范项目建设，共同确定一批能够照顾双多边利益的项目，对各方认可、条件成熟的项目抓紧启动实施，争取早日开花结果。

“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只要沿线各国和衷共济、相向而行，就一定能够谱写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让沿线各国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共建成果。